

关于修訂版

本書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国史’批判”的第二次修訂版。初版是在什么意圖下写成的問題請參閱“序言”。

最初的修訂版，是一九五〇年二月由科学社以“日本历史——‘国史’批判补充”而出版的。在該書中作为战后的历史，又补写了一百頁左右的第十三章“佔領下的日本”。但是，在这一部分中，对美帝国主义佔領制度的批判是不徹底的，而对于战后的“改革”的評价也犯了很大的錯誤。

这一版，主要的訂正是把上述部分从根本上作了修改，而对于明治維新及以后的部分，有很多地方也都作了訂正。关于战后的問題，比采取編年史的方式，更多地采取了論述基本問題的方式。至于詳細的史实或論証請參看我与鈴木（正四）、小此木（真三郎）兩君合著的“現代日本历史”^{*}。

這本書，作为对現在正在复活中的反动的軍国主义历史的批判，作为日本史的通史，特别是作为明治維新以后的近代和現代史的概論，如多少能对讀者有所帮助，則幸甚。

井上清

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

* 該書已由世界知識社一九五五年九月以“战后日本”翻譯出版。——譯者

序 言

教学正确的日本历史的自由，也开始给予了我国的国民。我們对于这一貴重的自由必須立即并充分地去享用，而且必須在享用过程中使其日臻确实。自由，只有充分地运用，它才会成長和發展，否則它就会消灭。

正确的历史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够認識到，而正确历史的教学自由，也就不外是批判的自由。为对我国普及正确的历史，作为确立正确历史教育的一种努力，我对新的国定的国民学校历史教科書“国史”的批判作了尝试。

为了使“国史”含混的地方得以澄清，糾正錯誤，补充遺漏的重要事項，为了在教室里更好的講授这本书，为了給教学正确日本历史的人們提供參考，基于这种願望而將此書貢獻于世。

在此書章节的順序方面一切皆照“国史”，而且，在标题的項目方面也都沿用了“国史”的标题。但是在“国史”下卷江戸时代部分，我認為，其結構不論是在历史上或論理上都是很牽强的，如沿用这种結構，則不論补充多少，也是不能正确地說明該时代的，当然也是不能說明它向明治維新的發展过程的，而即使能够作到这一点，也極难对它作全面的理解。因此，在各节內容方面作了相当

的刪改，对每节內的項目的順序方面刪改的也很多。在明治以后，也同样地作了相当多的补充。

另外，我对于“国史”很多完全没有写的問題——其大部分都是关于人民的历史方面的問題——也作了增加和补充。有的地方“国史”中只写了三行，而在这里則用了数頁的篇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認为只有这样，这書才能起到作为一本独立的日本历史的概論的作用。其次，要說的就是，我虽然也注意到了应引起兒童兴趣的問題，但对兒童來說，我仍感到是过于理論化了。

二

关于“国史”，它是在散佈着严重的錯誤观点与荒謬言論。“国史”是“盟軍总部”批准的唯一的历史教科書，除此之外，是不准用来作教科書的，这是个事实。进一步說，也正是仗着这一点，所以它才不叫人去批判的。这是完全錯誤的，是沒有道理的。因为本来就沒有可以扼杀自由的自由，所以用反民主的軍国主义及过激国家主义或神秘主义来批判、解釋或补充“国史”，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但是，以民主的正确的学术与教育的立場，对此作自由的批判与討論，从民主教育的原則来看不但是無碍的，毋宁說是應該予以鼓励的。

“国史”編者之一的岡田章雄，在“朝日評論”杂志举办的讀書研究会上——这个研究会我也曾参加了——就明确地說过：“文部省只建議用这本教科書来教，但并沒說一定要教这本教科書”。以这本教科書为材料来講授正确的历史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够使它成为有用的材料。

另外，从“国史”的編纂手續上来看，我們也應該对它作充分的

商討。这本教科書是仅仅用了三个月，而且是毫無准备的，只由文部省自己，瞞着教育会与学术界所編造出来的。这一作法的不当，就是看看美国对日教育考察代表团向“盟总”提出的报告也都可以明了的。报告書中強調說，教科書是不應該由文部省来編纂，而特别是对于历史教科書來說，是“不能把編纂的責任委給文部省的。而是應該設立有能力的日本人的学者的委员会，为了重新編写日本历史来發掘有典据的、客觀的史料。也只有这种史料才能够作为編写教科書的基础”。从我們日本国民的立場来看，尤其是應該这样。而为重新編写日本历史教科書奠定基础的委员会，不仅应由学者来組成，而且也应该要有經驗的教師和民主組織的代表参加，否則是不能編写出真正适合于国民教育的教科書的。

“国史”是用与这个民主原則恰巧相反的方法編造出来的。这只能是暫定的教科書，迟早須以民主的方法来編纂一本确切而正式的东西。为此，对于这本教科書就必须从学术上、教育上、甚至扩大到从整个为推进日本文化的見地，民主主义地来加以自由的批判。历史本身就是批判，因此，如不能对历史教科書加以批判，那末历史教育也不能成立。

三

有人說民主立場也是一种立場，只要有一定的立場，則历史的真实性就会被歪曲的，正如軍国主义歪曲历史一样。前文部大臣安倍能成在职时的發言就是这种說法的代表。但是，如果沒有一定的立場，想解釋历史是不可能的，这是十分清楚的事情。連一个人的一天的生活都是由無數事情总合起来的，何况成千成万人的成千成万年的史实，当然更是錯綜复杂的。要从这里面找出基本

的与非基本的问题，并且还要将这些史实的彼此联系弄清楚，若是沒有一定的基准和一定的立场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问题并不是說不站在任何立场就不可能得出結論，而是說站在什么立场才能更好地、沒有錯誤地选择与 解釋史实。在下結論之前，可以說，所謂正确的立场，就是創造从現在到未来的立场。要創造未来的人，要超越現代向前进的人，首先就必须充分正确地認識現代的構造。如果不知道何者是有助于前进，何者是阻碍前进的話，那末，我們是不能够正确地前进的。因此，要超越現代前进的人是要求把自己認為是不愉快的，不合宜的事情的赤裸裸的真实一齐毫不隱瞞，毫不歪曲的予以究明，也就是說，是要求究明現在是如何的 为过去所形成，而未来又將是向着什么方向發展。相反，那些停滯于現在，只想維持現狀和留恋过去的人，則是不想知道也不想叫人知道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过去的。

創造从現在到未来的立场，就是現在沒有特殊利益的，不满足于現在的人的立场，也就是人民的立场。只有貫徹了进步的人民的立场，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过去。

現代日本的生存道路，除民主主义以外，是別無他路可走的。但这并不是說由于战 敗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即使不願意也得要順从民主主义。相反，其所以从事必然要失败的战争，也正是因为日本沒有民主主义的緣故。并不是說現在才这样，而是說从一开始如果沒有民主主义的話，那末也就不可能产生这一 文明世界的。如果創造历史的原理非是民主主义不可，那末，解釋历史的原理，也就必然要是民主主义的。

虽然說民主主义和軍国主义 都是一种立场，但这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同时，也正因为軍国主义不容許批判，因此，在这里也就

不会有学术，而民主主义却正是以自由批判为其存在的基础，因之，它也就是与学术的原理相輔而發展的。

从上述情况看来，民主主义的立場即創造从現在到未来的人民的立場，才是唯一的正确地學習历史的立場。这一点也是很明确的了。安倍能成等所謂的以民主主义立場来写历史，則历史就要被歪曲的这种說法，实际上也不过是在为过激国家主义和軍国主义而辯护的。

四

正确的历史学术得以成立的原理，也是正确历史教育得以成立的原理。在欧洲，对于一般民众的子弟施以历史教育，已經是十九世紀中叶的时候，是民主主义已經充分确立了以后的事情。而且，其教育的目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在培养学童对于現狀能有正确批判的能力，在于給他們能动性的力量去生活。

我認为我們的历史教育，也必須要有同样的目的。

历史的講授并不是在于講解过去的事情，而是在于培养理解現在的能力。

也只有通过历史的講授，第一，才能够發現和組織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区别輕重，辨別真偽，也就是說，是在于培养兒童的对历史的批判能力。第二，是批判地寻求历史进步的痕跡，認識哪些是有助于进步，哪些妨碍进步，認識現代是如何形成的，进而能够对明天的情况作历史性地展望，給予为历史的进步而工作的力量。

历史的講授也并不是在于講解別人的問題，而是使兒童自己去發現問題的。如果从認識过去，認識世界和認識現在当中不發

現自己，不了解自己應該怎樣做，那末历史教育也是沒有意义的。过去的历史教育都是講解皇室、將軍、官吏等等別人的事情，講解要服从別人的事情。因此，在講解方法上，也只是在于叫兒童背誦国訂教科書。而对于兒童發現疑問，自己去研究一事，也就不能不施以压抑。現在我們的教育又复納于正軌了，因此，就必須十二分地尊重兒童的自主性，努力使历史教育不变成强制背誦，而是使它成为兒童走向人生的生动的力量。

为了貫徹这样的正确的历史教育，在教学历史时，就必須要經常地注意現在的，每天在發生的問題。当然，对于現在和过去是不应当机械地去联系或者机械地去类推的，但是也只有从过去才能了解現在，从現在才能認識过去。現在是过去的結論，如果不知道这个結論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是不能够說已經認識了真正的結論，同时，若是不了解現在的結論，也就訂不出探討这一过程的出發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历史的講授，使兒童研究現在的報紙是很有益处的。使他們研究以一星期、一月、或者一学期为期的主要的問題。不但要讀商業新聞，而且也要讀政党的新聞，这样就能够使他們自我养成对于史料的批判的处理的能力。

最近各学校盛行着討論法，但这只限于在公民科方面的問題，似乎尚未普及于整个学科。对历史的講授是迫切希望用討論法的。教师站在講壇上，填鴨式地使人記筆記和背誦的“印刷术發明以前”的作法，在法国已經是拿破崙第三的帝政时代的事情，現在除了日本以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出这样愚笨的事情。我在本書中虽然有的地方也提出了对于实行討論法是很合适的問題（在举例說明的意义上，一开始是常常提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提出什麼問題，都可以与已經学过的和現代的問題相比較，利用国語讀本和从其他方面得到的知識来实行討論法。

五

究竟“国史”能否作为正确的历史教育的教科書，由于本書以下的詳細的研究就可以明白。但在这里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国史”虽然說它是不站在任何立場，但实际上却是以皇室中心主义的立場来选择和解釋史实的。讀“国史”的人都感到它是曖昧的、含混和枯燥的，而这一切都是起源于它不是像战时教科書那样正面的提出，而是偷偷摸摸地在主張着皇室中心主义所致。事实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战后最初的文部省在“为适应新时代，茲將国史教育的方針改革如下”的第七項第五条就明目張胆地說“究明在我們国家社会發展中的以皇室为中心的一大家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史实”。其后，它虽然不再这样露骨，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得隱蔽了一些，但“国史”是基于这一方針写成的，那已經是很明显的了。

“国史”中关于皇室方面都使用了敬語，但我在本書中不管是对皇室或是其他任何个人和团体一概都不用敬語。因为第一，本書是純学术性的著作，而在学术的領域內，对于特定的人使用敬語是沒有必要的。即使是著者所崇拜的人物，从学术上来論述时也是無須用敬語的。

第二，根据新宪法，主权在于国民，这是很明确的，天皇只不过是既不在国民之上，也不在国民之下的一介国民，这一点連現在的天皇都不例外。何况从历史学上来处理历史上的天皇时，是更無須使用敬語的。在政治、交易和社交上，妥协和斟酌是必要的，但在学术和理論上，却不应当有任何妥协和斟酌。我不管是在敬語問題和其他問題上，只是在于要真实地作科学地探求并將其毫無掩盖地予以發表，而別無他意。

著 者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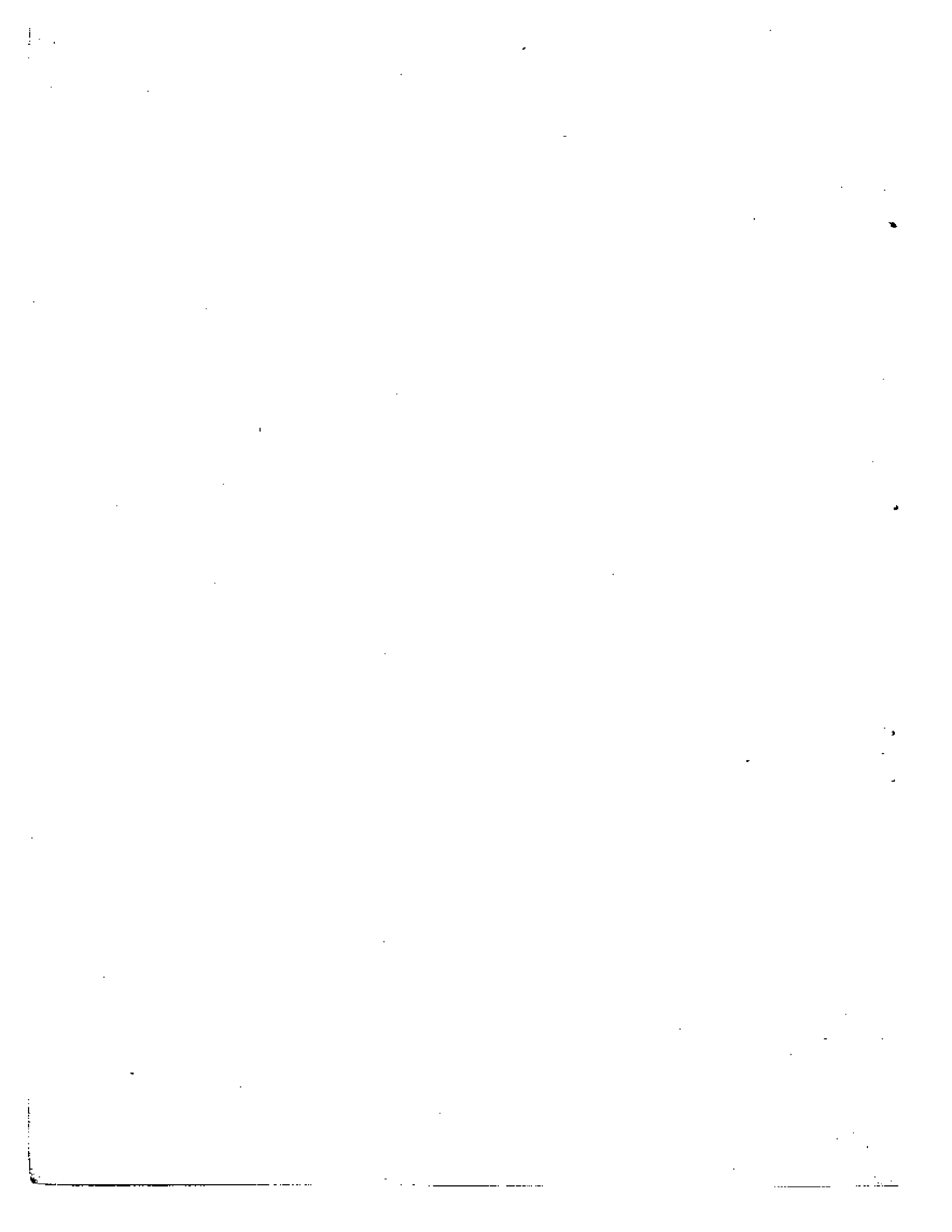
目 次

序 言

第一 日本的起源	5
一 历史的开端	5
二 大和朝廷	20
三 大陆文化的容纳	27
第二 走向开化的日本	30
一 聖德太子	30
二 大化革新	32
三 京城——奈良	39
四 与外国的交往	47
第三 平安京时代	48
一 平安京	48
二 藤原氏的兴盛	50
三 燦爛的文化	53
四 地方的状况	56
五 武士的兴起	61
第四 武家政治	65
一 鎌倉幕府	65
二 社会和文化	70
第五 从鎌倉到室町	77
一 建武政治	77

二	室町幕府	82
三	经济与文化	89
四	走向新时代的动向	92
第六	安土和桃山	100
一	国内的统一	100
二	外交和文化	103
第七	江戸幕府	106
一	江戸城	106
二	朱印船	110
三	鎖国	112
第八	江戸和大阪	117
一	农村和城市	117
二	元祿时代	123
三	学問之道	147
第九	幕府的衰亡	162
一	世界动向	162
二	开港	169
第十	明治維新	183
一	新政的成立	183
二	新社会	200
三	文化的动向	207
四	立宪政治	211
第十一	世界和日本	221
一	明治外交	221
二	东方的糾葛	223
三	产业的發达	233
四	明治文化	240
第十二	从大正到昭和	244

一	歐洲大戰和日本	244
二	侵佔中國東北	264
三	太平洋戰爭	289
第十三	走向和平、獨立和民主的日本	307
一	戰爭帶來了什麼	307
二	虛偽的民主改革	311
三	走向殖民地化和法西斯化的道路	318
四	戰後世界	323
五	朝鮮戰爭和單獨媾和	331
六	獨立、和平、民主勢力的發展	342



第一 日本的起源

一 历史的开端

历史的开端 社会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的历史。从最发达的类人猿到人的飞躍的发展，就是劳动的结果。猿在爬树时，其前肢(手)和后肢(足)的作用已经是不同了，当它上树或在平地上摘食果实和嫩叶时，拿木棍打落手所够不到的地方的东西以及保卫自己免受袭击等等，所有这一切由于劳动而使前肢和后肢所起的微小的不同的作用，经过几万年、几十万年，逐渐地使前肢发展成为手，并且使手从脚中独立出来。以两脚支持着身体的重量行走，使手由行走当中完全解放出来，专门去拿取或抛掷物体时，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在最初的动物学意义上的人类。

开始有了自由的手的人类，由于劳动就使手日益发达起来；手指的动作也更加巧妙，还做到了其他任何动物所不能做的事情，即生产了劳动工具和器具。例如将自然界中原有的石头，用另外的坚硬的石头，将其一端凿成凹凸不平的形状以便于把握，并将它作为剖开核桃等硬壳的工具，这已是相当发达了的工具了。总之，人类就是这样的，并不仅止于用自然界中原来就有的东西，而又在改造自然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方面，即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反

过来又在支配自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样，人类就完全与其他一切动物不同了。

但是，在森林中只是一个或两个人的分散生活，那末人类也绝不会成为人类的。人类从最初就是构成了集团、组织了社会而生活的。他们在这种社会生活中彼此交换了知识和经验。也只有这样，人类才发明了工具，才学会了自由地使用有着惊人力量的火，才使语言发达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生活，那么人也是不能成其为人的。

人类在最初主要是以打手势或身势来表达思想的。在人类使用工具，从而使社会劳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立着行走，脊椎骨也笔直地发展了，喉嚨的构造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样就更便于发声。此后，随着与打手势和身势相联结的固定了的声音，也就有了固定的意思。与这一过程的同时，另一方面，人们共同劳动的社会生活也发展了，彼此沟通意志的需要也日益增加，因之，也就愈需要交谈更复杂的问题。这样，渐渐地，声音和语言就发达了。语言是社会共同生活的产物，这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实际上，也不能够想像，在沒有交谈对象的单独的个人会有什么语言，只有语言才是整个文明的根本手段。

人类由于劳动，就使社会组织日益发展，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像动物那样仅仅保持自己和子孙的繁殖，而且，还要把自己从饥饿和自然的威胁当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利用自然，使学术和艺术产生并发展，使爱情、自由和幸福等高度的欢乐得以发展，历史就是这样的过程。然而，这不是说所有的人年年都是度着同样的丰富的生活过来的。相反，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实际上从事劳动生产的大多数的人，却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的痛苦。作为整个人类，虽然是从自然的束缚和压迫当中一步一步地确切地得到了

解放，但人类的大多数，却受着同一人类的极少数的社会压迫和束缚。到了现代，人类的先进部分——在社会主义各国——才将这社会压迫根除了，现在整个人类也正在向着这一方向前进。

没有劳动，社会也就不会发展，因此，生产的复兴和祖国的重建，首先就必须使工人、农民和市民等劳动生产者能够有足以使他们快乐的安心工作的收入，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这也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人类历史的起源，就极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说明了在历史当中的劳动的本质的决定性的意义。

从地球上出现了现代人类以前的人类历史的大体情况来看，也说明了社会劳动是历史的创始，而且，也是历史的唯一的原动力。

关于人类的概述，在苏联学者伊林的“人类的历史”这本著名的书中写的很详尽。

根据这本书，可认为是地球上最初的人，是出现在地质学上的第三纪末或是第四纪初。话虽如此，但第三纪和第四纪之间就差了几十万年，然而，不管怎样，最初的人的出现，最少也是在三十万年或是一百万年以前的事情。这个最初的人叫“爪哇人”*，他很类似猿猴，但很明显地，他是以两条腿直立的，眼睛不是往下看，而是向前看着行走的。这种猿人的残骸已在爪哇岛发现了，而从爪哇岛同纪的地层当中，还发现了虽然是极原始的，但显然却是为人所加工了的石片即石器，就是说，有人的地方是必然有工具的。

同样，也相当于第三纪末与第四纪初的地层的北京西南方周口店的洞窟中，也发现了人骨。这与德国的海得尔堡所发现的人骨极为相似，而且还是比“爪哇人”更为发达的人。这叫做“北京

* 爪哇人 (Pithecanthrope Erectus) 为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在爪哇发现之直立猿人骨，故亦称 Java man。——译者

人”。这种北京人不但有了石器，而且也有了用火的遗迹。

从北京人和海得尔堡人到現在的人类的發展过程中，还先后發現了內安得塔尔人*、克罗瑪尼揚人**及其他与現代人不同体格的人。在几十万年間，地球常常有过被冰河所掩盖的时期，这时很多的动物都死灭了。但只有人类，在海得尔堡人死灭之后，跟着就出現了更进步的內安得塔尔人，而在这种入灭亡之后，又出現了比他們更进步的人类。关于这一点，虽然沒有遺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說明这一切原因的迹象，但可以想像人类不外是忍受着寒冷，在地球的某些地方生存和發展了的。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只有人，才借助于社会生活，發明了工具，知道了用火，并且，人还能在空間方面及時間方面，將这一切彼此相傳所致。

考古学者們，为研究沒有文字的原始时代，首先注目的就是工具。从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就能够究明这种人是有着什么样的文化、从什么地方如何地受到和發生了影响。而这一情况也就無可辯駁地說明了文明的基础就是物質生产。

風土、地理和历史 “国史”是从描写日本列島的風土开始的，而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却几乎是不能理解的。其中写的是，在亞洲的东端，島嶼貫南北，这里既不酷热也不寒冷，雨量“适宜”，“四季如春”。这就給人一个印象，似乎是要对这个地上乐园，講一番詳尽欢乐的，美丽的故事似的。然而如果这不是对自己国家的非科学的驕傲，而是作为历史环境的地理条件來說的話，那末它就有了含义。关于这一点是不能如該書所談的那樣，將自然的和地理

* 內安得塔尔人(Neanderthal Man)主要是欧洲洪积世(Diluvial epoch)即第四紀中之前世的原始人类。一八五七年在德国莱茵河支流 Neanderthal 谷發現此种人骨。——譯者

** 克罗瑪尼揚人(Cro-magnon)在法國 Dondogus Eyzies 附近之 Cro-Magnon 發現之原始人骨，因名之。——譯者

的条件絕對化的。固然，位置、風土、資源也能够影响历史，然而它并不是决定性的。而其所以說它影响历史，也只不过是表現在社会越不發达，那末这个社会从屬於自然的事情也就越多而已。

認為气候能影响人的性格并能决定文明的想法，在十八世紀时是曾盛行过的，但現今在学术上已經是不成立了。气候及其他地理上的多种条件，大体上几万年之內都沒有什么改变，而人类社会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还不足一千年的時間就已經完全轉变，由此，也就可以明白自然条件并不是絕對的。在資源方面也是一样。在日本，石油和煤，作为可燃燒的水和石头，在八、九世紀就已經知道了。但其成为資源，却是近代进入資本主义时代以后的事情。最近南極应屬何国的問題成了一个大問題。过去南極只是作为捕鯨地区来考虑的，并未發生过認真的領土問題。而現在之所以成为一个問題，就是因为估計在这里可能埋藏着大量的鈾礦所致。由于原子能科学的發达，就使南極將要成为一个極重要的“資源”地帶了。物質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但其所以能够有意义，就是因为人的社会生产对它賦給了意义所致。

就是在風景方面，“美丽的風景”本身是不存在的。人类判断風景美丽与否的标准，也是由于社会的不同而不同的。例如平安朝的貴族不但不感到波濤洶涌的大海的美丽，相反，却感到是可怕。

关于位置在历史上的意义，就更是系于社会生产和交通工具的發达程度的。所謂历史上的位置，并不仅仅是經度和緯度，而是对周圍社会的位置。“国史”在开头所說的，“在亞洲大陆东端的海面上，橫貫南北的細長的列島”，只是地理上的位置而不是历史上的位置。当然，有这么多的叙述，也並沒有什么不对，但“国史”仅写这么多就算完結了，却是不对的。如其是这样写，倒不如从东亚文

明的起源写起却更能說明日本列島在历史上的位置。

至于日本不酷热,也不寒冷,雨量适宜,四季如春等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美的詞藻而已。从对这几行的錯誤的批判,就会使我們更能了解人类对改造自然的历史的意义。如以最近对我們日常生活很苦惱的电力不足的事实来看。电力不足,据說是因为現在日本的發電設備方面水量不足——即雨量不足的緣故。但另一方面从每年的台風事件来考虑,又不能不說雨量是过多的。但如果电力工業民主化了,設備也改善了的話,那么雨量是不会有过多与不足的。同样地,如治山、治水和灌溉良好的話,那么台風也可能成为自然之惠的。在寒冷方面也如此,在住宅的取暖設備齐全的欧洲,气温要比日本低,但也并不能使人冷。农业技术进步的的話,像西伯利亞这样世界上最冷的地方都生長了小麦。这一切事实就可以使人明白該書的錯誤了。

原始生活 現在的人类可以認為是与克羅瑪尼揚人有直接联系的,是距今三万年至五万年以前,在地球上出現的。大約距今一万年以前,人类就不仅仅像在这以前那样,敲打或削成了石片,而且也懂得了通过研磨,制成更精致的东西。这样,精巧的石斧或石鏃就出現了。这种研磨的石器叫做新石器,而在这以前的石器則称作旧石器。人类的进步从这以后就加速了。逐渐地积累起来的人类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技术的發展,加速了生产力的提高。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在部分的地方就开始了用粘土来制造土器。最初,多半是在小树枝和树皮編成的筐上塗以粘土,弄結实以后,經過火燒,树皮燒掉了,这时却發現粘土之型比以前更为坚固。恐怕就是在这种經驗的积累当中,人类才懂得了制造陶器。

在此前后,有些地方也开始了用銅来制造器具。此后又經過二、三千年以后,即距今約六、七千年前,就开始制造了青銅即銅和

錫的合金。石器和銅器仅仅是对自然材料加工变形，但青銅却是使自然材料变了質，到了这时人类又飞躍地向前發展了一步。这种金屬文明最先發达的地方是小亞細亞。有趣的是，世界的人类在任何地方都是經過石器——銅器——青銅器的順序来制造器具，而在最后，在距今約三千五百年或比这更以前的一些时候，就逐渐地开始使用了鐵器。

農業的起源 在进入青銅器时代以前，人类只是撈魚、貝，獵野兽，摘取自然界的草和树上的果实、叶子和根或是拾取昆虫来充飢的。其后不久，人类又終於發明了農業。这是可与語言的發明，火的使用相提并論的人类的根本發明。至于農業的發明主要是女子的功績。当男子狩獵的时候，女子就去搜尋植物性的食物，在这过程中恐怕也曾有过吃了毒草而死亡或害病的事情的。这样，經過几千年，就知道了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好的，也稍稍理解了一些植物發芽或成長的情况。恐怕这也是因为曾經几次看到熟落了的果实落在松软的土地或是具有适当的水分、日光及其他合宜条件的地方發芽生長情况的緣故吧。同样的事情，其他的女子們也都懂得了。这种整个社会的經驗被集中起来，最后，太古的女子們就懂得了掘土、播种和澆水等等工作。在下埃及到中埃及一帶，在紀元前一万年前后就种植了一种小麥，这是現在所知道的最古的農業。繼此知名的便是小亞細亞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斯河流域的農業。这里也是銅器和青銅器最初發达的地方。不久，这个从小亞細亞到埃及一帶的農業，就很快地普及于周圍各地，使太古的文化益加燦爛。人类最初的文字也在這一帶創造出来了。

紀元前四二四一年在埃及創造了历法。这是現代明确知道的最古的年代。

从小亞細亞地方开始的生产革命，也傳到了东方印度和中国

的甘肅、青海地方。在中國的黃河下游也獨自地擴展了原始農業，牛、羊等也作為家畜來馴養了。這樣，在四、五千年以前在印度河和黃河流域，就種植了麥子和黍子，器具方面青銅器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還馴養了牛、豬、山羊等家畜。此後不久，在中南歐也進入了農業、牧畜業和使用金屬器具的時代。

在日本 由此看來，日本歷史的起源是較晚的。雖然不知道人類從何時才開始住在這一系列島上，但根據現在所知道的遺物和遺跡來看，日本是沒有舊石器時代的人的。很可能距今五千年以前，——或者是七、八千年以前——從居住在現今的中國東北和濱海省一帶，使用新石器的移住於這一系列島上的人，才是最初的列島上的居民。其後，就由來自北方的蒙古系人種和來自南方的印度尼西亞系人種，相繼在這一系列島混血融合後，才成了單一的日本人種。“國史”的本文（簡稱本文）在“原始生活”中，並未涉及到日本人種問題，但也必須弄清楚日本人是混血人種的。而且，這種混血過程還不只一次，而是經過了數次的。從時間上說，在紀元前後就逐漸開始，其後，在九州和近畿地方* 也相當多地與漢人及朝鮮人種實行混血，在關東和東北地方** 則盛行了與倭奴人的混血。

在列島之外都進入了農業、金屬器和鐵器時代，文字也發達了，在希臘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等偉大的哲學家為創始，發展了甚至在現代也仍有着不朽光輝的文學藝術，在印度出了釋迦，在中國孔子和老子也在活動了，這時候，在這一系列島上却還過着從自然拾果實，撈魚、貝于海河，獵鹿、豬、兔于山野的漁獵經濟和使用石器的生活。

* 近畿地方為本州島西南部以京都、大阪等地為中心的地區。——譯者

** 關東地方為本州島中部太平洋沿岸一帶的地區。東北地方，是以秋田、山形等縣為主要地區的本州島東北部。——譯者

当孔子、释迦死后四百余年，始皇帝的秦朝已亡，汉朝统一了中国，武帝征服了周围的各个民族建立了一大帝国，甚至朝鲜，在当时也被併入了他的版圖。

到了紀元^[註]前一、二世紀，日本列島在大陆的强烈的影响下，才开始进入农业和金属器的时代。本文中所写的“生活的变化”就是指这个来说的。

氏族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以前我仅就生活现象，作了一番说明，但实际上却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即石器时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它都是氏族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比人们吃什么，用什么工具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具属于谁所有，是谁用它来劳动，人们彼此间是以什么关系来劳动、生产，而人们的社会的方式又是怎样的问题。

日本列島在漁獵經濟时代当然沒有，甚至就是农业开始后不久也是沒有过人剥削人的情况的。也就是說，在社会上，还没有一部分人自己壟断土地和工具等生产資料，而驅使沒有这些生产資

[註] “紀元”是国际紀元。其所以称其为西历虽然是与皇紀相对而言的，但正如将在下面要談到的，“皇紀”完全是非科学的，作为紀年法来说是無意义的。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相对地称其为“西历”，只称作紀元就可以了。这一紀元是以給西洋人的精神生活深刻影响的耶穌基督的生年作为元年的。他到底是否是在这一年誕生的問題，虽不肯定，但他生在这紀元前四年的說法却是有力的。可是根据最近的研究，对于究竟有没有基督这个人也發生疑問了。但現在不管这一年是否为基督的生年，一般都通用了这种紀元。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这一年与基督的关系真伪不明，但与其他历史上的各种事实之間的关系却是很清楚的。在日本的所謂神武紀元，則是以神武天皇即位的一年作为紀元元年的，但所謂神武，实际上是并無其人的，而且这一紀元元年的一年与历史上各种問題的关系，除神武即位这一架空的概念以外是別無他物的。也就是說，这一年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年份，而只是神話上的年份，因此，是不能以此作为紀元的。如果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神武紀元在实际上是多出了六百年一事是事实的話，則神武元年这一年即使是不正确，却也会成为实际存在的年份，但因神武即位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实在的，所以，只有与神武即位联系起来才能存在的神武元年也是不实在的。基督紀元是先有了实际存在的年份而后才与基督相联系起来的，所以，即使基督在实际上不存在，但在紀元的年份方面是仍然有其价值的。

料的大多数的人去劳动,而自己則从中發財的情况。

当时,人們單純地是由共通的母亲的子孙們組成了巩固地結合起来的集团和氏族。結婚是一个母系的子孙的所有的兄弟姊妹与另外一个母系的氏族的兄弟姊妹集体举行的。結婚之后,夫妇也不同居,女方仍留在原来氏族內,男方則到女方去,所生的孩子則成为母方氏族的一員。因此古日本語的“亲”就是母,而母也有着祖先的意思。所說的“妹”从男方來說,就是姊妹,是爱人,也是妻子。相反地从女方來說不管兄弟,爱人和丈夫皆称作“兄”。这是与兄弟姊妹实行了杂婚有关的語言的用法。

氏族中主要的生产資料——土地,从事漁、獵用的網、船、弓箭等——是公有的,不管是建造房屋——即掘洞窟——或是捕魚和狩獵都是共同劳动,而由此得到的收获物,也都是共同消費的。他們死后都是葬在共同的墳地的。这里也沒有特別上等的墳地,从这些墳地中發掘出来的物件,經過研究之后全都是同样的日用品,並沒有特別高級的裝飾品。

这些情况就說明了:在氏族社会中,貧富之差和身份的上下是不可能有的,而实际上也是沒有的。“日本書紀”*中記載,当皇室征服了全国各地时,在关东地方的很多农村中,都是沒有統治者的,这說明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遺跡,甚至在皇室成立之后,在地方上也还是殘存着的。实际上,氏族的公共事务,都是由氏族的整个成年男女的平等的集会来决定和实施的。氏族的代表与战时的軍事首領,虽然也存在过,但他們并不是由特別的家系**和身份所規定的,而是由大家的选举产生的。有时女子也被推选为代表。

* “日本書紀”原称日本紀,为日本六种史書之一,公元七二〇年(养老四年)写成。当时执笔者多曾留学長安、洛陽,入唐朝太学多年。全書是用汉文写的,并采用了唐以前的中国正史中的本紀及表的体例。——譯者

** 即封建的門第制度。——譯者

日本在三世紀時，在各地就已出現了階級和國家，中國古書上就曾記載着其中之一的耶馬台國的女王就是由貴族的選舉產生的。這是母系氏族時代形式的殘余。另外，兩個或兩個以上血統相近的氏族就組織了胞族。而且，近親的各氏族還結成了更大的稱作“部族”的組織，部族也有着民會和軍事首領。

生活的變化 所謂生活的變化，並不是如本文所說的那樣僅限於農業和使用金屬器具的開始，而是應指原始氏族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之後，出現了私有財產制，開始了階級與統治而言的。

農業開始時，僅僅是由女子或兒童來做的事情，但逐漸地男子也參加進來了。與此同時，在一定地方定居的情況也愈來愈多，生產也迅速地向前發展了。雖然農具仍是石耩和石鐮，但就是使用這種工具也使收穫漸漸地得到了保證，人們也就沒有必要為找尋一日、一年中的食糧而徬徨了。生產力一提高，氏族的人口也增加了，這樣，就更提高了生產力。正因為如此，所以氏族或部族的公共事務也就愈來愈多和愈複雜了。因之，從事於這種事務的人也就成了專家，他的地位也很容易地逐漸地被固定下來了。

另外一方面，氏族中也不再集團結婚，而開始出現以一組夫婦為中心的家族。並且，由氏族公有地當中劃出一定的土地，使相同的家族年年在這片土地上耕種的情況也開始了。由於社會分工的發展，用轆轤製造土器和石器的人也出現了。也就是說，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使個人的勞動也發展了。這樣，認為這是由自己勞動所製造的，因之就應該為自己所有的思想也產生了。

由於氏族制時代生產力很低，只有大家都去勞動才能够生存，而且，社會上也沒有供養游手好閒者的余力，因此，也就沒有剝削者出現的余地。這時，由於生產力提高了，因之，也就產生了自己不勞動，而去剝削別人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一个氏族与另外一个氏族之间的经济力量的差别也产生了。在农耕方面佔有着便利地点的人们与相反的人们之间，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可能是有着相当的差别的。而且弱的氏族也开始被强的氏族所征服，并使之成为他们的奴隶。在此以前的生产力低下情况下，即使人被变成了奴隶，也只能够生产为奴隶生活所需的东西，因此，对于奴隶主是没有什么利益的，因之，也就没有产生奴隶。但当生产力提高了，人们能生产比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更多的东西时，也就开始有了将人作为奴隶来进行剥削的可能。

如此，最初的为氏族所共有的奴隶就产生了。由于这一事实，就破坏了氏族是原始时代由平等的有血统关系者的结合这一原则，并且，还吸收了形式上是奴隶的不平等的血统以外的人到自己当中来了。它不久就变成了破坏氏族的决定性的力量。此后，所说的氏族和部族的发展，就不外是指它们拥有了更多的奴隶，但一部分被认作是动产的为氏族所共有的奴隶，有时也成了对俘虏奴隶有功者的个人的所有物。氏族和部族的军事首领及其他由氏族成员中选举出来办理公共事务的人，也就私自佔有了奴隶并逐渐地成了在氏族内部有着特别多的财富和独佔了有力的地位的人，最后，他就变成了氏族的领袖。他不但将一般的氏族成员置于他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还征服了弱小氏族，使它们进献贡物。统治者为了防止奴隶或被征服者的反抗，就建立了特别的武装军队、警察和官吏，而为了要维持这些人，也就不能不实行征税。

生产力的发展——剥削的可能性——私有财产制——阶级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贡物、税捐、军队、警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之后才产生了国家。而法律则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意志的表现。在此以前，人们仅仅是由血统的联系来结合的，而现在就

不管血統的有無，只要在一定地區居住的人，都在有着私有財產并借此剝削別人的一種權力之下，結合并被統治起來了。

能干的人們 在“歷史的開端”這一節內特別重要的是在於理解勞動在歷史方面和社會方面的意義，理解從沒有國家的平等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國家的形成的意義。國家從五十萬年以上的人類的歷史來看，只不過是在最近七、八千年以前才開始的。在日本也只不过是約在二千年以前才開始出現了小的類似國家的組織。私有財產制度也是一樣。國家只是私有財產制和階級對立的結果，是作為剝削階級統治被剝削階級的機器而產生的。

“國史”對這些事情一點也沒提，只是寫了一些衣、食、住的現象。本文在剛剛說完了能干的人是為了人們的幸福而創造了國家之後，就自相矛盾地說，“隨着社會的前進，就出現了能干的人物，他們歸并并指揮了這些村莊”，說明了最初的統治者和國家出現的情況。但聰明的孩子會問“那末在古代難道就沒有過指揮者嗎？”在這裡“指揮”與“統治”是被用作相同意義的，其實是沒有比這更詭詐的了。在共同生活當中指揮者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存在過的。但是指揮者並不是自然地成為統治者的。在氏族社會中也是有过指揮者的。但這只是如本文所說的，是在“人們合力”去從事於農業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大家選舉的。然而，這裡所說的“指揮”者却與此不同，他是統治人們的人。他並不是以特殊“能干”的人物的身份來為村人謀福利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達之後，就立即將其利用於自己的私利方面，累積私有財產，成了剝削別人的人。

變化和進步 “國史”中雖然也提到了“變化”，但卻沒有提到“進步”這一歷史上的重要的概念。本文中雖然也常常出現“社會在前進”的字樣，但這種“前進”也僅是與時間的經過的意義相同的。

原拟作为“国史”的补充讀本而編纂的流佈很广的每日新聞社的“新日本历史”，也同样的只說“成立与演变”就是历史。而所謂进步、發展、亦即飞躍的进步和革命的概念却那兒都沒有。它只是說，不知道为什么社会会有演变，反正在時間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社会就变化了云云。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由于“国史”和“新日本历史”的著者們并没有把历史作为劳动人民的历史来看待，而只是从衣食住和当权者的盛衰等表面現象来看問題的。仅仅从現象来看，除了表面的演变外，是不会看出一貫的进步和發展的。

如果不抓住推动历史的基本的力量，那末也就不会看出进步这一事实的。过去曾有过例如將絕对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力量，而这一种“理念”又逐漸地使自己走向發展，借此来解决历史的进步与發展問題的历史哲学。但这并不能十分正确地說明实际的历史现实，因此，現在已經被擯棄了。

历史是随人的劳动生产力的發展而發展的，只有当这一概念弄清楚之后，历史的进步这一概念才能确立。有人說历史就是“自由”的發展，但从根本上說，正如前所述的，历史是人类的社会結合，是以人类的社会結合为前提的生产的發展史。在这基础之上才有其他一切的自由、学术、艺术等的进步与發展。

农業生产的开始，就是生产力的飞躍發展的表现。而这一發展也給社会組織帶來了“变化”。从古代的快乐平等的社会来看，新形成的階級社会是統治与隶屬的、对于人民是充滿痛苦的社会。但就是在这里，却也有着飞躍的进步，因为它給人类的社会結合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在古代氏族社会内部是平等的，自由的，也没有人束縛人的事实。但这社会却被血統这一自然的东西牢牢地束縛住了。因此，其結合的范围也是很狹窄的，也不能建立超血

統的广大的社会。而且,这种平等也只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被自然所左右的平等。森林中的鳥,似乎是很自由的,在森林範圍內它也确是自由的,但在地理和風土的条件稍有不同的情况下,是絕對不能棲息的。就是說,鳥是被自然所束縛的,同样,原始人也是被血統的“森林”这一“自然”所束縛的。

在破坏了血統这一問題上,在不拘血統之有無,只是作为階級,作为国民,广泛地开始結合起來的問題上就有着标志着已进入了階級社会的、飞躍的、革命的意义。

进入階級社会之后,人类就被在此以前所不知道的特别的痛苦和束縛所苦惱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参加劳动的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为少数不劳动的人所剝夺,被他們所鞭撻,遭到了如同牛馬的境遇。但被統治、被剝削的羣众并非是永远去忍受,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自由与統治者和剝削者作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历史从进入階級社会之后,就是以这种階級斗争为原动力而前进的。而且,当一个被統治階級推翻了当权的統治階級时,历史也就飞躍地發展了,这就是革命。

在氏族制度之后出現的最初的階級社会,是奴隶制社会。日本从奴隶制到現代一直都是私有财产、階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从奴隶制到表現着較高生产力的农奴劳动,再到近代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而發展的。同时,劳动者也一步一步地把自由的範圍扩大了。这种發展并不是随着時間的过程自然形成的,而只是由于劳动羣众的坚决的斗争才获得的。由于他們的劳动而提高了的生产力,不但使古代社会陈旧的生产方式陷于困难,而且,随着破坏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就發生了在此之上的当权者的兴衰,有了政治形态的变化。但即使如此,它也并不是簡單的“演变”。創造了进一步的生产关系的人掌握了政权,但当他們

成为进步的障碍时，他們也就走向灭亡。

从世界史来看，現在劳动人民的三分之一已經进入了比出卖劳动力的劳动更进步的、生产率更高的自由的劳动，进入了社会的主要生产資料已經为劳动者本身所公有的社会主义阶段，而其他部分也正在向着这一阶段發展着。社会从無階級的氏族的社会到階級的民族社会，而現在又复看到了要向無階級的人类的社会發展的景象。

如只考虑一个單純的演变淘汰問題的話，那末比起变迁的和过时的东西來說，不变不动的东西倒似乎显得有价值。但如万物只是單純的变化与流轉，那末我們也就沒有了生的目标了。虛無式的頑冥和守旧的事物，就是想要寻找絕對势力为靠山的。正因如此，所以陈旧的东西才受到了尊敬。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一切陈腐之物都被重視了。像捏造了皇紀二千六百年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因为，即使是一百年也好，也是把旧东西当作是最可尊崇的东西所致。

进步的立場則是永远的瞻望着未来。

明治之初，我們的进步的父祖就說，文明人是不盲从过去，但也不滿足于今日的。文明人并不是在于尊崇陈旧事物，而是以不断的超越陈旧事物而自豪的。

二 大和朝廷

国家的兴起 本文对大和的“被綠色羣山所环抱的盆地”的地理的叙述，与該書开宗明义对日本全体的描述一样，也是毫無意义的風景。重要的是大和盆地具备了使农業得以發展的良好条件

(平原和小河的發達, 溫暖的气候等), 当农业从海外傳来的时候, 就使它很快地得到發展。

在这里与农业發達的同时, 阶级与豪族也形成了, 其中成为最有力量的, 就是此后的天皇一族。至于神武天皇平定日本全国即行即位和建国一事則是捏造的。

神日本盤余彥天皇 本文認為皇室从一开始就在大和, 它否定了“日本書紀”的由西而东漸的傳說, 这是正确的。但它同时却承認神日本盤余彥天皇是最初就任日本統治者的地位的。这問題也就等于原封不动的承認了神武建国和即位这一不科学的事实。神武东征与亩傍山即位*在“日本書紀”中是不可分割的故事。那末为什么本文却刪掉了一部分呢? 而且为什么不用神武这一通用的諡号, 而用神日本盤余彥天皇呢? 如果沿用所有“日本書紀”的天皇名字的話, 那末对于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也是應該沿用“日本書紀”的名称的。这与不写作“大和朝廷”征服了四方, 而写作以天皇为中心自然地形成了日本这一国家的理由是相同的。也就是說, 这是为了在避免什么“神武”, 什么征服等軍国主义影响的借口下, 实际上是不批判軍国主义, 而將其安插在某些地方, 來說明日本这国家自建国以来就是以皇室为中心而結成的。

但事实却并不如此。

在大和地方, 国家最早也是在三世紀才形成的。

在此以前, 在一世紀的时候, 在北九州就已經有了許多国家, 他們是向中国朝貢的奴隶而由中国取得鉄制的农具、高級的綢緞、鏡、劍和玉等等, 同时并被賞賜了国王的称号。有的就曾由后汉光武帝那里得到了“汉倭奴国王”文字的金印。

* 神武东征与亩傍山即位为日本統治阶级伪造的, 神武天皇未即位前, 自九州往东沿瀬戸内海至奈良县大和地方的吞併其他部落的軍事行动。据说神武到了大和以后就在亩傍山即位。——譯者

从三世紀起，在北九州和大和地方就出現了古墳，當時在大和地方，作為部族同盟的首領的天皇一族，也開始獲得了世襲的像君主那樣的地位。

古墳 本文中說“隨着社會的進展，人死以後(中略)就建造了豪華的墳墓”。但“社會的進展”並不僅僅是時間的經過，而應該是階級社會的發展。而且也並不是“人”死後就建造古墳，而是王和豪族們的墓才是古墳。在這裡，據說在原稿中寫的是“身份高的人死後”的，而當該書出版後，不知何時“身份高”的字樣卻被刪除，而單單成了“人死後”了(“朝日評論”二卷三號“國史研究會”)。由此即可了解這本教科書是如何有意識地在散佈謊言了。在古代的不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是沒有特別豪華的墳墓的，但現在則如本文所說的那樣的大墳墓却建造起來了，並由此中還發現了由大陸輸入的鏡、玉、劍和高級的綢緞等。本文也說“由這些物件來看即很清楚的了解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對此，我們必須不僅僅要了解貴族的生活現象，而且也要了解當時的社會組織。從古墳出現的東西主要是輸入品。那末它又是以什麼東西換來的呢？這主要的是奴隸。即使不是輸入品的話，生產這些東西的人和使用這些東西的人也是不同的。古墳說明了是存在過奴隸與奴隸主，存在過生產物品但卻不能使用這些物品的人以及自己不生產而剝削別人勞動的人。像如此壯大的古墳是誰建造的呢？是用什麼樣的權力才強制使用了這麼多的勞動力呢？如果將這些問題給兒童作一簡單的暗示，他們自己就會找到解答的。

以愛恤並對人民有着深情的天皇的故事而聞名的仁德天皇墳墓即傳言的前方後圓的古墳，就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高達一百十餘尺、佔地總面積達十四萬坪*，儼然像一座山一樣的古墳。在建

* 坪為日本土地面積單位，約合 0.03 公畝。——譯者

造时，可以想像曾有几十万的人民是在受着鞭笞与虐待的。为造墳墓而受到虐待一事，是人民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苏我氏为了造墓而使全国人民無限痛苦甚至还成了它灭亡的有力的因素。当仁德天皇在世的时候，他就使人来建造墳墓了。“日本書紀”中記載，当該墓造成时就有一头鹿自草叢中跳出，跑到服勞役的人民当中而倒斃了。在当时的譬喻來說，鹿就是代表人民的。

紀元問題 古墳的形成，开始是在大和、九州等国家开头的，这一点从中国的古文献（三世紀的“魏志”）中，也可以得知。当时有一个国家叫耶馬台（或耶馬多）国。这个国家究竟是現在北九州的山門，还是奈良县的大和*不很清楚，但据說这国家有一名叫卑弥呼的女王。在女王之前曾有一男王，但因世乱，貴族們商量后就另立了卑弥呼为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虽然也立了男王，但因仍未改变局面，于是又立了十三岁的女王“托約”，結果就有了好轉云。

这說明王还不是無条件的世襲制，而是由各豪族的协商而推举的。从这种文献上的記載与古墳的样式来看，在大和地方的皇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当地豪族們的首領，最早也不过在三世紀，不会追溯到距今一千七百年以上的。

而且，这大和国家到五世紀終了时，由于征服和侵略已經將从北九州到出云以及关东地方都归于它的統治之下了。这一点从神武东征、四道將軍和日本武尊**的傳說也可以了解的。“国史”中对神日本盤余彥天皇何时即位，大和朝廷何时統治了全国，古墳是何时出現的等等年代都毫未涉及到，只說是在很久以前的古代。

* 山門和大和，在日語中都讀作耶馬多。——譯者

** 四道將軍傳說为日本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为繼續鎮压其他部落的反抗，于北陸、东海、西海、丹波等四地区設立官职，該官职是由皇族来充任的。

日本武尊据說为日本第十二代天皇。景行天皇之子，曾奉命鎮压过九州熊襲族及东部的蝦夷族的反抗。——譯者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如果写明了年代，則紀元节和二千六百年等的伪造立即就要暴露出来所致。“国史”即不敢明目張胆地主張二千六百年的神武紀元，但又为了对此不加任何批判而將其加以掩护，才一个年代都沒有写的。但是混淆时代觀念的历史教育是不需要的。編纂該書的家永等曾說“国史”为了使学术与教育相一致，曾对史实和年代付出了最“細心的注意”，但这里所謂的“細心的注意”却并不是如何努力地將史实和年代弄清楚，而只是使其含混化的苦心而已。

另外，再談談关于紀元不是二千六百年，而是多出了六百年之說的問題。这一說法是在考古学尚未發达，一般对社会發展的阶段也不明确的時代，專从文献上来考証，并通过对（一）“日本書紀”的上一代的天皇，很多是活到一百岁以上一事是不自然的。（二）在古代中国和朝鮮的史書上出現的关于叙述与日本关系的年代与“書紀”的年代，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等問題的研究，就得出了假定有神武天皇即位的这一樁事实的話，那末它也不是像“日本書紀”所記載那樣的古老，而是多出了六百年的。至于为什么“書紀”不將其延長一千年，而只延長六百年呢？这是由于当宮廷制造神武建国的故事的六、七世紀时，由于大陆傳来的迷信而产生了辛酉年將有大变革，特別是第二十一年的辛酉將有徹底的变革的想法，恰巧推古天皇九年又正当辛酉年，因此，天皇开始这一重大事件就必须放在比推古九年再追溯回二十一年辛酉即一千二百六十年以前，这样，就規定了辛酉年一月一日为神武即位年。但这樁事情捏造出来以后，則略知其存在情况的四世紀的天皇与初代天皇之間就相距太久——大約相隔了一千年，为了弥补这个时期就使天皇都活了一百岁以上，并捏造了無任何事蹟的天皇。这是以德川时代本居宣長和伴信友等开始，到明治又經白鳥博士等研究而确定

的說法。但這也是舊的、不充分的說法。採納了最近考古學的成果而樹立的學說，就是如前面所談到的說法。

我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入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系時，當時的名譽教授三上參次博士，在新生歡迎會上勉勵我們說“諸位大學畢業後作了教師的時候，不能將在大學中所學得的原封不動地教給學生，因為作為學術的歷史與作為教育的歷史是不同的。例如皇紀多出了六百年一事，在學術上是定論，但因為到目前為止都是講授為二千六百年的，所以就不能不沿用這一說法”。這樣有意識地講授謊言的就是“歷史教育”的現況。

但不能不更注意的是日本民族祖先的最初的建國與現在的日本民族國家的建國是全然不同的。這正如古羅馬人最初的建國與其子孫的現代意大利人的民族國家的建國不同，如漢族最初的建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不同是一樣的。我們建國的年代應該是我們建設國民國家的年代。建設天皇國家的年代，不是我們建國的年代。如同現代中國人和歐美近代各國國民那樣，在這種意義上，我們還沒有建國的年代。將來等到我們從外國佔領者手中爭回了日本的獨立，樹立了民主的國民的權力的時候，才可以算是我們真正建國的年代。

氏和姓 支持了大和國家的重要的制度是氏姓制度。這個氏與太古的自由平等的氏族完全不同，而是氏族社會的族長們，作為階級的統治者，統治了舊氏人*的人。而且族長們還有着表示他們勢力的姓**。所謂“身份高的”問題並不是从一开始在社會中就有身份的高低，而只是當統治氏族成員的人們，建立了國家，并借

* 氏人為日本氏族社會中的平民。——譯者

** 姓為日本古代區別世襲職業的一種稱號，如臣、連、宿禰、首、國造、縣主等即是。例如臣、連的世襲職業是輔佐統治者執政，而國造、縣主的世襲職業是從事於地方的行政。——譯者

此国家而制造了姓这一身份所致。在大和的这些族長們联合之后，推出了一个成为他們的最高的統治者的就是天皇，天皇的地位确定成世襲一事，最早也是在四世紀。但即使在那时候，天皇死后也还是經過各族長集議而立次代的天皇的。因此，如本文中所說的氏上**“率領着氏人仕于朝廷”是不正确的。先帝死后自动地确定其子为天皇，請勿吃惊，这还是来源于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的“皇室典范”的。到大化革新为止繼皇位者是由各豪族决定的，大化以后，平安时代虽然先帝在世时就确定了皇太子，但皇太子的最后决定，主要的还是貴族。在鎌倉以后，又是由幕府的指令来决定皇嗣的。

奴隶和部民** 人民又是怎样的呢？有的成了奴隶并作为天皇和族長买进奢侈品的回头貨被輸出了，或者是为了他們的需要而从事于手工業和农業。奴隶是被买卖的，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数他們的时候不是說几人，而是說几口，他們被称作“奴”(男奴隶)和“婢”(女奴隶)。

这种奴隶的人数是比較少的，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奴隶，即“部”。他們是为天皇或其他豪族制造各种物品和耕种田地的。种田的“部”叫田部，制玉的“部”叫玉部，造弓的“部”叫弓削部等，所有从事什么專門工作的，就叫做什么部。有时还冠以其主人的氏来命名的如苏我部(苏我氏的部民)，大伴部(大伴氏的部民)等等。部有着自己的家庭，自己过着生活。部虽然要进献物品，但却不是被买卖的。奴婢和部就佔了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余的就是平民，他們虽然也过着独立的生活，但在政治上却是毫無自由的。他們被拉

* 氏上是日本氏族制度社会(实际已具备奴隶制度社会性質)中的貴族。

——譯者

** 部民是由“氏人”中产生出来的，比奴隶略有自由的半奴隶。——譯者

佚去从事建造族長們的墳墓(古墳)和宮殿的勞役,而且还被征收了高额的苛稅。

三 大陆文化的容納

与朝鮮的关系 大和国家在四世紀到五世紀的时候,已經統治了日本列島的主要部分,不久其勢力更伸張到了朝鮮半島,并且在半島的南端还佔有了任那及其他一些小的殖民地。本文中所說的“当任那受到新罗和高句丽的威胁时,就派兵去援助他們”,但这只是在于要保持在任那已取得的殖民地,并不是为任那人民的利益和独立的。

汉字和儒教 在这里本文隱藏了一樁重要的事情。从紀元四二一年到四五七年間,讚、珍、济、兴、武的五代的倭王,都对中國南宋进貢了奴隶和其他物品,并由宋朝的君主那里取得了对日本國內及南朝鮮各小国的統治权。估計这些倭王就是仁德、反正、允恭、安府和雄略五代的天皇。雄略天皇即倭的武王由宋朝取得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韓、慕韓、六国各軍守安东大將軍倭国王”的称号。也就是說武王对于除百济以外的南朝鮮五国的統治权是取得了中國的君主的承認的。这在“宋書”上是有記載的,“日本書紀”的編者是看到了“宋書”,而且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但他們却隱藏了他們認為这一不体面的事情,而儼然地將其写做似乎各种工匠因仰望了天皇之德才从外国来到日本似的。本文就是这样原封不动地將其接收过来了。

“新日本历史”利用了“宋書”的記載,力說天皇是自称为如前述的長的称号的,并說由此可見,当时日本在南朝鮮是多么有勢力

云云。但这是对史料的歪曲，即使用普通的头脑来读“宋书”时，也可以明白倭王是由宋朝取得了这样长的称号，并且是向宋朝乞求援助的。将古代日本在文化上或在政治上都受到了邻近先进国的强烈的影响那一事实作为事实来加以承认，这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耻辱。

佛教 本文曾提到说“特别重要的是佛教的传来”，至于为什么重要，却并没有谈。另据“新日本历史”说“我国国民接受了佛教，并没有发生什么摩擦，只是热心地信仰它”。我真不明白该书为什么要这样公然地说谎。当佛教传入时，在宫廷中即分成了崇佛派的苏我氏与反佛派的物部氏，经过了数十年的激烈的斗争，其结果由于频繁的內乱，终于使物部氏一派灭亡了，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将这问题原样的教给儿童，又有什么地方不妥当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就是作为该书著者，又是古代史特别是古代思想史专家的家永，明知道苏我氏及物部氏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政治斗争而非信仰斗争，是天皇和贵族间的斗争并不是人民间的斗争，却故意这样说的。

当然，佛教之争就是政争，是宫廷之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的佛教与人民的宗教生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由于当时，古奴隶部民社会已经不能再维持了，对人民的统治也很困难了，因此接受佛教与否的斗争就成了佛教在精神上对这种情况能否起维持作用的斗争。佛教之开始成为人民的信仰，还是进入八世纪，行基等冒犯着政府的禁令而向民间传教以后的事情。

人民的动向 在佛教传进的当时，奴隶部民的逃亡及其他的反抗是很高涨的，生产荒废，一雨即成洪水，稍旱即成灾，连年歉收与飢荒，再加上瘟疫流行，人们是纷纷地倒斃了，旧社会崩溃的前夕就必然要发生这些情况的。

对此,統治者們如果不采取与此以前不同的办法,就不能再維持其統治,而佛教則是正当發生了这类問題的时候才傳进来的。

苏我氏主張以崇拜佛教之神(蛮神)来改变瘟疫与飢饉,来防止人心的不安的,而物部氏則認為正是由于崇拜蛮神才發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佛并不是像日本的神那样是与各个豪族的祖先相联系的,而是超越于它們的神。因此,企圖越过氏姓豪族建立新的統治的苏我氏是主張不崇拜旧氏族的神,而主張崇拜优越于它的蛮神的。对此,代表旧氏姓豪族的物部氏作为旧氏姓豪族的代表,則是为旧氏神而战,并主張只有保衛旧神即以固守旧的作法才是挽救其統治危机的办法。最后还是苏我氏胜利了。这問題就說明了个别的豪族如仍是分散地来統治部民和平民的話,那么就不再能够压抑住人民为自由而作的斗争了。

第二 走向开化的日本

一 聖德太子

苏我氏 如果明白了苏我氏胜利了的意义，则聖德太子的治世的意义也就很清楚了。甚至在旧的小学校的国史中都曾談到过“苏我氏的專横”以及在大化革新以前苏我氏是有过全盛时代的问题，然而，在“国史”中对苏我氏的势力却一字不提。因此，也就不能明白大化革新的直接的动机。

五八七年，在苏我氏灭亡了物部氏之后，到六四五年的大化革新为止，是由天皇，还是由苏我氏来創建新的統一国家的斗争时代。苏我馬子杀掉了反对自己的崇峻天皇后，就立了自己的甥女为推古天皇繼承其位，并使自己的女婿为其皇太子。这就是聖德太子。在太子幼年时代，当苏我氏与物部氏斗争之时，太子站在苏我氏方面并且建立了功績。

冠位和宪法 聖德太子的治世，实际上就是苏我氏的治世。太子之定冠位并不是像本文所說的是为了压抑苏我氏的，相反，当时由于天皇和苏我氏都不满足于当一个像过去那样的豪族而是企圖作为統一各豪族的君主，来統治全国和人民的。因此，就开始建立被称作冠位的新的宫廷贵族的官阶，当然，苏我氏是取得了最高的冠位的。根据津田博士的說法，十七条宪法*并不是在太子时

代創作的，假定这是太子的創造，那么，他在这里所以要強調“和”的原因，也是由于宮廷貴族們的爭權夺利的斗争是激烈的，因此，如这时代变成了“和”，不用說对苏我氏是最有利的。

就是在現社会中，也常常提到“和”，提到“举国一致”等問題的。特别是在战争中就更是如此。可是战争中的“大和一致”的用意就是叫人們像奴隶一样去盲从軍閥的。在現社会中对工人們說“和”，也就是在于叫他們溫馴地去順从資本家的。当存在着强者与弱者，而前者又在压抑后者的时候，在二者的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強調兩者間的“和”，就等于是叫弱者順从强者的。

官吏虽然口头上說不要随便向人民征稅，要平等地待人，但不管怎么說，那种想法还是在官吏能随便向人民征稅、随便压迫人民的政治組織和在專制政治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尽管聖德太子說过“重要的問題在于与大多数人商量”，但这也絕不是民主主义，同时，也不是民主主义式的。这只不过是專制政治的一种方法而已。所謂“大多数”人也只是一部分的官吏，甚至都不是全部的官吏，当然也更是不会包括人民在內的。

与隋朝的交往** 到了这个时代，日本才开始成長到能与中国王朝对等地来往的程度了。但是文化的独立却还不是那样容易的。为了明确这种新的国交的意义，就必须对本文中提到的在此以前“我国是对中国进貢了”的事实加以率直的說明。

天皇的語义 这时对隋提出的国書中就曾說“东天皇 敬白西皇帝”，在这里就开始出现了天皇这一称号。在此以前天皇对外是

* 十七条宪法为紀元六〇四年(推古天皇十二年)，由攝政的聖德太子所制訂，但当时并未公佈。宪法第一条是“以和为貴”。——譯者

** 聖德太子时代正当中国的隋(煬帝)唐，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往来更为頻繁，日本屢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公元六〇七年聖德太子就曾派小野妹子来中国学佛法，而中国和朝鮮的各种技工也去了日本。——譯者

称倭国王，在国内则叫“皇尊”。其所以称作天皇是因为在中国的道教中，曾有一称作天皇的神，而天皇这一称号也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本文中所提到的“东方天子”是来源于第一次的国书，在国书原文中是作“日出处天子”的。在古代这“日出处天子”是作为有着特别优秀的国家的含义来理解的，但实际上“日出处”只不过是东方之意，在这一方面，本文是作了正确的解释的，这是好的。至于称作“天子”的问题也只是道教的想法。

法隆寺 破坏了旧的氏姓制度，图谋建立新的统一的贵族国家的圣德太子们的新兴势力，其力量及意志的表现就是法隆寺及佛像和佛画。在这里表现了新兴贵族的明明和健全。这些壁画是中国和朝鲜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作为奴隶被佣于宫廷的人，参看远自印度传来的样本绘制出来并不是在日本人的生活基础上画出来的。这些壁画不但受了西方小亚细亚文化的强烈的影响，甚至也表现了与遥远的希腊文明都是有着联系的。可是这一寺院本身以及其美术只是为了贵族的，而不准人民自由地参访的。

圣德太子将费用都用于建立“法隆寺”或其他类似事情上面，从人民征来的劳役和捐税都未用于生产方面，因之，就使人民更加痛苦了。

二 大化革新*

人民的苦痛 即使在圣德太子的时代，国内也是充满了饥饿

* 大化革新为纪元六四五年由贵族首领中臣镰足联合天皇一族推翻了苏我氏以后，所实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主要内容第一是将以前贵族所佔有的土地和人民悉归于天皇，从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第二是实行了班田制。自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即进入奴隶制社会。——译者

的人們。他死后不久，从六二六年春到秋，霖雨不停，釀成了严重的歉收和飢荒。到处是吃草根而僵死于道旁的老人，是在母怀中吮着母乳与母亲一同死去的嬰兒，强盜、匪徒到处横行。

社会已無力恢复生产，而且，自此以后又是連年的大飢荒。人民的痛苦已达絕頂。人們是热望着新的政治的。

聖德太子是死在推古天皇之前的，推古死后，馬子之子蝦夷無視推古天皇的遺囑，一个跟着一个地另立了对自己合宜的天皇。

当蝦夷在世的时候，就征用了全国的人民甚至都借用了天皇的部民来建造为自己和他的兒子入鹿的墳墓，并称其为“天皇墓”。对于自己的家則称为“皇宮”，称其子为王子。也就是說蝦夷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皇。

但由于他仗其权势，只一味地来榨取人民并未从事于恢复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因之，就遭到了整个人民的反抗，特别是被拉伙来的、为他而大兴土木的东国部民的反抗。逃亡就是他們主要的反抗形式。

苏我氏的灭亡 被苏我氏夺取了势力的中臣氏以及在天皇一族内与苏我氏無甚关系的人，也都認為灭亡苏我氏的良机是来到了。六四三年山城王虽然也举兵企圖推翻苏我氏，但却失败了。最后，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等才终于消灭了苏我氏。

胜利了的鎌足們，首先就廢黜了苏我氏所立的天皇——皇極天皇，而設立了自己一派的天皇。皇極天皇是最初被廢了皇位的天皇。天皇由于当时的政治势力的起伏，是很容易被廢同时也是很容易即位的。

大陆的形态 本文中說天皇看到了大陆的形态，于是就想学习它来整顿国家，这就是大化革新。这种說法簡直是胡說。新的統一的統治傾向从苏我氏就开始了，其后对便于他們統治的法律

制度和技術，也參考了唐朝的專制政治而加以研究，這時已經消滅了一切競爭對手的中大兄一派就着手傾注全力企圖鞏固他們的權力機構。

革新的政治 在推翻了苏我氏之后，天皇始成为比豪族同盟首領高一級的全国的（虽然說是全国，但也只是东至关东地方以及現今富山县附近的日本海方面，西至九州中部一帶）統一的統治者。古代天皇制在此時始確立起來。公地、公民和班田制* 又是古代天皇制的根本的組織。“公地”的問題留在下面“國有問題”項內說明，這裡就“公民”作一解釋。

本文中說“此後，人民就不是為了強有力的氏服務，而是任何人都作為公民來勞動了”。這種說法是混淆了人民是如何被統治的情況的。

說人民之成了“公民”，與說人民不是各個豪族的部民和氏人，而是成了國家和以天皇為中心的貴族們的聯合體的——這一點對兒童來說單單解釋成“天皇的”也是可以的——部民是一樣的。

根據班田制，在這時人民中的男子由國家分得了二反**（相當於現在二反四畝）的土地，女子也得到男子反數的三分之二。然而，它並不是如本文所說“分予”的，而是分給了这么多的土地，就被这么多的土地緊緊地縛住了。人民即使不願意耕種這些土地也不行，否則就要受重刑。

用這塊土地，人民生產了自用的糧食，也繳納了各種的捐稅。然而本文中對於租、庸、調為什麼一字不提呢？其原因，就是想借“分得了”土地，“作為公民來勞動”的說法，將人民形容成似乎已經

* 班田制為紀元六四六年元月一日孝德天皇頒佈“革新詔書”並據此而制訂的令豪族把所有的土地獻給國家（公地），並將其按一定數量平均分給人民（公民）的制度。

——譯者

** “反”為日本土地面積單位，約等於九·九一八公畝。——譯者

是独立自由的国民。

租是以稻米来缴纳的税,约估土地收成的百分之三,庸是使二十一岁到六十五岁的男子一年有十天要到京城去服劳役,或者是以缴纳布疋(麻布)和絹綢来代替,有时庸的劳役竟超过十天以上而达三十天。调也是以絹、布及其他各地的特产物作为捐税来缴纳的,而这也是由十七岁到六十五岁的男子来负担的。如将以上三种折成稻米计算就大约估去了一家人种田收获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但使人民最痛苦的负担却是另外的称作“杂徭”的劳役。第一,是在地方长官(当时在日本已分成了几个国,各国都任命了天皇政府的官吏,即相当于今天县知事以下的官员。这一官员就叫国司,相当于县知事的叫国守)管辖内,一年有六十天要出公差,而且食粮还得自备。第二,租因为是缴到国司去的,在运输上还可勉强过去,但庸和调则要运到京城去,因之,所用的劳动力也是无法估量的。第三,是兵役,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岁的三分之一的男子轮班地被抽作兵员,一部分成了京城的守衛(衛士),另一部分则成了北九州的防衛(太宰府的防人),其余的就成为各国军队的兵士。军队的兵士不但食粮,就连武器也是要自备的。而且,不管中央衛士或是防人、或是军队的兵士都不是真正的为国家防御外敌而受训,他们都被当指挥官的贵族们当作奴隶来使用。兵役,实际上是当时人民特别感到痛苦的,当时有“一人被抽丁,一家都灭亡”的说法。

二反的土地,就是为了从人民勒索这些东西和劳役才分与的。当时从一反(相当现在的一反二亩)土地上所收获的大米,大约是一石*,而当时并没有其他副业,因此,人民如何生活的情况,是可

* 石为日本容量单位,约合一·八〇四公石。——译者

以想像得到的。此外还有“出举”，就是說国司强制地借給人民稻种，每年还要收取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利息。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捐稅。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当然也是沒有的。

这就是“任何人都是作为公民来劳动”的真相。

奴婢即使在大化革新以后，也絕沒有被解放，他們仍然作为豪族的物品，被佔有和被买卖的。在奈良市集上，奴隶的行市，成年男子为八百把稻子（約合大米一石六斗），而女子則仅及男子的四分之三。天皇貴族和傳佈慈悲教理的寺院，都拥有了数百人的奴隶。

大宝律令 阿部比罗夫*“平定”了蝦夷的写法是很恶劣的，事实上則是“征服”。东北当时仍是未列入天皇国家的化外的地区，蝦夷人即倭奴人这时还是刚刚开始农业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他們就是征服了蝦夷人，將俘虜作为他們的奴隶或是由倭奴人部落中征收貢物的。

次項所說到的，在天智天皇时日本之所以由朝鮮撤回，并不是由于天皇們認為內政要比对外侵略重要，而是由于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势力，原来就是乘大陆混战之隙而鑽进去并建立起来的。但不久大陆上的長期的混战平定了，唐朝这一强大的統一的国家出现了，在其势力下朝鮮半島也有了趋于統一的傾向，因此，就迫使日本的势力不得不后退。这样，正如本文所說的，由于“唐朝的势力”日益强盛，与唐朝联合的新罗的力量也强大了。因此，当日本和百济的联軍在白村江被全部歼灭**以后，日本終於从朝鮮全面地撤回来了。

* 大化革新后，齐明天皇时，为統治日本北部曾派皇族阿部比罗夫征服該地，并鎮压了北海道的蝦夷族的反抗。——譯者

** 齐明天皇与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为保持其在朝鮮的势力与百济联合对抗新罗、唐朝，但在白村江一战为唐將刘仁軌所击败。——譯者

大宝律令是大化革新的完成。在前項“革新的政治”的說明當中，已闡述了由于大宝律令所完成的政治狀況。

本文在这里所說的，官吏都是在大学或国学內學習之后，再經考試合格者之中來挑選的一事是不對的。第一，身份高的子弟不經考試也要被授予一定的官階的，第二，身份低微的人不論多麼有天才，也是不能夠成為高級官吏的。出身于国学的人，也只不过是就任國的下級官吏，就是由大學出身的人也不過是任中央的下級官吏而已。

國有問題 在本文中，關於班田制崩潰的理由方面，說是由于該法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維護原來的豪族的利益的，因此它的崩潰也是必然的。這一說法是正確的。

但是其次，它說由于人口增加而使分配的土地不足，因此才獎勵開墾并承認墾田的私有，這樣作的結果，就使班田制崩潰了，這種說法却是錯誤的。經濟史家們，雖然也是這樣解釋，但土地却并不是因为人口增加而不足的。相反土地从一开始就是由于分配的方法不合理，一方面出現了有着大量土地的人，而另外一方面却產生着沒有足夠土地的人。从一开始豪族、貴族們就有着大量的土地，在人們之間有了貧富之差，而且一般的人民本來就是過着如上述那樣的貧困的生活，一有荒年貧者無力繳稅，糧食也發生困難，這樣，就不能不求借于富者，因此，田地也就被富者所吞併，自己則成為他們的佃農和奴隸。不僅如此，富者還僱傭貧者去大量開墾土地，并將其據為己有。而當政府限制他們的私有時，他們就故意使其荒蕪下去。正因如此，所以分配給人民的土地就不足了。如果是為了增加分配給人民的田地而開墾的話，那末使個人去開墾的這一理由是不成立的。個人開墾，而由政府征收過來并將其分配給別人一事也是不可能的。還有，必須要接受班田的普通的人

民也是不能够去开垦的。实际上，人民也是没有这个余力的。因此，为了增加班田而奖励开垦是骗人的。如果是以国家资金去开垦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国民，不使贫富之差产生的话，那末，土地的国有也是决不会崩溃的。

在这里使儿童们学习什么是“国有”一事是十分必要的。现今常常有人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日本在大化革新时就已做过了，只不过是出于个人的私有欲过强才失败了而已。但是大化的土地国有或者所谓“公地”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而且与社会主义也是毫无相似之处的。根据大宝律令，“国家”就是代表天皇的，而实际上“国”或“公”也并不是指国民的共同体，而是指天皇而言的。因此，所谓公地制度也就是说土地无条件地是天皇的私有物，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但因天皇是贵族联合的中枢，因此，土地的国有或公地制度实际上就是意味着贵族阶级的公有和统治，而它们就是将此土地分配给“公民”，并对“公民”进行剥削的。大化以后所说的公地与社会主义那样的真正地集合了自由平等的国民而创建的国家的土地，亦即全人民的公有地，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在现代，为使“国有”真正地正确地变成为人民幸福的国有，就必须创建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

解放的斗争 在不合理的班田制度下，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在这方面，可以将“万叶集”*第五卷的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介绍给儿童。当时在塑造奈良大佛时，根据人民生

* “万叶集”为八世纪到九世纪的作品，是日本最古的歌集，共二十卷。蒐集了四千四百九十六首歌子，为天平胜宝五年左大臣橘诸兄奉勅所撰。——译者

** 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的歌词为：人们身上披着连棉花都没有的破布，房里满地铺着乱草，父母坐在枕边，妻子坐在脚下，悲伤叹息。炉灶早已断炊，米囊也结成了蜘蛛巢，就似好久未用，人们是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译者

活的程度从上上戶到下下戶分成了九等和等外戶，在越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等外戶。在安房，等外戶、下下戶就佔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等外戶就是完全不能維持生活，是立即需要救濟的。

我們的祖先并未屈服于这种生活。他們放棄了分配的土地而逃亡了。被征作兵員的，也从兵營內逃跑了。在山城某村的戶籍上，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奴隸，百分之十八的女奴隸和百分之十九的成年的平民男子和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婦女都逃跑了。公民的逃亡使耕地也荒蕪了。在远江的濱名郡，在塑造大佛时代，就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土地变成了荒地。

一方面良田变成荒地，而另一方面森林和平原却被开垦了。这个矛盾就是發展了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矛盾的一个表現。从整个社会来看，人民的劳动一面产生着大規模开垦土地的余力，然而，却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才無法生存。这一矛盾，是以人民逃亡的形式來表現它对旧的生产关系的反抗和对統治者的斗争的。

也正是由于人民的逃亡和反抗，才使得公地公民制崩潰了。贵族和富农之所以能够开垦并有了私有地，就是因为容納了要从国家奴隸或农業奴隸的状态中求得解放而逃出的人民和“公民”，并驅使他們去劳动所致。这样，逐渐地土地的私有即贵族、富农的个人所有也就發展起来了。

由于軍隊大批逃亡的結果，终于在七七〇年使光仁天皇也不得不停止对一般人民实行征兵。

三 京城——奈良

新的京城 京城——奈良是統治全国的天皇制的中心。本文

之所以說“朝廷政治在日本得到了廣泛的發展”，就是說天皇開始成了全國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

在奈良以前，京城是常常變更的，這是因為第一，作為全國最高的唯一的統治者的天皇威權並未確立。第二，當時夫婦是分居而不是同居的，子女是被母親這一面撫養的，因此，由於天皇朝代的不同，其住處也是不同的，結果在住處也就形成了宮廷所致。當時雖說是天皇，但也只不過是酋長，因此也就沒有什麼豪華的宮殿。

京城奈良是天皇、貴族、官吏和服侍這些人的奴隸們的京城，是沒有獨立自由市民的京城。

亞洲式的城市 唐的長安也是這樣。

歐洲古代的城市提味*也好，雅典、羅馬、迦太基也好，都有着很多的自由工商業者。而在這些城市中，雖然有着王制和共和制等政體的不同，但獨立自由的市民都是以某種形式參與了政治，參與了公共生活的。然而，長安和奈良卻完全是專制統治者的城市，是沒有城市市民的公共生活的。全市市民甚至沒有平等的歡樂的祭典，當然，市民在政治上也絕對是不能夠說些什麼的。

這是古亞洲城市的性格。城市由於與專制君主的統治聯繫起來，雖然僅在地區和人口上得到了擴大，但卻並未作為“市民的城市”而發展的。不論中世紀的城市或是近代的城市都是這樣（大阪和江戶的情況在下面將作比較詳細的闡述，但江戶、甚至“商都”大阪也是極少有自由市民城市的因素的），我們是沒有城市自治、自由發展的傳統的，這雖然也不足為奇，但與世界的城市的历史比較起來卻是耐人尋味的。現在的東京都不管在人口、官吏、學生、和各總公司的職員——與其說是作實際業務，倒不如說是指揮、監督

* Thavai 是希臘的一個古城市。——譯者

及与政府联络的机构——等等都是以近似于官吏的人为中心和为他们办事的工商業者構成的。东京、横濱工業地帶的發展又是与战争相联系的。但不管怎样,在面积和人口方面次于倫敦和紐約的大东京却不是一个自由市民的城市。这一問題从东京的真正有着实力的权力机关警視厅,不是在市民的統治之下,而是从上面来統治市民的机关一事看来,也是很清楚的。都知事的产生虽然是采取了由都民的普选这一自治的形式,但在財政方面来看,实际上都政則是被中央政府的官僚所操縱的。教育委員名义上是民选的,但实权却是被官僚所掌握的。在市民政治思想水平較高的东京都是这样,至于别的都市就可想而知了。

“記紀”和“万叶(集)” 本文中說“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兩者全是彙集了从古代傳下来的神話和故事等的書籍”,看去似乎没有什么,但其中却包含着極端的錯誤。

“記紀”* 絕不是單純的古代傳奇神話的記錄。“記紀”的神話傳說最早也是在六世紀以后,当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國家的力量逐漸地巩固起来,在統治者內部,根据氏族制度,豪族上下的位置也逐漸地确定了之后,以宮廷为中心企圖制造出根据,借此來說明皇室和各豪族統治人民的現狀的,憑他們的主觀而編造出来的。他們在編造的时候也可能是采用了民間的故事或是历史上隱約可尋的記憶以及反映了这些东西的傳說的材料。但是“記紀”也絕不是將这些材料原封不动地搬进来的。当編纂“記紀”所依据的書籍时,或者在編纂“記紀”时,作为編者的貴族們都作了有利于他們的歪曲和附加,因之与原物也就完全不同了。成为“記紀”材料之一的帝紀和旧辞,是在苏我氏全盛时代已經編纂了的。“日本書紀”

* “記紀”为“古事記”与“日本書紀”的簡称。“古事記”为日本史書之一,全書大部分是用汉字写成的日本文,小部分是用汉文,全書三卷。据說为太安麻呂奉勅根据稗田阿礼所口述的事实,于紀元七一二(元明天皇和銅五年)撰成。——譯者

記載，當蘇我氏滅亡時，蝦夷即將帝紀和國記付之一炬，而自己也自投火網中燒死了，但這究竟是蘇我氏燒的，還是勝利了的中大兄皇子們燒的，也不是沒有疑問的。但不管怎樣，該書總是反映了蘇我氏的利益。

正因如此，所以“記紀”的神話傳說，並不是由日本國民的生活當中產生的，而是由宮廷皇族和貴族中編造的，是有利於他們的。關於這一點，津田博士在“神代史的新研究”（其後為“神代史研究”）和“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等書中曾作了詳盡的考證。反動的教授們對於此書是吶吶不休的，但誰也不能作出這是錯誤的反證明。博士對“記紀”的主要內容的意思、構造以及編造的由來都一一的作了說明。

日本的神話 這樣豈不是就得出了“記紀”的神話並非民族感情和太古的原始民族精神的反映的這個結論嗎？但實際上正如津田博士所批判的那樣，關於伊弉諾尊、伊弉冉尊產生國家的故事*，假如真正是由古人的生活當中產生出來的話，那麼就應該要產生山川、草木、鳥獸、魚蟲等的，也就是說應該產生自然世界的故事，但它卻產生了大八州國這一政治世界和國家。而且，當產生這一國家時，雖然也有由於女神是先找的神，所以產生的嬰兒是個殘廢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但這是很久以後的後世思想，並不是民間的想法（古語所說的親即指母親），而天照大神作為太陽神的行動則是完全沒有的。所說的隱藏到天之岩洞**一事，很可能是神話化了的日食，然而據“記紀”的記載，就連這一點也都是當作純粹的政治行動的。大神的行動也只是作為高千原這一政治世界的——而

* 神話中說伊弉諾尊、伊弉冉尊先造成了日本國土“大八州國”，隨即生了山川、草木、和八百萬神，然後又生了“皇祖”天照大神。——譯者

** 神話中說，女神天照大神憤慨於其弟素戔嗚尊的叛亂，遂隱至天之岩洞中，使天地昏黑，素戔嗚尊因之而降伏。——譯者

这不过是大和国家的反映而已——君主而活动的。天照大神恐怕就是皇室的祖先神，他与皇室成为国土的統治者的同时，这一神也就成了諸神之王，进一步更利用了对太陽神的信仰——这对农业民族是必然要有的，但在“記紀”中却几乎是沒有出現——而使他成了天照即照耀天空的神。天照大神以前的諸神，从伊弉諾尊和伊弉冉尊夫妇神算起“天御中主神”及“高皇产灵神”等神，很可能只是后世根据道教的陰陽思想的傳說及其他純然的知識編造出来的。“天御中主神”是宇宙的正当中之意，而“高皇产灵神”則是万物生長的灵者之意。这样抽象觀念的神，不能是由太古人的直感的头腦中产生，而只能是后世的有着相当道理的头腦的产物。

在“記紀”中出現的各神，主要的全是宮廷豪族的祖先。“記紀”的各神的世界本身，就是大和宮廷的天皇和豪族的世界，却不是大和人民的世界。关于这一点，从农业世界的神話所不可缺少的雨神和風神的作用在“記紀”中并没有出現一事来看，也可以明白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反映民族生活遺跡的东西。如木花开耶后*、海幸、山幸**等故事也都是古代日本人的生觀和生活神話的一个片断。但这絕不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正統，而只是一种插話而已。

由东京文理科大学和歌森太郎助教執筆的“新日本历史”的“神話傳說”是充滿了陰險的謊言的。

* 神話中天孙瓊瓊杵尊遊海濱見木花开耶姬貌美而娶之，一夜而孕，天孙很怀疑。木花开耶后大憤，起誓說如非天孙之后嗣，則火燒之即死；反之，則生。于是后即入密閉室中自焚，火起后，逃生三子即火酢芹尊，火明尊，彥火火出見尊，火皆不能伤。

——譯者

** 海幸、山幸，为由海中、山中捕获之物。神話中說火酢芹尊專能以鈎捕海物，其弟彥火火出見尊專能以弓獵山上之野物。兄弟二人以弓与鈎相易，然二人皆無所得，兄將弓还其弟，而弟則將兄之鈎失去，兄怒逼其我回。第一籌莫展，徬徨于海边，遇老翁指示进入海中，娶海神女为妻并得鈎。——譯者

在这些“神話傳說”中反复地說神話本身并不是事实,并举例說神由天降临到地上即天孙降临*一事,是难为科学的头腦所接受的,它一面承認这一点,但却同时強調神話本身虽然不是事实,但在这里却存有着日本国民的希望、憧憬以及思想、信仰等等,并且还毫無根据地、武断地說,这一神話就是日本人精神生活的中心,說国家难局总是由于神話才打开的,也就是說,“神話成了創造历史的力量”,而且它还認為从天皇祖先的产生国家起一直到天孙降临、天壤無穷神勅一切,都是有着比其作为單純事实更为有价值的可尊敬的精神的事实。

实际上,使“記紀”編造的事情与国民生活的历史發生关系,还是从明治确立了近代天皇制以后的事情,是为了維護天皇制,从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政府的大教宣佈开始,并将此事与小学校相联系起来以后的事情。在德川时代,这类东西只不过是以川柳子或以猥褻的川柳**作为茶余飯后的余兴,战国、室町、鎌倉等时代也一样,甚至平安貴族也只不过是一部分宮廷学者在平安初期研究了“書紀”而已。奈良貴族之所以重視这一神話,也不外是由于这是他們的作品,所以他們才当然加以重視的。

紀元节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在所謂紀元节这一天,安倍文部大臣在广播中發表演說,就說建国的神話为傳說之暗云所籠罩的問題,并不止日本,在外国也是一样的,因此,使紀元节遺留下来与国民一同来回味建国的滄桑也是好的。这話当然是錯誤的,

*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外擴張,創造了神話,鼓吹日本民族是天孙后代。該神話說天照大神使天孙瓊瓊杵尊降居葦原中国而为之主,賜以玉、鏡、劍三种宝物,并下神勅說:“葦原瑞穗国是我子孙可王之地,宜尔子孙前往治理,宝祚之隆当与天壤無穷。”

——譯者

** 日本短歌之一種,由十七字組成,系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稱井川柳創始的,因名之。——譯者

关于这一点，由前述的情况就可以明了。纪元节是将“日本书纪”所记载的辛酉年一月一日，换算成太阳曆的二月十一日的日子，但辛酉年元旦的意思已如前所述，其制造过程简直是过于明显了。

“万叶集”在这里面，有着当时的人民之歌，它歌唱了美丽的男女的爱情，表訴了被抽作兵丁的痛苦，显示出它达到了日本抒情詩的一个頂点，关于这一点，是有必要例举“东歌”、“防人歌”和卷一的“相聞歌”来作說明的。

本文对人麻呂是說“柿本人麻呂之歌是有名的”。人麻呂不但被平安貴族称为歌聖，就是在現代，也还受到佐佐木信綱和齐藤茂吉等的崇拜。然而他們之所以崇拜人麻呂是因为他們与人麻呂在本質上是一样的，都是宮廷詩人的原因。如果不抱任何成見，虛心地誦讀人麻呂的長歌时，就使人不能不感到它是重疊着空虛的思想和感情，重疊着重語、类語和緣語，而只是在外形上的雄壯。但人麻呂在怀念爱人的歌子中也有一些是有着独特而优越的技巧的。

至于山上忆良的思子歌，應該作为歌唱亲骨肉之間的、深切人情的歌子介紹給兒童。

国分寺和大佛 国分寺并不是像本文所說的那樣是“起着將京城文化傳播到地方去的作用”。国分寺和大佛只是因为人民反抗的高漲，使其統治更加困难，于是就企圖以佛的力量来維持其統治的东西。国分寺是必須要誦念金光明經和最胜王經的，其原因是由于天皇和貴族們相信它能够消災去病，能有鎮压反抗王朝的人的效驗的。这些寺院虽然未对人民佈教，但向人民傳佈的佛教，都是以此世之不幸是因前世沒作好事，此世不繳稅或者反抗統治者，則來世就要变成牛馬的說法，使人心变成黯淡的卑屈的奴隶根性，而絕不是鼓舞人心的东西。

为了創建大佛和东大寺，仅仅苦力就用了五十多万人，这佔到

当时日本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国家财富几乎全部是用在这个上面，由于这一情况就使人民的飢餓、穷困和死亡大大地增加了。东大寺等就利用此机会买进了大批奴隶，剝夺了人民的土地来扩展它的領地，仅仅东大寺的土地在九世紀就高达一万町*以上。

奈良文化就是以这样的人民的血、淚和汗建立起来的，是黑暗的沉悶的文化。虽然同是貴族文化，但却沒有像建造法隆寺时代那样清新的气氛，只是热中于奇怪的專制主义的偶像上了。不过在“万叶集”的恋歌中，还少許殘留了一点点男女有着自由交际的古代社会的明朗的影子。

行基 本文中为什么沒写行基呢？比起道鏡事件**这一常有的宫廷陰謀的問題，还是行基問題在历史上較为重要。

行基是和泉人，幼时为僧，及長就在貧民当中佈教。他对人們的苦痛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而且在其所到之处都修桥、补路、挖池塘，为人们謀福利并推进了农業。因此，就有数千到一万以上的人民跟随着他，听他傳教的。然而，当时只要是向人民傳教，只要是教人民思想，就会被当作危險人物受到政府的迫害的，但行基对此是毫不顧及的。

但是行基，原本就是由地方貴族出身的，他傳的佛教，也只是因果报应的教理，所以漸漸地也就脫离了人民，而当天皇建造东大寺时，行基就背叛了人民，为了天皇建造大佛，他帶头地参加了征用人伕的事情。其后，他就以此事有功而被天皇賞賜了高的地位，

* 町为日本土地面积單位，約合九九·一八公亩。——譯者

** 道鏡事件为奈良朝孝謙天皇（即后来的称德天皇）讓位于淳仁天后，但仍掌实权，并信任僧人道鏡，藐視貴族藤原仲麻呂。藤原仲麻呂則企圖勾結淳仁推翻孝謙，弒洩被杀。道鏡控制了迷信的称德天皇，并任太政大臣、禪師、法王等官职，从此开始了道鏡全盛时代。道鏡自己也想作天皇，但遭到代表藤原氏利益的和气清麻呂的反对，但在称德天皇死后，被藤原百川等貴族所驅逐。——譯者

在大佛完成之前，八十岁时歿去。他最后也畢竟沒有成为人民之友，但人民則忘却了行基晚年的事，而只是長期地將他当作行基菩薩来記憶的。

和气清麻呂 由于宮廷的腐敗墮落，迷信橫行，称德天皇由于道鏡而失掉了理性，才發生了道鏡事件的。

这时，天皇已經开始具有了不与各貴族商量自己就可以决定万事的权力。因此，道鏡只要掌握了称德天皇的心，那末就有可能使法王即事实上的天皇变成名副其实的天皇。这样就使道鏡事件成为可能了。道鏡的失敗，說明了天皇的地位要由各豪族間的勢力关系来决定的旧宮廷的慣例是更加加强了。此后由于天皇地位的急遽的沒落，由于藤原氏成了事实上的天皇，并对其他勢力施以压抑的結果，也就沒有誰再想去作天皇了。关于这一时期的宮廷的腐敗情况，將在迁都項內叙述。

四 与外国的交往

这个时代政府冒着东中国海的危險，每年都向唐朝派遣了使节，學習了进步的工艺，輸入了农具、学术、艺术和宗教。这样通过所謂遣唐使就輸进了大陆的进步的文化。旧貴族也並沒有失去積極地进取的气象，但这也只不过是輸进了統治人民和剝削人民的手段而已。因此，即使在这一时代例如像鍬那样最普通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农具方面，普通的人民也沒有鉄鍬而只是以木鍬来耕种的。正是因为这种来往是一种从人民当中湧現的对外国 的交际，所以在奈良的天皇和貴族們丧失了作为統一国家的統治者的力量和自信的下一个时代，就停止了外国文化的輸入，而开始了鎖國。

第三 平安京时代

一 平安京

迁都 本文中說“为了重建奈良朝廷的政治”，迁都是必要的，但为了解释这一点，就不能不談及奈良宮廷的腐敗。在奈良，僧侶就是在宮廷內部也是有勢力的，同时，鎌足的子孙藤原氏嫡系一族与其他的貴族也是对立的，这三派势力的斗争是激烈的，而在这些势力影响下的皇族之間，也彼此展开了斗争。称德天皇是作了兩次天皇的人，第一次时叫孝謙天皇。在这位女帝当位时代，藤原仲麻呂虽然为女帝所寵爱而掌握了政权，但在次代的淳仁帝时，由于僧侶势力的强大，仲麻呂就起而叛乱，事敗，淳仁被廢并被放逐于淡路島去了。接着孝謙又成了天皇(称德)，但因寵爱僧人道鏡，因而發生了道鏡事件。繼称德(孝謙)天皇之后，光仁天皇即位了。其正宮皇后与其間所生的長子即皇太子，曾同謀杀掉光仁天皇，但失敗了。光仁之后，在桓武即位不久，三方王夫妻就曾陰謀杀死桓武。在这种反复混乱期間，藤原氏就压倒了僧侶及貴族的势力。和气清麻呂在称德死后，虽然也驅逐了道鏡，一时在宮廷內也得到了势力，但并没有什么發展。

桓武迁都固然是由于清麻呂的进諫，但其在历史上的本質的

意义,却是在于以藤原氏为中心的贵族掌握了宫廷的全权并离开了僧侣的根据地奈良这一点上。迁都至平安一事是藤原氏们的贵族政治的第一步。但政府的本质与社会的基础却仍然未变。在这一点上,与鎌倉、江戸和东京之成为首都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蝦夷的同化 名义上是“同化”,实际上却是征服。关东方面的人民与蝦夷是有着和平的通商来往的,但却被政府所禁止了。政府一方面是禁止与他们的和平来往,一方面又以坂上田村麻呂们的武力来征服他们。本文所说的“朝廷方面将田地给与了蝦夷”,由于蝦夷的土地本来就是蝦夷人的,所以这话的意思只不过是將迁移到内地的蝦夷人变成农业奴隶之意而已。至于“在蝦夷指派了地方官”,也就是指,从蝦夷人中指派了做进贡事务的首领而言的。总之,所谓“同化”,也就是將蝦夷作为殖民地来统治的意思,这件事与战前对朝鲜和台湾的“同化”是有相类似的意义的。因此,也正如朝鲜与台湾的独立运动从来未停止过一样,蝦夷的反抗也是从未停止过的。在最后而且是最大一次的反抗,就是本文所谈到的“前九年役”*。

最澄和空海 天台宗与真言宗在大体上说,都是祈禱和念咒的佛教。小从天皇患病和藤原氏女儿的牙疼,大至稳定国家即天皇和藤原氏的统治,都声称要以“密咒祈禱”来調理,而这一点也博得了统治者们的信仰。此二宗实际上就是贵族的佛教,关于这一点,本文中也曾谈到过的。至于说空海週遊各地建造池塘的问题,也只是將行基的传说应用到空海身上的说法,而將空海說成是懂咒文与真言秘密之法的高僧这一问题,也是在貧苦人民中产生的传说。空海主要的是在奈良与京都的贵族们之間周旋的。为了建造万农

* “前九年役”是一〇五四至一〇六五年間以安倍貞任为首的居于东北地方的蝦夷人的起义。——譯者

池，讚岐的国司就曾利用了空海的名声，来圖謀征用人仗之便的。

二 藤原氏的兴盛

明确历史意識 为什么藤原氏在九世紀以后得到了那样的兴盛呢？这是由于藤原氏一族从鎌足以来世代在充实其作为宫廷贵族的过程中，建立了龐大的私領地所致。九世紀初，藤原氏所統治的人民，估計就已达到全国的四分之一。

本文所說的“律令* 所規定的政治措施，也不合时宜了”一事是什么意思呢？正如“变化与进步”一节內所說的，孤立地認為随着时间的过程，社会也就要随之而变化的想法是必須加以批判的。所說的“不合时宜”，就是說，从社会根本上，劳动羣众抛棄了像国家部民那样的地位，为了追求較為自由的劳动，結果，就形成了在私人領主的土地上劳动的形势，也正是这种形势就摧毁着旧的統治体系——律令。

因此，如本文中所述藤原氏之所以能世代地壟断与世襲攝政和关白，也絕不是又“重回到往昔那样”的。这里所說的“往昔”，即大化以前的豪族地位的世襲，就是在統治全国的天皇制形成以前，小奴隶主們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在世襲，但藤原氏的世襲，却是在天皇制崩潰的过渡时期內，作为天皇以上的实力者而开始的世襲。前者的世襲是意味着天皇还没有得势，而后者的世襲却是意味着他已經丧失了权力。

攝政和关白 攝政是天皇患病或者是年幼而不能执政时的天

* 大化革新后，統治階級为了巩固政权，制訂了一系列的法令如近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律是有关刑法的規定，令是刑法以外的其他法令。——譯者

皇代理，关白則是在天皇之下，是天皇的最高顧問或者是大臣以上的高官之意。

关白虽然是律令中所沒有的“官銜”，但攝政却是在律令中定有的，并且在律令以前就产生了的。本文中將此二者都說成是在律令中沒有的新的官銜是錯誤的。另外，將攝政也籠統地說成是“处理一切朝廷政治的重要职位”，恐怕其意圖就是想將此二者強說成是普通的官职吧。

皇族以外的人，原来就是当不上攝政的。就是在明治宪法和“皇室典范”成立后，攝政也只限于皇族；而且，就是当攝政的順序也都給排定了。

但是，从藤原良房在九世紀中叶，成了既不是兒童也不是病人的清和天皇的攝政以后，藤原氏的最有力者就成为攝政，同时也造成了所謂“藤氏長者”的慣例，而且这一情况还一直繼續到一八六八年。就是明治天皇也是有過攝政的。該攝政就是二条齐敬这一藤原氏嫡系的公卿。从良房之次的基經时起，由于天皇不是兒童，如用攝政，是說不过去的，所以那时，就不叫攝政而称作关白。

为了混淆这件事情，本文將攝政写成像是关白的附加物似的，但事实上，关白却是攝政的附加物，是由皇族以外的人作为攝政来代理天皇的，——关白实际上就是天皇的代理人，就是攝政——这件事情一直沿行了一千多年。换言之，攝政的形成，也就是意味着天皇已經完全失掉了他在宮廷的实权。

道長父子 本文对藤原道長父子問題的提出是为了給叙述“鳳凰堂”問題作伏笔的，是为了介紹管原道真的。本文編者的用意，恐怕就是在于想渲染道真在太宰府*“恩賜御衣今在此”的感慨

* 太宰府系根据“大宝律令”所建立的專司軍事与外交的机构，管原道真曾在太宰府三年，常賦詩表示其对天皇的忠誠，詩中就有“恩賜御衣今在此”之句。——譯者

無限的忠義的故事吧。

道真是保守的反動政治家。當然，這並不是說藤原氏就是進步的，但當時社會的根本的方向早已不可能再回到從前那樣的天皇制去了。雖然如此，但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為了多多少少作些嚐試還是起用了道真，但沒有成功。

正如本文在次一項“文化的變遷”里所說的，道真是停止了遣唐使的直接的主使者。他所以要將此停止的理由，固然可以舉出很多，但主要是由於失掉了進取的精神，害怕東中國海的怒濤的。道真、宇多和醍醐們已經失去了跨過萬里波濤學習外國文化的勇氣了。其所以如此，也是由於他們已喪失了作為統治者的自信，原來想學統治人民文化的他們，現在甚至連冒着困難學習這樣的文化的熱情都沒有了。

虛假繁榮 從管原道真的時代到道長全盛時代，整整經過了一百年，但本文對這一過程，就連一點暗示都沒有。這是毫無歷史感覺的。而這一百年却是很重要的。這一百年中，律令制越來越成為形骸，平安貴族們對於政治也只是當作宮廷中日常儀式來做了。雖然也任命了地方官，但上流貴族，在實際上也沒有赴任的，他們只是在京城拿俸祿，實際上到地方去的都是下級官吏。全國土地日益私有化，公地愈益減少。正因如此，所以宮廷政府的財政也就愈益困窘，除藤原氏嫡系一族外，甚至相當上流的貴族收入也都很少，生活也困難了。他們都怨恨藤原氏，卻又不得不对其屈膝以求生，但有才能的、不平的人，作了地方官就土著于任地而不復返，並且在任地利用其地位來積蓄私財了。源氏和平氏就是這樣的一種人。留在京城的，只是些有氣無力的人。藤原氏嫡系的繁榮雖然是系于其龐大的領地的收入，但就是領地的管理和經營也都是委任給當地的豪族的。藤原氏不是生產的組織者，而是脫離了

生产和政治,只是驕奢遊蕩地度日的,这是虛假的繁荣。

三 燦爛的文化

文化的变迁 本文在这里开头一行就說,平安文化是貴族們的浮华生活的产物,这是正确的,因此,这种文化就絕不是国民文化也不是健全的文化,这一点是必須要弄清楚的。

遣唐使的廢止一事,在前一項已經叙述过了。这一問題的結果,虽然就構成了鎖国,但中国*和九州地方的人民却仍然是与朝鮮和中国大陆任意通商的。貴族們虽然害怕这种浪濤,但人民商人却是泰然处之的。这一点也清楚地說明了国民的力量只是存在于劳动人民中。

大和繪和假名** 这里本文主要的是想談論所謂平安文化的日本化的問題。这也就是前項所說的,与停止了學習中国文化的同時“我国文化也自然的轉變了”的真意。

脫离政治和生产,依靠領地的年貢优閑度日的,反映藤原氏們的懦弱無力,冷眼一看似乎是燦爛的,而实际上是既無力量也無清新的气氛的文化,那就是大和繪。

假名的發明,确是使日本文化由古大陆王朝的文化独立出来,使文化变成国民的文化的的第一步。取汉字的音,訓***来表現日本音一事,在汉字傳來不久的六世紀时即逐漸地实行了,到了奈良时

* 中国地方为以广島、鳥取、島根为中心的日本海东岸的地区。——譯者

** 假名为日本字母。正楷的字母称片假名,为紀元七一七年隨唐时,日本吉备真备来中国居十七年后回国,取汉字偏旁假其音而成者。草書称平假名,系七世紀留学隋唐的空海和尚所作。——譯者

*** 韻为日文对汉字的讀法。——譯者

代以后，表示日本語音的汉字也一定了，最后，通过对汉字的改形和简化后，就成功了“假名”。

本文中虽然也正确地写出了女性在傳奇文学上的功績。但假名發达的本身也是女性的功劳一事却不能不提及的。男子是不屑于用假名文字的。紀貫之以假名写“土佐日記”时，甚至是假借女人的名义来写的。因之，貴族男性对于宫廷公文从来是不用假名文字，甚至私人日記也都是不用的，而只是用汉字来写一种既非汉文也非原来的日本文的異样的文章。

假名是女性的文字。貴族的女性对平民固然也是蔑視的，但是她們却并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男性貴族所統治、所玩弄的。因此，妇女学习汉学，就被認為是自高自大。另外一方面，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恋爱也还是自由的，而当恋爱之时，也曾經作出了很多的歌子。由此，妇女們就使写恋歌的文字發达了，其后，又用这种文字写出了各式各样的傳奇故事。如被称作是爱国者和日本思想家的管原道真就是喜欢写汉文的，他作的汉詩还曾受到唐朝人的夸奖。日本人写日本文，自由地表达日本人的心情，这一点是特权統治者所不能够作到的。他們認為严正的汉字，人民所不懂的汉字是必要的。他們并不是热爱日本文化的人，而只不过是爱自己的統治而已。但从这种特权中，自由的女性，却使假名發达起来了。

文字的本質 文字是語言的符号。因此，文字就当然是以能最正确而最簡單地表达出来者为最好。語言是由母音和子音的各式各样的配合而成的。因此，为了正确地表达語言，創造母音符号和子音符号的文字并使其配合起来就可以了，而且，这种办法也是最簡單的。羅馬字就是这样的文字。假名是不分母音和子音，只是將母音和子音配合成的音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汉字不管是一句

話、物件、事情、動作和狀態，有一字就有一種意義的。例如植物的“瑪茲”是松，等人的“瑪茲”是待，“瑪也”是前等等。因此，漢字幾乎是必須要有無限的文字才可以，而為了記憶與使用，這種文字就不能不經過特別長的時間的訓練。這一點只有有餘暇的人才能作到，對於天天從事劇烈勞動的人則是很困難的。僅僅一部分人壟斷了文字，而大多數人是文盲一事，就使一部分人的統治力量看去似乎是穩固了，而對其人呢，看去也似乎是特別的偉大，似乎是有些神秘的偉大似的。因此，對人民來說越難懂的文字，也就越是專制政治所希望的。

據說羅馬字之本源是二千五百年以前腓尼基人所創作的。因為他們是自由地在各地貿易的商人，因此所創造的也都是實際有用的，而不是麻煩百出的文字。

世界最初時期的文字都是像漢字那樣，甚至比漢字都難懂的。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這樣。奴隸主的貴族及僧侶就是利用這種文字來使人民相信僧侶和國王都是由神那里得到了神祕的力量。

女流文學 自由地使用了假名的女性，對於創作“源氏物語”^{*}等文學是有功績的，但同時也不能不承認“源氏物語”的文學價值。然而它不是國民文學，而是在平安貴族的虛假繁榮中產生的文學，不是以健全的立場來批判地認識與表現社會和人生的真實，這一問題是有必要弄明白的。在某些部分固然也有其優異的地方，但其全體的結構與綫索都是描寫平安貴族的萎靡生活的。同時，在“源氏物語”的文章中，所用的主語都是不明顯的，而且是以各式各樣的敬語的用法來表現天皇或當政的最高的人物及其他人物的。這是奴隸的文章，在日本文當中，這樣的文章還是不少的。

* “源氏物語”為紫式部所著，是平安時代以宮廷生活為中心描寫平安朝社會的長篇小說。——譯者

在日本文学中，女性的功績可以說以万叶之歌和平安朝的假名傳奇达到了頂点。其后，到近代为止，一直就沒有出現过堪称为作家的女流作家。这是由于以男子为本位的社会日益發展，上流階級的男女交際被認作是極不道德的緣故，是由于懂得文字、書写和写文章的階級——貴族和武士——的女性，沒有任何自由，并且被認作是对社会和人类沒有充分的批判力量所致。因为，在恋爱方面受到了限制，因之被局限于恋爱方面的文学也同样是沒有發展的，其結果就使女性文学到平安朝也就达到了止境。

鳳凰堂* 在平安中期，貴族繁榮时代的佛教，是主張尽情享乐，主張今生和来世都要去享乐的。在寺院中作法事，也都是像今天在歌劇中的对白似的。在吉祥天女等嬌艳的女佛圖和雕刻——本文中写作是“有着亲切的日本風格”——之前，按身材高低排列十几人的青年僧侶，从中挑选出声音最美的，使其共同誦讀經文，就如同現代的合唱的風調是一样的。天台宗与真言宗虽然並沒有衰落，但在道長时代前后，又兴起了叫人信仰阿弥陀佛如来并說誦念南無阿弥陀佛就能够到極乐世界去的教理。而且这一教理还不断地說这个社会是空虛的。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貴族們的繁榮趋向終結的历史預言。

四 地方的狀況

京城与地方 在这里所謂的平安朝的“地方之乱”是作为問題被提出来了。这固然是道長們的繁榮盛世的一面，但“京城与地方”

* 鳳凰堂是平安时代，紀元一〇五三年建立的寺院“平等院”的構成部分，是日本有名的、艺术性很高的古建筑。——譯者

的提法，却是混淆了历史本質的。

这里所說的京城与地方的不同，就是貴族与在农村中正在兴起的武士的不同。

本文所以說貴族“对政治是并不热心的”一点，就是指前面“虛假繁荣”項內所說明的問題而言的。

其所以說“在地方官吏中，很多都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人”与說中央貴族“对政治是不热心的”含义是一样的。中央貴族們首先考虑的也只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本文中將所有的責任都归咎到地方“官吏”身上，这也正是官吏所常干的事，他們永远將責任推到下面的人，最后則推給民众而自己却摆出一副毫不知情的面孔。本文將責任归咎到地方官的私慾問題上以后，馬上就說“坏人即趁此机会而跋扈，并威胁了人民的生活”，很快地“坏人”就不是官吏而变成了人民了。由于“人民的生活”不安定才有盜竊的出現，如果生活安定了，人民是絕不会作盜竊的。威胁人民生活的是坏人，但最大的“坏人”是誰呢？

尾張的农民 官吏对人民是压榨了其所能压榨的一切。但人民对此却并不是沉默的，是常常上告到中央政府的。其最有名的事件就是九八七年尾張农民控告国守藤原元命事件。元命与其家族和其部下的官吏，征收了超过法律所規定的重稅，强制地借給人民稻种，而收取加倍的利息，恣意地征用了人民，为他自己的私利而劳动。对于农业非常重要的水利灌溉等工程，不但一点沒作，而又征收了費用。并且还借口准备度荒，使人民繳納稻子，而却將它擡为已有。元命之子及家僕們，整天醉醺醺地，有时甚至还去搶夺人民的牛。此外，凡是想得出的暴虐的事，他們都做到了。不堪其苦的尾張人民，归納了三十一条反对元命的苛政的要求，就向中央政府上告了。

政府無可奈何地，只好罷免了元命，但元命也只是被免去了尾張的国守，他回到京城却又就任了高官，并且以其在任中所剝削来的財富过着驕奢的生活。也就是說，中央政府是并沒处罰元命的。在日本到現在为止何曾有一次是因为官吏对人民作了坏事而受到真正处罰的呢？

所謂“地方起了騷动”就是因为是在貴族政治之下，民不聊生才爆發的。由于不論如何向中央上告地方官吏的不法，中央也不接受，人民沒有办法，只好以实力赶走坏的官吏，有时还将国守杀掉了。八五七年，对馬的人民就燒毀了国司館，杀掉了国守及其部下等十六人。这样的事情是日益增多了。

另外，不能生存下去的人民的一部分，不知道應該如何做而成了强盜。尽管他們是被称作路劫和强盜，但他們并不是威胁普通劳动人民，而只是襲击由地方向京城貴族运送的年貢、旅行中的官吏和剝夺人民而致富的人。本文所說的海賊襲击了貨堆，也是年貢的貨堆。强盜和路劫是坏事，但是，在人民广泛地坚强地团结起来，廢止恶劣政治和民主政治来建立起来的期間，这样的事情是会不断地發生的。

將門純友之乱 地方官吏都为了圖謀私利而土着，并且还增加了私領地，豢养了多数的爪牙。他們不是与附近的豪族和官吏們同盟，就是彼此之間混乱，一味地彼此爭夺領地。有的說杀人越貨是武士的因習，但实际上他們却是大規模地杀人越貨的强盜。其最早期的而又是最大的事件就是平將門事件。將門原是鎮守府將軍——蝦夷地警备軍司令官——系統的人。土着以后就大大地向下总地方擴張其势力。而且，从很早的时候就与其伯父和其他近隣的豪族彼此反复地在作着爭夺領地的小的斗争。九三九年終于以数千之兵赶走了关东东部和北部一帶的国司們，在下总的猿

島建筑了宮殿，自称为新皇，并将一党的豪族們都任命为太政大臣等官。但不久即作为叛变者被率領了东海和东山一带大兵力的从宫廷派来的追討使(实际上是与將門同样的地方官)的独立的軍隊所击败。

在將門之乱終止这一年，伊予国官吏藤原純友在任期屆滿后也沒离开伊予，却据有了附近的島嶼而成了海賊的总首領，并殃及到了瀬戶内海及其沿岸地方。純友在此以前是曾作过海賊追討軍的司令官的，但这次相反地却成了海賊的总首領。然而，在不过一年的时光，势力所及虽曾达到了九州博多灣一带，但也在那里遭到了歼灭。

这些事情給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从历史上說，在这里新的权力，新的社会組織——即武家社会却在成長之中。

庄园 在此以前屢次提到的貴族和寺院的私領地就是庄园。庄园是对政府不納稅的領地。开始时，貴族、寺院和地方豪族不論是通过开垦所得的私領地也好，或是將作为封祿而領取到的土地成为永久的私財，或是通过剝夺貧者的土地以及其他各种方法所取得的私領地也好，都是必須对政府納稅的。但是从九世紀中叶起，領主們就捏造了各种借口而从政府那里爭取到了可以不納稅的特权。虽說是政府，但这个政府畢竟是由他們所建立的，因此，这一特权也就比較容易地取得了。

其后，又过了两个世紀，庄园又有了“不入”的特权。所謂“不入”，就是国司和政府的权力不到庄园里来的意思。这样，庄园也就成了完完全全的私領地，成了既不給政府納稅，也不受政府法令支配的地方了。

可是，当庄园得到了这样强的独立性时，名义上是領主的貴族和寺院，就已經失去了对庄园的控制力，而这一控制力却轉移到庄

園的富农手中。中央庄园的領主們，为了对現地的經營与管理，固然也派遣了各种名义的官吏(庄官)，但他們都土着并成了地主，成了事实上的庄园統治者。而且，中央領主虽然在一开始时曾任命过現地的富农为庄官，然而这些庄官后来就都成了实际上的土地的統治者了。

另外，地方上的豪族与地主，为了使自己的領地不被政府課稅，名义上是將其捐献给中央貴族和寺院，而自己则以領主的当地的官吏即庄官的名义、实际上即作为大地主来統治农民的。这样，通过各种形式而形成的地主就叫做名主。中央的領主虽然也被称作“本所”和“領家”，但他們也只是从庄园中收取定額的年貢而已。

农奴 在庄园中劳动的农民是隶属于領主的，但他們已經不是奴隶了。他們自己有家并成了与家族一起將領主的一部分的土地作为自家用的土地来耕耘、来独立生活的农民了。然而，他們是不能够脱离土地的，他們是被領主牢牢地束縛在那塊土地上的，而且，收获的百分之三十都要作为年貢被領主拿去。此外，农民們的手工業制造品也作为捐稅被征收了，而他們自己不是被拉伏到領主直接經營的田地上劳动，就是被拉伏去作領主的护衛和建筑他們邸宅的劳役。在藤原道長建造法成寺时，每天有近六百到一千的人都是由庄园抽征的。

如上所述，农民虽然还未真正成为农民，但却也不是奴隶与部民了。將农民当作奴隶来使用，这对于領主來說也是不上算的。这是因为奴隶絕不会去忍受这样苛酷的压榨，而是会逃亡或是会怠工所致。因此，逐漸的即使是些微的，却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劳动者的地位。就是这样，农民就由奴隶的生涯內迈出了一步。这就叫作农奴。另外，作为法律上的身份的奴婢，虽然在九世紀初就

已廢止了，但实际上，奴隶也仍是存在的。名主們是統治与剝削多数农民的人。但同时，他也使用了被算作下人的奴隶。

五 武士的兴起

武士 根据本文的說法，武士似乎是为保护村庄，对付外来的扰乱者的，同时也是作为农村共同防衛的指揮者而产生的，这是多么牵强附会呵，这在以前几項的說明中已是很明显的了。本文中說說的武士是住在庄园内的地主，这一点却是正确的。这些地主即前述的名主中的有力者們，是为了掠夺他人的土地、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武裝起来的，是为了不讓劳动的农民从土地上逃走，并强迫他們劳动而武裝起来的。

將門之乱就已經显示了这种武士階級的萌芽。

大小地主的一族，团結起来，拥有了部下，順从着强大的武士集团，这样他們的势力也就逐漸地增强了。武士之所以能比貴族强大，本文說是因为“武士在乡村中过着朴素的生活”，但实际上并不是朴素与奢华的問題，而是因为当时武士虽然不劳动，但却也組織和管理了生产所致。

脱离生产的人就会削弱下去，这一点是古今东西历史所共通的。王朝貴族是將人民作为奴隶来統治的。但人民的斗争却摧毁了奴隶制，首先將社会推进到农奴制了。而利用了人民的解放斗争，組織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就是住在农村的地主們。这样，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王朝貴族就衰落了，而立足于比奴隶制先进的社会組織的农奴制的地主們即武士們，逐漸地成了統治者。

东国的源氏 本文中說东国武士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东

国沒有开化，而武士团也沒沾染上像京城那样的浮华習气所致，这是胡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在东国以外譬如从四国出現武士的首領呢？为什么沒从九州南部产生最初的武士的势力呢？而从“尙未开化”这一点上来看比起东国这些地方豈不是更不开化嗎？

首先，从东国产生了武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东国即从东海到关东地方，特别是关东平原“尙未开化”，相反地，却正是因为逐渐开化，而农業生产在这里也得到了發展所致。而且，也因为这些地方中央貴族和寺院的領地較少，因之，在这里的旧社会制度的束縛也就較少所致。在东国是有过清新而自由的空气的。但仅仅这一点还並沒有使东国成为新时代的先驅。东国原始的清新还不得不与近畿的文化相結合。

本文中所說的“当平等院成立时，安倍氏在奥羽叛变了”，就是指作为殖民地被統治的奥羽的蝦夷人的独立运动。安倍氏是蝦夷人的酋長，由于長久服从內地而得到了安倍之姓，到了这时看到王朝政府丧失了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才掀起了独立运动。这一运动經過了十一年才被鎮压下去。

平氏社会 武士們在地方上，固然是培养了經濟、政治和軍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但在开始时，它并未形成一个統一的势力，而只是在各地，以分散的、大小武士团的形式而存在的。可是正如本文中提到的，从前九年和后三年之役*起，东国的武士团以源氏为中心，就大大地集中化了。京城的貴族們懼于此，就对其首領源义家施加迫害，以便使义家的势力不至于威胁到宮廷。

* 一〇八八至一〇九〇年帮助源义家鎮压了蝦夷人安倍氏起义的清原氏内閣，源义家援助亲源氏的一派击潰反源氏的一派，通过这次战争又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譯者

組織从近畿到西国的武士的是平氏。这里是大貴族和寺院的自古以来領地最多的地方。因之，这里庄园的武士比起东国武士，与其說它对貴族的独立性是弱的，毋宁說它是起着貴族的僕从的作用。

宮廷由于完全沒有武力，因此在需要武力时就不能不依靠武士，平氏在这一点上，比源氏是更早就与宮廷勾結起来了。

平氏之所以能急速地兴起，固然是因为它与王朝貴族勾結，但其所以很快地灭亡，根本的理由却也正是因为平氏沒有在地方上巩固从王朝势力中充分独立的武士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統治，而只是掌握了中央权力，是因为如本文所說的实行了“驕橫跋扈”的、独裁專制的黑暗政治的緣故。

密探政治 平氏为了爭夺天皇王朝貴族和寺院的勢力，曾采取了各种手段。后白河上皇对平氏表示了不滿，馬上就被监禁起来。因此，这一些敌对的勢力是在暗中窺探机会准备推翻平氏的。假如只是打击在历史上正在灭亡的旧勢力的話，倒也还好，但由于平氏一族大兴土木，沉湎于奢华，对人民又課以重稅，这样就引起了人民的反感。为了搜索表示不滿的人民，平清盛指使約三百兒童經常地閒蕩在京城的街巷以充間諜，来檢舉偶語于市的人。这种用密探甚至都用到了兒童的黑暗政治，就是清盛的政治。平氏因为这样，就不但成为貴族勢力的、而且也成了民众的怨恨的对象，而这一問題也就給予了各国反平家的武士的暴动的机会。平家經過了約二十年的如夢般的繁榮之后就灭亡了。

說清盛开創了与宋的貿易，首創地开放了瀬戶，在兵庫筑了海港等等一切都是“为了社会”，是有些言过其实的。与宋的貿易是由平氏壟断的，是妨碍人民或其他領主們与宋的貿易的。另外，也因为平氏在西国有着地盤，而为了运输那里的年貢，为了修筑統治

西国的軍事道路，才整頓了瀨戶內海的交通路。一旦建筑起来的交通路，虽然除了作为軍用路以外，在發展交通方面也起了作用，但这不能說平氏开辟了这些道路就是“为了社会”。这与納粹党在德国国内修筑了縱橫的大公路是沒有兩样的。納粹党借軍用道路工程和軍事工業，是暫时的使德国的失業者消逝了。假如这一情况真是像当时納粹党所自豪的那樣，是“为了社会”的話，那末，納粹党也就不会灭亡了。同样，假如清盛的政治真正是“为了社会”的話，那末，平家也就不会这样快地灭亡的。

壇之浦 与平氏灭亡的同时，清盛的外孙安德天皇(母为清盛之女即建禮門院)也在長門的壇之浦投海而死，而且在这时，三种神器中的瓊曲玉也沉到大海中去了。这两个問題應該講解清楚。瓊曲玉在这时就沉入大海了，其后，虽然說它又重浮現出来，但并没有关于浮現出来的具体情况的記載。

第四 武家政治

一 鎌倉幕府

幕府之成立 源賴朝在推翻了平家之后，就将新国家的中心設在鎌倉，建立了全新的政府組織——幕府。关于这一点，本文着重地說明了由于武士不会搞政治与审判，所以就从京都招聘了作这种事情的人。实际上，在这里只說明一下政所和問注所的建立就够了*。本文在这里特別着重地加以說明的用意，就是为了要極力地給人一个幕府本身是沒有力量的印象。如果像本文所說的那樣，幕府沒有執政能力时，那末又怎能建立武家政权呢？如果京都的宮廷拥有政治和审判的能力，豈不是也就不会衰落了嗎？这里所說的，由京都招聘的人，就是指大江广元們即宮廷的法律家和汉学者們而言的。賴朝之所以聘請他們也只是想利用他們的技术知識而已。本文中对此問題的闡述与其后所說的北条时政“作了政所的工作”一事是互相矛盾的。編者的意圖是想与下述的幕府請

* 源賴朝掌握政权后創建幕府。在中央設置了掌管幕府行政事務的“政所”，掌管司法与审判的“問注所”以及管理武士的“侍所”三机构。在地方上則設置了司警察事務的“守护”和設于庄園及公領地內的、直接压榨农民、收取捐稅的“地头”。

幕府的最高官銜是“將軍”，在北条氏时，又增設了輔佐將軍的“执权”和輔佐执权的“連署”以及司管一般行政事務的“評定众”与“引付众”等官职。——譯者

願設置守護地頭相聯系，借此來說明朝廷是經常處在幕府之上的。

守護地頭 在說明幕府設置守護地頭時，本文中說它是“向朝廷提出了請願”并“得到了朝廷的准許”，這裡兩次地提出了朝廷字樣，并強調了“請願”與“准許”，由此即明顯地看出編者的意圖了。但是從歷史上來說，當設置守護地頭時，本質的問題並不是賴朝向朝廷請願，或是得到了准許，這不過是形式問題。假如賴朝得不到朝廷的准許時，他也是要恣意地去設置的。設置守護地頭一事，就是要將王朝貴族的莊園與尚未成為莊園的所謂公領即宮廷領的警察權和征收年貢權，掌握在武士階級手中。這當然是要引起“朝廷”的強烈的反對的，而對於剛剛推翻平家不久，權勢尚未充分鞏固的賴朝來說，為了要避免無味的摩擦，不得已才上奏后白河上皇，採取了設置守護地頭也要取得上皇承認的形式。對此，不應將興趣單單灌注在向朝廷請願這一形式的問題上，而應該更認真地說明設置守護地頭在歷史上有着什麼意義。守護地頭的設置就是建立了代替律令國家統治體系的全新的統治體系。平家之所以簡單地滅亡了的原因，也就是因為他沒有建立這種新的現實的統治組織，而只掌握了舊的中央權力機構所致。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創建了武士階級國家的問題。賴朝是武士階級即大地主階級聯合軍的總指揮，而設置守護地頭，也就是大地主階級終於將政治權力施展到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的問題。正因武士們的新國家的成立，所以儘管源氏僅僅三代就滅亡了，但鎌倉幕府即大地主聯合政府却毫未動搖，相反，在北條氏指揮下，却日益鞏固起來。

另外，賴朝被朝廷任命為征夷大將軍，這固然是事實，然而這與武家政治本質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將軍在形式上是由朝廷任命的，但在事實上，主權卻是在將軍而不是在天皇，日本的政府是幕

府，却不是朝廷。正因为如此，所以攝政和关白也是为賴朝所更动的。

鎌倉 本文中沒有提到幕府为什么要設在鎌倉的理由，但使兒童加以討論，培养他們对历史的判断力，却是当前存在的一个問題。在普通的書上，一般的都說賴朝是唯恐把幕府設在京都，則武士們就要墮落到像公卿那样，所以才設在鎌倉的，但問題并不是这样簡單的，而是因为以幕府的形式建立了政权的武士們的根据地是在东国，因此，也就在东国的要地，建立了他們的政府。

执权政治 比起执权政治來說，在幕府制的确立方面倒有一件更为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承久之变。

承久之变 承久之变在“国史”中只是在下一章用了六行就結束了。而且，在其結構方面的地位，也并不將这一变动作为鎌倉幕府發展期的問題，而是作为其灭亡的問題，作为建武中兴的前奏來說明的。这絕不是以正确的学术来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而是將侵略战争和过激国家主义时代的教科書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在这一方面，就是在战前的小学的国史中也沒有这样写过。

当設置了守护地头的武士的統治組織在全国建立起来之后，所謂的朝廷——朝廷的意思，原本是君主的办事机构，但这时的真正的朝廷却是幕府。普通所說的朝廷，是指皇室或以皇室为中心的貴族們的宮廷而言的，——領地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地头在征收了庄园的年貢以后本应送到其上面的領主的，但在实际上，却是不送或是減少应送的数量。这样也就不能不引起貴族們的反抗。而对被剝夺了权力的现实生活基础也在逐漸被剝夺的宮廷來說，产生了將这一切再夺回来的意圖也是必然的。后鳥羽上皇就成了這個問題的中心。特别是因为上皇給予其寵妓龟菊的庄园的地头，竟不承認龟菊的領主权，就更激起了上皇的憤怒。

另一方面，賴朝死后，在鎌倉，將軍一族也繼續內鬩。這并不仅仅是由于他們性格上的缺點而產生的鬥爭，同時也是幕府主要武士們的勢力的鬥爭促成了將軍家內的鬥爭。這樣，源氏彼此間互相廝殺，僅僅三代即滅亡了，而執權北條氏就掌握了全權。

鑒于鎌倉混亂情況的後鳥羽上皇們，以為此時如發出舉兵討伐幕府的命令時，對幕府不滿的武士們，會立即在全國響應，而且在鎌倉也會產生內亂的。一二二一年，上皇終於對全國下了征討北條義時的命令並召集了近畿的武士——自古以來就是皇室和貴族莊園的武士——及寺院的僧兵（僧兵只是在形式上是僧侶之兵。但大貴族的寺院為了守護其領地，都豢養了很多的僧兵）。但是寺院方面估計到沒有勝利的可能性而拒絕響應上皇，其他的武士也不是像上皇想像的那樣容易集中，結果僅僅只征集了一萬五千名士兵。

鎌倉雖然起了內亂，但在此以前參加了內鬩的武士們的聯合，相反地卻更緊密了。於是義時之子泰時就任指揮，在進攻京都的各個道路上，都征集了兵力，其數竟多至三十萬人，離開鎌倉二十三天以後，很快地在宇治、瀨田一戰，就擊潰了上皇軍，翌日即佔領了京都。

泰時立即開始了對上皇的處罰。

當時的天皇雖然只有四歲，但泰時認為即使他是個兒童，也是有罪的，於是就令其退位，將他在九條殿監禁了一生。這叫作“九條廢帝”或稱後廢帝（後廢帝是對淳仁天皇這一前廢帝而言的）。罪魁後鳥羽上皇也被流放到隱岐島，在岩洞中作為罪人結束了他的殘生。順德、土御門二上皇，雖然也曾反對舉兵，但順德也被流放到佐渡島，而土御門則被流放到土佐島去了。後來，就立了與後鳥羽系統完全無親緣關係的八歲的茂仁王為天皇。

此后，不論是皇位的繼承，或是攝政和关白等的任命，这一切，暫時都必須要取得幕府的准許了。幕府的主权从此就断然确立起来。不仅如此，幕府还沒收了依附于上皇的武士公卿——公卿也并不是全部依附于上皇，大部分是依附于幕府的——的領地，將其分配給幕府方面的武士，进一步扩充了地头制，加强地头的权限来巩固其基础。

这并不仅仅是上面的政爭。上皇胜利一事，是意味着企圖將农奴制社会再拉回到奴隶制方面的胜利。但这一派最后在这里是被击败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像关原之战等，不論哪一方面胜利，对于社会的大势是没有影响的。建武中兴在本質上就是在历史方面承久之变所解决了的問題的重現。

貞永式目 由于承久之变就确立了武士階級的国家，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他們的宪法——貞永式目。

本文強調了評定众的問題，实际上这与聖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一項的写法是有着同样意圖的。所謂“政治公平”并不是对人民公平的，这一評定众只是从幕府主要的家臣中任命的，可以說是樞密顧問官。与他們商量問題不能就說成是民主的，因此，这里所說的“政治公平”也只是武士階級間的公平而已。

廉潔政治 本文中強調了执权是接連地施行了廉潔政治。但具体的却什么也沒写。其原因可能是本文認為“評定众”的設置与北条时賴的崇高朴素，就是“廉潔政治”。关于評定众的問題，在前項已談过了。至于品質好的問題，对个人來說是一件不坏的事，但絕不是“廉潔”的政治。廉潔政治是使人民生活丰富与安乐的政治，却不是从早到晚叫人去質朴、节省、去勒紧褲帶的政治。質朴是武士階級的道德。將农民束縛在土地上，迫使他們劳动并剝削他們的武士，是在規劝农民質朴儉省的。为了这样，也就有必要使

自己的生活也簡朴一些。可是一般的武士領主，自己都是沉湎于奢侈享乐的。因此，偶然遇有时頼那样的崇尚朴素的人出現时，封建历史家就把他說成是实行了“廉潔政治”的人，这本教科書，也正是原封不动地採納了这种观点的。福澤諭吉有一句“明君为暗夜之明灯”的話，在古代所謂施仁政的名君，是因为他們整个政治都是黑暗的專制政治，所以，偶而出現了減收人民捐稅的人，就会像黑夜中的灯笼一样發光的。如果不从本質上將廉潔政治的問題弄清楚，那末，它就不能成其为历史的。

在时頼的时代，实际上人民是否过了丰富、安乐的生活一事，將在下节叙述。

蒙古来襲* 并不是仅憑武士的力量才击退了蒙古的襲击的，还必須要提到九州人民的功績。这时，天皇和京都的貴族，只是慌慌張張地求神拜佛，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

另外，在这里曾說“我国”并未答复元的使节，在这里代表我国的，并非京都的宮廷而是幕府，元使来到的地方也不是京都而是鎌倉，將这一点弄清楚也是很重要的。

二 社会和文化

武士生活 这时，才开始出現了“公家”这一字彙。这是与武

* 元世祖忽必烈遣使日本，令日本朝貢，然而，北条时頼等則驅逐并杀掉了元使，表示拒絕。于是在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元朝兩次对日本“兴師問罪”。第一次出动蒙古兵二万五千人，朝鮮兵一万五千人，分乘九百艘大船，企圖征服日本，船到对馬，遇台風，元兵溺死將近一半。第二次又动员了十大大軍，由福建出發，船行駛到日本海岸，日本兵环岸拒守（一切軍費皆系兵員自理），参加者达四十万人，元兵不能上岸，又遇台風，船皆沉沒。元朝兩次征日以失敗告終。——譯者

家相对的,是指天皇、皇族和王朝贵族全体而言的。但这与“公卿”却又不同,公卿只是指上流的王朝贵族的一部分而言。

本文所说的“公家在京都是过着与过去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脱离了政治和生产而闲荡着的意思。但这时的奢侈,却也比不上过去了。

至于说武士“成了国民的中心,并领导着社会前进”一事,与现在地主为农村的中心领导着农村、资本家是领导工业的中心、官吏领导了社会等的含义是一样的。实际上并不是“领导”而是统治,是向人民榨取年贡的。谚语中所说的“哭夜郎和地头是难对付的”,其实这并不仅仅是说明了地头的的作用,就是武士本身的欺压跋扈,人民也都得要忍气吞声的。

说有不少武士自己也参加了农耕一事是骗人的,成了武士的地主是完全地脱离了农耕的。而在未成为武士的地主(就是如下述的名主的下层)之中,虽然也有若干是自耕农,但即使这一部分也是极少的。何况说武士自己拿了锄头去耕种等情况更是没有的,他们只是使用农奴和奴隶来经营农业的。

农民生活 本文提到了“武士的生活”和“工商业的发达”,但对当时佔日本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却没有作为问题提出,这就是这一教科书向来不考虑人民的表现。

这时的农民遭受到了极其复杂的统治和剥削。在多数庄园中,最上层有本所和领家即名义上是领主的贵族和寺院,其下又有本所和领家的代官和幕府的地头。而实际上掌权的则是地头。在其下面才有实际上的地主和名主。他们一般地都是武士。地头就是这些名主中的有力者。名主中有的还是没有完全成为武士的。在其下面才是实际上的劳动农民(称“百姓”和“作人”)有时在百姓下还有“下作人”。

幕府——地头
本所領家——代官——名主——百姓——(下作人)

农民不得不供养名主、地头和本所等等。因此，他们收获的将近百分之六十都作为年貢被征去了，而自己仅仅能得到百分之四十。此外，还要在地头（本所的代官的地位逐渐地被地头所剥夺）和名主直接经营的田地上劳动，或者在他们出外旅行时，特别是由于地头常常到鎌倉去，以及到京都的警备軍中执勤时，此时还要出伙或者为此而被征收特别的費用。

农民是不能放棄土地而逃走的，因为如果这样，其遺留的家屬就会被地头逼迫着去充作奴隶的。农民一家的耕地面积，有不少仅仅是五反的。每反的收获，中等田地可收一石四、五斗，一家六、七口人就是靠此生活的。現在农家的耕地，一户在內地平均約为九反，而由于地区的不同，中等田地一反的收获常年收成約为二石五斗。可是即使在今年只有五反耕地的人也是極多的，农民的困苦与生活水平之低是世界少有的，可是这个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却还远不及現在的。然而，比起平安时代农民的地位，还是有了一些提高。也就是說，被征去服劳役的事情是逐渐地減少了，农民家族作为半独立的农奴，就越来越多地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农具。

下人 即使在这个时代，也存在着称作“下人”和“所从”的奴隶。他們是在本所和武士們（地头 and 名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劳动的。繳不出年貢的农民和償还不了債務的人，便被迫自卖和卖掉其妻子来充下人以抵債的。下人被买卖，被作为人質，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关于买卖奴隶（买卖人口）的情况，在这一时代是相当多的。但这些下人，在十三到十四世紀时就独立了，并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农奴的水平。其所以能如此，归根結底还是由于新的生产力的發展。

產業的發達 本文說“武士和农民为了交換生活必需品”而形成市集的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在这里所說的定期的市集，是專为武士和貴族以及其僕从而服务的。如果將地主也算到“农民”中的話，那末地主(名主)也的确是参加了这一交換的，但耕种的农民却不是这样(應該將农民說成是耕种者)。由于他們的农作物和手工業制造品，都作为年貢被征收去了，因此，他們沒有可卖的东西，也沒有任何購買力。这个时代的商品是以本所、名主和地头等从农民那里榨取来的产品的交換为主的。

农民和下人的不懈地劳动和鑽研，虽然在酷苛的榨取之下，也使农業生产力發展了。在近畿地方也开始了小麦的兩季耕种，一般农作物的品种也增多了，新的水車及其他农具也發达了，使用牛馬耕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农民的手工業生产也發达了，各地的生产品也开始發达了，專門的手工匠人也逐漸地出現了。有的名主自己还兼作农村商人，溝通了农村之間的交易。生产的發达加强了农民和下人的独立心。因为如果农民們不將其作为自己的工作而热心地去鑽研时，則新的农業和手工業也是不会进步的。但实际的劳动者如前項所述，虽然它使生产發展了，但也並沒有能够立即使他們的生活得到提高，他們的产品全部都作为年貢被征收一空，同时，这些年貢物又作为商品在市集上被买卖了。

在这里还必須要提一下与中国大陆的貿易。不仅有必要講授元寇等的战争，而且也有必要講授不論在这一战争前或是在战争后人民之間的和平的貿易仍是很頻繁的。尽管这一貿易受了源氏和平氏勢力之爭的影响，但仍是年年發展的。輸入品多为高級的絹綢和香料等奢侈品，輸出品多为硫黃、木板和刀劍等。由于这种貿易就使宋朝的銅錢大量流入日本，并且在國內大量流通。这就助長了國內商業的發展，而商業的發展也就日益增加了对貨幣的需要。

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商人的力量，于是財富便移到了商人手中。但像幕府那樣的以統治農民為基礎的政府，對此是忌諱的，因此，幕府限制了對外貿易，並且規定了國內商品的公訂價格來壓抑自由的商業，但它並沒有能夠擋住這一歷史的洪流。

新佛教 本文中明確地指出天台宗和真言宗是貴族佛教，這是正確的。而如果在傳教大師、弘法大師的地方提到這一問題，那就更為適宜了。

新佛教當中，淨土宗、真宗和時宗都說只要專心的念佛，那末就不論是農民也好，漁夫、商人也好，任何人都能到極樂世界去的。淨土宗有的地方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很像貴族佛教的，它特別強調這個世界是骯髒的，是不可琢磨的。這與瀕于沒落之途的貴族們的已經到了世界末日的感情是相吻合的。因此，與其說它在平民之間，倒不如說在貴族之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就是法然和尚，也並沒有費怎樣多的時日在地方上傳教。

創始真宗的親鸞是京都人，但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巡迴在東海、關東和北陸地方傳教的。他在相當程度上是主張僧侶可以肉食，也可以娶妻的現實的人的生活。他到處教導說，人是無智的，罪孽是很深的，並且是充滿着迷惑的，但如能專心的念佛，就是過着這種人的生活，也可以脫離這一不幸的世界而踏上西方極樂土。一遍和尚也傳佈了同樣的教理。他創始了念佛舞并走遍了全國，來傳播其念佛即可得救的教理。

日蓮則傳播其如果信仰法華經就會得救的教理。

禪宗正如本文中所述的，它是武士的宗教。不是用文字來說明的，而是以自己的體驗和修練來取得趨死的覺悟，在這一點上，對於只從事於戰爭的武士的氣味是相投的。

這樣，在日本的民間也開始形成了各種宗教的宗派，特別是真

宗，就在为战乱和难以忍耐的剝削所苦惱的农民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不論是哪一种宗教，主要的都是說来世的話，求来世的得救，而不主張与現世的困苦作斗争的。至于佛的正义和佛的慈悲在此世并未得以实现的社会批判却是沒有的。因此，不論教祖們的意圖和人格如何，結果就都成了为統治者服务的教理。

学术和艺术 本文說，大学、国学制度已不流行了，繼之而兴起的是“在寺院內施行新的教育”，这是地方武士和地主們的教育。这与江戸时代的“寺小屋”^{*}，教育了一般人民的子弟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

將和歌称作是“符合我国風尚之歌”的說法是令人难懂的，实际上就可叫作和歌或是短歌。这是作为宮廷貴族們的文学——甚至源实朝从宮廷趣味出發也曾創作过和歌——在他們之間玩賞的，但它絕不是像“万叶集”时代那样的国民文学，同时，这种歌多半是沒有生气，沒有雄壯气魄和直率性的，多是神經衰弱的矯揉造作的歌子，而且歌的規則又非常复杂，糊塗透頂的人甚至都看重得將其秘傳起来。如藤原定家被称作是歌的“名人”，也就是因为他很懂得这种規則并創立这种規則的緣故。这时代，在实朝所創作的歌中，虽然很少，但有的也是很好的，这是因为他是新兴武士階級中的人物，他把鎌倉武士的强而有力的情况表現出来了的緣故。“平家物語”是說的故事，也就是說它不單是用眼睛来看的文学，而且也是給很多人——話是这样說，但很多都是武士——听的文学。这就产生了与“源氏物語”完全不同的清晰的表达方式，使日本語和日本文章也为之前进了一步。

^{*} 鎌倉、室町时代的兒童教育系由僧侶担任，因之，教育兒童的学塾即称之为寺小屋。到江戸时代，教育兒童的学塾仍因襲此名，如同我国过去的私塾性質。寺小屋的教科書为三字經、童子教、孝經等。教師多为幕臣、藩士、僧侶、医生等。——譯者

所說建築和雕刻也“反映了國民生活”一事，當然也只是反映了武士的生活而已。

第五 从鎌倉到室町

一 建武政治

朝廷和幕府 本文在这里輕描淡写地处理了承久之变，这是錯誤的，关于这一点已在前面詳述过了。

关于天皇家的两个系統的迭立，本文說这是幕府“为了不使推翻幕府之謀重演”，这种說法实际上就是繼承了作为过激国家主义者被整肃的平泉澄等人的說法的衣鉢。

在皇位繼承方面，在承久之后，天皇也是完全沒有自主权的。当古老的家族在衰落时，必然是会发生内鬨的，天皇家一族也对其仅有的皇室領地展开了爭夺。此时，由于他們对自己的斗争自己也不能解决，因之，也就不能不求助于幕府。在保元之乱*时，由于皇室的內乱自己不能解决，就曾想以武士的武力来解决，可是，鎌倉时代的皇室比平安末期是更弱而無力的。

后嵯峨天皇比起其長子后深草是更愛其弟龟山的，在遺囑中就命令在龟山天皇之后要使龟山的子孙繼承皇位。对此，后深草

* 保元之乱为一一五六年鳥羽上皇为了爭夺政权，拉攏源义朝、平清盛及藤原忠通与勾結了源为义、平忠正和藤原賴長的崇德上皇抗爭，結果崇德上皇失敗。这次战争后，源义朝与平清盛上了台。——譯者

是很不滿意的，這樣，他們之間的鬥爭就爆發了。但由於一直不能解決，於是雙方就都頻頻地去運動幕府，而幕府則是以兩系統輪流繼位的通融辦法來解決的。

幕府的衰落 本文中說由於武士抵禦元寇耗盡了財力和人力，致使其生活也很困苦，因之，就使幕府衰落了。這只是對表面現象的接觸。武家統治並不是“廉潔政治”，而是從人民那里榨取了其所能榨取的一切。因此，人民是毫無余力的，一旦風雨不調，立即就發生了大歉收和大飢荒。鎌倉幕府全盛時代即泰時、時賴的時代，大飢荒就已經是頻繁地連年發生了。其中一二三一年泰時時代就達到了絕頂，在其前後數年，在全國範圍內的大飢荒，據說就已經是餓殍盈野了。在時賴時代自一二五一年以後的數年間，也連續發生了慢性的飢荒。

就是這樣，人民甚至連生活都不能維持，又加上與蒙古的戰爭，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使生產越加荒廢了。武士們當時如果減輕人民的負擔，恢復人民的力量，自己也與他們一把土、一把泥的一起去勞動、去恢復生產時，也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但相反，他們對農民的剝削卻更加重了。因此，人民也就更加貧弱，最後，武士的衰落也變成了幕府的衰落。但為難以忍耐的剝削所苦痛的農民，已經與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農民不同了，村人已經懂得團結起來鬥爭的問題。在這以前，人民只能採取在夜里逃跑的方式，但現在却是全村團結起來向領主提出要求，如這一要求不被接受，則村人即採取“逃散”的方式即團結起來大家離開村子的方式。這對於依靠剝削農民而生存的領主來說，是一件非常頭痛的事情。村人們逐漸地也開始有了村的自治組織。如此，像過去那樣以比較小的地主武士的分散的力量，就不能夠再來統治農民了。而在實際上，商業的發展也使中小武士們貧窮化了。武士中像守護、地頭等

的强有力者，逐渐地将无力的武士的领地收买或者典押过来，甚至不法地掠夺过来而转变成大的领主。这样，武士阶级内部的动向，就频繁地发生着争夺领地的诉讼，但幕府却没有力量来加以判决。这样，提出诉讼的武士就对幕府抱有不滿。幕府也由于这样而被武士所間离。这样，就出现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存在着很多独立的中小地主武士，而是統治了一郡、一地区全体的武士——即后来发展成为大名的前身——，瓦解着鎌倉幕府的势力的基础。也就是说，利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力量的高漲的大领主的出现，这一问题才是鎌倉幕府崩潰的根本原因。

鎌倉幕府的灭亡 如本文所提到的“执权”北条高时的昏愎无能就更加速了幕府的灭亡。在下野的足利地方，極有力量的足利高氏和上野的大地主新田义貞等，都在寻觅时机企圖推翻高时来掌握政权。人民的不滿和武士的不平也都集中到高时身上。

后醍醐天皇們的龟山天皇系統的皇族們，鑒于这种情况，也想来推翻幕府。河內的楠木正成是居住在皇室領庄园的武士，它与幕府的地头等是对立的。由此可知，当后醍醐天皇举兵之檄提出后，他立即响应，那也是当然的事。

但由于皇室本身已經没有什么力量，因此，最初的举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年）失敗之后，就發生了天皇被流放隱岐島的“承久之变”的重演。但这时問題却不是以“承久之变”的重演而結束，最后鎌倉幕府終於在一三三二年灭亡了。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天皇的力量，而是由于普天下的人心都怨恨幕府，而幕府也处于勢將被击潰的形势，特别是由于足利高氏和新田义貞参加到天皇方面，就更决定了天皇方面的胜利。

建武的新政 站在天皇方面的武士推翻幕府的目的，只是想要增大自己的领地与势力，是毫無顛复以武士为本位的社会和国

家的意圖。然而人民則渴望着能够保障人民生活的新的政治。

但是，天皇和公卿則認為幕府是被自己的力量所推翻的，自以為像過去那樣可以恣意跋扈的時代又來到了，又想来沒收武士的領地，而對於在戰亂中痛苦的人民則毫不考慮，借口建築大皇宮，濫發紙幣來搜括人民的財富，征用勞役和大量年貢等，一味地在加重着人民的痛苦。

當時，若狹的東大寺領的莊園的人民向東大寺提出的請願書就說，在幕府垮台後都認為好容易的才由地頭的惡政中解放了出來，可是沒想到天皇政府倒比幕府所課的稅是更加重了，這一點也就充分地表達了人民的心情。這種做法怎能掌握天下呢。

利用人民羣眾與武士們的反鎌倉的情緒，天皇們是企圖來妨礙歷史的進步的，想倒回到舊的社會去，這種反動的陰謀當然是不會成功的，結果一年就被击潰了。本文說，中興是由于公家與武家的不和才失敗了的說法，只不過是將平泉澄的中興是由于國民的利己心而失敗了的說法的翻版而已。“中興”，從皇室的历史來說，儘管是如何短暫，倒也總算是個“中興”，但從國家的历史來說，也只不過是一個反動的插話而已。

京都和吉野 這種問題，從學問上來說，簡單的提一提就可以了。對於足利高氏的來歷是沒有必要寫的。也只是由于他自己企圖作將軍才去推翻幕府的，所以即使不得到天皇的容許，他也会自任為將軍，並將天皇由京都驅逐出去，而使後深草系的皇族為天皇的。他並不是請求后醍醐“請將皇位之印賜下”，而是強迫他交出來的。

本文中說后醍醐天皇們在吉野的深山里執政了，這就会使兒童對政治有了一個非常錯誤的觀念。目前對吉野的天皇家曾繼續了幾代的問題都是不太清楚的。長慶天皇等直到後世一九二〇年

才开始認定他是作过天皇的人，但关于这一点的确切的材料是一点也没有的。生于何地，死于何地都弄不清楚的天皇，就說他也“执政”了，这算什么呢？这只不过是与同类的公卿們自封了空虛的官位来自慰而已。“公家和武家虽然都強調要为双方的朝廷服务”，但实际上到吉野去的只不过是很少的一些公家。武士們也只是分成了足利派与反足利派，也并不是服务于朝廷的。

皇位之印 本文在这里又提出了三种神器。持有假皇位之印的北朝有天皇，而南朝也有天皇，这样就使兒童和教师都会莫名其妙的。若是說三种神器是假的，則全都是假的。鏡和劍是存放在伊勢神宮和热田神宮，但到了这个时代果真存在与否也是个疑問。原在宮內的瓊曲玉已沉入壇之浦而不存在了。因此，不提这些問題，只說“尊氏使后深草天皇的子孙繼了天皇之位，而后醍醐天皇則逃至吉野”就够了。实际上，后鳥羽天皇就是沒有所謂“皇位之印”而即位的。当平家使安德天皇拿着所謂神器逃到西海去的时候，在京都的后鳥羽就空手即位了。

对于这一节的处理，除了將上述的真实情况加以闡述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

至于南朝的后龟山天皇讓位給后小松一事，实际上就是南朝的投降，这問題在当时的任何史料中都是很明确的。正因如此，所以在这以后只有北朝的子孫才繼承了皇位，而南朝則並沒有繼承皇位的。如果南朝有足以使义滿“提出請願”的力量说的话，那末南朝就是不能繼承皇位，也是要形成两个系統迭立的局面的。

“京都和吉野”，即所謂南北朝时代，并不是像本文中所說的那样，在本質上有着天皇爭夺势力的意义的时代，而是日本人民在这数十年的內乱时期终于彻底地清算了奴隶制的有着革命意义的时代。經過这次內乱以后，封建制才奠定了穩固的基础，也就是說在

这次内乱后，立足于旧奴隶制的皇室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就完全丧失了。

二 室町幕府

幕府的成立 在这里所說的是利尊氏“得到了光明天皇的准许”才成为将军一事在形式上是如此，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相反地，光明天皇等还是受了尊氏的“指令”才成为天皇的。在这里，只讲解尊氏在延元三年成了将军并开创了幕府就够了。

乱政 如在“幕府的衰落”项内所說的，社会从根本上在变动着。人民使旧的统治削弱了，在我们历史上开始培植了民主国家的萌芽。利用这一人民斗争，武士和旧庄园领主以及武士之间也展开了势力的争夺。这一点在本文中是叫作“乱政”的，但也只有这个才是日本民主主义的光辉的第一步。这一点将在下述各项内详加论述。

集聚起来的力量 在这里虽然也写到了幕府的虐政，但却說幕府由领地征收的税款不够使用，所以便想到了对农民课以重税的问题，这一点的意义是不明确的。幕府向领地课税，就是向领地的农民课税的。另外，幕府对直轄领地以外所课的税，就是通过守护、地头把他们由农民征来的年貢的一部分使其繳給幕府的。本文說，就是这一部分守护、地头也是不肯給的。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受到了幕府重税盘剥的农民又是誰呢？这是莫名其妙的說法。在这里应该說，幕府是越来越从人民课赋重税。也正是因为說由领地课税和由守护、地头课税等等，就反而将问题混淆了。所有的捐税都是由劳动者身上征收的。

人民的力量集聚起来，暴动就發展了。可是本文中却說这就使“社会越来越混乱起来”。前年（一九四七年）的元旦吉田首相就說工人运动是“不逞之徒”的运动，这种立場，在叙述本書中所談到的民众时，是必然要采取“騷乱”論的說法的。与此相反，对于大名的問題或者对于一有机会就向隣国侵略的軍国主义倒說是实施了“廉潔政治”。

“集聚起来的力量”是日本人民羣众初次有組織地展开了羣众斗争的問題，是进一步要求确立民主主义的自治的問題。

这时，就不單是个人的逃亡，而是全村的人协商之后集体逃亡的。这一点是給了領主以致命的打击。农民如果不存在，那末領主收入的源泉也就丧失了。这种农民的逃亡，就叫作逃散。

农民暴动 如前所述，从十三——十四世紀起，农民的集体斗争和逃散就頻繁起来。歉收时，他們要求減免年貢，另外在当时領主們由于年年不断的爭夺領地的战争，所課的临时捐税是非常之多的，农民們反对这一切苛捐杂税，并向領主提出了要求，而当这些要求不被接受时，他們在协商之后就采取了逃散的战术。这的确是有作用的。領主們懼于逃散，有时也出过佈告，表示可以免除一切未繳納的税并要农民回村的例子。逃散一方面固然也打击了領主，但另一方面，农民本身却也失掉了生活基础。这样，农民們在更强有力的团結的基础上，坚决地就以武装暴动，以羣众行动来要求領主減輕他們的負担。这就是农民暴动。日本人民終于开始了以自己的有組織的力量来保护生产并与苛政战斗了。农民暴动在鎌倉时代就已經到处發生。到了十五世紀，全国到处都为农民暴动的風暴所席卷，其中有名的就是一四三二年的大和国中的大暴动。大和大部分的村庄，都是受着奈良的寺院和神社的統治。农民們与代官交涉后無結果，于是就大举地拥向了奈良，迫使它們

接受了农民们的要求。这一年在大隅、薩摩和日向等地也发生了大暴动，而且，在伊势国以神宫領地最多的度会郡为中心，三郡的农民为了減輕年貢也掀起了暴动。

农民暴动并不止要求減輕年貢和其他負担，在近畿地方也提出了反对高利貸剝削与撤銷关所*的要求。而且，农民与市民也常常联合起来掀起暴动。这又叫作德政暴动。

德政暴动 本文中說，由于幕府“对京都的富商抽了重稅”于是商人們就与幕府的官吏勾結起来“作了各种各样的坏事，获取了利益”，这里所說的“富商”，就是叫作“酒屋”、“土倉”的高利貸。当时很多的酒商是兼營“土倉”这一当舖業的。“土倉”开始是保管典当物的倉庫的意思，但逐渐地就專指当舖而言。“土倉”的主顧全是武士和地主，至于一般的人民則几乎是沒有可以典当的东西和田地的。但当武士們被“酒屋”、“土倉”掠去了高額利息之后，他們为了补偿这一損失，就更加殘酷地剝削人民。因之，人民在怨恨武士、領主和幕府的同时，也是憎恨这些高利貸者的。

按照本文的說法，“富商”是与官吏結成一团来掠夺人民的，但也正由于商人受了官吏的勒索，就使商人更想將負担轉嫁給弱小者。因此，基本的問題是武士、官吏对包括商人在內的整个人民的剝削与統治的問題。正因如此，所以就曾發生过劳动人民反对官吏妨碍“酒屋”營業的事件。对这一基本問題應該有一正确的認識。

当时，幕府为了挽救部下的武士們的貧穷化，常常自称为“德政”，下命令取消一切借貸来压迫商人們。但人民則要求这种德政不要專为救济武士，而要来救济人民。这样就掀起了德政暴动。

* 即关卡。——譯者

这一暴动又是农民与城市劳动者的统一战线，而站在这一战线的最前线的则是被称作“馬借”的交通运输工人。“馬借”的战斗性是很强的。例如由于幕府破坏了制麵厂，压迫“酒屋”的营业，这使京都大米的需要大减。这样的结果，就威胁了自近江运米到京都的“馬借”的生活。于是“馬借”就掀起了暴动并要求幕府停止对制麵厂的破坏，并威胁幕府表示如不接受这一要求，他们就要烧毁京都的寺院，他们就是这样的来贯彻他们的要求的。

德政暴动的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一四二八年的暴动。这一年日本全国大饥荒，饿死者不计其数，仅仅鎌倉地方就饿死了两万人。此外，又复蔓延了“三日病”。这似乎是指三日即死之病。

对于人民这样的痛苦，幕府和领主是没有采取任何救济措施的。到了八月，忍无可忍的近江的“馬借”和农民首先起来了，并立即从醍醐波及到了京都，继之就形成了在奈良、伊势、纪伊、和泉、河内等近畿一带地方的大暴动。他们要求德政，袭击了“酒屋”、“土倉”和其他富豪，撕毁了借据并取出了典当物。这些决不是单纯的暴动，除了平常所深恶痛绝者以外，是毫没有触动的。暴动在良好的纪律之下进行着，达到了目的之后，就解散了。

一四八〇年的德政暴动，是以反对设立关所而开头的，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一年将军义政的夫人富子借口为了在京都七所的入口修理皇宫，便设关所开始征收关钱。这给予一切农、工、商人们的困难是很大的。于是京都内外的群众就暴动起来，要求撤销关所并佔领了东寺及其他寺院，召开了民主形式的集会，不但反对关所而且还要求德政。在统一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袭击了各所的“土倉”。对此，幕府就立即派出了讨伐军在市內各地展开了战斗。但讨伐军经不住暴动的攻击，只三个月，暴动队伍就迫使幕府承认了施行德政，而且还破坏了关所，不仅如此，当时还宣称如今后再设

立关所，則將立即加以破坏。事实上，在第二年当幕府企圖再度設立关所时，人民便立即准备了暴动，終于迫使幕府放棄了它的这一企圖。

一向暴动 暴动从十五世紀末，就以宗教的形式大規模地展开了。其典型就是“一向暴动”，詳情見后。

民主主义的萌芽 十四、十五、十六世紀，在全国範圍內的人民暴动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

人民羣众在这次斗争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民主主义的傳統。

逃散和暴动，只有在当地的人們的一致团結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虽然統治他們的領主不是同一人，但遭受着同样苦难的人民却不顧其各自領主的異同关系，同一地方的人都集中于一处，以平等的發言权来討論，決議并实行了共同的問題。这种人民的集会，当时的話普通都称之为“寄合”，但也开始使用了“集会”的字彙。人民的“集会”本身就是斗争，而它又是在斗争中發展壯大起来的。

他們將“寄合”，“集会”上决定的事項提給領主时，是用“全体农民”的名义，并由全体农民选举出代表来。后来这种临时的斗争組織变成了日常的村的自治組織。不仅如此，这时还有了“全体”和“集会”的村民會議，并且，在該會議上还选出了“年行事”充任为期一年的村長。在大和的东大寺，农民还有着每隔十天的定期集会，此外还悬挂了大鐘，以备一朝有事之际得以临时召集會議。这种情况进一步發展之后，事情就不限于一村，而是在相当广泛的地区也都实行了自治。

山城国民議會 一四七一年(文明三年)，在大和的布留乡，由乡內各庄联合起来作出了反对領主征收苛稅的決議。在此前后，在山城国的乙訓郡还成立了称作“郡总会”的郡民共同的自治机关。这一趋势不仅遍及到全国，而且，进一步还形成了全国要求自

治的趨勢。

一四二九年(正長二年)在播磨國就掀起了一大暴動,驅逐了守護以下的武士,一時地還實行了國民自治。至於其詳情至今還是不了解的。

從一四五八年(文明十七年)以後的數年內,在山城國,農民們建立了有着議會和政府的、類似獨立共和國的機關。詳情在三浦周行博士的論文“戰國時代的國民議會”(“日本史的研究”所載)中曾經研究過。

文明十七年,從秋到冬由於在山城南部一帶畠山政長與畠山義就二武將之間的戰爭,到處設立了關卡,妨礙了交通並佔領了寺院的領地,實施了苛酷的軍政。但從早就以郡總會等組織使自治制得以發展了的乙訓郡及其他南山城的國民就起來反抗,召開了從十五、六歲到六十歲為止的男女人民的大會,作出了要求撤退交戰兩軍,歸還寺院領地和廢除關卡等三條決議,他們自己也組織了軍隊並以此威力迫使兩畠山氏接受上述的要求,到十二月,這一要求已被接受,他們勝利了。在這段過程中,“馬借”的活動是相當活躍的。也只有他們才是最希望自由交通和發展交通的。

其後,南山城的國民就曾以三十六人,有的說是三十八人為代表在宇治的平等院召開了議會。在這裡曾制訂了國內的法律,而且還自主地決定了繳納給領主的稅額。所有的行政事務就是由上述三十六人或者三十八人的代表組成的議會中選出的“月行事”來負責的。大事件則召開國民大會來解決。

這一組織到翌年末期為止還是相當鞏固的,集會似乎也是定期舉行的。後來雖然是慢慢地垮了下去,但仍繼續了七年之久。一四九三年當山城一國陷於守護伊勢氏的統治下的時候,雖然也曾有過相當有組織的抵抗,但結果還是被打垮了。

山城国民議會最后垮台了,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在这些“国民”中,武士式的地主、富农与普通农民是存在着矛盾的。当由于畠山氏的交战給国民带来了困难,在这一种共通的利害之下,全国国民虽然是团结一致了,但当这问题一解决,国民議会的领导权就轉入了武士式的富农手中,而脱离了群众。所說的三十六人的代表也主要是地主与富农。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使国民議會变成軟弱無力了。

庄园制的崩潰 室町末期的像这样的农民斗争,终于使庄园制度崩潰了。二重、三重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本所,領家及其代官、名主、守护及地头等这些复杂的关系都被簡化了。首先本所、領家及其代官就丧失了势力,地头也成了守护的家臣,这样,在同一个地方存在着几个不同的領主的状态也没有了,相反,却形成了一个大的領主統治数郡或一国的情况,这就是大名。一般武士则是作为大名的家臣,由大名領取領地,而他們也就因之要为其主人的大名而尽忠的。因为在不同本所和領家的庄园的农民(有时好几个不同的本所和領家的庄园,都拥挤在同一个村庄中)由于住在同村同地也会团结一致起来斗争的。因此,对这些农民也必須要一个统一的統治網。另外,为了镇压农民的逃散、暴动和拒繳年貢,为了要督促年貢,也只得借力于武士。例如东寺領播磨国矢野庄的农民,一三九三年(明德四年)为了控訴代官的暴虐而逃散时,东寺就請求播磨的守护赤松义則帮助他們找回这些农民。找回逃到他人領地內的农民一事,也是从此时开始的。而做这件事的又是站在每个領主之上的有权力的守护。这样,农民斗争越高漲,則每个領主的力量也就越衰落,而守护也就越强大。例如一四〇七年(应永十四年)丹波大山庄的农民逃散了,而从第二年就把管理庄园和征收年貢的事情委任名叫稻毛修理亮的武士——守护代理——去做

了。这种情况从十五世紀中叶起就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然而不久,这一管理人的守护就篡夺了整个的庄园并将其化为己有了。

这样,庄园内部的复杂的统治关系,由于自下而上的集聚起来的力量就逐渐地简化了。这一个大名、小名彼此厮杀和掠夺的过程,就是室町末期的混战,就是战国时代。

应仁之乱 应仁之乱,基本上也是这一过程的表现。本文在这一节的末尾曾说,“从这被烧毁的廢跡中产生出崭新的力量并进入了其次一阶段的社会”,这种说法辞藻是美的,但却不具体而且是错误的。山名、細川、斯波和畠山等在这个大内战中是全部垮台了。將軍或者說是幕府的控制力也都沒有了,大小武士們,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都恣意地耽于領地的爭夺。从京都的被烧毁的廢跡中并未产生出新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却是正在人民羣众内部产生着如上所述的民主主义的萌芽。

三 經濟与文化

經濟的發达 这个时代名主和領主在自己直接經營的土地上使用“下人”,使在其統治下的一般农民来劳动的情况就逐渐沒有了。而且“下人”們也成了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农民,也就是說,奴隶制的残余逐渐地被破坏了。

工業方面,以自己的工具和材料来生产、供应顧客的訂貨或向市場上出賣为目的而生产的專門的手工業者也出現了。鎌倉时代的手工業者,自己有原料的还很少,不过是以简单的工具,对訂貨者的材料加工,从中收取費用。

关于“馬借”、“酒屋”和“土倉”等問題，前面已經談过。关于商業和城市方面，留在本章第四节再談。“国史”的經濟史，只是經濟現象的罗列，对于基本的經濟組織和劳动人民是並沒有涉及到的。因此，实际上这并不能算是經濟史。

文化的發达 將公家文化与武家文化混为一談是絕對錯誤的。不論提出本文所举出的文化方面的任何一方面，諸如禪学、五山文学、墨画和住宅等等，都不能說公家文化与武家文化是同一的。在这一个时代，公家已經失去了拥有独自的文化的力量，正如政治經濟一样，在文化方面也是受武士的支配的。这个时代的文化，其所以很像是公家化了的原因，實質上并不是公家化，而是武士与脫离了生产的同时，他們的文化也就逐漸的成了消費式的文化所致。至于說“將軍由朝廷得到了高的地位”，說武家“也被朝廷委以重任”等等，也全是胡說八道的。实际上他們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个称号。如这样的称号就算是“重任”的話，那末像足利义滿那样，在生前就成了太上天皇，而死后又正式的由天皇贈予了太上天皇的称号一事又当如何說呢？其实就連“天皇”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称号而已。

佛教 禪宗这时也失去了它当初的活潑的生命，禪宗的僧侶只不过是——在將軍保护之下，成了將軍們的政治顧問和慰藉者而已。

法华宗、一向宗在民間日益得到了發展。而且，由于信仰相同的結合，就更加加强了当时的人民羣众的团結，因此，也就促使被称作法华暴动和一向暴动等以信仰为中心而团結起来的农民暴动爆發了。其中以加賀为中心的一向宗暴动最为强大。一四七四年，加賀的一向宗本願寺門徒与同一的一向宗的高田派相爭，数年后，本願寺門徒胜利了，并驅逐了高田派的守护，沒收了高田派的土地。其后，在一四八七年，这地方的本願寺派又掀起了大暴动，教

团的领导者連如也供給它們武器，最后，暴动就佔領了加賀全国，对于隣国的越前也几乎是全部佔領了，而且威力还远及到从越中到能登的地区。本願寺派就以此为地盤并在攝津、河内方面有了更多的領地，同时，还活动于作为貿易港正在發展中的堺市参加了对外貿易，挾其財富在大阪的石山建立了本願寺（一五三二年），將教团的主教区由京都的大谷迁至此处。也就是說，本願寺結果也成了一个大名。本願寺所以能够这样获得势力，是由于它有着“講”和“組”的信徒的民主的組織，它利用了这个組織不仅召集精神上的和信仰上的集会，而且还召开政治和經濟上的集会，經羣众討論后决定实行，而这些組織还是由一个中心来联系与統一的。当时，参加这一暴动的人民羣众的話就說“与其对武家的地头的势力低头，倒不如奉一向和尚为領主来傾訴衷腸”。这就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向暴动所以强大起来的理由。

但是一向宗，却利用了人民对武士压制的不満而与地主們相勾結变成了新的武士，本願寺結果也成了大名，这也就意味着它已不再是劳动羣众的朋友。后来，石山本願寺与其他大名一同都被織田信長所灭亡。三河的一向暴动虽然極其强大，并給了德川家康以很大的打击，但最后也被灭亡了。

只是在室町末期到战国时代，一向宗及其他佛教才或多或少地給人民生活帶來了一些積極的意义，从这以后它就变成了武士專制政治的一翼，特別是成为鎮压“切支丹宗”的警察机关了。

学术和文学 到了这个时代，民間生活就逐漸地成了文学的題材。狂言和小歌就是屬於此类。小歌是后世种田歌和民謠的淵源，是表現了真朴的农民的感情作品。

美术工艺 雪舟（等楊）是禪宗的僧侶，他的画是以水墨山水來表現自己的热情的作品。从它不單純是裝飾品，而且是有着思

想性的問題来看，也許是日本画的最高的傑作之一。可是它只是禪宗式的独善其身的，却不是表現人类的真实生活，而是拋棄或者說是逃避现实的画。

关于狩野派，應該說，其裝飾画是由于受了宋、明的花鳥画的影响而多少有所改变，但如果說是“融合了我国与中国的画法”則是过分的。

四 走向新时代的动向

社会形象 由于本文对解釋“集聚起来的力量”錯誤地認為是“实权越来越往下面的有力人士手中轉移”，因此，它就沒能够抓住“走向新时代的动向”的本質。关于这一方面，前面几項已經說明了。

大名的分立 冲破每个庄园領主和地头的統治的人民运动的成長，却促成了統治者方面的統治的集中，成为促使大名成立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前面已經談了。在这里正如本文所說的“这些大名們是一有机会就要去攻佔隣国的”，就是瘋狂地从事侵略战争的。但是本文紧接着又說他們“对于自己的国家則是施以廉潔政治，治理得也很好”。实际上是沒有比这个更陰險的軍国主义了。將“一有机会就攻佔隣国”的人說成是实行了“廉潔政治”，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这简直是在胡說。

即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或是北条早云們下了命令叫他們部下实行廉潔政治，尽管如此，但因連年的战争荒蕪了人民的田地，而由于对人民征兵征伋也就加重了人民的痛苦，这种根本的苛政也是不容否認的。所謂廉潔政治甚至都不足以說成是黯夜的灯

籠的。

城下町并不是“自然的成为政治和工商業的中心”，而是由于人口集中于專制政治的中心才形成的。最先这里就是作为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建立了城砦，其后，在这里又集中了武士，集中了作为年貢由人民征收的大米及其他农产物，同时，为了处理这些年貢物，为了出售和制造武士們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和武器，亦即武家御用的工商業者也都集聚到这里来了。正因如此，正像在“亞洲城市”項內所談到过的，这一城下町也終于沒能容易地發展成为自由的工商業市民的城市。

但是，在这战国时代与农村中的民主主义和自治的傾向相呼应，在城市方面也逐漸地开始产生了自由城市。

自由城市 从鎌倉时代到室町时代，与农業生产力增加和实物年貢增大的同时，圍繞着为了买卖这些貨物的商業以及与中国大陆的貿易也都發展起来了，这一点前面已經談过，而成为这样商業中心地的主要是交通要冲，特別是港口。室町时代，九州的博多，瀨戶內海的尾道、兵庫、堺，伊勢灣的桑名，北陆的敦賀等，都作为海港城市而繁榮起来，近江的大津、坂本由于在琵琶湖畔也作为通向京都的入口而繁榮起来了。周防的山口虽然不是海港，但也是个商業中心地。

特別是博多、山口、堺，都是作为对外貿易的城市發展起来的。但由于博多和山口同时又是政治城市——博多在九州探題城下，山口在大內氏的城下——因此，它向自由城市的發展也是困难的。独有堺是京都的寺院崇寿院的庄园，是与明朝貿易的根据地，尤其是該市与琉球的貿易是更为繁盛的。与琉球的貿易主要是輸入琉球国的高船，自爪哇和菲律宾所輸入的胡椒，再將其輸出至朝鮮和明朝。这一問題，就促使堺很快地接受了欧洲文化。如傳到种

子島的槍就首先被堺的商人傳佈到全國去了。而且在這裡也出現了作為向明朝輸出品的手劍工業，在此基礎上又發展了槍炮工業。

由於這些貿易和工業，堺的商人都變成了鉅富，而且人口也增加了，在十五世紀初，即達到了一萬戶（京都為三萬戶，全盛期的鎌倉估計也只是三萬戶左右）。一四八〇年時，堺市有所謂“地下請”者，即由莊民中的有力者，承包了繳納給領主的租稅，不受代官及其他領主的官吏的支配並實行了莊民的自治。這一點是當時在各地莊園所普遍實行了的。

這些作地下請的有力者還兼營貿易業和倉庫業，稱為“納屋貸眾”。他們逐漸地對領主也不繳年貢了，這樣堺就成了完全獨立的城市。而“納屋貸眾”中更有力的則稱作十人眾，他們甚至還處理了市民的訴訟。另外，由堺南北二莊產生的稱作“會合眾”的三十六人，還通過他們的協商處理了一切市政問題。而為了防禦，在城市的周圍還挖了濠溝並僱傭了城市的軍隊。

同一時期的桑名和現在大塚南郊的平野也曾作為同樣的自由城市在發展着。平野雖然不是海港，但却是從南河內到攝津平原的中心地。這個地方氣候良好，而且還因為它毗近堺和兵庫等海港，因此，很早就傳來了朝鮮和中國大陸的文化，農業也很進步，兩季耕種法早在十四世紀就已經盛行了。伴隨着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也繁盛了，這樣就更促使平野向市場式的城市方向發展。平野雖然自古以來就是宇治平等院的莊園，但就是在這裡也實行着一種“地下請”，“年寄”們也自治地處理了市政，估計這個城市在十六世紀中葉就從平等院獨立出來了。在該市的周圍還圍筑了像城牆般的竹牆。末吉家就是這個城市最有力的一个，他甚至還對堺的貿易船隊投了資。

一五六八年，織田信長勢力及於近畿地方，於是就向附近的城

市一帶征收了称作“矢錢”的軍費，命令堺市要上繳二万貫錢。至于向平野征收的數額有多少还不清楚。堺对于这种非法的措施是極端反对并且是拒絕繳納的。全市民團結一致高筑了望台，深挖濠溝，在北口还种植了小麦准备从事持久战争，并且与巩固和信長交战的防御工事的同时，堺的会合众又向同样作为自由城市在發展中的平野市的“年寄众”发出了檄文，提議作共同的防御。在这种毅然决然态度之前，信長終于沒有能够染指于堺和平野。其后堺和平野的友好提携日益加深，在兩市有力者之間还有了姻戚关系。有事之朝彼此互相并調停了大名之間的矛盾，使兩市数次避免了他們的战火的波及。

但是在这期間織田信長的勢力日益强大，堺最后还是被信長所征服，同时还被迫宣誓將來永不养用浪人*，这样，首先被解除武装的堺市，也只得一步甚似一步地屈服于信長的暴力之下了。当信長向堺市市民征收称作納屋年貢的倉庫稅时，市民是以最大的力量来与之抵抗的，但立即遭到了处刑和杀戮。其后至丰臣秀吉时代，堺市民很多被强制地迁徙到大阪，堺市的濠溝也全部被填平了。另一方面，堺的对外贸易也受了秀吉的强有力的統制和压迫，因此，作为自由城市迈出了第一步的堺市，就这样被專制的武士政府所摧毁了（堺市之所以如此結局，正与山城的农民共和国的崩潰情况相同，在其内部也是有着弱点的，这一弱点就是富裕的市民与劳动市民的團結还不充分）。

平野在堺被摧垮之后，也沒有能够向自由城市方向發展。

在日本也是有过民主主义的傳統的。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日本，不論是在农村或是在城市，到处都产生过独立和自由的。只不

* 浪人是沒有主人的武士。——譯者

过是在最后，被大名，被統一了大名的信長和秀吉所扼杀了。这一点在現代的历史教育中尤其是必須弄清楚的。但是“国史”对于山城国民議會和堺市却是只字未提的。

皇室的衰落 在这里就暴露了它与本文在“文化的發达”中所談的是自相矛盾的。本文在該項中說，將軍是由天皇委以重任的，看去似乎天皇是处于自主的地位，但讀至此处就会明白，正是因为天皇受到了將軍的豢养，所以，当將軍一門一衰落，那末天皇也就不能不因之而衰落下去。地方的大名得知天皇穷困，就供給皇室費用一事，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企圖利用天皇的自古以来就有的傳統的权威而已。而且，这样作的大名，在几十几百人当中也不过是一兩人。

后柏原天皇在一五〇〇年就即位了，但連即位大典的費用都沒有。到了第三年还向管領細川政元要求捐獻即位大典的費用。但是，政元却借口現時已有將軍，而且天下已治，因此也就沒有花費費用去作即位大典的必要而拒絕了。这样，直到后柏原即位后二十二年，才从將軍那里取得了二万匹的錢来举行即位大典。

世界的浪潮 在这里必須对“切支丹”宗*作正确的說明。在本文中，任何一处都沒有只字來說明为什么“切支丹”受到了我国国民的热烈的信仰。本文說它“不合于我国習慣”甚至有的地方还以它不合于幕府的專制作为它不合于“我国習慣”的理由，依然將切支丹渲染为左道旁門，这是很草率的。

切支丹 談到“切支丹”問題，就不能不从基督教的概略說起。

基督教是在公元一世紀初，在小亞細亞的巴勒斯坦地方的耶路撒冷这一小城，作为貧穷的木匠的兒子而降生的耶穌基督所創

* “切支丹”来源于葡萄牙文之 Christian 即基督教。——譯者

始的教理。正如在前面也曾提到过的，基督是否是确实存在的人物还不太清楚，但据传说，他与创始佛教的太子释迦不同，他是在穷人、在受压迫的人之间传道，使他们信仰各种正义的最高审判者的神。他教导人说人皆有罪，只有信神才能由罪恶中被拯救。他特别攻击剥削人民的过着奢侈生活的富者，他说富者们的罪恶是极重的，他们进天国就像骆驼穿针眼一样的困难。基督还传道说，尽管在地上的人，有身份的上下和贫富的差别的不平等，但神则是一视同仁的。它还特别强调人应该互爱，强调不是上面的人去怜悯下面的人，而是应该作为平等的隣人来互爱的。

这样的教理就立即博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仰，但由于基督教攻击了与统治阶级相勾结的形式上的宗教，并且还主张与其服从王权不如顺从天地间唯一的神，因此，它也就受到了当时统治巴勒斯坦地方的罗马皇帝的总督的迫害。

但基督教在此后三百多年，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四世纪初罗马皇帝也终于不得不容许基督教的自由了。基督教虽这样地盛行，但到了这时，与其说它仍是像初期那样作为苦难群众的精神上的拯救者，倒不如说它已变成了强调国王也是神所指派的，因此，地上的人关于地上的事情就必须服从国王的命令，变成了强调现世的痛苦，凭借信仰在天国就可以得到拯救的与专制君主妥协的宗教了。正因如此，所以到了五世纪它就成了罗马的国教。在六世纪，基督教会就成了持有很多的领地的一个领主，而且，还出现了盘据在罗马的掌握并支配整个教会的法皇。这时，与其说教会是苦难的人民之友，倒不如说它是扮演着为使人民成为领主的精神上的奴隶的角色。就是在教会内部，其腐败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的。

在十六世纪初，当新兴的工商业市民阶级的力量强大起来的

时候,当与它們相提携的为农民的自由斗争强大了的时候,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也影响了宗教,而出现了像路德、加尔文等很多的大宗教家。他们谴责教会的腐化,说基督的教理并非如此,并提倡了改革,终于路德等就开辟了从罗马法王独立出来的新教派。

由于这种新教运动,也大大地提醒了旧教——是正统派的意思,也叫作天主教。当时航海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发达起来,以美洲为代表的很多的新世界也被发现,而且还开辟了到印度的航路,与东方各地的贸易也开始盛行了。天主教会中所创设的称为耶稣会的教团也乘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舶,出外到新世界各地去传道。其中传教士之一的佛郎西士·萨比耶就来到了日本。

在欧洲,天主教虽然是成了封建领主的帮兇,但它传到日本时,也还起了它的进步的作用。在佛的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这话不论哪一宗佛教也没有说过,甚至被称为一向宗的伟大的和尚莲如也有妻妾多人,在这样的日本,新的基督教主张人类平等,男女平等,向苦痛者传福音,教人们了解一夫一妇的纯洁的家庭是可宝贵的等等,这一切就唤起了人民,特别是最受虐待的妇女们的热烈的信仰。德川幕府的御用学者林罗山都说,由于“切支丹”的一夫一妇制的主张,就使愚夫愚妇为其所迷惑而信从了“切支丹”。“切支丹宗”虽然也认为现实社会的痛苦最终也要在天国来解决,但“切支丹”却有着为过去佛教所没有的,以神的正义来激烈地批判现实社会的非正义的特点。虽然“切支丹”也说人的罪恶之深,但却没有为过去的因果所束缚的黑暗的一面,相反,有的地方还使人生光明化了。这一点就为战乱所苦恼,为武士的虐政所困惑的群众所深信了。但是信仰“切支丹”的大名们,有的也并不是纯粹的信徒,而是为了求谋购进枪砲及其他舶来品的便利,企图借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信仰的。

皇室和武將 本文中曾說戰國的武將都“想奉戴皇室統一全國”，這是錯誤的。這一點只要看看統一天下的德川家康的情況，就可以明了的。家康完全統一了天下之後，就從天皇獲得了征夷大將軍的稱號，但並不是成為將軍以後，以此官銜的力量來統一天下的。武將之所以都想升到京都去，是因為京都是政治、經濟的中心所致。

那末為什麼又需要那樣的官銜呢？這是由於武將是剝奪他人的獨立與自由的，而剝奪了他人的獨立與自由的人，他自己也是不能成為獨立自由的人的。因此，他們就必須擺設一種權威和“足以使人感佩的東西”，以這種力量來壓迫人民。武將們對於天皇就是作為這樣的工具來加以利用的。

第六 安土和桃山*

一 国内的統一

安土之城 在这以下，簡單的了解一下就够了。在“安土之城”項內，本文說正亲町天皇聞信長之名便命令他“將領地由武士手中夺回”云。但是，如本文所說的，本应“奉戴天皇”来統一天下的信長，却絕沒有为天皇去夺回領地。在信長所統治的近畿一帶，虽然有很多是前天皇和其他公家的領地，但信長就是一塊也都沒有归还給天皇和其他的公家。信長只不过是給天皇提供了少許金錢以充用度而已。

全国統一 丰臣秀吉是尾張的农民出身的。也正因为他是农民的兒子，备尝了劳苦，他才能够統一天下。当时，人民已經爭取到了即使是农民的兒子也能够統一天下的自由了。只有有了这种自由，秀吉才能够成为武士，才能够統一天下的。但是，当秀吉成为統治者之后，却独占了这种自由。而且，当秀吉的主人信長被杀

* 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室町幕府垮台后，織田信長基本上結束了割据的局面，于一五七六年(天正四年)建安土城并以此为根据地号令全国。故織田信長时代即称安土时代。繼織田信長掌握政权的是丰臣秀吉，他先后建大阪城和京都附近的伏見城，至德川时代將伏見城毀掉而种植了桃树，因之遂称之为桃山城。后世則称丰臣秀吉时代为桃山时代。——譯者

后，秀吉对其子却不是防护和抚育，相反地，却赶走他们，而自己则篡夺了信长所建立起来的势力。

聚乐第* 这是空手成家的财主宴请落魄的公卿们并借此来显示自己的威福的。秀吉给予天皇的领地也仅仅是七千石。

本文说秀吉创建了大阪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他却弄垮了堺市，使自由的市民迁移到大阪。秀吉是弄垮了自由城市而创建了不自由的城下町的。

新政治 本文虽然说“信长和秀吉一直在关心全国”，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增加自己的权力和领地。以下逐一地看看，本文中所提到的他们的政治措施，就更会清楚的。

检地，这是将人民再度束缚在土地上，并由他们身上征收重税的第一步。甚至在战争中的教科书都说检地是为了征税的，而在这本教科书中，却更为反动地将其写成简直是为了振兴农业的措施了。

在秀吉的检地以前，田是以六尺三寸平方为一坪，但从秀吉时代开始，却改为六尺平方为一坪，三百坪为一反。年贡则征收到整个收获量的三分之二，这确是令人吃惊的高年贡。通过对村庄的每个角落的田地的检查，就增加了地亩的面积，在这种情况下，收获的三分之二都要作为税额被征收一空，这一点是农民所难以忍受的。秀吉把这些税款都用来在伏见和 大阪建筑大城，在北野的茶道、游乐或聚乐第的饗宴上面，以及用在侵略朝鲜上面，但对生产费用的支出方面，却几乎是沒有的。检地 不仅是规定了田地的面积和税额，而且，还调查了当地居民的户数和人口并将其载于检地簿上，而在这本簿子上有名字的农民也就永远作为农民被束缚

* “聚乐第”为丰臣秀吉在京都所建的豪华的宾馆。——译者

在土地上面。农民們，好容易才取得的職業自由和迁移住所的自由，由于这样，又再度徹底地被剝夺了。

关于“关所”的廢止，正如前所述，“馬借”的功劳是最大的。統治了全国的秀吉由于現在在国内已無特設“关所”的必要，因此，也就順从着人民的热烈的要求而將其廢止了。但也正如本文所談到的，秀吉却禁止了“切支丹”，也就是說在人們的內心中設立了关所。此外，他还禁止了人民自由地与海外通航貿易，也就是說，对外国也設置了“关所”。至于信長之所以沒有迫害“切支丹”，也只不过是于他正在爭夺延曆寺和本願寺的領地而作着激烈的战斗。因此，也就沒有感到有对抗“切支丹”信徒和束縛新宗教的必要，而且也由于人民的自由的風气很强，信長也沒能够去压迫它。

本文提到信長和秀吉也發展了商業，但这也只不过是于在服从他們統制的范圍內，在城下廬集了商人，也絕不是發展自由商業的。这一点，从他們弄垮了自由城市堺市等的表現来看，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另外，还提到“也能够自由地去做生意了”，但事实上农民是絕對沒有拋棄農業轉移到商業的自由的。这也只不过是于商業已經广泛地發展了。信長和秀吉也不过是为了搜括自己所需要的物資和銷售年貢貨物，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商業而已。

至于刀狩*的說明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这一問題是成为天下独裁專制統治者的秀吉們，为了剝夺人民武裝的自由，將武裝只作为武士的特权来压抑人民的办法。刀狩的結果并不是“使农民只要和平地專心于農業就够了”的問題，而是使农民不能去反抗武士，只能將其一生劳动所創造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收获，無条件地被武士所征收。这一問題已經是历史学上的常識了。

* 即沒收民間的刀槍武器。——譯者

二 外交和文化

外交的失敗 从侵略朝鮮一事来看，也就說明了秀吉是多么不“为人民”着想的人了。發动了不法的侵略战争，加重了人民的困苦，怎能会被認为是“为了全国着想”呢？

另外，本文对此問題是以“外交的失敗”作为标题的，是將侵略战争緩和成为“外交”問題来表現的。另外，对于只批判侵略朝鮮的失敗，而不涉及到侵略本身，相反地，对侵略本身似乎还要表示贊同一事，是必須加以徹底的批判的。为了向海外發展，是可以采取鼓勵和平的自由通商的办法。但是秀吉却不是这样，他对貿易是压迫和統制的，如沒有特許証是不能做的，他只是企圖以武力来征服外国的，这就是軍国主义。对这一点不加批判，只說“秀吉……为了向海外發展，才想进攻明朝，而由于向朝鮮借这一进攻的道路”遭到拒絕，才决定“首先就要征討朝鮮”，本文这种腔調，就是一种向海外侵略的想法。至于，將庆長之役*的原因說成是由于明朝封秀吉为国王，从而引起了他的憤怒而举兵的，这一点也是掩盖問題的本質。这一問題的實質是在于秀吉企圖趁此来挽回文祿之役**的失敗的。这本教科書到处都有軍国主义的殘余。該書对战争問題的写法是尽可能地簡化了，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它对軍国主义却是毫無批判的，相反，却是加以掩盖的。这正如不批判神話，而却为它辯护的情况是一样的。

* 庆長之役为丰臣秀吉消灭北条氏掌握政权后于庆長二年侵略朝鮮的战争。

——譯者

** 文祿之役是丰臣秀吉于文祿元年侵略朝鮮的战争。——譯者

少年使节 信長为什么容許了“切支丹”的原因，前面已談过了。“切支丹”的信徒和其他大名們，是远涉重洋向羅馬法皇派遣了使节的。然而这并不是單純以信仰上的动机为目的的，而是企圖以此来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援助的。

秀吉为什么要禁止“切支丹”呢？这是因为如前所述的“切支丹”的一切新道德观念和人类平等的思想以及神比地上的君主更可尊崇等一切想法是为統治者所害怕的緣故。另外一个理由，也如前述，是由于在信仰“切支丹”的大名和武士們当中有的則是企圖勾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教士以及站在他們背后的各該国的政治勢力，而且，他們的勢力是不可侮的，特別是長崎就几乎成了葡萄牙的半殖民地，这一切都大大地妨碍了秀吉对全国的統治。至于本文所說的“切支丹”成了一切葡萄牙人們的走狗并陰謀来爭夺日本等情，这是商業竞争敌手的新教徒的荷蘭人和日本商人的夸大其辞的話，而秀吉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作为镇压“切支丹”的借口的。秀吉为了將日本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就把妨碍他的本願寺和大名都打倒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打倒了“切支丹”，但这絕不是为了保护日本独立的。

桃山文化 桃山文化是有着为过去日本所少有的、明朗的、蓬蓬勃勃的特点。但这并不是像本文所說的那樣是由于信長和秀吉的气質如此而产生的。相反地，文化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政治上的統治者的性格所决定的。安土、桃山文化的自由与明朗，就是当时人民自由与明朗的反映，是在东方所有海上任意地航海并充分地呼吸了广大世界文化的空气的堺市貿易商人的豪爽，是在农村的每一角落为人民所發展了的民主精神的明朗，是为了爭取一切言論和集会自由、職業自由、迁移自由和武裝自由而战斗的社会的反映。

但是,这些都逐一地被信長、秀吉和家康所剝奪,使日本文化又轉變成黑暗的和萎靡的了。

第七 江戸幕府

一 江戸城

德川家康 这里虽然也提到了关原战争* 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简单地谈谈就够了。过去我们就是把这些领地争夺的故事当作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来学习的,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中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毒。但现在就必须停止这种教学方法。德川家康在丰臣秀吉死的时候,就被托付来保护加贺的前田利家们的,特别是秀赖的前途。可是在秀吉死后,他就背叛了其遗嘱而将丰臣氏灭亡了。秀吉灭亡了其主君织田氏,而织田氏也是把他的主君灭亡了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既无义理,也没有人情的。

幕府政治 本文中在这一项内,并不是在谈“幕府政治”,而只是在谈“职位制度”。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统治者管理人民。真正的政治是人民为了人民的幸福来处理人民自己的共同问题,除此以外,不论是冠以多么好听的名称,也都是专制政治。江戸幕府

* 关原在今之滋贺县琵琶湖畔,一五九八年(庆长三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势力增强,但却引起了前丰臣秀吉的重臣一派的嫉忌,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他们动员了武装力量,企图消灭德川家康,但经关原一战反而遭到了失败。关原战争后,德川家康的统治建立起来,一六〇三年在江戸(今之东京)开幕府,开始了江戸时代。

——譯者

的政治，如下所述，根本問題就是如何來統治農民和市民的問題，就是下一項要談的，管制大名和公卿的問題。

幕府的“老中”和“若年寄”*是來源於表現戰國時代發達了的村莊的長老們的“年寄”的字彙，但其內容則完全不同。村莊的“年寄”很多是由村人選舉的，但幕府的老中等都是將軍由有着一定的家系的大名當中任命的。

對大名的管制 本文在這裡是寫出了幕府為了防備大名的反抗所費的苦心，但這一點也是不必作詳細的說明的。本文在這一項的末尾所提到的“本陣”，就是大名所泊居的旅館。但一般的對有下處的地主和大商人的邸宅也都稱作“本陣”。江戶時代三百年間，雖然說是天下太平，但實際上三百年間，日本全國完全是在戒嚴令下，被壓抑得連一聲都不敢響，大名們也是經常在作着戰鬥準備的。因此，參觀交代**的隊伍，也是行軍的隊形，而其停泊的地方也就稱為“本陣”了。

對公家的管制 本文雖然沒有提到幕府管制天皇的問題，但通過“禁中并公家諸法度”(公家諸法度)***束縛了從天皇的日常生活到公家官階等問題却是不能不談的。在這一個時代，天皇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甚至就是在禮節方面也都是毫無主權的。在宮廷內部雖然也有一月一日的四方拜及其他的儀式，但這也只是天皇和公卿們的事，並不是整個國民的儀式。一月一日、三月三日、五

* “老中”與“若年寄”皆為江戶幕府的中央統治機構的最高的官職。前者專管幕府的行政，後者則為老中的輔佐。在此二職之上還有大老（亦稱大家老），他的職務是統領幕府的各官，輔佐將軍。——譯者

** “參觀交代”為德川幕府為了管制與提防大名的叛變所採取的辦法。該辦法規定大名每隔一年須由領地赴江戶謁見將軍，而大名的妻子則須留在江戶作人質。

——譯者

*** “公家諸法度”為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管制天皇的一種辦法，其主要內容是限制天皇活動，規定了公卿的服裝以及官階等。——譯者

月五日、七月七日和九月九日作为五个节日，幕府是举行祝賀式的，但同时也是整个国民的节日。当幕府的將軍死后朝鮮和荷蘭就派来了吊唁的使节，而当新將軍就职时，則又派来了祝賀的使节，然而，在天皇方面，即使更換了，也是沒有这样的事物的。

天皇对于祭祀家康的日光东照宮，每年都必須派人去祭奠。但是，由幕府派人去祭奠、祭祀天皇祖先的伊勢神宮的事情却是从来沒有过的。

至于天皇的領地問題，在丰臣秀吉时代，秀吉是給了天皇七千石的領地（仅仅是七千石！）。其后，到家康时又給增加了三千石，共达到了一万石。在这以后，每一代的幕府都給他稍予增加，到了十九世紀中叶幕府末期时，天皇的領地已超过了三万石，如果上皇在时，則上皇个人还能从幕府得到三千石到一万石的領地。此外，当將軍的女兒給天皇作妾时，作为“嫁妝”（陪嫁錢），还能附加一万石。公卿們也由秀吉和幕府取得了些微的領地。这时从天皇以下总共公家的領地不过十二、三万石。

由于宮廷的耗費与时代进展的同时也与日俱增，因之，也就不足了。为此，幕府还临时地以各种名义在最少程度上供給了所需的現款。但相对的，称作“禁里暗头”的幕府官吏却监督和支配了天皇的財政。

在京都，有幕府的官吏“所司代”来監視天皇，而天皇也就如同被关进了称为“御所”这一較为寬敞的客厅式监牢的人一样。一般的人民甚至都不知道有天皇。京都的市民虽然知道有天皇，但也并未覺得他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因为对于与自己的生活的好坏，無任何直接联系的人，对这种人，是無从尊崇，也無从仰望，因之，也是毫不关心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德川时代末期，高山彥九郎反对幕府的專制政治，并且，每次經過京都时即向皇宮叩拜，这件事

就被市民当作奇特的怪人的行动来看待了。至于將軍为什么又采取了由天皇任命的形式的問題，將在第八章的第三节內叙述。

士农工商 这里分明地規定了一般人民的社会地位。士佔总人口之百分之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九十是农、工、商、平民。其中的农在德川时代之初就曾占到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关于农民和市民的状况將在第八章“江戸和大阪”內詳述。以身份的差别来对待人民，并将这一点深深地印入人民心中，这就是幕府和大名政治的全部内容。但在这里仅对固定了的士农工商及称为宮、堂上的公家和賤民的身份加以闡述。关于賤民制，我們必須清楚地去理解它的历史本質。將“穢多”“非人”^{*}說成是因为他們与日本人在人种方面不同才受到了差別待遇，說他們是因为从事人所討厭的職業才受到了差別待遇等等，这样說法都是完全錯誤的。这是封建統治者为了統治人民，为了設置比农民、市民更下等的身份，使农民和市民感到还有比自己下等的人，来忍受武士的压制而創設的。这时候在公家方面，就是亲王也不是特別的皇族身份，而只是規定在大臣之下的一个职位。

身份制貫徹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地方都沒有人的对等的往来。如二人集在一起，武士們当然是，就是农民和市民也会根据财产、家系、地位和年令等来分上下之位的。而下对上則是要絕對服从的。在一家中，父是主君，子女也分成兄弟姊妹的順序。友人也是年長的居上。由于身份的不同，衣食住甚至連語言也不同了。

本文所說的武士之所以“能恣意地橫行”，其实，就是說武士对人民是实行了“格杀勿論”的專制政治。

* “穢多”为牛馬屠戶，糞皮業者；“非人”为乞丐。——譯者

至于“农民是居于武士之次”的說法，也只是因为农在士农工商这一名字的順序方面占第二位而已。农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并不比工商更有权利。农工商一样，全是無任何权利的平民，这一点將在下面說明。

本文在这一节末尾提到幕府的力量很强，因此“也就不喜欢去树立新計劃和作有进步性的研究工作”。这种說法是含糊其辞的。幕府是以“停止一切新的風尚”从根本上禁止和迫害一切新事物和有进步性的研究工作的。所說的“不喜欢”并不是为一般人所“不喜欢”，而只是为幕府和大名所不喜欢，实际上还不止于不喜欢，而且，还加以迫害和鎮压。

二 朱印船

世界形势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十五、十六世紀时是非常活躍的，但他們也只是專心于在他們所發現的土地上掠夺当地的财富，如墨西哥的銀就被西班牙人完全掠夺去了，土著居民也几乎是全被消灭了。以这种方法將像山一般的金銀拿回本国，但也只是浪费在本国国王們的奢侈生活和战争上面，却并没有成为振兴生产的力量。因此，他們的活動就逐渐地被英国和荷蘭所取而代之了。

当一五七九年，在日本正当織田信長弄垮了自由城市堺的时候，荷蘭北部即相当于现在荷蘭国的地方，就成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而这一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的力量，即使在对东方貿易方面，也都远超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一六〇〇年正当我們庆長五年关原战争和武士騷动的时候，

英国商人們就已經創設了东印度公司，圖謀东方的財富，这一勢力甚至也伸展到了日本。

朱印船* 朱印狀是創始于秀吉时代，它不是無限制的發給任何人的，而只是發給長崎及其他少数的特权商人的，它在名义上是管制海盜，实际上則是限制自由貿易的。

而且，在这时候的貿易，并不是向外国輸出本国的产品，輸入外国的原料和制造品，而是以南洋的香料、藥品或欧洲的制造品来交換中国和朝鮮的綢緞和生絲的轉口貿易。因此，如果生产国之間的直接貿易發展了，那末这种轉口貿易也就有可能要停頓的。但如果参加了这种对外貿易，那末也会刺激国内的工業和商業、也会在国民之間培养明朗而蓬勃的心情的。如果繼續下去的話，日本的文明是有可能更快地进步而成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可是秀吉和家康却限制了这种貿易。

日本街 在暹罗和南洋是建立了日本街，但以今天的日本，特别的来提及这一問題却是不好的。因为这样就很像是利用这一点来鼓吹侵略思想的。

本文又說到，家康們虽然也想进行更多的对外貿易，“但由于我国对切支丹宗的管制日益加强”，所以才沒有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說来，似乎“管制切支丹”并不是家康，而是另外一些人。毫無疑問，管制了“切支丹”的就是家康們。家康們是企圖利用在国民中間高漲的、正在發展中的对外貿易和国际通商的要求，將其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来独吞对外貿易的利益的。但他們不仅害怕由于外国通商而帶來的“切支丹宗”，就是对于給一般人民帶來了的自

* 丰臣秀吉时代为了管制对外貿易实行了“朱印狀”制，商船只有領取了此种憑証才能进行对外貿易。德川幕府亦沿襲了这一制度。而領取了这种憑証的商船即称之为朱印船。——譯者

由空气和丰富的財富以及發展自由工商業者的城市也是他們所畏懼的，正因如此，所以他們就連貿易的利益也都因之而放棄了。因此，在本文的“但是”以下就必須改寫為“由于家康們對於由這種貿易而給國民帶來的切支丹和其他自由精神是畏懼的，所以最後也終于沒有勇氣來實行對外貿易了”。

三 鎖 國

切支丹宗 在這裡希望能夠翻閱一下在前面“切支丹”和“少年使節”兩項內所說明過的問題。

本文說由于切支丹不合于“我國習慣”，所以当信徒一增加，幕府“施政也越来越困難了”。可是，同時卻又說幕府雖然迫害了信徒，但他們的“信仰却不稍減”。這前后是矛盾的。對於不合“我國習慣”的信仰施以迫害而不稍減的事情是沒有的。相反地，却正是因為它合于人民的“習慣”，所以他們的信仰就不是為迫害所能減弱的。本文在這裡所指的“不合于我國習慣”實際上就是不合于武士的專制政治及其社會習慣。正因如此，所以当“切支丹”的信徒一增加，幕府的“施政也就困難”起來了。從這裡也就反映了“幕府政治”的本質。

鎖國令 幕府之所以迫害切支丹，按本文的說法是很容易誤解為是由于新教派的荷蘭的忠告所致。本文雖然未將這一點說成是施加迫害的唯一的原由，但由于它將本質的問題只是含混地提了一下，就強調了對荷蘭商業的排斥行動，這樣，本質的問題就更加曖昧，因之，也就易于產生誤解的。所以對於前述的本質問題是必須充分強調的。

家光鎖国令的殘酷，正如本文所說的，不仅禁止在海外劳动的人回国，甚至还規定了不受理在航海中罹难而为外国船所救起并被送回国的日本人。

由于这种卑怯、胆小的武士政治，就使日本在世界上远远落后了。家光除規定了朱印船为外洋航船外，还規定要有“老中”的特許証，而当禁止了在外的日本人回国的寬永十年即一六三三年，英国已在印度孟加拉海岸大事殖民，在意大利則是伽利略 虽被 羅馬法皇处了刑，但仍主張“地球仍然是在动”的学术真理的胜利的一年。家光对于出国是无条件的加以严禁的，而留日外国人的子孙甚至都被驅逐走了的一六三六年，在英国正是商人們甚至对国王征收航船稅都是反对的时候，正是相当于將查理判了刑的英国共和革命的十二年前。

在北美大陆，富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民，是突飞猛进地在开拓着新的大陆。

正当自由民主主义的欧洲將要飞躍發展的时候，幕府專制的日本却开始閉关自守。

有的人說由于鎖国使日本独特的文化發展了。因之，鎖国并不是只有坏处的。本文虽然沒有強調这一点，但在这一章末却提出了“試举鎖国之利”的例題。本文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說的沒有对外貿易，国内商業也繁荣了的那句話，实际上也是認為鎖国并不是只有坏处而无好处的一种表現。本文的著者也可能是認為由于將对外貿易的資本轉用在国内商業方面，所以才使国内商業繁荣起来了，但这是完全錯誤的。正因为沒有了对外貿易，因此商業資本也就沒有了去处，而必然轉变为通过不健全的大名和以幕府为对象的高利貸与他們一起来剝削农民。所以，它沒有刺激健全的商品生产，相反地，倒是严重地阻碍了商業的發展。特别是由于妨碍

了自由商人精神的發展而引起的損失，甚至对今天都是有影响的。

島原之乱 本文对这个为了日本民族的良心的自由的最偉大的战争，是毫無同情地只是从幕府的立場上来写的。

肥前島原的松倉家領內的农民、市民、男女老幼二万四千人和肥后天草島的寺澤家領內的人民三万余人，不堪長年的領主的虐待与剝削以及对切支丹的迫害，終于一六三七年十月掀起了武装起义，驅逐了領主，来寻求独立与自由。这支队伍并不仅仅是切支丹信徒，很多的佛教徒也参加了。島原、天草人民的团結，清楚地說明了在人民之間虽然是有信仰的不同，但本質上却并不是对立的，說明了將信仰的不同导至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对立的，只不过是陰謀妨碍人民团結的統治者們的策略。

为对付这次起义，幕府派出了十万大軍来討伐。人民軍依据島原平原这个地方的古城，木匠与土工修城、筑要塞，鉄匠則制造槍炮及其他武器，妇女和兒童也有各自的任务，主將十六岁的少年天草四郎时貞則是由全員的意志，民主地选出来的。这样民主的、一致团結的人民，依此簡陋的小城竟抗住了幕府大軍將近半年。一六三八年一月，初代的幕府軍的大將也在战争中被击斃了。

幕府恳求荷蘭人——本文中写的倒好像是命令荷蘭人似的，其实是幕府恳求荷蘭人——用他們效能高的大炮从海上轟击人民軍的后方。日本政府为进攻追求自由的日本人民竟不惜無耻地借用了外国的力量。对此，守城的人民軍則提出了抗議，指出“有这么多的武士，还去借用外国的援助，这真是万世的奇耻大辱”。

守城的人們被圍了十重、二十重，粮尽，經过了五个月的英勇抗战之后，終于失敗了。这时殘生的主要人物都被判处了死刑。

島原、天草之役是十五世紀以来集聚起来的日本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主义最后为大鎮压所潰灭的事件。

踏繪和改变宗門* 对切支丹的迫害是一年比一年严厉了。在村和鎮的十字路口树立了布告牌，牌上写着，如有告密信徒和傳教者的人就給予賞賜。这也就是說，人民向官吏告密人民的这种黑暗的行为是被獎勵了的。对于明知是切支丹，但仍不轉变的人，不但他本人，就是其全家也都要判处死刑的。

从一六八七年起幕府对于轉变了的人民就称之为“轉变切支丹”并將他作为“本人”来处理，在“本人”轉变以前所生之子称作“本人同然”，“本人同然”之子及本人轉变后所生之子，男子一直到七代，女子到四代都称之为“类族”，他們的日常生活及其他一切是严重地受着監視和束縛的。如本文所說人民被強制地必須成为某寺院的信徒，戶籍的变动也必須經過寺院的批准，旅行的身份証明書上也必須写上是何宗何寺的信徒。这样，寺院实际上就起着特殊警察的作用，頹靡墮落，成为道德腐敗的中心。同时，在寺院中賭博之風也盛行了。

但是人民的切支丹，是从未被任何的迫害和鎮压所嚇倒，信仰的火焰始終沒有断熄。这一問題也就等于是向世界显示了日本人民为維護良心的自由的勇气和誠实。

从島原、天草到長崎方面，切支丹的信徒在二百五十年間的長期迫害下潛伏下来了。其后，虽然也發生了一七九一年、一八四二年及一八五六年的三次檢举騷动，但在幕府末期开港后，遇見外国傳教士来到長崎而建立了十字架的教堂时，隱藏着的信徒們又都訪問了教会，表示公然信仰的就立即达到了数万人，至于明治政府对此是如何加以迫害一事，將在后面叙述。

* 此二种皆为德川幕府为迫害基督教所采取之办法。踏繪是把聖瑪麗亞像和十字架像刻在木版和銅版上每年使人民用脚踐踏它，以証明不是他們的信徒。改变宗門是使人民向寺院提出保証書，保証不是基督教信徒，一切活動須經寺院批准的制度。——譯者

人民不論如何也沒有喪失自己的良心，這一事實是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

出島和倭館 幕府將荷蘭商人禁閉在長崎的出島，企圖阻止日本人民與他們來往。當荷蘭商人拜會將軍時，將軍和內宮女子們，都將荷蘭人當作是奇怪的觀賞品，並要其表演各種技藝。這實際上就是不知世界、不懂得人的對等來往的將軍和武士們的如井底之蛙一樣的夜郎自大的表現。

在朝鮮的釜山，日本的商人（對馬藩人）也遭到了如在出島的荷蘭人那樣的待遇。朝鮮的鎖國也是很嚴重的。朝鮮政府只准許我們的對馬人在釜山與朝鮮政府作每年的定額的貿易。為了進行這種貿易在釜山一角就建立了倭館，日本人是不准離開倭館一步的。

當時，農業几乎是唯一的產業，統治者實行將勞動的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並對他們進行榨取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封建社会——中，鎖國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到处都有被实行的可能。但歐洲各國的封建社会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彼此是有广泛的联系的，商業也比較广泛地开展了，而且尽管“國”不同，但各國國“王”之間却也常形成親戚关系，因此，也就沒有像東方各國這樣的鎖國。

第八 江戸和大阪

一 农村和城市

武士和农民 这一项与“士农工商”一项是有关连的。希望能够参看前一章第一节对该项的说明。

本文说从武士脱离了农村以后，农民也就不再被拉去当兵，因之，“就只致力于农业了”，这一点的说明与对秀吉的刀狩的说明（参看第六章第一节）是一样的。农民并不是“只致力于农业”，而是从早到晚的、从父母到子子孙孙都不能离开出生的村庄，也不容许改变职业，只是被束缚在土地上，在这里劳动，一直到死。而且所得的收成几乎全部作为年贡被征收去，剩下的粮食甚至还不足以维持他自己的生命。

本文之所以说“幕府是最重视农业的”，这就是说幕府、大名和武士的存在的基礎，就是对农民的剥削。

本文谈到的为大名服务的武士作为俸禄而领取了大米，这是不正确的。武士在原则上也是领有土地的。只是下级的武士才不领土地而领大米的，就是这样的武士，也是采取了领取土地的形式。直到后来，在上流的藩士*，才有很多人实际上不是领土地而

* 藩士为大名的家臣。——译者

是領大米的。

大名是將領地的十分之一作為其個人的收入，領地的一半是作為“知行”即俸祿分給藩士的，其餘的部分則用於藩的財政方面（將軍直接的家臣是“旗本”和“御家人”。“旗本”是高級的家臣，大體上都是領有土地的，“御家人”則為下級的家臣，一般是領俸祿米的），而這些地位和“知行”全都是世襲的，在武士社會當中一切都規定有門閥制度的。將軍、大名都是世襲的，就連大名的家臣以及其他萬事也都是由家系來規定的。而且在同樣的大名和武士之間，也根據家系和俸祿的高低以及其他等等問題的不同而分成若干等級的。

一旦成為武士，甚至成了“足輕”這一最低級的武士，這一每年只領祿米二石或三石的武士，如果農民和市民對他們不禮貌時——不管什麼事情只要武士認為不禮貌時——，則武士就可以把農民和市民殺掉而不算犯罪。

這樣，佩刀的就只有武士，他們是嚴禁人民武裝，而使農民種植稻米並將其收穫征收一空的。這就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的組織形式。

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業幾乎是唯一的產業，是勞動農民被土地所有者束縛在土地上來從事勞動的問題。身份制度等也是由此而產生的。當領主作為俸祿將土地分給臣下時，臣下則宣誓要對其盡忠，這樣，所謂的主從之恩與忠義的關係也產生了。鎖國問題主要的也就是不願意使這種社會的生產組織遭受破壞的問題。商業也是被蔑視、被迫害的。因為商業非但不能增加土地領主的收入，而且，還由於將農民拉進了買賣關係當中，從而就破壞了農民自給自足的經濟。

在日本，封建制的确立，還是在鎌倉時代以後的事情。大化革

新虽然已向封建制迈进了第一步，但作为整个来看还是奴隶制的。庄园之在平安时代开始，也就是因为该时代是奴隶制被破坏并走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的缘故。封建制直到镰仓时代才确立了。但即使在镰仓时代也仍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的残余。这种残余之所以被铲除，也是归功于南北朝内乱以后的人民解放运动。到了德川时代，封建制就完完全全地建成了。

现在我们所认为是“日本式”的东西，实际上几乎全都是封建式的东西。就是为人们所谈论的日本人的“岛国根性”的问题，也是由于锁国才造成的。妇女对男子就像僕从对主人那样卑屈的不平等的情况，也是到了德川时代以后才完成了的。称君主与人民是父子，说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家人的“家族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封建主义。在这个“家族”中父亲是有着绝对的无上的权威，其他的家庭成员都是无条件地去服从，并不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人的结合。

农业的奖励 如果明白了武士阶级的本质，那末对于本文所说的幕府和大名推进了农业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的。主要的，它就是为了要征收更多的年贡。正因如此，所以就连种植作物的自由都是没有的。

农村的姿态 本文说“这时已经允许了农村的自治”，但这只是一种形式。

所有的大名和领主为了从人民征收年贡，都是采用分配给这村一千石，那村二千石，由村来分摊的方式。正如在这次战争中（第二次大战），以部落为单位来分摊征粮数额是一样的。此外，在本文中所提及的江户时代的村与现今的包括几个小村在内的村的区划是一样的。

村中设有村的官吏，他们所作的事情，就是将分摊给村子的年

貢再分攤給村民，然后再將年貢收集起來，此外還作一些別的村的公共事情。村長在關西稱“庄屋”，在關東則稱“名主”。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莊園制時代的莊的官吏和稱作名主的地主等類村中有力量的富農都變成了村長所致。除了庄屋、名主以外，還有叫作組頭（亦稱年寄或長百姓）及百姓代的村官吏。百姓代，顧名思義是百姓的代表，是由村民選舉出來的。名主和組頭在江戶時代初期在很多地方也是由選舉產生的。這當然也是戰國時代農民自治的余音，但就是被選舉出來的名主以下的村的官吏，實際上也並不是村人的代表而是成了統治村的領主的走狗。另外，在本文中曾說五人小組的頭目，叫作組頭，這一點雖然不算錯誤，但一般所指的組頭却不是指五人小組的組頭，却是指充當村官吏的組頭（長百姓）而言的。

所說江戶時代的農村被允許了“自治”，正如它說在第二次大戰中允許了部落常會“自治”是一樣的。這並不是農民自治的組織，而只是領主統治農民的組織之一。但對這種自上而下的統治的組織却也被農民利用在團結自己的問題上面來了。在农村中貧富差別還不十分尖銳的時候，名主、庄屋在農民羣眾的集聚起來的力量的壓力下，為了村人而與領主鬥爭的例子也是有的。

五人組制度 按照本文的說法，五人小組是“彼此互助”的組織，這是極其錯誤的。相反地，這個組織是最殘酷地束縛農民的組織。因為第一，五人小組是強制地組織起來的。第二，在五人小組內如果有人不能繳納年貢或是有人逃跑時，則這一部分年貢，就必須由組員共同來負擔繳納。第三，如果五人小組中出現了犯罪的組員，尤其是切支丹信徒和反抗領主者以及逃亡者，那末全體組員就要負連帶責任。還有，第四，與其說五人小組是彼此關懷的，倒不如說是彼此猜疑、彼此妬恨和監視的。而且，如果組內一有犯罪

者的迹象时，組員就有向村官、領主及其代官告密的义务，而告密者就可以不負連帶責任。这就是五人小組的本質。对这样的組織又怎能說它是“互助”的組織呢？对于組員們彼此是“負有責任”的，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是很好听，实际上則是領主和統治者以連帶責任將人民紧紧地束縛住了的东西。

五人小組还由領主領取了“五人組簿”。在这个“五人組簿”的“序言”中，以組員应拚命劳动，不要荒蕪田地，要很好地繳納年貢等問題为中心，从上述的連帶責任起到子应孝亲，妻应順夫，不要奢侈，只能穿粗布衣服等等都詳詳細細地有所命令。这样农民就被紧紧地束縛住了。

农民生活 幕府是怎样地統治了农民的問題，在庆安二年（一六四九年）即英国共和革命已經成功了的这一年，幕府对农村發刊的“御振書”中說的是最清楚不过了。

它說农民是沒有头腦的，不会打算的傻瓜，还罵他們說，到了秋天农民就攪合着大米与杂粮給妻子和孩子吃，并叫农民要永远認为是在鬧飢荒，叫他們不要吃大米，要攪合着蘿卜叶、豇豆叶和大豆叶一起吃，不要扔掉等。甚至还說應該起早貪黑，說即使是美貌的嬌妻如果是游手好閑、好奢侈的話，也应將其休去等。不仅如此，它还劝說貧穷农民如果孩子过多而为了減少吃飯的人口，就應該將孩子寄給公家去做工或者就送給別人。从武士来看，农民是不应有夫妇，也不应有父子之亲的人。此外，它还說烟叶無营养，而且对于防火也無好处，还是不要吸，还是常常吸些杂草倒为好些，要避免因病而不能劳动等項也詳詳細細的都給規定好了。固然有的成为笑柄的御用学者將此解釋为武士的 爱护农民的思想，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手段，使农民劳动，并將其收获的全部几乎是当作年貢被征收了。

年貢在大体上，除了五公五民的“本年貢”之外，还有一种叫“小物成”的杂稅以及其他各种勞役和临时稅。在这种情况下，在“不要使农民好过，但也不要叫他死掉，在这种程度上来征收”，“农民正如榨麻油一样，在越榨越出油”的原則下，是以不要因过分压榨而使其死掉为理想的，但实际上，却是压榨到死为止的。因此，从十八世紀之初，日本的人口就沒有增加，这一点留在“农村的衰落”节内来談。

当时，在“寺小屋”这一小学里是以“滿作往来”作为兒童的教科書的。在这本教科書中就說，應該認為大米是上面人的食品，农民当該多吃加掺青菜的麦、粟、稗飯，其味道也是不亞于大米的，如果吃了大米，相反就会生疔疽而短命等等。农民是一点也沒有如現在的新宪法的第三章中所規定的国民权利的。

农民是沒有職業和迁移的自由。父子世代是农民的，就一輩子作为农民被束縛在土生土長的土地上。从村庄逃走的人叫作“掛落”，这样人是要被处以極刑的，如果有“掛落”的嫌疑的，有的地方在五人組簿中就規定五人組首先就要將其妻子扣押，然后再到代官所报告。

农民也無种植作物的自由。他們被强制地首先要种稻米，其次再种五谷。这就是說，是不叫种烟叶，不叫种菜籽的。其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要压抑农民不使他們借出賣种植年貢作物以外的作物来提高生活水平的。

农民也是沒有買賣或处理土地的自由。当时农家的耕地，水田和旱地在一起平均在一町左右，这比室町时代是多的。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在战国时代中爭取得来的。但自己对这些土地却是不能隨意处理，这也是沒有職業或迁移自由的另外的一面。然而这并不是說江戶的农民就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而只不过是有了耕

种領主土地的权利而已。至于耕种权的买卖看来似乎是土地的买卖似的，但这也决不是自由的。一年比一年穷困的农民都失去了土地而成了富农的雇工。估計在幕末，整个耕地的三分之一是出租的。

农民也沒有結婚的自由。在不同領主之下的农民之間是不能通婚的，同时，有很多地方即使在同一領主之下，如果村子不同，也是不能通婚的。而且結婚如果不是由村官来証婚，那末也不被認為是合法的。婚姻的决定是奉父母之命，是無視当事者的意志的。虽然如此，但在农民之間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以本人的意志結婚了。可是在武士之家，本人的意志則是絕對不被承認的。

連私事的自由都沒有的农民，能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是不可想像的。村中的年貢額也是由領主随意来决定的。对于武士不論是怎样委屈也得忍气吞声地去服从。言論、集会和信仰自由等等基本人权以及“民主主义”是到处都找不到的。特别是对于农民的团結，又是被視為朋党而加以最严厉的鎮压。团結起来向領主請願一事是被当作“强訴”而加以鎮压的。参加“强訴”的首領要处以死刑，而且还要殃及其子孙一族和五人小組。另外，如农民要打官司，那末就必须要通过头頂上的村官和代官，否則就被当作是“越訴”，是絕不准許的。这样，农民甚至連上告的道路也都沒有了。

教育是在民間的寺小屋中进行的，富农的兒子們都是誦讀和書写“滿作往来”的。領主对一般人民並沒有人民教育的設施，在岡山藩成立寺小屋时，向农民下的“諭”中，就說“儼然如猿猴一样的农民”，應該感謝使他們懂得文字和算盤的王公的恩情。这就清楚地說明了設立寺小屋的目的 就是为了很好地維護奉行和代官*

* 奉行和代官为德川幕府的地方統治机构的官职，前者只在几个主要的地区設立，任务是掌管該主要地区的行政，后者則設置在幕府的直轄地，掌管民政。——譯者

的命令来灌輸努力耕种才是人的正路的思想的。

本文中虽然也說到农民的生活很苦，但却并没有提出收获的庄稼全被領主索去这一重要的問題。

商人 武士之所以蔑視商人的理由，在“封建制度”一节內，已經說明过了。其实并不仅是蔑視，而且对商人的發展还是加以压制的。如果商人發了財，就找一个借口將其弄垮的例子也是有的。

独创是工商業的生命。但是因为幕府对学問、思想和政治方法当然是，甚至从衣服的种类到点心的制造等一切的新的改变都是禁止的，因此商人的活动就被限制在極狹小的範圍內了。

本文說由于鎖国使国内商業繁荣的錯誤在前面已經批判过了。

江戶和大阪 本文中提到江戶和大阪成了“最开化的壯觀的城市”，但在“开化”即文明的进步的意义上，兩個城市都是很貧乏的(这一点可參閱“亞洲城市”和“城下町”等节)。江戶的人口在十八世紀中叶时，估計已达八十万人以上，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武士，商人大約是在五十万人上下。但是江戶时代初期的十七世紀的中叶，江戶的商人只有十五万人左右，江戶本身也只是將軍及其“旗本”和“御家人”的城市。商業主要是买卖他們这些武士由領民所征收来的年貢米和供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品。江戶是最典型的寄生的城市。

大阪是作为丰臣氏的城下町而繁荣起来，而当丰臣氏沒落后，它也就作为商業城市而發展起来了。十七世紀前半叶的人口約为二十八万人，到了十八世紀初(元祿时代)就达到三十八万人左右。大阪人口的增加，大体上一一直是停滯在四十万人上下。虽然說大阪是商業城市，但其商業的一半，全是作日本各地特别是西国大

名的年貢米及其他各藩的年貢品如薩摩的砂糖和土佐的紙等的生意，而作这些生意的商人都發了大財。本文所說的“反而比大名的日子过的更舒适”的商人，就是說的这些在江戶和大阪作年貢米生意的商人。他們有时还貸款給大名們来預購他們的年貢。

大阪的一般商人，都是銷售各地特产品的，主要是农林水产及其加工品和棉紗及布疋等。

在大阪几乎是銷售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的。十七世紀的大阪商人是有着相当的独立自由的空气的。开始的时候，一种不看重祖先的遺產，以自己的活动来發財，并且不吝嗇地，很慷慨地去用这些財富的思想是很濃厚的。

在財產繼承法方面，武士称为“家督”并規定祖先世代的俸祿要由長子来繼承，与此相反，大阪的商人則实行了近代的分配給各子来繼承的办法，而普通地对女子也是分予財產的。在这一点上來說，确是可以說“开化了”的。同时在这一自由的商人中也产生了值得夸耀的文化。但是，大阪最后也仍是被与处理年貢的武士相勾結的大商人們所統治了的。他們壟斷了生意，任何商家如果不参加成立的“株仲間”的行会，是不能作生意的，而这一行会也不是可以自由参加的。虽然如此，但由于作为商業基础的工农业生产未能自由發展，因此，商業到了一定程度也就不能再向前發展了，因此，随着行会會員的增加，这一行会也就垮台了。这样，大阪的人口虽然有了增加，但自十八世紀后半叶以后，就行停滯，甚至还开始減少了。同时，独立自由的精神也淡薄了。对祖先的“店鋪”和“股份”也热心了，正如武士紧紧把持着“知行”不放手是一样的。

商人的自治終于也沒能在这里得到發展。为幕府所任命的“奉行”統治了这一大城市，而且，除大名領以外的全国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都有幕府的“代官”駐紮。像欧洲那样的“城市的空气使

人自由”的事情在日本却终于未能实现。

本文从这里就直接跳到了元祿时代文化史方面去，这是不妥当的。对本文的这一部分结构是必须要重新修改的。

要修訂結構 在說明元祿文化之前就不能不繼“商人”之后來說明一下“矿山和貨幣”。本文对这一部分的写法是沒有任何历史的或邏輯的結構的，只是憑連想就从元祿的文化引到貨幣的改鑄，写到了矿山，而且还从質劣的元祿貨幣又提出了新井白石，而在轉到了对白石的說明之后，又去談論德川第八代將軍吉宗的問題了。这样，無論是教师或是学生也只能看到一些現象，是不能有系統的去理解任何一个問題的。

在叙述文化之前就談到与商人相关連的貨幣經濟的發展和新井白石企圖阻止本幣向海外流出等，大体上都不是重要的問題，比起这一問題倒是應該要写一写三井等匯兌業的發展問題。至于白石的問題，在第三节的“學問之道”处，倒是有加以詳述的价值的。

这样，在叙述了江戸时代的社会結構和經濟發展之后，就應該談及作为江戸时代前期文化的一节的文学和繪画，應該談及“學問之道”一节的林氏一門的朱子学，中江藤树的陽明学，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的古学及新井白石。

其次應該重換一章來說明江戸时代后期，吉宗以后的幕政的大体情况及人民的穷困和封建社会矛盾的發展等，也要闡述包含了对封建社会批判的萌芽和不仅傳播了新的技术知識而且也傳播了近代的世界觀的国学和蘭学*。对于企圖維持封建道德的心学和二宮尊德等問題不写也是可以的。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理解“幕府的衰落”，而且也能正确地理解新力量的抬头。另外，也只有

* 蘭学是荷蘭船至日本时，日本人向荷蘭人學習的知識。日本受歐洲資本主义文化影响是由蘭学开始的。——譯者

这样作为加深了国内封建社会矛盾的强使日本走上新的方向的与外国关系也就会清楚了。但是像本文那样的结构，只是罗列了杂七杂八的问题，是不能了解任何一支历史的潮流的。下面就依此修订了的结构来加以说明。

矿山和貨幣 由于商业的发达，对货币的需要也增加了。在奈良时代虽然也铸造了铜钱并强制其流通，但因为商业不发达，不管怎样强制和奖励它也没有能够流通。从鎌倉时代起农产物增多，而且与农产物作为年貢被征收及其被商品化的同时，货币的必要性也就增加了，这时还颇为盛行地使用了宋朝的铜钱。货币的质量和数量如果不统一也是不行的，而如果没有强力的中央机关，要铸币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平安时代到丰臣秀吉时代，在日本是没有日本自己的铸币的，商人们都是使用了自宋和明输入的錢。从战国末期，大商人们都是衡量純金、純銀来作交易的，秀吉见此形势，他认为军用金也必须儲积，这才铸造了金幣。

德川幕府繼承了秀吉的事業，铸造了大判(十兩)、小判(一兩)的金幣和丁銀、豆板銀等銀幣。庆長小判的重量約为四匁*七分三厘，含金千分之八六二点八，大判是其十倍。

每当使用銀幣时，也还是要称分量的。丁銀是海参形的銀子，普通为四十二、三匁，至于豆板銀则是大小和重量都不一定的小銀塊，它也叫作“小粒”。其质量的比率大体上是足銀百分之七十九，銅及其他百分之二十一。一般的交易主要是使用銀幣的。

随着商业的发达，类似银行的机构也出现了，这就是“兩替屋”。“兩替”是起源于金、銀、錢三种貨幣的兌換，其后就逐渐地發展起来，兼營貸給商人資金，收存商人的金銀，組織匯兌、开具支票等項業務。

* 匁为日本重量的一个單位，合三·七五公分。——譯者

大的“兩替屋”不仅貸金子給商人，而且，还貸給大名們。貸給大名的金子要在大名秋天运至大阪的年貢米來抵償的，是非常賺錢的。但偶尔大名們抵賴不還的事情也是有的。

三井原本是伊勢人，在江戶時代之初，三井高利就到京都開設了綢緞店，不久又在江戶日本橋開設了“越後屋”。而當一六八三年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時，在江戶又開始作匯兌商了。三年後，在京都又開設了匯兌支店，一六九一年在大阪也開設了這種店鋪。這樣，它就在當時的三大都市密佈了金融網，於是三井組就成了幕府御用的錢庄，甚至还貸款給大名。通過整個江戶時代，它就成為了最大的高利貸者和富豪。

將軍、大名和武士榨取着農民而自己却游手好閑地在城市消磨時光。至于其所用的生活用品，則是以賣出年貢的錢來購買的。因此，武士的財政自然也就被大商們所掌握了。由于游手好閑，所以武士們的財政是必然地越來越困窘的。至于本文所說的隨着商人以其富有的力量使社會繁華起來的同時，幕府需要的東西也就多了的問題是錯誤的。由于他們游手好閑地將作為年貢征收來的東西，也不作為資本投入再生產，只是在城市揮霍于奢侈生活上，所以，社會經濟雖然日益擴大，但武士的財政却因之日益困窘了。

因此，幕府就降低了慶長金銀幣的質量。一六九五年（元祿八年），小判的重量名義上雖為四匁七分五厘，但其中含金量只不過千分之五六四點一，銀幣也降低到銀百分之六四，銅及其他百分之三六了。但由于仍使其與過去所定單位同等流通，所以幕府雖然是借此大發其財，但人民却遭殃了，物價立即高漲起來。正和現在的通貨膨脹是類似的。

對此，新井白石建議並實行了對通貨的質量的提高，但結果因為質量提高了，而重量卻減低了一半，所以在根本上與過去還是一

样的,其后随着幕府財政的困窘,金銀幣也越来越坏了。这与通貨膨脹一样,都是用看不見的形式来搜括人民的金錢的方法。

二 元祿时代

元祿風 在这里要談談市民文化和幕府文教政策問題。

長年的战乱平息后,生产增長了,人口也相当迅速地增加了。估計这时日本的人口已接近于三千万人。

商業的發达和拥有財力的市民階級的抬头,江戸、大阪等城市人口的增大,特别是大阪的市民的独立自主精神等等,这一切正如本文所說的就产生了燦爛的元祿文化,这是市民的文化。

井原西鶴是大阪的商人,他在年輕时發了財以后,到晚年就停止做生意而从事文学活动了。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写市民生活的,在这里他說,比起傳統的权威和神,倒是以人的劳动和創造来發財为可貴。西鶴对于忠孝等封建道德是譏笑的,他批判武士的世界是“为諾言所巩固”的,并率直地主張人的物欲和爱情并不是骯髒的,而是人类原来的姿态,是生活的动力。西鶴是最初的以日本文学全面地和现实主义地描述了平民的生活。但就是西鶴也有着使他不能徹底地去表現这一切的东西,他有着一种人生如夢和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于年輕时賺錢以备在晚年享乐的思想。元祿市民的商業是不具有永远地增加新的投資的發展性的,而是寄生于大名的年貢的。因此,在量的方面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不能再發展。当然也是不能在質的方面發展成工業資本的。所以也就必然把賺来的錢不是揮霍一光,就是把它死积起来,二者是必居其一的。到元祿时代为止,市民是有才能的,只要能鑽营,那末,在某种程度上

來說是能發財致富的。正因如此，也就產生了不要節儉的，發了財就要將其揮霍一光的享樂主義。但這並不像從戰國到安土、桃山時代那樣的自由明朗的豪華，而是有着一些悲觀情緒的。

近松門左衛門，雖然對他的身世不太了解，但顯然他是一個受過武士教養很深的人，是作為大阪木偶戲院的編劇者而活躍的。他主要的作品是說戀愛這一人的真情與人世的義理這一封建道德是相矛盾的，但這一真情苦於不能突破封建道德來貫徹人性，結果就只得在內心解決。固然，他也有“不管武士或是市民，人畢竟是人”的這種進步的思想，但卻沒有像西鶴那樣的肯定現實的明朗性，而在相當程度上是屈服於封建道德的。另外，近松所描寫的戀愛也並不是獨立自由的市民男女，而很多都是寫妓院和妓女的（就是西鶴所說的游玩，也是指在妓院與妓女游玩而言的）。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市民的生活是如何的被限定了。

松尾芭蕉也是武士，是作為武士不得志，遂作為浪人走上了藝術的道路。他完全逃避了人生，游浪在自然的世界。他認為人生就是流年似水。因此，人的勞動，男女間的爱情和財富等是不為芭蕉所關心的。他只是注意自然並想從這裡找出自己可以寄托的地方。這是為封建的重壓所敗北的人，拋棄人生的戰場，在自然世界裡來觀察人生的淒情的思想情緒。因此，在他的俳句*中看到的都是主觀的風景，而不是與農耕生產相連系的景象。

將這樣的知識灌輸給兒童是很牽強的。但像本文那樣僅僅是列舉幾個人名也是沒有意義的。我想只叫兒童知道西鶴一個人也就夠了。但是，對西鶴是反映新興市民的世界一事，是應充分加以說明的，而這一點我想也是比較容易的。近松和芭蕉都有其乖僻的

* 俳句為口語體裁的日本詩歌之一種。松尾芭蕉即為有名的俳句作家。

地方，他們的風調也不是單純的風調。這一個對兒童講解是困難的，而且也是沒有必要的。

浮世繪*，反映了日本繪畫開始發掘了現實的人的美及人類世界的美的意義和市民站起來作人的藝術，這一點必須弄清楚。而且與這“人”的發展停滯的同時，浮世繪也成了頹廢的美人畫，成了與人類生活無關的風景畫了。

儒教與寺小屋 德川家康將儒教中的朱子學作為幕府公認之學，企圖借此從精神上來統治人民。朱子學是中國宋朝學者朱熹解釋的儒教，是最提倡大義名分的。而所謂大義名分，就是一種要家臣對主君盡忠的，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無上的，而他國都是夷狄的思想，這是極端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儒教以此為中心，提倡子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親的“孝”，妻不論夫如何也必須要順從的“貞”。它主張農民繳不起年貢時，作父母的就是鬻兒賣女也應該要將其繳納的，但此時如子有獨立自由的意志就很難辦通，所以，它就提倡上述的孝，而且對孝子也是常常表揚的。所說的妻的貞，也只不過是任憑男子的武士們來玩弄婦女的手段而已。男子有着好幾個妻，它卻說這是為了要增殖子孫，至于一夫一婦制則說成是野蠻的，是不尊重家庭的習慣。本文所說的具原益軒的學理和心學就是把这个問題通俗化了的東西，是再也沒有比益軒的“女大學”更歧視女性的了，就是在心學中，也主張女兒是不能列入血統的，也就是說女兒是不被當人來看待的。二宮尊德是從這裡所舉出來的學者，更晚的一七八七年到一八五六年的人。當時的農村，如下所述，是遭到了很大的蹂躪、人民的痛苦已達到了極點。而尊德對此却是主張人們去加倍勞動的，儘管他明知道為了勞動就必須

* 浮世繪為江戶時代初期由岩佐又兵衛創始的一種風俗畫（還有一種是版畫），主要是描繪當時人民生活的。——譯者

确立能够去劳动的生活条件。

对于幕府公認的朱子学，中江藤树、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是有着不同的想法的。对于他們的学說也不必逐一加以介紹。总之，他們都是想不將別人的学說囫圇吞下，而是要以自己的思想来解釋他們所謂的“聖人”即孔孟的思想的。益軒畢生地研究了朱子学，但到了晚年，反而怀疑了朱子有錯誤，于是就写了“大疑录”这本书，想自己从根本上来重新研究儒教。在这一点上，这些学者是使学問有了进展，但他們对于“聖人”之为物在思想上仍然是相信的。他們并没有怀疑聖人的学說本身是否正确的問題。

山崎闇齋和山鹿寺行的問題是沒有談及的必要的。

新井白石 在这里不能不特別提一提的就是新井白石。他的身份虽然是武士，但却是出生在浪人之家的，从小时候起，他就很勤苦用功。当时的学問除了儒教外是沒有其他的，因此，他也是鑽研儒教的。一六九三年(元祿六年)仕于甲府的大名德川家宣，教授了儒学和日本历史。当家宣繼任將軍时，白石也随之成了他的政治顧問。这时意大利人乔万尼·西多齐(西罗得)滿怀着傳基督福音的希望，从南九州的島嶼上陆，却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到了江戶。当白石审訊西多齐时就了解了这一傳教士的高尚人格，并对其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于是就把問訊西多齐而得到的材料整理过后，作为“西洋記聞”出版了。这本书是想要正确理解欧美及其文化的鎖国时代的日本人的最初著作。白石在家宣死后不久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地位，而作为一介学者埋头于学問了。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是很注重批判的精神的，并且他对日本古代史还作了最初科学的研究。他的主要著述都是用很流暢的日本文字，而不是用汉文写的。以自己的思想来考虑問題的人，也就必然是以自己的語言来考虑的，因此，他們也就必然是以自己的語言来写文章的。(如本

文所說的山鹿素行、山崎闇齋之所以口稱是國粹主義但却用漢文寫文章的問題，就是他們在實際上并不受自己的民族的文章，不是以自己的思想去考慮問題，而是以舊儒教的思想來考慮問題的表現。)不論從白石的學問廣度、深度和其獨創的見解，都可以說是日本的最初的、最近的學者的先驅。他的自傳“折柴記”就是日本最早的和最優秀的自傳。

德川吉宗* 以下數項是根據前述的、重新修訂過的結構來談的，在事實上也是應該成為獨立的一章的。

江戶幕府和大名到元祿時代為止，雖然沒有受到什麼大的困難，但到這時他們的財政卻窘迫起來了(其原因請參照本章第一節礦山與貨幣項)。人民在幕府和大名的令人不死不活的榨取之下，並不是束手以待而是開始了積極的反抗。據說江戶時代初期，即一六五三年下總佐倉的名主木內宗吾(佐倉宗吾)由於直接向將軍控訴了領主的虐政，就被判處了死刑。據傳說當宗吾被縛在刑架上的時候，眼看着在其旁邊的四歲的孩子都被處了死刑，就更憤怒地、一直不停地在怒罵着這一苛政。這一義民宗吾的壯烈的解放鬥爭的故事，打動了人心。而在前一年正是有名的若狹的松木長操被處死刑的一年。松木長操在一六四〇年以僅十六歲少年之身，就站在整個農民的前面為反對領主京極氏和酒井氏的酷苛的年貢榨取而鬥爭了。在成年人中有的都為鎮壓所屈服，而少年長操在監獄中遭受了數年的折磨，卻不改初志而終於爭得了勝利。當他死於獄中之後，仍被農民像神一樣尊崇着。這些傳說還傳遍了整個日本。農民暴動是一年比一年地劇烈起來了。

* 德川吉宗為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將軍，他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實行了一些新的措施，企圖來緩和與人民間的矛盾。這叫做“吉宗改革”，因當時的年號為享保故亦稱“享保改革”。——譯者

本文似乎說吉宗想要重建“衰落中的幕府”，主要是因为財政窘困的原因，其实在本質上是由于如上所述的封建統治的困難。

吉宗只是一味地要求質朴、儉省，也就是說對於農民們的微小的生活的提高也認為是奢侈而加以壓迫，企圖使他們的生活倒退到過去那樣的低下的水平上去。

本文說吉宗設置了“意見箱”，使人們“自由地對政治提意見”，其實並不是如此，他並不是真正叫人民提意見，而只是開了這個針眼似的“意見箱”來轉移在人民心中積壓的對專制的公平。人人即使寫了意見投進去，也不知道幕府和將軍是怎樣處理的。僅從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明白這種東西也就不足以說明是有民主的、在政治上提意見的自由。

吉宗所使用的有名的江戶町奉行大岡忠相制訂的大岡審判法，也是透頂的封建式的審判。幕府既不叫人們了解刑法，也不允許人們旁聽審判的。

德川時代刑法的殘酷，有的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單是死刑，對於平民來說，就有烤、釘、斬、絞等，斬下來的頭還要擺在公共來往的地方以示眾，財產也要予以沒收。

如果沾上了犯罪的嫌疑，平民則立即被關進牢房並要遭到各種拷問，連吃飯也都不是輕易就准許的。至於武士，雖然也將其關進“揚屋”這一種牢房，但比起平民的牢房來說對這種牢房的待遇則是相當好的。普通的人坐牢一年就會死的。這種牢房原封不動地留到現代的就是“留置場”和“刑務所”。即使現代，有很多偉大的人民的政治家、學者和思想家，甚至都未經過正式審判，就被警察的拷打，被“留置場”——普通叫“豬檻”——的生活所殺死了。野呂榮太郎*、小林多喜二、岩田義道、三木清和戶坂潤等這些人的

殉难，也都是为很多人所周知的。

本文所渲染的大岡审判的公正，也只是立足于这种拷問和牢房基础上的审判。

吉宗和各大名对产业的鼓励，也只是为了要借此征收更多的年貢而已。因此，人民的生活也就得不到丝毫改善。这样，幕府的财政想在这个基础上变好也是不可能的。吉宗晚年的时候，幕府就已经是为财政所困窘了。

武士和商人 本文在“武士和商人”中说武士“随着生活的浮华”就不得不出售其俸禄米。其实，將軍、大名和武士將作为年貢征收来的大米出售一事，从一开始就有的，并不是如本文所說的，是不得不出售的。为什么对这个問題会有这样的錯誤呢？是不是因为時間倉促而沒有能够注意改写呢？

至于本文所說的“尽管武士有着高級的身份，但也仍为商人所苦了”一事，其实并不是武士为商人所苦，而是因为武士不从事生产而只去浪費的自我矛盾所苦的。另外說商人为了“实际上推动社会”的大的力量一点，也是言过其实的，寄生于年貢的大商人們也只是左右了大名的財政而已。而“尽管有着高級的身份”的写法，也就是想要种下身价高的人当然要享乐那种卑鄙的思想的。

剝削的强化 (松平)定信改革**（一七九〇年前后）是吉宗改革的翻版。他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各种新学术是迫害的，是不准研究朱子学以外的学問的（異学之禁）。并且还將林子平这一爱国的学者监禁了一生（參看本章第三节“蘭学”項）。到了这时，幕府

* 野呂榮太郎为已故的日共中央委員，一九三三年被捕，惨死于警察署中。遺留下名著“日本資本主义發展史”，奠定了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来研究日本資本主义的基础。——譯者

** 松平定信是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齐的幕府老中，为稳定幕府政权加紧推行了統治人民的办法。——譯者

和大名对农民、商人的剥削已经达到了极点。年贡是一年比一年加重，定信时代仕于幕府的学者柴野栗山在详述年贡“渐渐增加”的问题上就说，由于代官认定了他的工作就是在于怎样去多征收一粒年贡米，所以如果一个代官在十万石的土地上多征收三、四千石时，那末后任的代官若不比他再多收二、三千石他就不能够出人头地，依此类推，由于年贡“渐渐的增加”，经过了十个代官则从原来只为十万石的土地上就要被征收了十四、五万石了。不仅如此，甚至年贡还要被强制地预缴，有时在一、二年内竟征收了五、六年份额的年贡。

甚至松平定信在他的“国本论”中也说，各种杂税是每年在增加的。年贡甚至达到了农民收获的百分之七十，田地要课以杂税，生孩子也要征税，布税、酒税等税的名目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收获时数百的官吏在村中到处窜扰，还要宿于民家，如对他们的款待稍有不周，则立即就要增加年贡，或者就要增加劳役。人民畏惧他们有如虎狼，而不得不修桥补路，在地下到处爬行以对这些官吏恭恭敬迎奉。

定信对于人民这般痛苦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但是，尽管他身为老中，身为白河藩主，但他并没想去解救人们的痛苦，只是照例地强制人们去质朴和俭省。这样，社会当然是不会安定的，并且武士的生活也是不会好的。人民则掀起了大暴动来反抗这一苛政。

定信的改革也失败了。其次就轮到了一八四〇年前后老中水野忠邦的天保改革。尽管忠邦是以很大的决心开始改革的，但在财政上除了要人们质朴、俭省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在一般行政上，也只是企图更加紧的来巩固幕府的专制而已。

另一方面，在这期间新的工业生产却正在成长之中。

生产力的发达 本文对于江户时代的产业的发达一事几乎是

沒有提到的。只是在談到吉宗時略談一點，而在“农村的衰落”中，又談到了一些商人的力量伸到了农村，談到了农民虽然也从事織布和造紙，但結果都为商人賺去等等在商業資本下的家庭工業的情況而已。但这种写法也是不好的，因为这样就忽視了新的生产方式的發生，而且也將农民的基本的剝削者是武士这一点含混起来了。

尽管处在各种苛酷的剝削和压迫之下，但农民們还是逐渐地發展了農業生产。在十六世紀后半的秀吉施行檢地前后，全国耕地約达一百五十万町步，吉宗时(十八世紀初)就达到了二百九十七万町步，此后虽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但到了一七七一年(明治四年)，也达到了三百零五万町步。从石数来看，元祿时約为二千五百万石，而当一百三十年后的天保年間就增加到了三千零五十万石。这一情况就反映着農業技术进步的結果。在开垦新田方面，很多都是由大商人們的資力来开垦的。

其次，在谷物以外的农产物，虽然是处于多难之中，但也逐渐地增多了。桑、茶、楮、漆称四木，紅花、藍、麻称为三草，这些都是繼谷物之后被鼓励栽培的作物，而且逐渐地还作为一个地方的特产普遍地被种植了。桑是养蚕和制絲及綢緞業之本，而在陆奥、出羽、下野、上野、甲斐、越前、若狹和丹后等地方都發展了綢緞業。京都附近的茶，从室町时代就很有名，到了江戶时代，在伊勢、駿河和九州的肥前也有了很多人出產，这里就不再逐一地說明了。但在这个时代，新的而又是最重要的就是棉花、甘薯和菜籽。甘薯的問題在本文中也提到了。菜籽，不用說也是为了榨油的，它虽然为領主們所禁止，但在近畿以西种植的也很多。而菜籽油也就成了大阪市場的重要商品。棉花是在十六世紀后半，由中国和朝鮮傳来的，——当然，在此以前也曾傳来过——到了江戶时代，就迅速地

普遍于全国，而近畿地方就首先成了有名的产地，此后不久，还傳到了中国地方和北陆地方。

甘蔗和馬鈴薯等也在这个时代开始种植了。

与农業产物多样化的同时，以此为原料的手工業也發展了。于是，农民們逐漸地也就种植了除自家用以外的、作为商品来出賣的商品。例如，生絲原来叫作白絲，是来自大陆的輸入品，但到了江戶时代后期，在日本国内，就全可以自給了。从幕府末期开港后一直到今天，生絲还成为日本最大宗的輸出品。

棉紗、棉布等自江戶时代后半——十八世紀前后——以后，从河内木棉开始，久留米花布、伊予花布和关东的真岡木棉等都作为特产而暢銷了。

久留米花布是从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由久留米的米舖的女兒傳子，在織棉布来補助家庭生活的过程中創造的織品。当时傳子仅仅十二岁。其后，当傳子結婚后不久，夫即亡去。她扶养了三个孩子，由于精通織布，接二連三地研究出了新的織布法，到了五十八岁还研究出了四道紋的新布紋，八十二岁才死去。

伊予花布也是名叫健屋加納这一妇女的發明。这些絹綢和木棉的織品，一开始虽然都是由农家的妇女們用自家的原料、自家的織机和其他工具織成的，但逐漸地这些制造品的中間批發行就預先貸給織布者以織机和原料的生絲来織（紡紗时也是預先貸給棉花）的，成了在批發行（資本家）支配下的手工業而生产了。

比这种形式再进一步，批發行自己也有了有很多的織机，而且还雇用了称作“机織下女”的女工，使其在小工場内劳动。在繅絲方面，也是买进茧来使女工来操作的。而在更进步的时候，——主要的是进入了十九世紀以后——在工場内，很多的女工分工地来作一樁事情的所謂工場手工業也發生了。

以上，虽然只是举了木棉和絹綢的例子，但在十八世紀的日本，商業資本的家庭手工業是很普遍的，还有工場手工業如桐生、足利、甲府和福井等有名的針織業地区的絹織品業，德島的藍玉，土佐的日本紙和全国各地的釀酒業等等，也是相当普遍的。

这样的新的生产方式，就破坏了与农业和手工業密切联系着的、农家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因此，也就使立足于这上面武士專制的政治制度瀕于危殆了。

因此，幕府和大名是企圖来禁止机織下女，阻止她們的發展的，但另一方面，獎勵作物的多样化和农家的副業作为支持他們財政的新稅源也是有必要的——这些就是吉宗所鼓勵的產業——这样，他們就陷入了这一矛盾当中。

生产力的發展，并没有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相反，却更带来了貧穷。因为越劳动就越受上述的武士和寄生于武士的商人的掠夺。

例如耕地的扩大并未使耕种的农民生活好些，而只是增加了領主和原来在村中的富农以及挾資金开垦了新田的大商人們的財富。农村中貧富悬殊的情况更严重了。在幕府末期，估計日本整个耕地的三分之一都是佃租地。

农村的衰落与“天災”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力越發展，就产生了將軍和大名对农民的剝削以及一部分大商人的中間剝削就越加加重，而农民則越貧困的矛盾。同时，由于得不到充分的肥料，与农民一样土地也瘠瘦了。所以風雨稍有不調則立即釀成歉收与飢荒。本文提到說“天災和飢荒常常發生”，致使人民遭受了痛苦，風雨不調和地震等等固然是自然的作用，但歉收却不是天災，飢荒也不是由自然所引起的。如果治水、貯水和排水的設備完善，那末也絕不会發生洪水和旱災的，即使發生了，受災的程度也会減少的。

而且不論是什么样的歉收，如果政治良好則也不会引起飢荒的。歉收之能繼續几年，也全是因为政治不好的緣故。而且，像那样恶劣的天气繼續几年的事情也是絕對沒有的。从日本历史上来看，大化革新之前，所謂的天災和飢荒就是頻頻發生的，在平安末期，也是如此，就是在鎌倉时代，从后半期起，也是飢荒連年的。进入江戶时代后，前半期固然是比較少，但从后半期开始，大飢荒也是屢屢發生的。最近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的东北地方的飢荒更是记忆犹新的。像这样的从全面来看，就会明白天災和飢荒等，实际上就是当一个社会走到了末路的时候所頻頻發生的事情。

所謂天災絕不是天然之禍，而是社会和政治之禍，这一点應該使兒童很好的加以理解。江戶时代三百年間，在其后半期时，天气也不是特別坏，可是飢荒在后半期却特別飞躍地增多起来。

庆長以后明治以前的江戶时代二百七十年間，大歉收有一百三十四次，大部全是在后半期。最大的一次是吉宗时代（一七三二年）的山陽、南海和九州的飢荒。此外，还有距此五十年后的如本文所說的从一七八二年即天明二年开始，連續了三年的、从畿内席卷东海、东山、北陆和奥羽的大飢荒以及在这五十年后的，从一八三二年即天保三年到十年，連續地在日本全国到处都發生了的特别是奥羽的大飢荒等。享保年間的飢荒，是以久雨与蝗虫之害为其直接的原因的。飢民曾达二百六十万人。这时伊予的农民作兵衛，他父亲和長子首先餓死了，他自己最后虽然也餓死了，但留下一斗麦种沒有吃，殘生的其他的村人也沒有吃，到了秋天，人們撒下了这斗麦种，他們是把复兴生产作为首要任务的。在天保飢荒时，下野的一个农民，也如作兵衛那样留下了种籽而死，但却被驗尸的官吏夺去。看来就只有劳动者才是維護生产的。

天明飢荒时，仅津輕餓死的就达十万二千余人，死于癘疫的达

三万余人，据说全家死尽的也达到了三万五千余户。在仙台饿死和病死的也达到了三十万人。

天保饥荒也同样，当时，到处都是累累的白骨。这也是个慢性的大饥荒，生产也遭到了极度的破坏。

在这段期间，疫病的大流行也是常常发生的。其中又以与天明大饥荒同时而来的疫病，即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年）从长崎波及到江户的霍乱的大流行是最为悲惨的。由于霍乱，仅在江户的寺院所处理的尸体数即达二万八千余具，实际上死的人数还不知比这要超过多少倍。

对此，本文说“以幕府为首的各国的大名们为了从饥饿当中拯救农民”是作了相当的努力的。其实，这正如大火的纵火犯用木桶泼水来救火是一样的。有的地方大名们借口说为了防备饥荒，还特别的由农民征收了大米贮积于仓中（称义仓），但这也是官吏所作的工作，由于他们管理不当，致使大米发霉或是由于他们的贪污等等这一切，只是使农民更痛苦，而并未使他们得到什么利益的。上州的农民长谷川勘造，就曾这样指责过，而实际上，农民暴动有不少也是要求废除义仓的。

农民们是苦不聊生的，甚至都无力来抚养孩子，一般的农民最多也没有超过三个以上的孩子。如果超过三个，在其生下来的当时就弄死了。这种事情叫做“溺婴”。这时，如果是男孩子则就是说“叫他上水晶宫了”，如果是女孩子就是说“送她上天了”。堕胎和弃婴是与年俱增的。

这样，日本的人口到十八世纪中叶达到了三千万人左右，其后一直到明治初，几乎是没有什么增加的。社会也完全到了末路，如此下去除了亡国以外是别无他路的。

但我们日本人民当面临着灭亡，或是革命的两条道路的时候，

就坚决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农民暴动 本文說农村衰落了“农民的心情也横蛮起来”。这一点与吉田首相称呼为了生活而斗争的工人是“不逞”之徒是相同的。而談过室町时代的“集聚起来的力量”的本文，为什么不談江戸时代的农民暴动一事，是难以理解的。

农民正如前所述的佐倉宗吾和松木長操那样，从江戸时代初期，就已經与將軍、大名和武士的恶政作了不懈的斗争。

随着时代的进展，换言之，即随着封建社会矛盾的发展，农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也更加剧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摧毁了农民的自古以来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而这一問題就是意味着农民已經是和过去有别的农民，是生活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当中了。同时，这一問題也給人民的团結的扩大創造了条件，使思想也前进了一步。由于这样，它也就將人們导向了新的斗争。江戸时代二百七十年間，仅仅就現在所知的，暴动最少也爆發过一千五百次以上，其中大部分又是集中在后半期。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剝削农民的基础上的，因之，农民的反抗，也就成了推翻幕府、大名和武士專制基础的决定性的力量。至于农民斗争的方法或形式，大别之有三种。

第一，就是如佐倉宗吾那样，对代官的不法向最高的負責官員控告的办法。在初期很多都是这种办法，这叫做“越訴”。初期时，在村中貧富之差还不是很悬殊的，同时，由于当村官吏的名主、庄屋們与村人利害关系的共通点还是多于不同点的，因此，他們也就能夠在农民集会上被选举出来成为代表并向其上級官吏提出控告。但至中期以后，由于村中的富农与普通的自耕农和佃农之間的利害关系有了相当的不同，因此，越訴的代表也就不再是村官吏，而是由普通的农民和佃农代表劳动的村人来充任了。松平定信时代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越后魚沼郡的农民們，向幕府越訴时，开始是向統治附近一帶的大庄屋要求的，但未被受理，于是又向藩的官衙控告，也被駁回。其后虽然又向恰在同地方視查的幕府的官吏提出了請願，但也未解決問題，結果，大家就認為除了向最高的統治者的幕府的重要人物控告外，是別無他法的，于是，便共同地选举了代表，由一个小农民仁右衛門去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

第二，由于越訴仍达不到目的，因此农民也就逐漸地采取以羣众行动来爭取达到其要求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自鎌倉时代以来的、为羣众所实行的逃散。逃散是农民的示威，也是农民的罢工。农民当要求不被接受时，則一村即和数村团结起来，离开村庄投奔鄰近領主的領地去。但离开的主要是倔强的男子，至于妇孺則多半还是留在村中的。这样一来，則不仅在荒蕪了土地，收不到年貢等方面直接地打击了領主，同时，也在將其苛政暴露給其他領主和將軍方面也使領主为之棘手了。逃散中最有名的是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南部藩領民逃到仙台藩領的例子。一开始逃散的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后来一直到南部藩主与仙台藩主交涉后，將农民遣回南部藩时为止，有三千人沒回去，有四十五个代表就在仙台領与本藩的官吏交涉，終于爭取到了全部要求，并且沒有出現一个牺牲者。

第三，最多的形式是“强訴”。几千几万的羣众高举蓆旗*，以鎌刀、鋤、斧头、鷹嘴鉤和竹槍等生产工具作为武器，拿着要求書一齐拥向領主。有时，固然也曾捣毀村内欺压人民的土豪劣紳的住宅，但这絕不是一般的暴动，而是有着良好紀律的。領主如果要老

* 当时日本农民起义时，常以稻草制成蓆作为旗帜。——譯者

老实地接受了要求，则暴动即行解散，但暴动是常常要与領主的军队作战的。吉宗时代(一七二六年)美作津山的农民八千人，在“与老爷有怨”的口号下，进攻了領主，并与以刀和槍炮武装起来的武士五百余人展开了战斗。一七三八年奥州淺川的农民八万四千人也与領主軍交战了。翌年，在但馬生野，数千的农民和抗夫联合起来，面对附近一帶的十二藩的大軍展开了战斗。一七五四年筑后久留米的暴动也有二十万人参加了。这时农民是很慎重的，从很早以前就作了准备，借口为了獵取糟蹋庄稼的野猪，还到城里去預先借好槍炮来發动暴动。同年，在美濃的郡上郡农民五千人的斗争竟坚持了四年多。这时，在十八世紀后半，在全国到处都爆發了数万或十数万人的大暴动。

当天明飢荒和天保飢荒时，暴动的浪潮是非常洶涌高漲的。松平定信的改革，就是为了要压抑天明飢荒以后的羣众斗争的，而天保改革也是这样。在天保年間的时候，每年要有二十或三十件的羣众暴动，而且在大阪、甲府和三河等幕府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也都出现了大規模的暴动。

其中在大阪由原任幕府的大阪町奉行所官吏的大鹽平八郎所組織与领导的斗争，就不仅使幕府而且也使整个的封建統治者为之發抖了。当时，因連年歉收而米价高昂，大阪市民苦不聊生，餓死者日益增多，可是奉行和土豪劣紳却不顧人民的痛苦，仍然驕奢作乐，只顧更加紧地剝削附近貧穷的农民。大鹽对此是極其不平的，于是就連自己的藏書都卖掉来周济貧民。但这种个人的慈善也是無济于事的，事实使他下定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非改变政治不可的决心。这样，就秘密地准备了武器与当时大阪郊外的渡边村的人們——由于他們过着最穷困的生活，所以是被蔑視为民以下的人——取得了联系，終于一八三七年(天保八年)二月，就

准备以数百人的武装暴动来袭击奉行所。大鹽在这时向人民宣傳的檄文中就有“一直到从天所生的各村的小前为止”字样。这就是強調了即使是小前这种佃农，也是天生平等的。

奉行馬不及鞍地狼狽逃窜了，但不久由于大阪城及其他的武装镇压，暴动軍仅仅兩天就被消灭，大鹽也在逃走中自杀了。

但是，这一暴动就完全暴露了幕府的昏愎無能，使称为天下的副將軍的水戶藩主的德川齐昭等，也懾于人民的威力，立即建立了叫做“床几廻”的近衛队，并向將軍建議徹底地镇压人民。

市民的捣毁 与农民斗争相呼应，在城市中也进行着为劳动人民生活的战斗。当时的城市如前所述，并不是作为工业城市而發达的。城市市民就是零售商、土木建筑、家具、制造日用器具的手工业者和运送貨物及其他交通劳动者和大、中商店的店員等等。而近代的工資劳动者則几乎是沒有的（他們逐漸在地方的小城市中形成）。当武士陷入財政困难时，就强制大商人捐献“御用金”或者是通过貨幣的改革以及由各藩的称作“国产品办事处”的机构来壟断和專卖藩的特产物等来压迫城市市民。但大商人們則通过收买官吏或屯积貨物、操縱物价等办法將一切負担悉数轉嫁到一般市民身上。特别是荒年时，米价暴漲，市民生活就更难以維持。这时他們就袭击了奸商并捣毁了他們的住宅。

享保年大飢荒时，江戶的米价暴漲，二、三千人的市民袭击了屯积者之家，并形成江戶的大騷动。其后，由于傳出了要捣毁大阪的消息，这消息也曾使屯积的商人們大为恐慌。一七八〇年正当天明飢荒又加上疫病流行时，从江戶、大阪和京都的三大城市开始，伏見、奈良、郡山、堺、和歌山、伊勢山田等近畿地方各城市一直到中国地方的广島，九州地方的熊本和長崎，东海道的駿府、甲府、小田原、神奈川，陆奥的石卷，几乎在全国都爆發了大捣毁事件。天

明七年(一七八七年)五月的江戸的搗毀,参加者达五千余人,共組成了二十四個搗毀隊。當搗毀時絕不盜竊而只是搗毀家具、燒毀賬簿等,并且还十分注意火堆,若有去拾零散在路邊的東西并要逃走的人,則搗毀隊就將其大打一頓。據說這種隊伍就形成了城市消防隊的基础。

天保飢荒時,大阪的“大鹽之亂”就是市民与附近農民的聯合,是農民、市民及所謂賤民的超身份差別的全人民的共同斗争。

地方小城市市民的搗毀,很多是農民暴動中的構成部分。如果不是經常地維護着民主主義的原則,那末不論一、二野心家怎樣去煽動,群眾也是不會動的,暴動也是不會起來的。

農民不是被他人強制而是以自己的意志來參加斗争的。而且,所有向領主提出的要求事項和行動計劃等全是由羣眾討論決定的。代表和領導者也是由民眾自己選出來的。他們有時在要求書上簽名時只是畫一個圓圈,使人不知道誰是第一個簽名者。這叫作“傘張速判狀”,可是在武士們的社会中即使這樣的事情也是難以想像的。在斗争的民主的組織之中,對於真正徹底的正直的輿論是尊重的。聖德太子雖然也說過重大的事情要商量着做,鎌倉幕府也創立了評定眾由大家的意見來決定政務等等,但這些都不是民主主義的萌芽。室町時代的農民暴動、城市和農村的自治等,只有在這里才有真正的民主主義的萌芽,尽管這種萌芽在發芽時即被封建領主摘掉,但它在近世的農民斗争的組織中又重生和茁壯起來,而且,這次還成長得將軍制已經不能再將其壓潰的程度了。例如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內亂時,在隱岐島就驅逐了幕府的官吏,實行了民主自治;越後南蒲原郡的暴動中還有過由全村民選舉來任免村官吏的例子。

在家族制度方面,幕府末期在農民和市民之間認可妻子有提

出离婚权的民主的习惯也相当发达。继承法方面，在日本是刚刚在这次宪法中才将家主继承与财产继承分开了的，可是这一问题在市民和商人之间，如前所述一直就是这样的。明治政府在有关这些方面的法律全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了武士的家族制度，但在民间，这一民主的家庭制度的萌芽却是早已有了的。

三 学問之道

只有说明了封建社会的矛盾，说明了在封建社会中要求发展的生产力以及人民的革命运动才能够了解“学問之道”的正确意义。将封建统治的学問“儒教和寺小屋”与在江户时代后半期兴起的并与其对抗的新学問的萌芽的国学和蘭学，甚至連年代都没有分别清楚地混淆起来是不能容忍的。

国学 本文在这里說“在观察所有事物时，不被古代学者的意見所拘束，以自己的思想去考虑問題才是学問之道”，这是正确的。这一点从“国史”的全文来看也是最好的文句。但它所說的这一“学問之道”是随着儒教的发展而兴起的这一点却是不正确的。固然，普遍的认为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的古学是影响于国学者，但学問之道即自由批判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不是儒教的精神，相反，儒教却是它的死对头。在江户时代，一說学問首先就是要提到儒教的，甚至要学医学，都必须要先学儒教。因此，任何一个学者在相当程度上都受了儒教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他們的学問发展的要素。只有冲破了儒教，才能够有“学問之道”的。

国学之所以能够兴盛，是由于在武士專制社会萌芽的民众的现实，促使了接近民众立場的学者——本居宜長，他是伊勢的松阪

町的開業醫——去了解武士專制思想的武器的儒教和佛教未傳來以前的日本所致。宣長對古日本的研究確是對新日本的探求。但由於宣長沒有堅決地站在真正的新日本建設者的人民的立場，所以在古日本的研究中，反而為古日本所俘。他一方面對儒教和佛教歪曲了人的真情一事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卻被古代日本人，為人類所不可知的“天地諸神”所俘，甚至一代名著的“古事記傳”的優異的批判精神，當變成了“古道”以後，也就消逝了。我們學習宣長並不是去信仰他的“古道”，而是去學習他的“勿為師說所拘泥”的批判的精神。

本文所提到的塙保己一的情形，他和盲人這一不自由之身鬥爭並成了很好的學者，這對兒童來說，可以認為是有了鼓舞人生的意義的。至於水戶藩編纂“大日本史”的問題，對於今天的学生來說，却不是必須了解的。“大日本史”是“大義名分史觀”的歷史，而且還是用漢文寫的。關於“大義名分史觀”的問題前面已經談過，從“大日本史”不屑於用本國的文章這一點來看，也可以明白它是貫穿了歷來的不用漢文就不能寫作的封建思想的。儘管口頭上說是以“大義名分”來尊崇本國，但可以了解它對本國國民及其文化的進步是毫不尊崇的，而只是尊崇他們自己的封建統治者而已。

蘭學 說蘭學開始於吉宗的這一寫法是歷來的惡癖，如前所述應該說是從新井白石開始的。

蘭學充分地顯示了它作為新的民眾的社會的新學問的意義。在吉宗時代，舊的統治是如何的窘困已經詳細談過了。所說吉宗很愛好歐洲學問，也只是想從歐洲的自然科學和技術中來尋求拯救這一窘困情況的技術的。因此，雖說吉宗是准許了對洋學的研究，但也決不是讓一般人民自由地去研究，而只是秘密地使幕府的官吏去學習的。這並不是愛好學問，而是愚弄羣眾，企圖讓自己有

着特別的知識來統治羣眾的舊專制政治的魔手。

另外，本文說吉宗命令青木昆陽去學習荷蘭文一事，也是不正確的。昆陽是江戶的日本橋的魚商的兒子，是一介平民。他開始是學過儒學的，但後來却頗想研究對社會有用的學問，並得到機會被准許閱讀幕府書庫中的書。在這些書中就有荷蘭書籍，於是他就認為這一定是會對社會有用的學問，於是就口口聲聲地表示了願學荷蘭文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最後又為吉宗准許所致。

新的學問是商人之子所創始的，而且，從青木昆陽研究蘭學及其他學問所得到的的一種成果就是防備荒年的甘薯的輸入與普及一事來看也說明了學問的發達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或者站在接近人民的立場上才有可能。

前野良澤是中津藩所僱傭的醫生，他跟從青木學習了荷蘭文。杉田玄白也是小濱藩的醫生。他們都不是正統的武士。他們翻譯“解體新書”的苦心，在杉田的“蘭學事始”中是很有名的。開始時，他們兩個人着手翻譯，但因在解剖圖上的人臉，眼，耳，鼻等都各有說明的文字。他們逐字推敲，有時一個字的意思甚至都思索了好幾天。在這過程當中，桂川甫周等五、六個志同道合的人，也參加進來，他們每月召開五、六次共同的研究會，經過四年的苦心，終於譯完了。必須強調，這是一本共同研究的產物，這對儒學來說是从未有過的研究學問的方法。由於只准許青木一人讀荷蘭書，一般人是不准許的，因此他們曾為他們所譯出的東西顧慮過是不是會因此要受到幕府的處罰。於是他們又特將此書譯成了漢文，通過甫周的父亲是將軍的侍醫的關係，給將軍送上了一本，據說他們見將軍接受了以後才放下了心。

由於學者的這樣的苦心，蘭學逐漸地普及了。如本文所說的，很多日本人還跟從出島的荷蘭醫生學習。有一個叫西波樂特的優

秀的荷蘭医生，同时他又是个通曉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百科的学者。西波乐特是一八二三年（文政六年）到長崎来的，一年以后就在長崎市外（現在的市中）的鳴瀧地方設立了一般市民的診療所，并將此診療所作为学校对日本人的弟子們教授了医学各科以及化学、物理、植物、天文学和地理学等等。临床講解医学也是从他开始的。在此以前，荷蘭人尽管是医生也是不准离开出島外出的，但由于長崎市民要求拜望优秀医生的热情——对于优越的事物，就是欧美的也好，仍然是尊重的，并不是像武士、儒者和国学者那样頑固的去加以排斥的市民精神——还迫使官吏許可創立了西波乐特的鳴瀧学塾。

在西波乐特門下几乎聚有日本全国的优秀的学生五十七人。其中尤以岩手县水澤町的医生高野長英为有名。就是幕府的天文学的学者高桥景保們也曾受其教于江戶。日本人某（名不詳）給西波乐特的信中就写有“四海之內皆兄弟，唯救人民于病苦之中，此乃先生之宿願”的字句，在这里，日本人民就在武士的排外主义当中，培育了高尚的国际的人道主义和超国境的真理之交。

在日本滯留了五年后，西波乐特就准备起程回国。这时他以純学問的动机为目的的，与高桥景保以洋書交換来的日本地圖，在回国的行李当中被幕府的官吏發現了。結果高桥被判处了死刑，其子也被驅逐至远島。此外，西波乐特和高桥的門生以及有关的数十人，不是下了牢獄，就是被驅逐，西波乐特也被永远禁止再来日本（安政开港后，与其子一同又复来到了日本，但不久即回国了），可是西波乐特却以他的名著“日本”及其他著作向国际学术界介紹了日本人的科学研究的成績，提高了日本人的名譽。这是幕府对蘭学的最初的迫害。

在此以前，仙台的林子平以“海国兵談”及其他著作，強調江戶

日本桥的水与倫敦相通,同时,由于日本是海国,所以为了日本的防衛就必须建立海軍,而且为了这样的防衛,整个日本人就必须抛开身份上下,一齐努力,为了說明这些問題,他把他的著作都印刷出版了。其中,他闡述了人的社会是必然要变革的,今天的社会是不会永久繼續下去的历史变革的必然性,而且还提出了在欧美有种妙法能使国民一致并不發生內乱的、涉及到欧美民主主义的說法。但这却被当时的老中松平定信,作为是向国民鼓吹社会变革,任意評論国家政治,蠱惑人民,破坏秩序者而判处为終身囚。“海国兵談”等書也被禁止出版了。这时子平在獄中竟悠然地唱着“無亲,無妻,無子,無木版,既無金錢又不願意死”的歌子,并自称为六無齋。信仰真理的人,經常地比迫害真理的人是开朗的。像这种对个人的迫害并不仅此一樁,但可以說,西波乐特事件是对于想要冲破幕府的御用医学和天文学的束縛向外發展的蘭学的最初的全面鎮压。

但是蘭学还是冲出了这些迫害,逐渐地普遍到了医学、自然科学和兵学等各科。

天保时,幕府御用的蘭医和天文学者們都住在江戶的下町,对此,民間的開業医和各藩医的蘭医們則住在山手,彼此往来很亲密,于是他們就被称作山手派。而領導这一派的就是前面談过的高野長英和名义上是田原藩这一小藩的家老、实际上只有二百石上下俸祿的渡边华山。华山幼时由于父亲的大病,一家生活非常困难,弟弟們則被送到寺院里去作小沙弥有的就寄养在別家,备尝了一家顛沛流离的痛苦,当他成了藩的官吏以后,他也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他在繪画方面也是有天才的,开始是画山水画的。后来則吸收了欧美的写实主义的画法。在他的画中还有寺小屋的形狀和江戶庶民的風俗的素描。他是日本最

大的画家之一。他自己虽然几乎是沒有鑽研蘭学的時間，但由于他对学問的热爱和高尚的人格，就受到了高野長英等的崇敬并处在很多蘭学者們的領導者的地位。

当时，連年的飢荒也使他为之痛心，于是他就与紀州的儒学者远藤勤助及其他很多的学者創立了名叫“荷齿会”的組織，此組織后改称“蛮社”，在这里，从农学和植物学角度，研究了对飢荒的对策，并进一步研究了欧美的兵学、历史、世界情况和日本的前途等。

幕府对于外国船靠日本海岸一事，即使是送回漂流民的船，也是毫不留情的發出立即撵走的盲目昏庸的命令。一八三九年有了英国船將要来日本的傳說，对此，幕府就决定了：如該船要来日本則即將其赶走的态度，这一消息被蛮社知道了。华山和長英对此很吃惊，認為必須要停止这一無理的措施，于是長英就写了“夢物語”，华山写了“慎机論”等書。这一些書原来就是要給幕府的官吏看的，但这时一直畏惧山手組威信的幕府的書物奉行——管制思想的官吏——烏井甲斐守們以莫須有的理由，借口說他們要企圖出海到無人島小笠原，并在那里再到外国，或者与外国作走私貿易，就逮捕了华山和長英并把他們押进了牢獄。幕府对長英們作了各种調查，却毫未找出任何要偷偷出国或作走私貿易的表現。但当搜查家宅时，却發現了夢物語和慎机論，于是便以此为借口說这是批判幕府政治的过激思想，就強將他們治罪了。这样山手組的蘭学者們就因之而四散。这称作“蛮社之獄”，是繼西波乐特事件的第二次的全面的对蘭学的大鎮压。俸祿虽少，但身为武士又处于家老地位且为幕府很多名士所知的华山不久就出獄了，但仍令其反省。此后，由于忍受不了仍橫加于他身上的各种压迫，結果就留下了期待新社会的遺書而自杀了。另外，也由于这一事件，老

医生小美三英也自杀了。

市民高野長英在監獄中堅持了鬥爭。在獄中的第六年，由于獄中起火，——有一說是由于在獄內照顧長英的一個人放的火——得到了臨時釋放的机会，就此而脫逃了。他以藥品燒坏了自己的臉，改變了相貌隱于各地，以翻譯蘭書及其他方式為新的時代作了不懈的鬥爭。一八五〇年在江戶青山的隱藏的房內被幕府捕吏所圍，而終于自杀。當時才四十七歲，他才真算是一位為正確的學問之道而生活并為此而殉職的人民的天才。

本文所說明的伊能忠敬是下總佐原開醬油店的，青年時，作生意發了財，到了晚年就有志于自己所好的學問而繪制了著名的日本地圖。

如此，新的學問全都是在人民當中產生而并不是為武士階級所發展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就沒有一個是武士出身的人，但主要的全是由人民出身的）。這就說明了建立新社會的學問上的能力，也只有和人民之間才得到了發展。本文談到的炮術和兵學的知識，也抹煞了長英的貢獻。而開始研究并普及了歐洲式的操練的是長崎的“町年寄”（由長崎市民任命的市的官吏）高島秋帆。但他也被畏懼新兵法的幕府以莫須有的罪名坐了八年牢，一直到培理提督來時為止。這還是因為當時無教操練的人，所以才被放出來的。

本文在這一項的末尾說，幕府也進而接受了蘭學，起用蘭學者，努力地去了解世界大勢，這種說法看來似乎很正確，其實是大錯特錯的。幕府對蘭學和蘭學者一直是不斷的鎮壓的，幕府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想要自己來壟斷歐美技術。幕府是進步學問之敵，是對進步學問的迫害者而決不是它的鼓勵者。

特別是自蠻社之獄以後，幕府對蘭學的迫害是一年比一年地

严酷。一八四九年甚至將軍的侍医,除了眼科以外,也是禁止用荷蘭方法的。在第二年又限定了蘭書的翻譯,一定要由幕府的官吏來作,并且对普及到全国各处的原文書,也拚命地搜集并將其沒收了。像这样大的根本的事实,本文就是一句也沒有写。而只是根据在某些部分利用了蘭学者,就說幕府是“进而接受了蘭学”,这是騙人的。而且,在这里它又写道“由于鎖国,一般的人們是不了解海外情况的”,其实这正是因为学者們稍微作些努力想去了解一下,那末幕府就立即加以彻底的鎮压所致。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必須改写成“幕府是企圖仅由自己来接受一点蘭学,而对人民的研究則是一直在迫害的。然而,这新的学問却是在从人民中出来的学者們在与幕府的迫害的斗争中所發展起来的”。

社会思想 新的社会思想也产生了,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准备詳細談一談。

自江戶时代中期以后,反映了人民的斗争,很多学者都認定社会是不会就这样原封不动的,早晚是免不了要有大变革的。林子平的“海国兵談”和渡边华山的遺書就是一例。甚至連幕府的御用学者柴野栗山——他是松平定信的“異学之禁”的提案人——用君为舟,民为水,水很能浮舟,但也很能复舟的話来警告幕府說人民有推翻武士專制的趨勢。

这时,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的意思也出現了。堅守武士階級立場的人,就不斷地提出了認為像鎌倉时代那样武士住在农村直接地压榨人民的社会是最为理想的反动意見。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描繪出社会必須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的輪廓的,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佐藤信淵和在本文中未出現的安藤昌益們。

信淵是羽後雄勝郡人,一七六九年当明和大飢荒的那一年,出生于农学者之家,从幼即在輾轉各地的过程中,研究了农学和矿山

学。虽然他也是在一八五〇年即与高野長英同年死的，但在此以前，他几乎周游了全国，常常看到了大飢荒的慘狀和农民忍痛杀掉自己的兒女的情况而深为痛心，并热心地研究了如何才能够將这个社会从这个痛苦的地獄中拯救出来的問題。于是他就在农業技术、兵器和海防等各方面著述了很多書。总之，他是認为提高技术使生活容易，或者是以新的軍艦和兵器来巩固国防則社会就可以变好的。但是，不管信淵怎样研究，但若实际使用，除了改变社会組織以外，就別無他路。只單純的以农学技术来使农民过好日子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信淵也觉悟到了。这样，也終于考虑了从根本上来改变社会的問題。他所描繪出来的理想社会就是“垂統法”的思想。根据他的說法，新的社会完全消除了士农工商的身份的差別，整个国民要分为八个产业部門，每人必須属于其中之一。所有产业和商业皆为国营，它們都不是为賺錢而生产，而是为国民生活而生产的。政治固然仍由一个君主和官吏来做，但这种官吏，任何人民只要有才能，只要出身于大学校（免費）就可以充任。在全国要設立小学，国民必須要在这里学习。而且在每一个小学校区内，都有免費的診療所和养老院、幼兒園、兒童运动場等。

这种想法在仍存有君主这一点上是表现了它的空想性，但是除了君主一人以外，全是無階級的，無剝削的，所有生产資料全是国有的这一情况，却是对武士社会的尖銳的批判，表现了为人民所渴望的世界的一个姿态。

比信淵显然更徹底的思想家是安藤昌益。他是在信淵时代以前的秋田人，其身世不很了解。他自号为确龙堂良中，曾在八戶作过开业医。他所著的“自然真营道”、“統道真傳”却傳下来了。昌益对于武士專制以及为其服务的儒教者和佛教者所提倡的忠孝仁义和慈悲等加以激烈的批判。他說这一切是法的世界——人为的世

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在自然的世界，人人都是以自己的劳动来衣食的，沒有人剝削人的問題，因之也就沒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沒有什麼武士和平民身份，也沒有男女的不平等。而由于沒有剝削、沒有战争，也沒有盜竊，因之，也就不需要軍隊和警察，大家只是劳动，快乐地、民主地、和平地生活着。然而，君主和諂諛于君主的聖人和學者却出來提倡自己不劳动而去剝奪人民的劳动生产物，提倡奴役人民的忠孝仁義和慈悲等。他还譴責說，“道德”本身就是監守自盜的東西，它一面提倡“道德”，但另一面却又在做着剝削別人的這一罪惡和不道德的勾當。另外，當君主在荒年稍一放鬆人民的捐稅，就散布說這是君主的恩賜。可是，君主又是恩賜誰的東西呢？這些東西原來全都是由人民剝奪來的。乞丐乞求別人的施舍，如得不到施舍的話就要餓死的，可是君主却向人民強征捐稅，如人民稍有繳納不出的情況則立即將其押進牢獄來強奪，到底君主和乞丐誰是更好的人呢？就是這樣的，他對弟子們教導了這一自然世界的理想，並隱隱地散播了時機已到的概念。

所有的人都劳动，沒有剝削的社會，儘管還是空想，但日本國民在十八世紀也終於開始將這樣最進步的社會描繪出來了。

人民以斗争的實踐，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展示了民主主義的茁壯的萌芽。高野長英是傳播了不要順從惡法、要抵抗暴政的思想，可是當時並沒有將這一斗争在全國範圍內結合起來，集中起來使它提高成為人民的一大政治運動的社會條件。（孤立分散的農業社會的斗争也必然是分散的，它只有與大城市的工商業市民階級、特別是劳动市民的大聯盟聯合才能够形成全國的統一的政治運動。）同樣，將民主主義的萌芽作為人民的原理，從理論上加以提煉再貫徹到整個人民當中去，這一點也沒做到。就是昌益和信淵的思想，在那樣嚴重的迫害之下，也只是傳播了極少的一部分。

但是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加以改革，那末旧的专制政治也是难以维持的。这样，紧跟着作为改良主义的武士阶级的政治理论的尊王论就被提出来了。

尊王论 当幕府的专制统治越来越困难时，一种想来挽救它的思想就出现了。使武士定居于农村是武士的在社会问题上的改革方案，而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尊王论。

所谓尊王论，原是封建社会的权威主义思想的一种。封建制度就是被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命令和自下而上的绝对的服从所支持的。但这种服从的观念仅靠上边的人有着权力和武力来维持还是不稳定的，还必须将上边的人有着绝对的无上权威的观念灌输到下边的人的心中才可以。在天皇的军队中，叫人将上级官的命令认作是朕的命令，以朕的绝对威权来使上级官神圣化。封建社会所做的事情与这个是一样的。正因如此，所以德川家康也就被看成了神，称他为神祖、神君和“权现神”*，将其所作所为都作为是神祖和权现神所规定的。但是家康的先祖明显地都是人，而在德川氏以前是存在过很多统治者的一事，也是不能抹消的。正因如此，所以幕府也就利用了是日本的建国者，也是建国以来就继续下来了了的皇室。德川氏在政权方面，甚至连祭祀权都没给天皇留下，但却留下了将军要由天皇来任命的形式，原因也就在此。现在作为职业的角色，仍然采取着在“丁髻”*** 方面也很能表现出来的封建组织，而特别在“横纲”**** 方面更是如此。横纲是只有连战连胜了其他力士的人才能当成，但是仅仅如此，即使成了优胜者也

* 德川家康死后，天皇为了阿谀德川幕府，送了他一个“东照大权现”的“神号”，表示德川家康与天皇一样，也是“神”的后代。——译者

** 丁髻为男子结髮髮型之一。日本在历史上有过各种髮型，而且，各个阶层或不同职业者按地位之高低皆有不同髮型。——译者

**** “横纲”为角力冠军者的称号。——译者

是不能称为横綱的，只有从熊本的吉田家領得了許可証才能成为横綱。吉田家固然既不是比力士角力好，也不是培养力士的，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傳統的权威。力士胜利了还是不滿足的，是希望得到横綱这一头衔的，有了这个头衔，即使失败了也仍可以高据最高地位的。將軍是由天皇任命的形式，也正如横綱一定要由吉田家領取許可証是一样的。

副將軍德川光圀所著“大日本史”，也不外是鼓吹封建的权威主义，作为拥护幕府的咒文的。被称作后期水戶学的德川齐昭时代的尊王論也是如此。在齐昭的教师会澤安所著的“新論”中，也主張是以幕府統治的安全为首要，尊王只是为其服务的工具。在齐昭給其子川越藩主的信中也說，尊王就是要提起大名們对幕府的忠义的观念，而你也是要永远地尽忠义的。藩士忠于大名，大名忠于將軍，將軍尊崇天皇才是真正的忠义和尊王。大名越过將軍而忠于天皇，或者藩士越过大名忠于將軍都称作大不忠。这就是有名的藤田东湖的“弘道館記述义”，东湖把这些问题都写成是天經地义的。

此外，还有另一种尊王論。这是出自浪人学者，即从身份來說虽然是武士但却沒有主人的学者。他們深知民众的革命气氛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也認為现今的社会，早晚必然要有一大轉变。为了这种轉变，他們批判了现在的最高統治者的幕府，而憧憬着作为与幕府对立的統治者的天皇的傳統权威。但这决不是想要廢除將軍制的，而只是作为挽救將軍制社会，从天皇方面来寻找新的权威的。高山彦九郎和山县大貳們就是这种論調的先驅。

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幕府各藩的統治体制已經是不可救藥了。財政完全垮台，民众革命式的暴动和搗毀越来越激烈，各藩对此已經是无法压抑了。这样，有实力的下級武士也就因之而参加

了藩政。他們是藩政最前綫的官吏，其中最优秀的分子就正确地抓住并利用了时勢，即民众革命的气氛和新的产业經濟發展的动向，由此并懂得了如不改革，則武士社会就不能够再維持下去。他們虽然有才能，但却被門閥制度所束縛，而且，武士階級的沒落及其表現之一的財政穷困的重担，在武士内部一直是最沉重地压在下層武士身上。如此，他們就利用了革命的人民从下面掀动起来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順着这种力量的發展方向，盼望着改革旧的制度，提出了登用人材和言論自由，換言之，就是提出了起用他們自己、讓他們自己發表意見。对于各藩來說，也是不得不用他們的。这是因为，为了打开財政的难关，除了利用工商業并由藩加以控制而从中謀利以外是別無他法的，而这一点也是旧門閥的家老們所做不到的，因此，也就不得不起用平常即熟知这方面情况的有才能的下級武士。另外，为了統治人民的新的武力以及下面 將要談到的当时与外国也發生了新的关系，因而国防的必要性也增加了，而为了軍备，也就有必要創建以欧美近代的大炮和槍为中心的近代軍隊。但是，这种軍隊在家系和身份制度之下，是并沒能創建起来的。这是因为近代軍隊是建立在兵士皆平等的基础上的。而懂得这种近代軍备道理的也是下級的武士和平民。即使从这一点来看，也是不得不起用新的人材的。但是，这一問題却是与上級武士的保守思想相冲突的。这样，在十九世紀中叶，日本社会就到处都进行了对立和抗爭。

为了粉飾封建統治而倡导的尊王論以及因浪人学者們漠然对將軍制表示不滿而倡导的尊王論，这一切到了十九世紀后半，培理提督来到了以后，就与上述的下級武士的改革运动相結合，作为与幕府制对立的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并在天皇制之下意味着由于登用人材而使他們掌握政权的尊王論也兴起了。从真正的人民革命

的立場上来看,由于旧的社会妨碍了人民的幸福,所以才要推翻它,这一理論是很明确的,但从武士的改良立場來說,推翻將軍制这一权威,其結果也必然要另立一个别的权威的。

就是这种尊王論,开始时也并不是要打倒幕府的。有名的吉田松蔭就不是企圖打倒幕府,也不是要反抗幕府,只不过是單純的幕府独裁的改良論而已。从安政大獄*以后,对幕府改良是絕望了,其后不久,尊王論虽然变成了倒幕論,但此时“尊王”也絕不是說要尊重现实的天皇,而是要反抗与踐踏现实的天皇——孝明天皇——,又要推翻幕府的。孝明天皇就是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推翻幕府的。处于社会最高位的天皇們,一直是嫌惡新事物的出現与变化的(明治天皇一生在私房中都是保守的不用电灯而用蠟燭的)。因此,尊王派就經常發生提出假的或是威胁天皇發布違反天皇意志的詔書等。本文說“孝明天皇对这种过激的运动是不喜欢的”,其实他对王政复古本身也認為是“激烈的”,是反对的。本文所說的元治元年長州藩被驅出京都一事是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年)八月之誤。在这王政复古派被驅逐之后,孝明天皇給薩摩的島津久光的亲笔信中就清楚写道“朕自开始就不望王政复古”。

总之,尊王論就是封建式的大义名分論,是当人民羣众沒有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的团結时,下級武士們在全国迅速地取得了联系,利用了人民的革命气氛,企圖建立自己的政府,并在这个政府上面摆設上有着旧統治者经历的天皇的权威。而这一問題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七年間,在反对幕府大名制这一点上,形成了新

* 由于天皇与幕府的对立,京都成了反幕府的中心,这样,天皇方面的浪人等,使幕府每一件事都陷于困难,而这一点也就有可能致幕府于死命。于是大老井伊直弼为了鎮压这一情况,在安政五年就逮捕并杀死了吉田松蔭、梅田源次郎、桥本左内等人,此事件即称安政大獄。——譯者

的力量,但当尊王派推翻了幕府,确立了自己的政权——即树立了天皇制——后,立即就暴露了它的封建本质,并成为过激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

在国内,以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根本的原动力,使封建制的变革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外力就把锁国的大门打开并急剧地卷起了政治的变动。

第九 幕府的衰亡

一 世界动向

欧洲各国 当日本鎖国,人民苟延殘喘于將軍、大名和武士的專制之下的时候,在欧洲,如前所述,以荷蘭的独立革命及繼之而起的英国革命为先声,各国都先后实行了民主主义革命。

日本在一七七六年(安永五年)当幕府为了竭力維持封建制,禁止农民流入江戶时,北美的英国殖民地的人們,就發出了反对本国重稅及在其他方面的压迫的独立宣言,高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是任何事情、任何人所不能夺去的权利。因此,人民也就有推翻不法的政府权利等等。

当一七八九年(寬政元年)老中松平定信正加强新的对人民的压迫时,在法国巴黎的劳动羣众就打破了囚禁革命家的巴士底獄,將武器夺过来,对路易王朝及其贵族的專制加以徹底的革命的第一次打击,此后,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大革命就像暴風雨一样的發展起来。終于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在巴黎,一时地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工人国家。

資本主义 在这期間,产业界自十八世紀末叶以来,以英国为开头,也發生了大革命。

当幕府和大名以禁止机織下女和农民离村、拚命地抑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家庭工業等新工業的發展时，在英国是正当工場手工業的时代，虽然如此，但它的优越的机械工業却是在突飞猛进地發展着。一七六五年，当幕府禁止發行“紅毛談”这一报道欧美情况的書、并处罚了著者的这一年，英国人詹姆士·瓦特就發明了蒸汽机。当时在羊毛和木棉工業方面已經發明了各种茧紬和織机，生产也比过去的手織方法提高了几十倍。再加上蒸汽机的發明，从紡織工業开始在整个工業中就掀起了一大革命。鉄和煤的生产及机器制造也盛行了，所有的东西都以机器来制造并广泛地向世界銷售。

资本主义以英国为开头，在欧洲和美洲节节地發展起来。在此以前，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而現在工人(無产階級)却佔了人口的大多数，成为国家財富的最大的生产者。工業生产比封建时代提高了几百倍或几千倍。英国、法国和美国扩大了本国工業生产产品的銷售，而且，也为了輸入所需的原料，就在全世界开始了商業活动。国内商業以及为便利于人的往来和运输貨物的交通工具也發达了，应用了蒸汽的輪船和火車也發明了。輪船的發明，使在太平洋上的来往也变得容易了(这时在日本，甚至連制造能裝載五百石的船都是被禁止的，在东海道的河上，甚至連桥都还没有架上)。英国和法国以这發达了的交通工具大肆活躍于全世界，它們的这种力量到了十八、十九世紀，像浪潮一样也湧到了东方。特别是英国还将印度作为殖民地壟断起来，对中国也以軍艦和大砲为先鋒，打下了穩固的势力基础。

沙俄在当时，由于罗曼諾夫王朝的專制政治，在欧洲來說是最落后的，但进入了十九世紀后，资本主义也逐漸的兴起了。沙俄的冒險的商人們蒐集了西伯利亞的毛皮向欧洲銷售。由此，逐漸地

又向东方进展，一七二八年，当日本的吉宗时代，探险家白令走到西伯利亚东端，发现了白令海峡。从此以后，沙俄的势力就南下达到了千岛列岛和库页岛一带。

幕府对这样的形势，从出岛的荷兰人每年向幕府提出的“風說書”——描述世界情况的書——中，也模糊地知道了一些，但对这一形势的原因却几乎是不能理解的，只是畏惧地认为夷狄在窥视着神国。因此，就如同蠢笨的海螺一样，龟缩在锁国的壳中了。

俄国人和漂流民 最初碰到了幕府海螺主义的就是沙俄。也正如本文所说，一七九二年沙俄使节拉克斯曼来到了北海道的松前，提出了要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要求。

这时，日本的渔民和货船船员每年都有几个漂流到堪察加方面的人。沙俄政府热心地帮助了这些漂流民，设立了日本語学校，并使他们当教员，来从事翻译的培养。

拉克斯曼把伊势白子村的船长幸太夫、磯吉们遣送回了日本。幸太夫们是一七八二年(天明二年)与十八个船员一起，搭乘了神昌号船，装载着运往江户去的货物，在航海途中于骏河湾遇到了暴风雨，最后是漂流到了堪察加，他们得到了俄国人的帮助，一行中的新藏和庄藏二人还成了伊尔库茨克日本語学校的教员。他们在一七九一年被带到了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在那里逗留下来。一行之中有的死了，有的归化于俄国，只有幸太夫、磯吉和小市三人随着拉克斯曼回国了。

如果幕府如本文所说的那样，有研究外国情况的要求时，就应该是以幸太夫们的回国为绝好的机会来设立俄语学校和俄国研究所的，但幕府却不如此，将军简直是同看到珍物异宝一样，使幸太夫和磯吉坐于江户城的院内，供人观赏。继之，官吏对他们还如同罪人一样，进行了审讯。后来，他们固然也得到了住房，有了最低

生活的保証，但由于不允許他們任職作事，也不許與人來往，所以說，也正如打進了寬闊的牢房一樣，度完了他們的殘生。

將軍“御覽”了一介漂流民的事件，成了很大的輿論。蘭醫桂川甫周著述了“漂民御覽之記”，同時，幸太夫的申述書也以抄本傳播了出去，使我國國民隱隱約約地也開始知道了俄國。

拉克斯曼敗興而歸。當幕府攆走拉克斯曼時，曾約定將來在長崎重新談判。因此，在十一年以後，這次一個叫作列札諾夫的人，乘着軍艦來到長崎與幕府談判通商問題，但幕府仍然生硬地將其趕走了。

這時，列札諾夫也將仙台領石卷的若宮號船員津太夫等遣送回來。津太夫們是一七九六年漂流到阿留申羣島，後來被救護到伊爾庫茨克，繼而又到了彼得堡（這時，津太夫一行很多人都歸化了俄國）。一八〇三年八月又搭乘了庫爾塞恩斯特魯恩上校指揮的艦隊，由北海出大西洋，南下，繞南美的麥哲倫海峽到太平洋，復北上靠岸檀香山，在堪察加稍作逗留後，一八〇四年九月到達了長崎。

津太夫們是我國國民最初繞世界一周的人。可是他們回國之後，也仍然是被當作犯人處理了。然而，仙台藩的蘭學者大概盤水從津太夫處聽到了詳細的遊記，並且將其與他從蘭學中得到的世界地理的知識相互印證，而寫出了“環海異聞”。這固然也沒有能夠自由出版，但卻以抄本大大地傳播開了。

國際友愛 日本人民就是從這樣的國際友愛的體驗中，懂得了外國人絕不是像幕府、武士和御用學者所談的那樣的夷狄和野蠻人。一八二四年（文政七年），當英國捕鯨船員在常陸的大津灣上岸以期補充燃料和淡水時，水戶的藩士們，就突然逮捕了他們，並將他們押進了牢獄。這時，由於漁夫們想起了在海上受到外國捕

鯨船的照顧，甚至都非難幕府說，外國人對我們都是這樣親切，可是幕府為什麼却將他們視如仇敵，這一點是令人難解的雲云。

國際思想在學者之間也逐漸地擴展了。如前所述的西波樂特的問題就是個明顯的例子。西波樂特的弟子就是在老師被幕府作為犯人驅逐出去以後，對於老師留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兒“稻”，也是倍加照顧的。他的女兒“稻”以後在日本就成了最初的女的近代的婦產科醫生。

幕府驅逐列札諾夫時，既是學者，又是畫家的司馬江漢，曾非難幕府說它不應該將一國的大使停留在長崎半年而竟不許其上岸，最後對他的答复也是極端無禮的，只是將其作為夷狄來處理。他是日本油畫開創人之一。他主張上自天子、將軍，下至士農工商和討飯者全都是人，人全都是平等的。

非難鎖國，提倡開國通商的人也是不在少數的。越後村上出身的浪人學者本多利明（一七四四——一八二一年）就是一個先驅。他認為農民之所以遭受飢餓的痛苦就是因為政治不好的緣故。還說，如果日本永遠去剝削農民的話，那末不久國家就要滅亡。因此，他主張振興工商業、與外國貿易、開墾北海道、增加國家財富和停止剝削農民。這也就反映了在日本，進入資本主義的時期已迫近了。

武士階級一方面鎮壓着這種思想，在表面上侮辱外國，可是在內心却是畏懼外國的。另一方面，就連一種切實可行的對策都沒有能夠提出來。

如本文所說，幕府雖然也命令了閉宮林藏去庫頁島探險，但這只是為了使幕府的官吏自己壟斷這些知識，為迫害人民的自由活動的。因此，對庫頁島和北海道也並沒能作出什麼研究與對策。

英國與荷蘭 本文在這裡曾談到蠻社事件，關於這一問題的

正确的意义前面已谈过了。英国在印度奠定了稳固的势力，于是又大量地向中国输出了鸦片。鸦片是伤身失力的毒品，是一經上瘾就不易去掉的。清朝政府对这有害物的贸易是严加禁止了。但是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还是秘密地在进行贸易的。一八三九年清朝的官吏，就把停泊在广东港外的英国船所装载的鸦片没收并烧毁。借此事件，英国就立即出兵占领了广东，并先后占领了华南沿岸各主要地区。清朝虽然也曾抵抗了，但终于不支，就在一八四二年接受了英国的要求，委曲求和，在南京签订了媾和条约。从此，清朝就割让了香港并开广东等五口与外国自由贸易。这样，只認本国才是“中华”(文明中心国之意)，对西洋人則將其侮辱成为野蛮人的采取了强硬的排外主义的中国，就不但被迫开国，而且，国土的一部分也被外国夺去了。这一战争就是鸦片战争。鄰国的这种命运，也的确使阻撓社会进步的幕府大为慌张了。幕府由于畏惧，就停止了不加考虑就驅走外国船的行动，也許可給予外国船所要求的燃料与淡水，另外一方面，对排外主义和对蘭学的迫害却更加强了。但想把日本由世界史的、大的动向中殘留下来，也是不可能的。

如本文所說，来自荷蘭国王的开国的忠告，于一八四四年(弘化元年)八月就送到了長崎。这里面談到了，从輪船發明之后，在世界各国都互相毗鄰的今天，想鎖国来坚守也是守不住的，还是迅速开国反而对日本是有利的，这话确是并無他意的、亲切的忠告。

对此，幕府隔了將近一年，还不是由將軍而是由老中給出島的商館館長發出了复信。主要意思是說，我国与外国来往时是分成了通信国和通商国的。貴国就是通商国而不是通信国，这是由祖宗的法律所規定的。因此，如答复貴国时就要違犯祖法，这是办不到的。实际上这真是一封糊塗信！

一八五〇年(嘉永三年)荷蘭向幕府提出的世界情報書(荷蘭地理書)中,就說到在美国是有要求与日本通商的輿論的,而且在第二年的地理書中也特別的提到美国政府是希望与日本开始通商。但是,幕府却并沒認識到这一問題的严重。

在第二年,即一八五二年,新任的荷蘭商館館長庫尔秋斯又帶來了荷蘭政府对日本的特別忠告書。其中說美国为了与日本締結通商条約,已作好了派遣大艦队的准备。現在只有日本是离开了世界的行列而鎖国的,由于不知何时就可能会發生战争,所以还是尽早开国为妙,而且,如能在美国艦队到达之前与荷蘭簽訂条約,以此作为今后各种条約的基准,对日本还是有利的等等。

幕府对此,也只是置之不理,甚至这一消息还是被老中及其他少数官吏所秘而不宣的。

因此,在第二年当培理提督终于来到了的时候,也就非常狼狽慌張了。与培理談判的浦賀奉行所官吏之一,甚至痛哭地說,在一年以前就知道培理要来,但却私自保密起来,同时有些事情,到現在还是被上面所秘而不宣。因此,就使談判的人感到非常困难,秘密主义就足以亡国。

培理来到的时候,幕府是沒有单独可以解决培理的要求的信心,因此,就向各大名和幕府的官吏以及整个国民宣佈了可自由提出对付此問題的意見書。这对幕府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决心。这样,幕府的独裁就立即松弛,各大名和藩士也就有了对幕府政治及对日本整个政治的發言的力量了,特别是薩摩、土佐、長州、越前和宇和島等藩更是如此。这些大名們和被他們所操縱的藩士們,为了使自己获得政治地位,首先推动了在傳統上就对幕府不抱好感的、而且有着历史上的权威的天皇的宫廷,利用它的权威使幕府陷入困难。这样,在尊王攘夷和佐幕开港等口号之下,展开了激烈

的政爭。

二 开 港

神奈川条約 美国为什么会要求我們开港呢？

当时，美国的捕鯨船在太平洋上的活动范围是很广闊的，它們常常在海上援救了日本的漂流民，可是，偶尔也有过一些美国人是遭到了海难。一八四六年就有七个美国罹难者在千島的擇捉島上岸了，但立即就被松前藩拘捕起来。第二年松前藩才把他們押送到長崎，并从这里搭荷蘭船遣送到巴达維亞。这些船員回国后，就报告說他們在日本受到了如对囚犯一样的虐待。这件事一經报載，就成了一个人道上的大問題，引起了美国的輿論的譴責。

但同类的事件，在这以后仍然是不断發生的。美国希望在太平洋航綫的日本的开港，还是一八三二年以后的事情。一八四六年海軍少將彼特尔又曾到浦賀来試探日本开港的可能性，在这当中，援救漂流民問題就成了美国在“为了人道”的名义下，向日本进攻的最聳人耳目的借口。然而，其根本原因却不在此，而是由于美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当时，加利福尼亞州的金矿也开采了，美国西部的開發如暴風雨般地在进行着。至于这种開發是如何的“人道”，只要看看現代美国的西部影片就会明白的。土著居民的土地被剝夺了，而且，还無辜地遭到了殘酷的、大量的杀戮——正因如此，所以才使世界的注意力都轉向了太平洋彼岸，旧金山和太平洋沿岸的其他口岸都急遽地繁华起来。而且，随着从这些地方到香港和广东的橫跨太平洋的輪船的增多，使正当此航綫中途的日本的开港，在日本建立美国的据点，对于美国來說是有着特別重要

的意义的。沙俄、英国和法国为使日本开港，也曾作了数次的努力，但直到最后才被美国的培理提督弄成功了。他怀着不达到目的决不休止的决心，率领着四艘军舰，突然闯进了江户湾，提出要求并以战争来威胁幕府，这样，才迫使幕府无可奈何地将口岸作了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并締結了条约，这就是一八五四年在神奈川签订的日美友好条约。

日美通商条约 日美友好条约仅仅是准许美国船靠岸于下田、函馆两口岸，补充船用物料、照顾罹难者和促进两国友好的关系的条约，并没有规定通商与贸易。接踵而来的哈里斯就提出了締結贸易条约的问题。幕府方面对此是激烈反对的，也曾想尽了办法试图达到不签订的目的。但在世界大势的压力下，最后也还是签订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的，不论你认为日本怎样与众不同，也必须适应世界的历史发展的。不论你是哪国国民，终久也都是要被世界史的铁的步伐卷进来的。贤明的国民是不会做无谓的倒行逆施的努力，而是在为着不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而奋斗着。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那末对历史的学习也就成了完全无意义的了。好好学习日本开港的这个段落，对于理解这个道理是最有帮助的。

所谓与外国进行贸易，就等于是封建社会的自杀。正因如此，所以它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前举的有力的大名们都乘此机会来加强自己在幕府政治上的力量，在条约的签字上，则主张一定要得到天皇的敕许。而其所以主张要得到敕许，实质上就是说要取得事实上已开始操縱京都朝议的有力的大名的承认。日本与外国进行贸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但这绝不是说培理与哈里斯就都成了我们文明的恩人，哈里斯与培理一样，也是以战争来威胁幕府，强使昏愆无能的幕府接受他的要求，并締結了使日本变成欧美

資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限制日本主权和压迫日本人民并在十九世纪后半世纪给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条约。

將軍的繼承問題与櫻田事变 除条约的勅許問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由谁来繼任將軍的問題。由于第十三代將軍家定是个体弱的白痴，而且沒有后嗣，因此，及早确定繼承人是很必要的。而可作为候补人的有两个，一个是紀州藩的庆福，另一个就是水戶齋昭之子，一桥家系的庆喜。从血統上来說，庆福是應該繼任下一朝的將軍的，但有力的薩、長、土、宇和島与越前等大名，为了安排适合于自己的要求的將軍，便于插足于幕府政治，因而推举了庆喜。因此，庆喜一派是屬於条约勅許派即大名派，而庆福一派則屬於幕府独裁派。

当时，哈里斯几乎是每天都在催促条约的签字，而幕府却因为已沒有再能拖延的借口，于是，井伊直弼就作了大老，坚决独裁，也沒等条约的勅許就签字了。同时，又發表了由紀州的庆福繼任將軍并命令庆喜派的大名們退休。直弼虽然是激烈反对开港与绝对拥护攘夷的保守派，但这主要是为了要維持幕府的独裁。他鑒于現時除了条约的签字以外，是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維持幕府走独裁的道路的，所以，虽然是条约他也独裁地簽訂了。这个条约問題在本質上并不是尊王心的問題，而是，或者是幕府独裁，或者是大名参政的問題。有的書說直弼在成为大老以前，向幕府提出的意見書中，也主張过应派遣貿易船到比日本进步的荷蘭去。因此，就認為他原来也是个开港論者。情况固然如此，但他的意見只不过是封建鎖国主义的翻版。其用意是企圖先由日本派船往荷蘭，借此防止外国船来日本。因此，他对于各国国民的自由貿易仍然是坚决反对的。

由于直弼的独裁，使原来期望幕府改良的人們也絕望了。一

八六〇年(万延元年)三月三日水戶的藩士們就把直弼暗杀在櫻田門外。

不管暗杀有着多好的目的,能刺死多么反动的政治家,然而它終不是件好事情。它只是在封建时代末期,由于沒有言論、集会和出版的自由,由于不能够以光明正大的說明道理的輿論力量来制止反动力量时才兴起的。在日本,从暗杀井伊开始——如再往上可追溯到古代天皇間的以及对源氏第三代將軍实朝的暗杀——在明治以后,事实上也仍是不断發生暗杀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实行暗杀手段的人們,实际上是仍未脫离以为暗杀了个人就会改变社会的錯誤的封建思想的人。特别是現在,以暗杀或者不是暗杀而是加害于反对派人身的人,不論他有什么理由,他都是侵犯了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的人民的公敌。

暗杀直弼的水戶浪人們絕不是进步的政治家,只不过是些如神附体的保守派,但由此事件却也暴露了不論怎样,幕府的独裁是难以再維持下去了。

开港的影响 开港后,生絲、茶等很多商品皆大量輸出了。但由于国内生产的落后,就引起了物价的暴漲。而为了挽救这一情况,除了增加生产以外,是別無他路可行的,是必須停止自古以来的封建制度的。显然,武士們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人們的生活也就更加穷窘,尤其是武士階級因为沒有参加任何生产,在这种新形势下更是無法泰然处之的。他們把这一切不幸都說成是野蛮人侵害了神国的結果。因此,就越来越滋長了攘夷的情緒。但所有的攘夷論者并非如本文所述是从“推翻”开港的幕府着眼的。推翻幕府一事不会是从簡單的从排外的攘夷思想中产生的。例如,孝明天皇是最保守而又最反动的人,是極端热心于排外主义的,但也从来没有过借推翻幕府来攘夷的想法,只是一小部分人才

把攘夷与倒幕联系起来。如長州的久坂玄瑞是最热心于強調攘夷的，他也与普通的攘夷論者一样，也不是胡乱的以排外主义为目的，而是主張虽然要与外国通商貿易，但不能立即开港通商，因为这样就等于是追隨了幕府。因此，他并不是說攘夷是正确的，而只是認為在幕府独裁之下是不能开港的。

至于一般国民是并没有去搞攘夷排外主义的。开港后，曾在日本数年的駐日英国公使奥尔柯克也清楚地說排外主义只是“插着兩把刀”的“浪人”的运动，而非国民运动。但是，国民对于来自国内或是国外的不法的压迫却是一直在抗爭着的。

开港使以繅絲業为中心的日本产业得到了飞躍的發展。結果，农家就出現了都趋集于养蚕、有的就不再致力于大米的生产的現象。但幕府为了从农民榨取年貢米，一直就在压迫着养蚕業，而在开港后，对于貿易也橫施各种压迫。这样，就更使幕府加强了攘夷的念头。

本文說，由于薩、長、土等西日本的大名与幕府关系疏远，因此，一当幕府衰落，就与三条实美等为了改变政治組織而加紧活动起来。但这只是作表面現象的接触，并不是从历史本質来看的。薩、長、土等大名們只是为了反对幕府独裁，圖謀自己参加幕府政治才希望朝廷与幕府和好，而絕不是希望打倒幕府的。这就是所謂“公武合体論”。正如前面所談到的，使天皇能在政治上取得發言权，实际上就等于抬出了天皇的大名們企圖以尽管低于將軍的，而又比現在較高的地位来参与幕府政治。这样，主要是由上述各藩下層人物所構成的改革派的武士們，打着尊王論的招牌，利用了三条实美等下層的公卿，直接与宫廷联系起来，圖謀树立自己的政权。因此，不論在長州、土佐，或是在薩摩，“尊王”实际上是在倒幕派的下級武士与主張“公武合体”的藩主之間，不断地發生着激烈的內

訂。最后，下級武士們終于掌握了藩政的实权，只是从这时候开始，上述各藩才成了倒幕派的中心力量。

炮轟下关的外国軍艦 以薩、長、土的下級武士为中心的所謂尊王攘夷的志士們，也并不是人民的革命家。他們并不想組織人民并以他們的力量来推翻幕府，而只是煽动人民对于封建制度的不滿，利用人民革命的压力掌握藩政并策动公卿使天皇下令来逼迫幕府的。如前所談到的，农民与市民是屡次掀起了振撼着封建制度的地方起义，但全国的这些力量并沒能联結在一起。趁此空隙，在下級武士当中，头脑清楚的，了解到社会發展方向的人就成了領導者，他們促使各地的人民起义彼此联結起来，企圖借此来推翻幕府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所采取的战术就是号召人們去“攘夷”。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春，正是他們力量开始昂揚的时候，如本文所談及的那樣，对幕府來說是难以做到的攘夷的日期就被决定了。

五月十日这一天，掌握了長州藩政的志士团，突然炮轟了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而在这前一年的八月，薩摩藩主的父亲事实上的藩主島津久光在由江戶到薩摩的归途中，其随行的武士在川崎与横濱之間(現今之横濱市)的生麦，非法地杀死了正在乘馬散步中的英国人。英国公使虽对此提出了立即逮捕犯人和支付賠款的要求，但薩摩始終也沒有答应他的要求。

攘夷就是这样地被实行了，可是这件事原本就是一件無謀乱来的。在下关突然攻击無防备的商船，看起来似乎是胜利了，但是当法国軍艦事先对于襲击有所准备时，却遭到了惨敗。在薩摩，虽然是坚持着不答应英国的要求，但英国艦队稍加攻击，鹿兒島的街巷，馬上就遭受了焚燒与塗炭，而攘夷派也因之恐惧起来(一八六三年七月)。

倒幕派被逐出京都 高倡攘夷的志士們的勢力，由此就衰落了。鑒于此，在京都由幕府任命的京都守护职——为镇压志士們的目的而設置的——松平容保(会津藩主)与薩摩的島津久光商量之后，就將与孝明天皇等联系的、八月間又与長州藩以及其他倒幕派的志士們取得联系的三条实美等七个公卿，一起都逐出了京都。(本文在“征伐長州”項內，称此为元治元年的事是錯誤的。)

这时西乡隆盛也参加了該驅逐計劃。島津久光对于攘夷是非常热心的，甚至在明治以后，都尖銳地指責新政府有夷狄之風而加以反对。但是，他却镇压了攘夷派，这又說明了什么呢？这只是說明了当时真实的爭論之点不是在于攘夷、而是在于打倒幕府与否的問題，是在于有的將攘夷与倒幕联系起来，而有的又沒有將其联系起来的問題，是在于大名和天皇絕不是倒幕派，而又不是王政复古派的問題。事实上如前所述，在此事件之后，孝明天皇給近臣与久光的信中就曾說，在此以前的詔勅，因为并不足以表示朕之真意，所以一切無效，又說：只有从此以后的詔勅才是朕之真意。他还說，他也不願意王政复古，而且，对于驅逐松平容保等長州藩士一事，还深深地加以褒獎了。

民族独立的保衛者 翌年，一八六四年八月(旧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艦队，以报复長州藩的不法为借口，进攻了下关，一击之下，即行摧毀了海岸的長州藩炮台，陆战队也很快地就佔領了下关附近一帶。長州方面，从前一年仅仅被一艘法国軍艦就弄得焦头爛額以来，就明白了攘夷是十分糊塗的。因此，就企圖以保証自由通过下关海峡为条件，不与四国艦队交战来求得妥协。但是，四国艦队，因企圖借此机会由日本撈得鉅大的賠款，并在扩大貿易的美名下，由日本夺取新的特权，却强行了战争。長州慘敗之后，慘然地就向四国艦队投降了。此后，相反地与外国特别是与英国却更

亲近了。薩摩因为在鹿兒島失敗以后,也同样地与英国亲近起来。在这次战敗之后,幕府被四国勒索了三百万美元的巨額賠款,此外还簽訂了对一般貨物的进口税要值百抽五的条約。

在这以后,日本仍能保全了它的独立,这是靠着什么力量呢?

首先,这就是靠着人民革命的力量。四国联合艦队本来是能够一直进攻到山口的,但它們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就是畏惧军队深入陆地时,就不但要以攘夷的武士为敌,而且,也要与一般的人民为敌,也要遇到人民的頑强的游击式的抵抗。当时,在日本和整个远东,有着领导地位的英国公使奥尔柯克,在其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著述“大君的首都,泊居日本三年記”中就清楚地写道:

“在日本国,新的民众的革命势力是很强盛的。旧封建制度現在正急速地被破坏着。如此下去,很可能是要陷入長期的革命內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英国來說,不論如何是不能援助叛乱者这一方面,而是要帮助現存的政权的。但由此而受到人民深刻的敌意則非所望。以現在西欧的軍事力量来击潰高倡攘夷的日本人容易的。但这样,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东方人特有的坚强的敌意而已。这样結果,也就不能使日本長期地处于不穩的状态,不能使其社会衰落,因之,也就不能使日本成为英国商品的最好的主顧,相反地却更会引起革命的势力的。因此,对于这一灭亡途上的封建日本是不能够原封不动地加以維持,而对日本的政策也必須十分慎重。对日本銷售鴉片或是以武力佔領日本来削弱日本,对于英国是絕對沒有利益的。因此,就必須不是以人民的革命自下而上地一举推翻封建制度,而是以自上而下地逐漸滲透的改革来謀求日本的近代化”。

由此,就可以明了阻擋了英国等奴役日本的思想的基本力量不是武士的攘夷狂热,而是民众的革命势力的萌芽。

当奥尔柯克在写此书的稍前一个时期，在一八六一年，对馬島頗有要為沙俄軍艦所佔領的趨勢。就是在这時候，幕府的官吏也沒有做任何認真的努力來保衛日本的重要的領土。原因是由於幕府從對馬島沒征收到一粒年貢米。因此，就認為對馬島不是幕府的領土，而是對馬藩的領土。甚至更令人吃驚的就是對馬藩主也沒有想認真地保衛自己的領土。相反地，他却認為與其保衛對馬，倒不如由幕府領取九州本島的適當的領地為合算。攘夷派的武士們，固然在口頭上咒罵對馬藩的官吏昏庸，但置生死於度外奔向對馬來保衛這個地方的人，就是一個人都沒有。

也就是說，武士階級不論是何層、何派，全是沒有真正的愛國心的。他們只是認真地斤斤計較於自己的領土和自己的地位的。在這次事件當中，真正的保衛了對馬島使其不被外國所佔領，舍死忘生而戰鬥的只是對馬的農民們和漁夫們。（詳情請參看“歷史學研究”一九四九年一月號井上清的“兩種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一文。）

像這樣的人民的愛國心，也就是要推翻國內封建統治者的革命心，只有它是保衛日本獨立的根本的力量。

第二，是因為有了國際的力量。奧爾柯克非常畏懼日本人民的革命力量轉向外國人也是有理由的。這是因為使他想起了，在他未來日本之前，在中國作駐廣東和上海的領事時感到的英國通過鴉片戰爭以暴力向中國侵略的結果，就使中國的革命的人民羣眾將“東方人特有的堅強的敵意”轉向了英國人，並堅決地要求着民族的完全獨立的這一种沉重的壓力。特別是從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五年十五年間的長時期的中國民眾的一大革命鬥爭——太平天國——的力量，就給了奧爾柯克以強烈的印象。因此，他恐怕在日本也會引起同樣的事情，所以他才反對硬將日本置於英國統

治之下，他是反对向日本銷售鴉片的，这在他的上述的著述中也曾提到了的。

甚至該时代的日本人如久坂玄瑞等，也認為英法之所以对日本恣意地使用武力也是托庇于太平天国。

在使日本幸免于被奴役的国际事务当中，英、法、沙俄等国侵入日本的力量均的均衡，在哪一国才能获得日本的領土和特权的問題上彼此牽制，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例如前述的对馬島之所以未被沙俄佔領，一般都認為这是因为英国反对沙俄所致。固然其中也有这样的因素，但到英国軍艦开至对馬与沙俄談判为止已經經過了六个多月了。在这六个月当中也正是由于对馬人民的坚强的抵抗，才使英国与沙俄势力均衡这一偶然的因素对日本起了有利的作用。如果没有人民的抵抗，即使英俄兩國势力均衡，那末兩國妥協而由各国来共管对馬事，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当时法国代表就曾抱有这种計劃的。

各国的力量是处于均衡状态，話虽如此，但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法国就对幕府派送了軍事教官团，在該团的领导下，还編成了以农民和市民为对象的近代化的步兵队。此外，对幕府的軍队也大規模地施行了近代化，在橫須賀設立了大海軍工厂，聘請了法国工程师和工匠来从事軍艦和兵器的修理与制造。在政治上，法国公使对幕府的指导也是無微不至的，对于后来成为明治政府自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三年所作的雛型的近代化的改革，也作了各种嘗試。法国就是这样地企圖从政治上和軍事上来加强幕府并用它的力量来压制反对派的大名，来統一全国的。幕府的官吏和最后的將軍庆喜，一八六七年，在其灭亡之前还曾拚命地活动，企圖將北海道的利权給予法国，以便从法国获得鉅額借款。假如这件事成功了，那末日本恐已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但粉碎了庆喜們这件卖国

計劃的，并不是与法国相对抗的英国的力量，而是使庆喜們沒有充裕的时间去作成功的推翻了幕府制本身的倒幕派的力量，在他們的背后或是他們的立足基础上，則不外是存在着革命的人民羣众。

由以上情况看，保衛民族独立的是日本和国际上的民众的力量，这一点已經是很明显的了。在这里也表现了世界历史的大的作用。

正如幕府依靠了法国一样，高倡攘夷的薩摩和長州的倒幕派，自一八六四年以后，也进一步地勾結了英国并接受了它的指导与援助。英国是以前面所詳述过的理由，企圖在日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没有起来以前，就自上而下地来改革封建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与討幕派勾結起来。英国是想將日本作为远东的大英帝国的前哨基地。它口口声声說除了發展和平的貿易以外，別無要求，可是他們不但对日本挑战（前述的四国联合艦队远征長州就是根据英国公使的主張），像是免稅一样的降低了日本的关税，而且，还叫幕府在橫濱建立陆海軍兵营、彈藥庫、演習場和軍医院，此外，它还常駐了兩個大队的陆軍。也就是說，这就把日本的首都江戶和最重要的港口也均置于英国的軍事压力之下。

征討長州 在这一項，本文在一开头的地方就錯了。最初的一段の錯誤，在前一項已經指出来了。被逐出京都的長州藩士們在翌年当下关被四国联合艦队攻击稍前的七月，就企圖率大軍至京都驅逐松平容保們，迫使天皇采納自己的意見。本文中說，由于“正想打进京都”，所以才与薩摩和会津的軍队即天皇方面的軍队發生了战斗，可是事实上他們却不是“正想打进”，而是闖进了市內，进攻了皇宮，但在蛤門与会津藩兵激战之后却遭到了慘敗。也就是說，勤王志士們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炮轟天皇脚下也是滿不在意的。当时十四岁的睦仁亲王（明治天皇）就曾为炮声所惊而昏

厥过。对于这一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文为什么要說謊，也是令人难解的。在中等学校的“日本历史”中，也同样的在散佈着这种謊言。

由于这一事件，幕府就得到了好的借口，得到了孝明天皇的勅命，終于决定去征討長州了。但由長州藩立即处分了打进京都的主使者的家老，幕府也就因之而終止了对長州的征討。

長州藩，在此以前于一八六三年的炮轟外国船之后，高杉晋作就已經知道了为挽救本藩，使用旧的藩的軍隊是不行了，于是也由藩內的工、农、商、平民中召募了自由的志願兵，創立了奇兵队及其他新的軍隊。在这年年末，他們見藩內的上層分子屈从于幕府而大憤，于是就以此新軍掀起了內乱。翌年，即一八六五年（庆应元年）春，就夺取了藩政的实权，在藩內的鑄錢司村的开業医出身的大村益次郎的领导下，改革了軍制，藩內一致进行着为抵抗討伐軍的准备。幕府鑒于此种情况，在四月又再度發出了征討長州的命令。

長州藩是鎮靜地与其相抵抗了。至此，該藩就成了倒幕派的中心。在这一点上，一般人民也都在支持着長州的。薩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也看出幕府已瀕于灭亡，因此，薩摩藩对幕府的征討長州即表示了中立。其他有力的大名們也都中立或是在事实上沒有响应出兵的命令。

沒有輿論支持的陈腐的幕府軍，也就不得不单独地以將軍的一族和世襲的大名們的軍隊来編成長州討伐軍，可是即使这样，也不是輕而易舉的。

到了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时，幕府就更是进退兩难。在这一年从春到夏，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都爆發了猛烈的搗毀和暴动。即使在幕府脚下的江戶和从当时將軍所在的大阪到神戶，都爆發了大的搗毀运动。市民都非难幕府說一切的生活困难都是由于幕

府政治不良所致。随着这一捣毁运动的浪潮，农民暴动在全国也猛烈地起来了。在这次暴动中，有不少是由于农民反对幕府抽农民去当兵，去当长州讨伐军的军伕，或是由于随意征收军粮等等而引起的。鉴于这种情况，在大阪的大名和幕府的官员们，就顾虑如果将力量放在征讨长州上面，那末，武士阶级的统治也就会从根本上被推翻，因此，他们就改变了主意想尽早地把军队撤回。

当暴动和捣毁运动的大浪潮尚未平息的六月初，幕府军与长州军终于开始了激烈的战斗。但从四面包围了长州藩并攻进去的幕府军却到处都是连战连败。这个原因是幕府军在这时，并不是只与长州的武士阶级为敌，而且也与从农民到市民、从男到女的整个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的保守的武士军，也是不可能抵擋住武士和平民联合的进步的势力的。

正当这时，将军逝世了。接着发出了征讨长州勅命的孝明天皇也死了。借此机会，幕府也将征讨军解散了。

早在这一年的一月初，由于土佐的乡士，原来只不过是出生于普通的酒店之家的坂本龙马的介绍，萨摩与长州对于讨幕问题缔结了同盟，这时他们就利用了民众革命的高涨，由防御转向了进攻，统一全国的反幕派，筹划着推翻幕府的计划。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又联络了在此以前是主张公武合一的公卿岩仓具视，并从英国公使馆的翻译官佐藤和公使巴库斯方面得到了关于讨幕后的政体的教导和很多的援助。

幕府的灭亡 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鉴于讨幕派计划的节节前进，前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和其左右手的后藤象二郎们，先发制人地企图使将军将现在所持有的统治权，在名义上缴还给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设大名会议，以将军充任主席的形式来掌握实权，他们将此建议献给将军庆喜，最后，在这一年十月就形成了所谓“大正奉

还”。其所以說“奉还”是因为自一八六二年前后，將軍就是以政权是由天皇的委任为理由来对抗反对派的，因此，在这里也就叫作“奉还”了。但事实上就是退讓。本文中沒有提及“奉还”的問題，这是好的。但为了給讀者提供參考起見，我还是提到了一下。情况虽然如此，但并不能說幕府这样就灭亡了。將軍仍然是將軍，不論是对外或是对內，他仍然是日本的統治者。固然說政权已經退讓出来，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接受退讓的朝廷方面，是沒有任何政治組織的。本文在这里又說幕府已經灭亡了。这是錯誤的。

（追記）这一章与次章第一节新政的时代，在我們的历史上，对于現代的人是富有教訓的时代。風波也多，故事性質的趣味也很濃厚，因此我想应尽量地在这里作一番詳細的講解。至于詳細的史实，請參閱我的“日本現代史”第一卷“明治維新”。

第十 明治維新

一 新政的成立

夺取权力 由于本文說幕府在十月就灭亡了，因之，对于十二月九日推翻幕府問題的說明也就困难了，正因如此，所以在开始的一段当中，几乎全是罗列了一些沒有意义的字句。

当庆喜在形式上讓出了政权以后，江戸幕府的老中以下的官吏和旗本，对此是激烈反对的，他們企圖以武力將幕府的政权維持到底，因此，也就不斷地派兵西下。大阪和京都方面的幕府官吏們也同樣，就是紀州及其他的將軍的支系和世襲的大名們也都認為虽然暂时是放棄了政权，但事实上的政权还要通过某种形式再回到幕府方面来的。山内丰信們則提出了公議政体論，主張朝廷应迅速地設立大名會議（上院）和藩士會議（下院），努力地企圖借此使庆喜掌握实权。在这样的宗旨之下，朝廷也确定了要保存封建制度的态度，于是就命令了各大名到京都集議，企圖通过这次會議来决定新政府的形式。虽然說是朝廷，其实天皇还只是个兒童（十四岁）。而且，到現在为止，一点也未受到政治上的訓練，什么也不懂，主要的朝廷官員还都是被公武合体派的大名所操縱的。

西乡、大久保和木戶們，由于被庆喜先所發制，失去了推翻幕府的借口，一时的处境是很困窘的，但即使如此，也仍然是企圖通过暴力革命以实力来討伐幕府的。与庆喜讓出政权并向朝廷提出的同一天，朝廷方面即向薩、長二藩頒下了討幕的密勅，这一密勅，不可能是孝明天皇在世时拟出的，另一方面，幼小的天皇也沒有統御朝臣的力量，所以它只是大久保利通們令公卿嵯峨实爱捏造的，名义上是“勅”，其实天皇本人是概不知情的。他們为使薩、長、艺州等藩的兵力以及土佐藩內的板垣退助們的討幕派的兵力能够随时集結到京都和大阪而进行着周密的准备。

大久保一面对岩倉和嵯峨实爱 們教授着手槍的用法，一面又鼓勵他們不要畏惧幕府，要坚决地以武力来夺取政权 并筹划着計劃。

另一方面，他們对于人民的动向，也付出了極为細心的注意。一八六七年八月下旬，在名古屋地方出現了皇大神宮神符从天而降的謠傳，在各地也有了同样的情况，大政奉还后的十月末，在京都，天照大神和八幡大菩薩的神符，也突然不知从何而来地从天上降落下来了。傳說这东西降临到哪一家，哪一家就要有什么喜事，于是家家都設置了神龕供着所拾到的神符，擺設酒肴，同时，任何街坊亲友都可拥至这家去吃酒，并醉薰薰地唱起了符的最末尾的一句“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不好呢？”的歌子来狂舞。不久男、女还乱舞到街头上来了，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的，成羣結队地喧嚷着“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不好呢？陈腐的东西用紙貼上吧，撕破了再給它貼上，又有什么不好呢？”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腔調，不分晝夜地在狂舞着。这样的情形很快地就蔓延到了关西、四国、东海道各地，一直到江戶，甚至在信州和伊势等地也都出現了。从十月到翌年正月，在这一像旋風般的羣众的混乱的情况当中，

推翻幕府的計劃就拟定并实行了。这是倒幕派所作的活动，据说这是長州品川弥次郎的策划。

借此，第一，大久保和岩倉們的往来就不会被幕府的偵探所注意而得以保守計劃的秘密。第二，最重要的是借此就麻痺了幕府的行政力量，使民众不再畏惧幕府的权威。我以前认为“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是倒幕派怕民众革命的成長，才以此种方式把这种革命的成長引入混乱的——这是很多学者普遍的说法——后来因为認識到这是錯誤的，所以在这一版作了如上述的修正。至于詳情还請參照拙著“明治維新”第五章，第二节。

这样，万事俱备之后，在旧历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即陽历的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由于平素的准备，討幕派的兵严守了皇宮各門，就不仅宣佈了王政复古的宣言、罢免了德川氏的征夷大將軍并沒收其領地，而且还廢止了旧攝政、关白制度及其他所有的宮廷旧制，新設了總裁、議定和参与三职組成了新政府。

總裁是由皇族，議定是由公卿和大名充任，而参与則是由各藩士充任的，但实权却是掌握在参与手中。在王政复古的宣言中，就有一項是登用人材和广开言路，这一点也正說明該宣言不外就是勤王志士們掌握了实权的宣言而已。

本文从这里就轉到了五条誓文，但認真說来，在这之后最好是談江戸城的投降。但現在就姑且按照本文的順序来加以說明。

五条御誓文* 作为新政府的方針而發表的所謂五条誓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天皇的詔書中也被引用了，“国史”的結論又

* 五条誓文为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明治天皇向日本国民所宣示的治國大綱。共分五条：一是广兴會議决万机于公論；二是应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是应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四是应打破从来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是应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譯者

是以引用这一詔書来結尾的。看来似乎这五条誓文就是近代日本的原理,也是未来日本的原理。但实际上,五条誓文不外是維新政府背叛了对封建制度的人民革命的宣言。

在王政复古之初,关于新政方針方面,越前的由利公正曾召开过各大名的會議,提議天皇与大名們約定下列五項:

- 一、遂庶民之志,以求人心之不倦。
- 二、要士民一心盛行經綸。
- 三、求知識于世界以广振皇基。
- 四、以貢士期限讓賢才。
- 五、决万机于公論而勿私論。

但参与福岡藤次对此則加以修正并改变了其順序。即:

- 一、广兴列侯會議,决万机于公論。
- 二、应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求人心之不倦。
- 三、应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 四、应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
- 五、应以徵士期限讓賢才。

这又經過了總裁局顧問木戶孝允之手而改成了现在的五条这样。借口說天皇和諸侯的会盟忌諱民主方式,所以在通过的形式方面也是采取了由天皇率羣臣百官向天地之神宣誓的反民主的神秘方式。

在誓文內容方面,最后的定案与上述第二草案相比較时,那末,第一个是最民主的,其余,是一个比一个反动的。这点是很明显的。如果使兒童能对此三种誓文作一比較和討論时,那末不但会使他們了解五条誓文的本質,而且也能教会他們对历史学的文献的批判方法。第一案最先是标榜了“遂庶民之志”,并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了“以貢士期限讓賢才”,和“决万机于公論”之条,因

此，这一公論是包括了广泛的国民輿論在內的。但最后定案，却没有貢士(估計是由各藩中选派到中央政治顧問會議的优秀人才)之条，而是將第一条的“遂庶民之志”改成五条誓文中第三条的“官武一途以至庶民”，也就是說，最后定案是強調了官(即政府)和武(即各大名)，而將庶民則拋至一旁了。五条誓文开头所說的广兴會議，也只是將第二案的“兴列侯會議”抽象化了的東西。从整个五条的精神来看，也只是強調了大名和官吏的官武一途而已。这就是說，开始时由于剛剛將旧政府推翻，对革新的要求还是很强的，同时也由于政府的基础还没有十分稳定等原因，才出現了相当民主的由利的草案。然而，随着政府地位的逐漸巩固，这一方針也就逐漸地反动起来了。

在天皇对此五条不是向人民而是向神宣誓的同一天，对人民則提出了“五榜(五塊告示牌)的揭示”：

第一、(一)应正五倫之道，(二)应憐憫鰥寡孤独和殘廢，(三)勿为杀人放火盜財之事。

第二、勿树党强訴或相率离开田里。

第三、从旧規，严禁左道旁門切支丹。

以上的三榜是作为永远的定法(其余二榜是临时的)，这与幕府所出的佈告是毫無兩样的，只不过文章方面更难懂了而已。农民仍然作为农奴被束縛在土地上，禁止他們团結，剝夺其信仰自由，强制推行称作五倫的儒教的封建道德。这就是新政府对人民的政治原則。

如果將五条誓文与这五榜作一对比时，那末它的反动的意义是会更明显的。

公議輿論 五条誓文將原来的公論的意义，虽然是作了反动的歪曲，但也不得不采用这一点，从此，即看出民意輿論对政治的

要求是很强的。在农民暴动等民众斗争方面和民众生活之中，真正的公议舆论的民主主义已经萌芽了，这一问题前面已谈过。正因如此，所以当它与有关外国民主政治的知识结合起来以后，在幕府末期就出现了立宪政治思想的萌芽，而其代表者就是坂本龙马。就是制订了五条新方针草案，并在草案中将庶民放在第一位的由利公正，也受到了坂本的强烈的影响。影响由利的除了坂本以外，还有横井小楠。小楠虽是熊本藩的下级武士出身的学者，但多年来是作越前藩顾问的。保守派认为他是崇拜共和主义思想的，因此，在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就把他暗杀了。

在坂本的胸中撒下了最初的立宪思想的种子的是谁呢？这就是土佐的渔夫之子，漂流民万次郎。

万次郎是土佐幡多郡中浜村人，当一八四一年（天保十二年）正月正当他十五岁时，就随着四个成年人的渔夫出海打鲣鱼而遇难，后漂流到鸟岛，在那里为美国捕鲸船“霍兰德”号所救。船长霍特菲尔特爱万次郎的良好品质和才能，把他带回了他的故乡，使他受了普通美国市民子弟的教育，也使他学习了为航海所必要的各种学问。

其后，万次郎数年间随着美国的捕鲸船，走遍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到南冰洋的全世界的海洋，在这期间当选举船长的时侯，他也曾经当选过，在这过程中也使他积累了没有人种差别而选举的民主的体验。但他也没有忘怀故乡，他在加利福尼亚金矿劳动，积贮了钱，抱着自我奋斗、民主主义的精神与新的技术，正如给其恩人的信中所谈的，抱着要将祖国导向开国并为其带来新的文明的意愿，一八五一年就回国了。他没有被美国政府护送，而是携着以自费制造的舢舨，搭乘了从檀香山到上海的船，在琉球湾乘上了这一舢舨——他给这舢舨命名为“冒险号”，实际上他从外国回到日本

来也是冒生命危险的——从琉球上岸，在这里又被作为犯人，在薩摩和長崎坐了一年多的牢房，经过审讯之后，好不容易地才回国了。

万次郎的回国曾轰动一时并成了土佐上下舆论的焦点。当时在高知市，有一个叫作河田小龙的进步画家，他访问了万次郎，并听取了他的经验谈，才开始知道欧美文明的优越的原因，也知道了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和四民平等的问题。这时，坂本龙马虽然未与万次郎直接谈过话，但从河田小龙方面却也听到了万次郎的话和欧美文明以及海外交通的必要等，这就深深地冲击了青年的头脑。龙马之家原本是酒店，不过是在其祖父一代时买到了乡士这一在武士与平民之间的身份，但他是很了解民主共和政治的。小龙的弟子有的还是焊铁铺和点心铺的儿子，他们后来与龙马一起创立了海援队这一贸易航海团体。龙马的立宪思想之形成固然是由于在海援队时代在長崎与西洋人来往的结果，但如果再追溯上去的话，则是由于受了一介渔夫之子的刺激所致。

万次郎，此后在培理来到时，就为幕府所起用，给老中和作外国事务的奉行们讲解了美国情况，并力说了开港的必要。据说他一生也没抛开过华盛顿的传记。

不论如何热心地跑外国，但上级的武士是不懂得近代民主精神的。甚至，幕府派往美国的使节村垣淡路守等见大总统于市内行走时不带随从，而且，也穿着与平民一样的服装，还认为这是夷狄，是不懂礼节的。真正理解近代文明的是平民们，就是在武士中间也仅仅是下层分子而已。

为民主主义所不能缺少的报纸，在日本是以姬路的船夫彦藏这一漂流者，后为美国人所救而回国的人，于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在横浜以“海外新闻”为题，每月发行三、四次为滥觞的。彦藏

亦称約瑟夫·彦。

立宪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就是这样地从民間产生,并在未充分成長之前,就为天皇制新政府所利用、所歪曲而成了五条誓文。

东京之都 新政府是企圖奠定自己的新首都,来刷新人心的。如本文所說,就出現了迁至大阪和仍留在京都的各式各样的提案,結果,还是定在东京了。其原因为:第一,新政府以武力征服了关东一帶,但还必须維持此后的治安。第二,新政府虽然推翻了幕府,但并未推翻各藩。同时,新政府的物質基础也是在以关东地方为主的前幕府領地,于是就决定了叫天皇暂时来到江戶,最后,这里就变成了首都。

新政府之所以建成單一皇系的制度,就是为了要加重天皇的权威的。年号也是东方的專制統治者的权威的象征。自大化以来,日本虽然也有了年号,但在江戶时代,在实际生活当中,却几乎是沒有用年号的,幕府的法令的日期,普通也都是用十干、十二支。当年号被認為是冲犯了天皇或是被認為不吉利,相反到有凶象时,就立即被改变了。例如明和九年,一七七二年(明和大飢荒的第二年)就被說成是不吉利的年,而改成安永(安康而永久)元年等等。由于年号不断的改变,就給人一种印象,似乎統治者的权威并不是不动的。因此,到了明治就規定了一代天皇就只用一个年号。从此以后,在署日期的时候,一切都用了年号,在我們不知不覺中,連写一封信都写上了天皇統制的年份,使日常生活也都与天皇联系起来。由于新的日本就不能不是国际上的日本,天皇也不过是一个象征,主权是在国民的,因此,就应该廢去年号,沿用国际上的紀元。

江戶城的投降和暴力革命 西乡和大久保認為不論如何也是必須以武力来击潰幕府势力的。現在一提到暴力就很被人們所嫌惡。的确,不論如何是必須將暴力与战争从日本清除出去的。佟

管籠統的說是暴力，但其中也有不同，有的就是建立新時代的民主的暴力，例如，美國人反抗英國暴政並為獨立戰爭而戰鬥的暴力，就是進步的民主的暴力。以此為首，從更古的英國共和革命以來，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近代民主主義事實上都必然是作為暴力革命的結果而產生的。為了推翻暴力統治，就不能不用革命的暴力。西鄉們對慶喜溫馴地讓出了政權是不能加以信任的（事實上也是不能信任的），他認為，如不發動徹底的暴力革命，那末，新政府的基础也是不會穩固的。於是不論在江戶或者是在京都、大阪，都頻頻地向幕府的軍隊挑釁，尋覓戰爭的借口。這西鄉的暴力是進步的抑系反動的問題在教室內討論一番恐怕是很有趣的。

幕府方面也不甘心於政權被人所奪，於是也在作着各種的戰爭準備。慶喜對此忽而鼓勵忽而中止，搖搖擺擺也無一定的方針，最後是決定要率兵開進京都，可是在大阪與京都之間的烏羽和伏見與以薩、長、土三藩的兵力為主的天皇方面展開了戰鬥，結果失敗了。他立即放棄了部下便從大阪逃回到江戶。

新政府軍立即發出了征討慶喜的宣言，宣稱幕府久操政權，民不聊生，現在就要替天行道。征討各軍在各處都出了佈告，號召為幕府苛政所苦者，不要有顧慮，要出來控訴，並約定斟酌情況可以全免或半減原來的年貢。實際上從一月到三月，相當於去年收獲的年貢已經征收過去了，新年貢還是十個月以後的事情。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許下這樣的諾言。另外一方面，他們對於甚至不知有天皇的人民，却大肆宣傳說“在這個日本國是有天子的，他就是日本的主人”。

討幕軍中，以長州的奇兵隊為首，大半的藩兵內都有很多是革命的農民和市民出身的兵士。他們對推翻舊專制制度是歡欣雀躍的。一般的人民也由於相信了討幕派是要施行新的自由政治，實

行真正消除人民的重担和痛苦的政治，所以也支持了他们。当鸟羽、伏见一战，新政府军胜利之后，大米的行市甚至都一齐下跌了。这也是因为商人和市民鉴于新政府军的胜利而安心了的表现。当庆喜在大阪时，京都若是有了自杀者，甚至，也都把它说成是幕府政治恶劣的结果。就是在江户市内，从一八六七年市民对幕府的非难和怨恨也都公然诉之于口。人民就是从对幕府或封建专制的怨恨出发，才支持了讨幕军。因此，幕府军也就失掉了在江户抵抗的信心，在闰四月就打开江户城而投降了。庆喜在先前逃到江户时，也没有安撫与整顿部下，而只是圖他个人的僥倖，躲在寛永寺騷扰新政府的。

尽管江户已归于新政府之手，但旧幕府的军人和以会津与庄内二藩为主的奥羽和越后的各大名却联合起来与新政府军相抵抗了。幕府的海军佔領了函馆，在该地建立了蝦夷島共和国，在全军的选举下，榎本武扬就任了总裁（大总统）与中央政府抗战。北海道的共和政府，最初，是被外国作为“事实上”的政府，而确认了它的交战权的。

但结果，一八六八年旧历九月会津被攻佔，东北一带也都立即投降新政府，翌年六月，函馆的共和政府也投降了。其所以如此，实际上，就是由于人民到处都反抗了统治自己的人，援助了新政府军所致。民众对本藩军队的游击战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其中有名的是六月间，越后新发田的农民，在新津驛，大举攔阻了藩主一行去参加奥羽越同盟军，从那时以来就阻碍了奥羽和北越的联系。八月间，仙台藩从伊达、信夫二郡农民中召募佣兵之时，还应允说对有功的人可以给予“士”的名分，但农民却并未响应，相反地一千多的农民，都各自武装起来，击退了正在中途的去援救福岛的仙台兵。函馆的榎本军们，固然是以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共和政

府，但因也不是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府，所以市民們对此也是不信任的。因此，当新政府軍来討伐的时候，一个市民（青年鐵匠）于夜間就潛入擾本軍的炮台并毀坏了大炮。

在这种庇助之下，新政府軍 就比較容易地胜利了。会津攻击軍的參謀長，事实上的司令官板垣退助，鑒于会津的人民不但不帮助藩主之难，相反地，却帮助敌人，就开始認識到如果不是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那末，国家也是沒有保障的，这一問題是他后来常对人提起的，而在自由党史的序文中也是这样写的。实际上，在这次战争后，板垣就回到了土佐执掌了藩政，从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就开創了四民平等的制度。

維新政治 人民認為新政府是要实行廉潔政治，所以才支持它的，可是当新政府平定了反对派以后，一点也沒有实行其开始时的諾言，到了要繳納年貢的时候，尽管由于战乱，田园荒蕪，收获減少，但也並沒有設法去減少年貢。甚至还發生过这样的事件即曾为战争和水災所惱的，越後的旧幕府領知事的前原一誠，因憑自己的意見減少了年貢，就立即被免职了。

長崎浦上地方的基督教徒 正認為幕府被推翻了，自由的新时代就要来到而欢欣鼓舞时，由于木戶孝允們的指令，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六九年就逮捕了三千四百余人的主要教徒，將他們分別地押进了十八个藩的牢獄。政府对教徒橫加各种拷問，甚至六年多都沒有釋放他們。同时，由于拷問和营养不良，約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徒即六百六十人都死在獄中了。

廢藩置县 被出賣了的人民，从明治二年又掀起了大暴动，来要求維新的徹底实现。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当越後地方的人民暴动时的民謠就說“大众干吧，不要再受騙了，朝廷說的全是假，說的是天官賜福，做的是男盜女娼”。这样，一方面民众的自下而上

的力量起来了，另外一方面，頑固的、保守的、和反动的武士們却反对新政府与外国来往，反对吸收外国文明。早在一八六九年正月就暗杀了参与横井小楠，同年九月，作为軍务官副知事掌握了軍事实权的大村益次郎，也被說成对任何事情都要用欧美式而被击伤以至于死。翌年，圍繞着長州奇兵队的解散，旧奇兵队士与反动士族就掀起了暴动，他們与农民暴动在反对政府这一点上結合了起来，發展成了从山口县到北九州一帶的大騷动。此外，也还暗中进行了各种顛复政府的活动。

这样，政府成了各个社会階層的怨恨之的，也就不断地在动摇了。因此，政府方面为了加强自己，固然要建立大的軍隊，但为了做到这一步，对于封建的各藩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殘留下来。而是企圖对民众讓步，采用“自上而下的逐漸的”改革，来撤除封建制，来加强中央政府的。

其第一阶段就是一八六九年六月的“版籍奉还”。它剝夺了大名和武士領有和統治土地与人民的权利，將旧藩主改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藩知事，并且作为知事的俸祿，只給予了相当过去的領地額度的十分之一（藩主个人的实际收入，以前也是这个程度的）。一般的武士，也分成了士族与卒的兩種身份，他們的俸祿額也大为減少了。

但是藩知事一职，仍是由旧藩主世襲的，各藩实际上与以前無甚区别，仍是半独立的姿态。其后，一八七一年七月，政府毅然廢止了藩而改其名为县，免去了所有的旧藩知事，將他們調离藩地使其居住于东京，这一次才名副其实地任命了只不过是中央政府的官員的县知事。由此，大名和武士对人民的統治就从根本上被推翻了。天皇及其政府也就直接地統治了日本国内的每一角落。

王政复古之后，天皇政府在实質上，就是幕府的原封不动的繼

續。通过版籍奉还,在名义上和形式上,都使天皇及其政府成了日本整个国土的領有者和統治者了,經過廢藩置县后,在实际上也作到了这一步。天皇成了絕对的無限制的專制权力者。官吏和軍人都要由天皇任命,而且是只对天皇負責,对于人民则是作为天皇的代表,实行了專制政治。对此,当时的人就称其为“有司(官僚)政府”。在这里形成的新国家,在世界史上是与法国大革命的路易王朝的性質是相同的,我們称它为“絕对主义国家”。

即使在新的天皇制的国家,日本人民也仍是沒有政治上的自由和权利的。但是,將日本全国零碎地分成了二百六十多塊的藩的組織却全部被撤除了,日本人由此才开始具有了作为一介日本国民而結合起来的条件。

本文中說版籍奉还只是批准了薩、長、土、肥四大名的請求而已,但这是形式上的問題,实际上則是在政府強制下,使其提出了請求的。当廢藩置县之际,就是通过旧藩知事請求的形式也都沒能够采用。因为藩主們对此是堅決反对的。尽管如此,旧大名們也畢竟是無法以实力来保衛自己的地位了。藩政的实权,已經不是握在旧大名及其周圍的高級家系的藩士的手中,而是在下層分子的手中了。并且,在这掌权者們中間,不論是木戶、大久保或是板垣,他們都是中央政府的当权者,他們本身也是有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員或地方的高級官員的希望,因此,殘留下“藩”这一形式,对于这些藩的掌权者來說,已經是有可無的。但大名本身却是做不到这一点,其所以如此,只不过是因為他們丧失了力量,对于反抗也断了念头所致。然而,像島津久光那樣的有力的大名,却仍是不死心的,即使在廢藩以后,甚至,还堅持不論怎样自己还是要作鹿兒島的县知事的。

俸祿的处理及私有财产的否定 廢藩置县之后,旧大名(与旧

公卿統称之为华族)与士族,比以前是減少了一些,但仍旧是由中央政府領取俸祿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封建特权的最基础的东西还是殘留下来了。但对于政府來說,在新国家需用各种費用——特别是对官吏和軍隊的費用——的情况下,是不能永远供养着飽食終日的华族和士族的。这是因为既無那样富裕的財政,而且对人民也無法再压榨出更多的东西了。因此,自一八七三年以后,就逐漸的以公債券替換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祿。这工作最初仅是对自願者才以公債替換俸祿的,但由于自願者很少,所以在一八六六年,当政府的新軍已經十分强大,不怕华族与士族造反的时候,就强制地廢止了所有今后每年給予华族、士族的俸祿,按照祿額之高低代之以公債券。

近代的民主革命,对所有封建特权和財產,都是無条件地加以廢止的,但明治維新的处理俸祿,如上所述,是采取了由政府收購的方式,这就使明治政府在財政上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遇到很大的困难,另外,也就必然不能停止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課賦重稅。

在这里應該注意的是俸祿的处理虽然是不徹底的,但仍是一种私有財產制的否定。“祿”这种封建的私有財產制,甚至都被不能称之为革命的明治政府所否定了(尽管是給予了华族、士族公債这一資本主义的私有財產来代替)。过去所有的革命都是廢止一切旧的財產制,創設新的財產制的。但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廢止私有財產的最后形式的資本主义財產制的。因之,它就是要否定私有財產制,創設社会主义財產制即創設生产資料为全民所共有的制度。否定私有財產,听起来似乎是了不得的事情,可是在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已經是多次否定了旧的財產制,創設了新的財產制的。

軍国主义 本文所說的,“由于过去的武士不存在了,所以为了保衛国家才采取了国民皆兵”的政策,这是大錯特錯的。由于新

政府已經不是幕府的武士階級的代表，也不是人民的政府，因此，它就為要求徹底消滅封建制的人民所反對，也受到了保守反動的武士階級的反對，因此就是一天也都不安穩的。政府為了壓制這種反抗，就將希望寄託在強大的軍備上面。武士是斤斤計較身份的上下的，同時頭腦又很陳舊，所以就無法吸收他們作為近代軍隊所必要的大量的兵士，這一點在幕府末期已經是昭然若揭了。在廢藩置縣之前，就曾集結了薩、長、土三藩創立了御親軍（後來的近衛軍）。由於從這三藩中湧現了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員，同時，也由於他們都支配了各自的藩政，因此，三藩的兵也就很容易轉變成了中央政府的兵力。而且，又以這兵力為基礎，堅決實行了廢藩置縣、設鎮台並統率了舊武士的軍隊。山縣有朋（當時的軍部長官）就曾清楚地說這近衛軍就是“保護聖體，保衛禁闕的”，也就是說它是從人民解放運動中，來保衛天皇及其政府的，對於鎮台他也清楚地說是為了“鎮壓人心的”。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又成立了巡檢參謀將校（即後來的參謀本部），這機構就是以經常研究與準備對付人民暴動的攻守方法為其任務的。

這樣，為了對付人民的士族軍隊建立起來之後，才開始發佈了征兵令。這時，山縣向天皇提出的奏文中就說，以此軍備“內則鎮壓草賊，外則張對峙之勢”。

這就是說，這支軍隊是以壓抑國民使他們順從政府為其第一目的的，而絕不是為了與國民共同的來保衛國家的。對外之所以說張對峙之勢，也並不是單純地對外保衛國家，而且也是要進攻弱國的。

人民在全國的範圍內，以強烈的大暴動反對了征兵令，就是被征兵之後也開了小差，同時還假造了戶籍等普遍地來逃避兵役的。

其后，随着警察与监狱制度逐渐具备，把普通的镇压国民的问题就交给了警察，军队就主要是从事对外战争了。虽然如此，对于警察所压制不住的民众暴动，也还是出动了军队。

政府对军费是从来不吝惜的。一八七七年由于西南战争，政府已濒于破产了，当决定要削减百分之二十的次年度的各部的预算时，陆军卿山县有朋就激烈反对削减陆军军费，要求政府不要负教育人民的义务，不必要奖励产业，也不需要议会政治的机构，要停止这些费用而将其拨作陆军军费。政府就接受了这一要求，牺牲了为文化、和平和繁荣经济的费用而充作了军费。不仅如此，还进一步从次年度又增加了军费，创立了参谋本部。

这样，日本的军部，从一开始就是牺牲了人民而肥大起来的。

中国和朝鲜 本文在第十一章的“明治的外交”的开头，把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向大陆的侵略活动写得是若無其事，隐蔽了它的侵略的本质，这一问题应该在“新政府的成立”的次一项加以明确的说明的。如果不这样，那末对“走向新的社会”一节也是不能正确地理解的。

新政府如前项所述，并不想与人民共同地来贯彻民主主义，而只是依靠于庞大的军队的。而且，从很早就侵略了朝鲜，标榜举国一致防止国难来压制国民反对政府专制的情绪，另一方面，也企图借此来满足嗜好战争的武士们。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正月，早在函馆战争未结束时，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们就已制订了侵略朝鲜的计划。木户在其日记中，就曾说：“慨嘆皇国人情之难治，常常湧現征韓之念”。甚至在给大村益次郎的书信中也说愿意夺取朝鲜来压制国内反抗政府的热潮，来提高日本的低的国际地位。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在岩仓和木户们赴欧美出任大使之前，他们二人就与西乡隆盛以及其他政府要员会议，商讨了侵略朝鲜的计划。

另外一方面，政府从一八六八年就为了与朝鮮締結条約而繼續了談判，可是朝鮮正如幕府对拉克斯曼和列札諾夫一样的鎖国主义，并未答应日本的要求。这一方面是由于某种机会使朝鮮得知了日本方面有征韓的念头，另一方面是由于在長时期內，駐任釜山的对馬藩的官員对朝鮮采取了卑屈的态度所致。

一八七三年夏，当岩倉們不在时，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借口朝鮮对日本人無礼的莫須有的理由，断然决定了征韓。这与反动氏族随着維新的进行掀起叛乱是完全相像的，是为了將“意圖內乱之心轉以对外”的（西乡給板垣的信）。这时岩倉、木戶、大久保从欧洲回来了，他們是激烈反对征韓的。其理由是，人民反对征兵并在国内到处都已爆發了暴动，在这情况下如果再要發动战争，那末人民的反抗是更要高漲的。然而，岩倉們所反对的并不是征韓这一問題的本身，只是反对由西乡和板垣来做这件事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西乡是最右翼的士族層的代表，而板垣則比政府更屬左翼的，而且，兩人的勢力在岩倉等不在时又都强大了，如果西乡們征韓取得胜利，則其勢力就会更加强大，他們所怕的就是这个。这样，終于一度决定了的征韓之議就被推翻了，西乡、板垣退出了政府，政府就成了岩倉、大久保、木戶等的独裁政府了。

可是反对征韓的大久保，次年却率先派大兵到台灣了。在一八七二年琉球人民漂流到台灣，其中有的就被土著居民杀害了。这問題就成了大久保們兴师問罪的借口，但实际上，却是由于薩摩的士族們对政府不滿，而且，在这一年，板垣們还提倡开国会，自由民权和民主主义运动也猛然地高漲起来，由于这样他們才企圖以对外战争来扭轉这一局面的。这一問題就是本文說的很曖昧的“由于台灣問題，在日中兩國之間产生了磨擦”的真相。

在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軍艦云揚号在朝鮮江华島灣，特意激

惹了朝鮮炮台的守軍，挑起了戰爭。以此為口實，翌年，政府就遣使赴朝鮮，在護衛的名義下，率領着軍艦威嚇朝鮮，最後終於締結了通商條約。這就如同是日本把它在培理和哈里斯的威脅下被迫締結不平等條約的情況又反過來在朝鮮重演一次。這樣，日本就踏出了侵略朝鮮的第一步。本文在這裡是既混淆了征韓論，又掩蓋了江華島事件，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政府與朝鮮的開港談判中，朝鮮一直就把中國作為自己的上國來看待的。因此，朝鮮主張日本首先要與中國締結條約。然後，再與朝鮮締約。日本與中國的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的條約，就是以此為直接動機的。

總之，明治日本的外交，是一方面順從着強大的歐美各國，一方面又陰謀來奪取朝鮮與中國的。這也就是幕府末期吉田松蔭等所倡的方針。

另外，他們也企圖以這樣的軍國主義來壓制反政府派。如此，就越來越着重於擴充軍備，使軍部作威作福並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形成了軍閥政治。這一問題從山縣犧牲教育費來增加陸軍軍費一事來看，已經是很明顯的了，其後類似的事情也還是不斷地實行了的。

如果了解了上述情況，我們就會清楚地了解到下一節要談的“新社會”是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的。

二 新社會

各項改革 本文在這一項里是錯誤百出的。

據本文說，這時身份是分成了華族、士族和平民三種，然而，實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此外，到了明治还重新設置了皇族这一特别的身份。皇族在江戶时代与宮、堂上是同級的，是与公卿同列的身份，而且它的席次，尽管名义上是亲王，但在“公家諸法度”中却規定要在攝政、关白，甚至还要在大臣之下的。可是到了明治却形成了皇族这一特别的身份。根据战后的新宪法，甚至天皇都成了一个普通的国民，而政府却还主張要把皇族降低为臣籍。这当然是与新宪法相違背的。此外，亲王等在明治以前是固定为四个亲王家，除此以外明明是都成了僧侶，可是到了明治以后作亲王的人却没有这个限制了。

本文說，华族、士族与平民是平等的，这也是錯誤的。华族和士族到廢藩置县为止，是壟斷了藩的政权的。其后，一直到一八七六年，华族、士族还是任何事情都不做，只是由政府領取封建特权的俸祿。后来，士族虽然沒有了法律上的特权，但实际上作官或是当軍人还是士族的身份較為有利的。华族特别是作为皇室的藩屏，即作为皇室对人民的堡壘而处于特殊的地位。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又重新获得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的爵位。对于高官、將軍和建立新政府有功的人，甚至对其子孙都給予了爵位，这称作勳功华族，他們后来就壟斷了貴族院議員的选举权（侯爵以上的成年人不用选举就成为貴族院議員），持有了政治上的重要特权，而这一切还世襲下去了。本文对这一任何人都知道的事情，却偏偏要加以掩盖，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直到新宪法成立后，华族的特权才被去掉了。

地稅改正 明治維新，正是由于是以人民要从封建制中求得解放的斗争为其原动力，便利用这一原动力来完成的。所以新政府对人民的要求也就不得不作某些讓步，对封建制也不得不作某些瓦解工作。由于这样，它才实行了廢藩置县，廢止了大名和武士

对土地的統治，停止了士族的軍事壟斷，对于身份制虽然不徹底，但也取消了，对人民的職業自由和迁徙自由也認可了。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又認可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因而也就認可了人民有买卖和处理土地的权利。但这时，江戸时代的地主却仍原样地作为地主而被承認了它的存在，至于实际的耕种者，是并没有得到土地的。如果是徹底地取消了原来的大名和武士們对土地的特权这一原則的話，那末認可不劳动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就是錯誤的。法国大革命及其他徹底的人民革命，都是使土地成为农民所有的。但是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地主与佃农却依旧殘留下来了。在这第二年的——一八七三年，就实施了地稅改正。本文所說的田地的賦稅改由貨幣繳納，就是這個問題。由此：第一，原来年貢分攤給各村，由实际耕种者来繳納的方式，此后就改由不論是否耕种，而只是对持有土地的个人課征。第二，原来的年貢多少是随着土地收获量多少，按照四公六民或七公三民来征收的，而新的地稅就不管年景的好坏，一律規定为土地买卖价格的百分之三。第三，年貢是征收大米和其他实物的，但地稅則是要以貨幣繳納的。

这在第一，認可了土地所有权；第二，不是在征收实物而是在征收貨幣的賦稅等問題上，也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相当于地价的百分之三的稅率，实际上是政府为了不低于原来年貢的額度而計算規定出来的。因此，农民的負担，在这方面是毫未減少。特别是佃农为地主所剝削的情况与过去是毫無改变。政府借口地稅是地主繳納賦稅的基础，就以处罚迟繳地稅的农民的方式来保护地主对佃农的剝削。后来，政府虽然没有这样露骨地去做，但警察和法庭一直就是保护地主，以治安維持法等法律来压制佃农的团结和斗争的。因此，地主就由佃农剝削了至今还是世界上稀有的高額的实物地租。

因此，由于地稅改正，政府得到了与以前收入一样的現金，情况当然是好轉了。但农民的穷困生活，却絲毫未得到改善。不仅如此，另外一方面对于究屬誰所有不很清楚的，为本村或数村的人民割草和打柴的山林原野——这称之为“入会地”——，借口說是不属于任何人，而將其划归政府所有的情况也是很多的。而这种情况就使农民更加困难了。

这样，就是好容易才有了土地的自耕农們，大部分由于繳納不出賦稅的緣故，不到十年的光景就失去了土地而变成了佃农。

政府就是这样地剝削农民，积累了軍国主义的和供养財閥的費用。而农民的低的生活，也成了工人的低工資的基础。

地稅改正与大化革新的班田制有什么不同呢？还有，这次的农地改革能实现在地稅改正中未解决的农民的解放問題嗎？对这些問題加以討論，对于培养历史的感觉和批判力是有好处的。

新产业 这一項和次章的“产业的發达”一項中，本文所写的是無甚錯誤的。但正确的是應該在这里說明日本資本主义的成立，在次一章就應該具体地闡述它此后的發展和工人的状态。

如前所述，在幕府末期即十九世紀前半叶，在日本也有了以工場手工業为开头的新产业的萌芽。开港后随着生絲的大量輸出，繅絲工業也急遽地發展起来。开港后四、五年，生絲的生产就比开港前增加了將近一倍。同时过去农户都是养蚕，以自家的蚕自家来繅絲的，但逐渐出現了生絲商人收購蚕茧而將其交給別家的农户去繅絲的情况，有时商人还僱佣繅絲女工来繅。也就是說，农户的养蚕和繅絲是分离了，繅絲就越来越作为独立的工業而發展了。另外，由于輸出生絲的質量必須平均一致，而这样工作就不是分散的农家的家庭手工所能胜任，于是在一个人控制之下的同时的作業也就成为必要，这样生产也就逐渐地大規模化了。一八六二年

(文久二年)甲州的若尾逸平發明了絲質既好，又能將大小纏得平均的纏絲工具。他以這種工具在甲府市內三個地方建立了可使女工七十人到九十人勞動的工廠。上州、信州各地也作為以坐纏器纏絲的地方發達起來，後來甚至連結數台坐纏器以水車的动力來轉動的、類似機器的東西也出現了。

次於生絲的輸出品的茶，在其主要產地，制茶等也作為脫離了農業的獨立工業而發展起來。

這樣，民間在和平的輸出貿易的刺激之下，以自己的力量推進了新的產業。其中一部分，甚至機器工業，固然還是幼稚的却也在方興未艾了。過去僅是收購物品的批發商也成了工業資本家，在家庭中作為副業而纏絲的農家少女，也成了在資本家的工廠領取工資而勞動的工人。這一資本主義的萌芽，自明治以後就日益急速地成長起來。

另外一方面，在幕府末期，幕府和薩摩及其他大藩，為了軍事上的需要，也從外國買進了機器，製造了小槍、大炮和小型軍艦，並且還創辦了為上述目的的鋼鐵廠和鐵工廠。幕府由法國借款，召聘了工程師，在橫須賀創辦的造船廠、鐵工廠就是其中最為進步的。

明治政府接收了所有這些幕府和各藩的軍事工業，而又更進一步地使其大規模化了。由於政府從一開始就是以擴大軍隊，以軍國主義為其最大方針，因此，對於軍事工業也是格外注重的。本文對於這一問題只字未提，這又是因為什么呢？引起兒童對軍國主義的興趣當然是不對的，但從學術上，正確地寫出“新產業”的問題，也能使兒童正確地來批判軍國主義的。

輸入軍事工業和軍需品是需用龐大的資金的，而軍需品對生產方面卻是毫無作用的。衣服即使穿破了，也還能夠保暖，也還能

够使人在生活和从事生产方面起些作用，机器使用到最后，虽然也就没有用了，但在这期间它却生产了很多的物品。至于大炮和军舰却是什麼也不生产的。

因此，军事工业，从国民全体看来，它只是浪费财富的，但一部分的大资本家却借此发了大财。自明治以来直到这次战败，政府一直是以扩大军需工业作为产业政策的中心的。因此，尽管天皇和一部分大资本家成了世界性的大富豪，但是人民却陷入了世界上所罕见的贫穷。

为了适应军事工业设备的输入，明治政府保护了以缫丝业为中心的工业。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政府是致力于发展工业的含义。但必须弄清楚的是，民间的和平工业没依赖政府也大步地发展了。同时，由于政府：第一，是致力于军事工业。第二，为了取得为军事工业所需的资金才发展了输出工业，因此，即使工业兴盛了，但日本却仍未成为富国。而且，也正是由于政府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所以如下所述，从很早就形成了财阀。

财阀 日本铁道的创始与其说是为了工业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海上交通运输，却完全是从军事上的需要成长起来的。

明治初年，虽然到处都有一些小的海运業者，但日本近海的外国航路，却全是在英国和美国輪船公司势力控制之下的。

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政府陰謀侵略台灣。当时，本来打算要租用美国輪船来运输军队和军需品的，但因为美国宣言局外中立而没有租成，这使出兵台灣的主使者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感到非常困窘。政府也感到日本如向外国进攻，无论如何也必须跨海的。因此，如果不掌握东亚的制海权，那么就会受到像这次一样的困窘的。于是就急急地以从人民搜括来的捐税的鉅款买了十三艘

輪船，將其寄存于岩崎弥太郎的三菱公司以充作軍事運輸之用。岩崎是土佐的鄉士，當廢藩置縣之際，幾乎不費分文的從本藩購得了數艘小輪船，開辦了三菱公司。同時，他又很巧妙地巴結了大久保和大隈重信等政府高官，才得到了這樣的特權。翌年，一八七五年，三菱由政府白白地領得了上述的十三艘輪船。此外，它還以很低的價款購得了其他的為政府所有的船舶。不僅如此，在此後的十五年間，還領得了鉅額的稱作“航路助成費”的補助費。這樣三菱就不但把內地的各個小公司，甚至把太平洋輪船公司和半島與遠東輪船公司等外國公司也都由日本近海排擠出去了。

政府為什麼要這樣使一個人來壟斷海運呢？這是因為在戰時和非常時期，當需要馬上動員輪船時，如公司很分散的話是不能勝任的。三菱由政府得到了這樣優厚的保護，相對地，當戰時以及其他為政府所必要的時候，就有立即提供輪船公司所有船舶的義務。即使如此，三菱也還是發了大財。

當江華島事件時，三菱的船就立即動員起來並集中於下關。僅僅在這兩個月左右，三菱就賺了四十萬日元（如以現在的通貨膨脹行市來計算就相當於四十億日元以上）。西南戰爭時，軍費的三分之一約一千五百萬日元，就都成了三菱的紅利。

三菱壟斷了海運後，就着手到倉庫業。因為，由三菱的船舶所託運的貨物必須要由三菱的倉庫來保管，所以其他的倉庫業者也都很快地被擠垮了。一八七七年由於西南戰役的通貨膨脹，日本紙幣一貶值，三菱就提出了運費和倉庫費要以美元來支付的要求。由於沒有其他的輪船和倉庫，所以貨主也只好隨三菱的擺佈。在這以後，三菱復伸手經營了九州的高島煤礦，成為控制了以造船、鍊鋼等為首的日本工業界之半的大財閥了。

三井財閥也是與政府勾結起來而脹大的。江戶時代的錢庄三

井組的問題，前面已經談過了。三井預見到了幕府的垮台，在王政復古后，就對新政府貸出了鉅款。固然，這也是為軍費所困的政府所半強制地借去的，但它當然也是取得了充分的利息的。其后，三井就成了政府的貿易公司和匯兌公司等的首領，三井的總經理，三野村利左衛門也成了政府財政和商業政策的中心人物，而且與在這方面的高官井上馨的勾結也密切起來。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井上馨也被稱作三井的總經理了。政府紙幣的發行也全是由三井組來包辦的。一八七三年創立了第一國立銀行并發行了紙幣，但結果却仍為三井所控制。江華島事件之后成了政府代表強使朝鮮簽約的就是被稱作三井的總經理的井上馨。而且在條約簽訂后還不到一年，三井資本的第一銀行就在釜山設立了分行，成了從金融方面向朝鮮侵略的先鋒。此時，三井還創辦了三井物產公司服務于政府，后来又逐漸地控制了日本的商業。一八八八年（明治二十一年）井上任農商務大臣時，以如同白得的價錢，曖昧地得中了政府所有的三池煤礦的投標，年年得到了鉅額的利潤。在這以后，又復擴充了煤礦，進出于紡織、繅絲及其他產業界，經過了中日、日俄戰爭，就控制了日本商業，金融和產業界的一半。

財閥就是這樣的，一直勾結着政府，勾結着軍國主義而產生與成長的。

本文所說的產業的進步是由于“政府的保護”。實際上，這就是對財閥的保護與對民間的自由產業的壓迫。

三 文化的動向

教育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設置了學制，日本人民不分男

女都要受义务教育了。封建时代教育几乎是仅限于武士，从这一点看来，这也是一大进步。根据学制，教育的目的在于授予知识和技术作为“立身处世的基础”的。正是由于当时，在民间出现了福泽谕吉等人，强调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教育和启蒙，而政府方面也由于军队和警察还未充实，也就有必要对人民作某些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这样的学制。但根据在军队和警察强大了、政府的权力也巩固了的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的“教育令”和翌年的“小学教员须知”，“教育的目的专在振起尊王爱国的志气”的，这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增进人民的能力，而是压抑人民能力，并在忠君爱国的名义下，来实行变人民为过激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奴隶的教育。

本文说“女子学校成立了，这样从古以来的鄙视女性的习惯也没有了”，这一点在谁来看都可以看出这是公然的说谎的。历史并不是修身课，应将鄙视女性的事实，作为事实先弄清楚。然后，再使儿童来批判这一问题是怎样的不合理，这样才是对的，像本文这样的说谎是不对的。

本文作为对教育方面有功者举出了田中不二磨。田中是尾张的藩士，后成为文部省的官吏，一八七三年三月从欧美留学回国以来，就掌握了文部省的实权，他也是从一八八〇年制定教育令开始，将日本教育统归于过激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主使者。福泽谕吉是中津藩（现大分县）的下级武士之子，是曾为身份门阀制度所苦的。青年时，至大阪，在绪方洪庵的学塾中学习过兰学，其后复至江户学英文学，一八六〇年幕府遣使赴美时，求人推荐始一同赴美。一八六二年又随从幕府的使节环游欧洲各国后，再度去美并很好地研究了作为欧美学术的根本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回国后，在江户芝区创办学塾（庆应义塾的前身）培养了学生。明治维新后

作为一个民间学者以提高教育和文化为其最大的乐趣，并发展了庆应义塾，同时又以无数的著述，向我国国民灌输了独立自由的精神。他曾写过“童蒙教草”等儿童教科书，就是在这里面也教导了自由独立的崇高问题。在福泽的著述当中，最有名的是“文明论概略”和“劝学”。“文明论概略”著于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倾其爱国者的热情论述了如何才能使日本文明赶上外国的问题。他说输入西洋的机器和物产是容易的，但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创造这一切东西的精神和人民的自由、平等与独立，学习和发展合理的科学的精神。他批判说，在日本只有政府的历史，而无人民的历史，他强调日本文明不能是由政府而是要由自由平等的日本人民来创造的。“劝学”是一八七二年陆续出版的書，开卷第一章就强调了“可謂天未創造人上之人，也未創造人下之人”的人的本来的自由平等，批判了封建的大义名分的道德，还阐明了学問就是批判等问题。

这些書受到了当时全国国民的重视，甚至像西乡隆盛那样的保守反动軍人也會表示說“文明论概略”使他睁开了眼睛，“劝学”甚至都以平均一百六十人就有一册的比例普及开了。

將一生与官僚主义做斗争、为学問和教育的自主独立而奋斗的福泽与以官僚主义来歪曲教育的田中混为一谈，都视为对教育有贡献的人，这当然是滑稽的。

馬来（大衛）曾充任文部省的督学官和高等师范学校的监督。馬来的意見一直就被文部省去其民主之实而只取其形。帝国学士院虽然也是根据馬来的意見所創建的，但馬来所计划的与文部省所創建的，只是在形式上相似，其中心内容則是完全不同的。

学問和宗教 本文在这一項沒有写政府对基督教施加迫害的问题，但关于这一情况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已作了介绍。受迫害的教徒，尽管在獄中受到拷打，但絲毫未放棄他們的信仰，同时，也由

于政府是一直实施这样野蛮的行为，因而也常常受到了欧美各国要求停止这样行为的抗議。如此，政府終于一八七三年解放了教徒，也停止了对基督教的公然的迫害，但自由的信仰却仍是不准許的。

另外一方面，政府則將神道作为国教，強制国民信仰。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一月下了宣佈大教的詔書，強制人民去信仰神道，將天皇宣傳成神的子孙，是活的神，到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为止，还設立了各种專职来繼續佈教。其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盟軍总部”發佈命令为止，表面上未將神道作为国教，也不使事实上是宗教的神道成其为宗教，但却強制人民去拜祭神社及其他的神道信仰。伊藤博文們为了編造明治宪法时，所尊为最大之师的奥地利反动学者斯坦因，就教他們說，应將神道列于宗教之外，但实际上应作为宗教之用，应使国民与神道相联結，因为这是維護皇室的重要的方法。

文明开化 本文說“佩刀之風沒有了”，將禁止武士佩刀的問題与开始吃牛肉一样，作为單純的風俗的变化，这誠然是毫無历史观念的。

洋館、洋服和牛肉是風俗的变化，但由此并未使誰有了或者被夺去了社会的特权。武士不是不佩刀，而是禁止了佩刀，这一問題，則是剝夺了武士的身份上的特权的問題。这件事是在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三月行开的。在此后的八月又以公債換取了士族的俸祿。这样，从十月末起就發生了熊本的神風連之乱、秋月之乱、萩的前原一誠之乱等士族的反动暴动。但本文却將風俗的变化与燒毀廢刀令問題相提并論，由此可見本文是多么糊塗了。洋館与洋服的出現也只是由于出現了服裝自由和建筑自由所致。

報紙和雜誌，特別是報紙的出現与电灯的裝設是不同的。報

紙的出現是意味着言論的發達。報紙只有人民關心了政治和社會問題并了解和批評這一切時才能成立，只有有了這樣的自由它才能夠發展。報紙是隨着民主主義特別是言論自由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就是從電燈的歷史來看，它也只是在民主主義社會才產生和發展的。就是現在，如果電氣事業不民主化，電燈也是不能十分明亮的。在報紙方面，也是沒有比它更直接的與民主主義相結合的東西了。

到一八七二年為止，言論出版的自由始臻完全，報紙方面也出現了高級——儘管是小型的，發行份數也很少——的報紙。但這一年政府卻以出版條例開始來束縛出版的自由。翌年又復創設了報紙條例。其後，過了二年，當自由民權論強烈起來後，又發佈了讒謗律和報紙條例嚴格地迫害了言論出版自由。民主主義者們一面拚着生命與其作着鬥爭，一面又出刊了各種的報章雜誌，大大地傳播了他們的思想，使報章雜誌得以踊躍地發展了。

但從自由民權運動經過了流血鬥爭之後，報紙在數量上是普及與發展了，但卻成了像官報一樣的東西。

“文明開化”普通大都是像本文所說的那樣，都將其膚淺地解釋作就是模仿歐美的風尚，但其積極的本質却是在於近代的自由精神。這一精神在政治上成長起來就成為自由民權運動。

四 立憲政治

自由民權 本文的開頭是談到了反動士族的內亂，至於其本質的問題，在前面已經說明過了。

本文在這一章始終是以政府為主，敘述了制定憲法的計劃，而

忽視日本人民可夸耀的自由民权革命的傳統。其結果則是对历史事实作了無数的歪曲。本文甚至就連“自由民权”这一成語都沒有提出來。“民主的”教科書忽視这一远比“文明开化”更为重要的史实，也真是不能不令人吃惊的。为了这个原因，本書在这里特設自由民权一項來加以詳述。

說立宪政治的來源是在于五条誓文，这是大錯的。民間方面的立宪思想的發展，前面已經談过，后来到了——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时，民間对于最进步的立宪政治即共和政治的思想甚至也逐漸濃厚了。就是在后来有名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的自傳中也說，他曾为当时佐賀的士族們对共和制盛行談論而吃惊了。

当时，尽管接二连三地实行了征兵令和地稅改正以及其他改革，但人民的負担却絲毫未減，特别是对以征兵將人民的劳动力充作兵員作为侵略战争和压迫人民的武力一事，在全国範圍內引起了激烈的农民暴动。如果將这人民的斗争在政治上統一起来的話，那末專制政府也將會被推翻的。鑒于这种情况，政府就企圖來創建由民間选举出來的人所組織的政府的諮詢机关了。这一点就是本文为什么要說我国为了赶上世界文明国，也想來制定宪法的真相。

但是这一些为政府想要創办的，也絕不是在人民參政权的基础上的議會和宪法，而只是企圖借此來扭轉由于民間对于真正的人民參政权的要求的強烈化这一趨勢的。关于这一点，当时制定宪法草案的元老院的官員宮島誠一郎就曾这样写过的。就是在政府当中，被称为立宪思想最前进的木戶孝允，在一八七三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教导“建国大法”給其后輩伊藤博文的書信中也說“建国大法不可無專制，此余之愚見。不仅如此，就是教育和兵制亦不应輕易停止專制”。这个为了專制的“愚見”，就是政府所謂的

“宪法”。

但是我国国民也并不是坐待给予宪法和自由的弱者。对于从幕府末期在人民之间就逐渐成长的立宪制的要求，终于在一八七四年一月，作为板垣退助们的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而表面化了。

板垣如上所述自一八六八年内乱以来就深深感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要，在他势力所及的土佐藩，在一八七〇年就已经实行了四民平等的改革。其后他成为中央政府的参议，与西乡一起主张了征韩论。但他与西乡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不同的，他是企图借对外战争的机会，在国内来施行自由主义的改革的。从那次失败以后，他就下到民间来并得到了恰恰由英国留学回来的片岡健吉等人在理论上的帮助，而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这一建议书为政府所轻视，于是板垣们就将此发表于“日新真事志”的报纸上，向天下的人民呼吁了。对此，以大分县人的大井宪太郎为首的、发表赞成论文的人也次第地涌现出来。加藤弘之（东京大学校长）等政府御用学者，却以民选议院虽好，但在日本由于人民文明程度还没有进展，所以为时尚早为借口而加以反对。反对进步事物的人的口实，总是说什么宗旨虽好，借为时尚早，什么不够稳健等等的话。大井们以第一，即使人民落后，比起少数人的专制也还是民主主义为好。第二，使人民有了参政权，则人民就能迅速地在文明方面得到进展，而且也应该得到进展等理由来反驳了为时尚早论。民选议院的反对论越嚣张，则立即设立论也就越高涨，同时在理论上也越加进步。政府虽然制订了报纸条例和设谤律来禁止对政府的批判，但爱自由的、追求确立民权的斗士们，堂堂地佈下了恢复强权政府、自由要以血来买的笔障。因此，无数的新闻记者就都被捉进了牢狱。这一运动就叫自由民权运动。

开始时，自由民权运动不过是富农、商人和士族知识分子的运动，因此它曾被諷刺为“上流民权說”。但是，这一运动之所以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后半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如上所述有了民众的深刻的革命的震撼，在这种情况下鼓动下，板垣們才敢于参加到这一政治运动当中来的。一八七三年在日本是农民暴动最高漲的一年，特别是在中国、四国、九州以及近畿地方的数万人、十数万人和数十万人的大暴动是接连地爆發了。这一年征韓論之所以高漲，在翌年民选議院建議書之所以提出，也正是显示了革命的浪潮在这一方面又得到了發展。一八七六年在中部地方和关东地方爆發了要求減輕地稅的巨大的农民暴动。政府狠狠地將地稅由三分降低到二分五厘。民众“以竹槍刺出来的二分五厘”歌頌了他們的胜利。自由民权运动是不能不与这一民众相联系的。而且从西南战争当中，自由民权运动也具有了逐渐地作为全人民的运动而發展的形勢。

在这期間板垣們的“爱国公党”(創立于一八七四年，后不久即行解散)和土佐的立志社及其他政党也出現了。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三月，二府二十二县，八万七千余人的代表一百一十四名，在大阪召开會議，創立了“国会開設期成同盟”这一大的政党。因此，政府就制訂了集会条例禁止了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集会。但是不顧这些迫害，同年十一月当“国会開設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在东京开会时，尽管是不合法的运动，但盟員們比春季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計有十三万余人之多。在代表委員六十四人的秘密集会上，就確認了主权是在于人民。

民主革命的势力已如浪濤一样地高漲，并且也有了从根本上复灭政府的趨勢。就是为政府所依賴的軍隊，在西南战争的第二年近衛炮兵联队的一个中队也起义了，而其他的自由民权論者也

更增加了。当时植木枝盛所写的宪法草案也确认了主权在于人民，甚至还主张人民有颠覆强权政府的革命权，有反抗官吏的不法的权利等。不论用什么样的镇压和迫害也是不能够扼杀民主势力的。像岩倉具視那样傲慢的大臣也曾为日本可能要成为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情况而发抖。在政府当中，参議大藏卿大隈重信也主张要尽早地开设国会。

这样，政府无可奈何地在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十月發佈了詔書，声明未来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年）即将开議會行宪法。同时并威胁說，今朕既已允諾，如再有煽动人民要求尽快实现的人，則將对其处刑。另外將大隈参議也免职了。

自由党 为这一胜利所鼓舞，人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不要从天而降的宪法，而是要由人民代表所組成的宪法制訂會議民主地所制訂的宪法。这样就进一步地加强了全国民主势力的团結，在这詔書發佈数日后，“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即行解散，而另創設了自由党。这是在日本最初的名副其实的大政党。另外，大隈重信也以三菱財閥为背景而組織了改进党，主张主权在于君主与人民之間，并得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还有主张主权在于君主的右翼反动的政府御用党（帝政党）也組織起来了。但是国民的支持毅然地都集中于自由党，要求制訂主权在于人民的彻底的民主宪法。此外，松澤求策、奥宮健元和中江兆民及其他很多的理論家，也都提出了共和政治才是理想的主張。

但是自由党内有一部分認為，政府已經清楚地定下了期限，許下了宪法和議会的諾言因而感到滿足的人，主要是佔据党的最高部分的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同时，恰恰从一八八二年，大米和蚕茧的价格暴跌，使大批的自耕农破产了，有的成了佃农，有的則成了流氓。这样，在自由党的主要地盤的农村，就产生了剧烈的阶级

分化和对立,过去支持自由民权运动的地主阶级也逐渐消极了。另外一方面,政治运动却也与维护贫农生活的社会运动相联系起来。

一八八二年春,福岛县令三岛通庸对县民的苛征暴敛有增无已,开始兴建毫无必要的大道路工程,征用县民的大量苦力,而自己却以自县民榨取来的血汗钱日夜沉湎于酒宴,干下了正如德川时代大名那样专制到极点的事情。三岛就是这样故意来惹怒自由党员的。福岛县议会主席河野广中是有力的自由党的干部,他在县会上彻底地批判了三岛的苛政,三岛所提出的预算,县会上虽然将其否决了,但三岛依仗其中央政府的后台就日甚一日地加紧了虐政。同年夏天,县民的痛苦已达到了绝顶,终于爆发了数千人的反对三岛县政的暴动。三岛就立即逮捕了河野们并付之审判。法院也以河野们曾立誓“推翻自由公敌的专制政府”为理由,将他们判处了重刑。

这样,当自由民权运动与贫农联系起来以后,政府的镇压也就更加剧烈,终于以此福岛事件为开始而爆发了羣马事件、加波山事件、高田事件、秩父事件、饭田事件、静冈事件和名古屋事件等流血暴动,紺野民五郎、田母野秀显及其他十数人的自由战士,有的被拷打而死,有的则倒于死刑之下了。结果掌握了自由党领导权的右派干部——地主、富农阶级的代表——的板垣们就完全丧失了领导力,一八八四年十月,终于将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民主革命党解散了。

本文在各方面都说自由民权论者“过于热心,以至于掀起了骚动”。实际上“骚动”则是由于政府的镇压与挑拨而引起的。在古今东西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其所以成为暴力革命,一直就是由于统治阶级先以反革命的暴力来压抑革命势力所致。先从人民方面

發动了暴力的例子是沒有的。明治維新之际,天皇政府方面是比幕府先用了暴力,但这是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例子。如果想要排除暴力的話,那么統治者就必须停止以暴力来鎮压人民,必須对一切的人民民主权利給予完全的保証。否則,对付暴力統治的暴力革命也是必然的。

大阪事件和景山英子 自由党左派的革命分子即使在国内运动为政府所徹底鎮压下去之后,也沒有停止斗争。当时正如后述,在朝鮮也出現了进步派,他們也是企圖施行民主政策的。前自由党的領導者大井宪太郎們也想幫助他們使朝鮮成为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然后反过来再圖謀日本的民主化。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政府所知,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十一月他們在大阪就被逮捕了。

在这事件当中有个叫做景山英子的妇女也参加了。英子是岡山人,生于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十五岁时就成为县立小学的助理教諭。其母梅子也是民主思想很濃厚的人,她創作了自由民权的大津頌,曾和着英子的月琴歌唱过。英子十六岁的时候有人来作过媒,但因不中意而被她拒絕了。母亲虽然很窘,但也終于被英子說服了。从这时起英子就有了謀取妇女独立的意願。十七岁时与母共同創建了“蒸紅学舍”这一妇女学塾,企圖来改革妇女的因循卑屈之風,还頻頻地召开了只有妇女参加的演說討論会。当时作为自由党内的妇女而有名的岸田俊子也来到了岡山,宣傳了自由民权的大义。英子对此也發生了大的共鳴,于是就組織了妇女悬亲会,来傳佈天賦人权和自由平等的主义。同年夏,在岡山的朝日川召开了自由黨員的納凉会,英子們妇女悬亲会會員也参加了,在船上大大地激起了自由民权的气勢。这时隱藏于周圍的秘密偵察的警察突然出現,命令停止与解散了該會議。第二天,县里就下

了命令，封閉了英子的學塾。

此後，英子即到了東京，參加了自由黨鬥士坂崎紫瀾的學塾，在進行擴大女權和婦女參政運動當中加入到大井們的組織，後在長崎被捕，並被關進了大阪的監獄。其後，當公佈憲法之際由於大赦而出獄了。自此以後就主張婦女的獨立首先就要求謀其在經濟上的獨立，於是就盡全力，傾一家的財產從事於女子職業教育。二十七歲時與福田友作結婚，生二子，但不久其夫死亡。英子雖然這樣不斷地備嘗着人世的辛酸，但卻毫未喪失勇氣與希望。後來的自由黨成了一個地主黨以後，英子對此大為憤慨，她終於懂得了真正實現自由民權和解放婦女的人就是工人，變成了“原先我憤慨于政權的壟斷而狂喊民權自由，今則成為堅決對抗資本的壟斷”的社會主義者了。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加入了幸德秋水們的平民社，四年以後又創刊了“世界婦人”雜誌。但僅僅一年半，這一日本最初的民主主義婦女雜誌就被政府弄垮了。其後英子雖然發表了婦女問題的解決除社會主義外別無他路的明確的論文，但晚年却只得以綢緞和首飾的行商來度其貧困的生活。一九二八年六十一歲在東京的南品川死去了。

憲法的制訂 政府一面這樣迫害民主主義，一面就派遣了伊藤博文們赴歐洲，隨普魯士的古納依斯和奧地利的斯坦因等最反動的學者來研究如何才能以表面上的憲法來延續天皇和政府的專制。在國內，也召請了普魯士的羅斯列爾，岩倉具視們也從其作了同樣的研究。

這樣就作成了原來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該憲法規定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使他能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情，規定軍部是直接由天皇統轄，而且有着不受政府約束的獨立的權力，政府只對天皇負責，而不是對人民和議會負責，以天皇的命令（勅令）可以自由

提出任何法令，总之議會是沒有任何权力的。

人民被規定成臣民即天皇的家臣，而不是独立的人，基本人权也被很多的条件所限制了。議員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只有地主和富豪的男子才能享有，在第一次选举时有权者的人数，只不过是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

內閣制度和帝国議會 內閣制度是一八八五年年末作为实施宪法的准备而創設的。也就是說它將原来在太政官制之下分散于太政大臣、參議、各部長官的权力，集中于一个內閣并將其加强了。这时“宮內省”也由內閣独立出来，而且在政府的财产当中，以木曾的杉和檜等美丽的森林等有着财产价值的山林平原一百万町步以上，簡簡單單地由政府移交到宮內省来管理的一轉手的办法，就都成了皇室的财产。另外大藏省还以人民的稅捐購買了日本銀行和日本邮船公司(这是三菱輪船公司的后身，很多股份是为三菱所有的)的股票，这些也隱然成了天皇的财产了。其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使天皇也成为大股东，以便于由他来保护这些銀行和公司的。天皇之所以有着这样的多的财产，是根据岩倉具視的意見的。具視由于自由民权运动之势日益洶湧，而为了与其对抗，就認為天皇必須要有日本财富的一半，便于以此财富来压制反政府派，所以在議會尚未成立之前，就急急地搜括了这些财产。

本文說宪法成立后“政府与議會共同执政了”，这种將官僚專制政治写得似乎已經是停止了的样子的說法是多么騙人，这任何人都知道的。这样写法就使人对这次战后为什么要修改宪法的理由反而会弄不清了。其实也正是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宪法是毫不民主的，所以才有必要加以民主地修改。因此，我們理應使兒童对于这次的新宪法与旧“大日本帝国宪法”作一比較。

政府和天皇怎样沒有与“議會共同地执政”的問題，在議會成

立的翌年，即在第二次會議上就已表露無遺了。當時，由於議會是反對政府的蠻干的軍事預算，但政府却立即解散了議會。而在其後的大選時，明治天皇就召見了松方總理大臣，命令他要盡全力在這次的選舉中不要使前次的議員再度當選。政府按照天皇的吩咐，盡全力來干涉了選舉。在高知縣，不是拋掉了民黨（反政府黨）的得票可能較多的投票箱，就是將支持民黨者作為叛逆者而加以檢舉，或者是令警察站在民黨的演說會前面扔碎石頭來加以攪亂。這與警察打亂工人的合法鬥爭是一樣的。將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給兒童，對於使未來日本真正的民主化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在拙著“天皇制”（東京大學出版會刊）中曾舉出了很多的為本章作全面參考的具體的事實。

儘管憲法成立了，但日本的權力依然被天皇及其官僚所掌握着。在這些官僚當中由於舊薩、長兩藩的關係，結成了鞏固的排斥別人的勢力，因此，也就稱其為藩閥專制政府。在軍部中，薩摩系的人在海軍方面，長州系的人在陸軍方面，幾乎都是壟斷了所有重要职位的。

第十一 世界和日本

一 明治外交

关于“中国和朝鮮”前面已經闡述过了，对于毗鄰的弱国采取了露骨的軍国主义政策的天皇及其政府，对于欧美列强却是極其卑屈的。

条約的改正 幕府为欧美各国所强制簽訂的条約，主要有三条是不利的：（一）輸出入关税我国不能自主的規定而必須要得到对方国的同意。（二）对于居住于我国的外国人的犯罪行为，我国不能审判（治外法权）。（三）我国給予某一国的条件，例如，对英国降低了稅額，那末也必須同样給予其他国家（最惠国待遇）。另外，治外法权与侨居制度相結合，就使橫濱和神戶儼然就成了外国領土一样了。再加上，如前所述，英、法还在橫濱駐紮了军队（一直到一八七三年）。这样，不但不能称其为充分独立的国家，而且，在貿易上也是不利的。总之，当时日本是处于現代人所想像不到的那样的外国殖民地的状态。政府各省（部）都有外国人的顧問，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竟不得不逐一地听从英国和美国的指令。在繁华的街道上趾高气揚地坐着馬車的，全是外国人。而且这些車即使軋死了日本人，也是揚長而去的。日本的巡警也由于畏惧而不敢

干涉。所有的日本人都渴望着使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日本。政府方面，一八七一年岩倉具視們为了修改条約也曾遍赴欧美，但各外国却借口我国政府残酷地迫害基督教徒，此外，在民主化方面沒有达到世界文明国的水平，而拒絕作修改条約的談判。本文中所提到的“由于有各种麻煩的問題”所以沒有能够做到一事，就是这个問題。

为了与外国对等，首先国内人民是必須自由平等的这一点，甚至明治政府的最右翼的佐木高行，在一八七一年的日記中都是这样写的。这一点，民間方面的人物，从一开始就是不断地这样主張的。福澤的“文明論概略”也論証了国家的独立，首先要有人民的独立。不將官吏的專制政治廢止，不將全国国民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来实行民主主义，那末也就不可能与外国对等的。可是政府借口显示日本已达到了文明国水平，就建立了鹿鳴館这一豪华的大厦。在这里，政府的高官和富豪們，每天、每夜都与外国的使节和商人們举行了欧美式的宴会和舞会。伊藤博文首相、井上馨外相，虽然并不信仰基督教，但为討好外国人，有时也到基督教堂去了。这样，在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时，井上外相就开始了修改条約的談判，但由于企圖对人民秘密而只由官吏来修改的結果，反而造成了更加不利的条約草案。例如草案中就規定有外国人可作日本的审判官等問題。消息傳出以后，自由民主主义者大为吃惊，就攻击政府說：为什么不集中整个国民的智慧 和力量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事業，还說，如果只以政府的力量来專制与秘密的話，那么就会成为更加不利的条約等等。可是政府在同年年末，就制造出“保安条例”，出其不意地將自由主义者驅逐到离东京三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尾崎行雄，就是在这时 由东京被驅逐出去的一人。保安条例是政府、知事和警察总监只要認为人民是在陰謀內乱，那末，沒有

任何証据就可以立即將其驅逐到离开天皇所在地的三里以外去的法律。

一面制造着这样野蛮的法律，一面又想与文明国对等，这当然是很勉强的。官吏和貴族們，認為跳交际舞就是模仿了文明国，这一点也是太滑稽了。如果整个人民都能以交际舞作慰乐的話，那末可以想像，就是那侵略主义的英美也將不得不承認日本的文明的。

繼而，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大隈重信任外相时，也从事了修改条約的談判，这次固然也仍是瞞着人民去談判的，但这次却作到了廢止無条件給予最惠国待遇的問題。此后，陆奥宗光外务大臣时代，根据一八九四年七月的日英条約，廢止了治外法权，关稅率也作到了按照日本的希望来加以提高了。但关稅自主权完全得到恢复，还是在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的事情。修改条約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日本尽管是表面上也好，也畢竟有了宪法，資本主义也逐漸地發展了。因此，欧美各国也就不得不承認日本的力量所致。但这并不是說日本的外交对欧美已經是完全独立的，这一問題將在下面敘述。

二 东方的糾葛

第一次中日战争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 和軍部对 朝鮮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

一八七六年的日韓条約第一条就規定“朝鮮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日本在这一条文上，不仅規定了朝鮮与日本平等(事实上，日本却是以这一条約將不平等条約强加于朝鮮的)，而且也意味着朝鮮是不受中国任何支配和监督的。在这一条約簽

訂后，日本就在汉城設置了公使。事实上的朝鮮王大院君是極其保守的。过去日本在釜山，对朝鮮是以卑屈的态度来貿易的，可是現在却率領着軍艦耀武揚威地来到了朝鮮首都，为此事 大院君是大为憤慨了。同时，由于过去一直就是奉中国为上国的，因此，大院君就圖謀以中国的势力来抑止日本的野心。这一派就称作事大党。对此，还有一叫做独立党的进步的改革派，他們是期待着日本的进步主义的。这样，日本政府就表示了援助 改革派的独立党的态度，企圖在朝鮮培植势力，因而就与大院君和中国对立起来。

本文所說的一八八二年在汉城“突然發生了騷动”就是指上述的情况爆發，指大院君一派襲击了日本公使館的事情而言的。这一問題是由于日本公使干涉了朝鮮內政所致。事件發生后，公使即逃回本国，而公使館即被中国兵和朝鮮兵燒毀了。

从此事件后，日本政府借口为了保衛公使館而获得了駐扎或多或少的軍队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在日本国内为了侵略朝鮮也开始了大規模的扩軍，为了这个原因，又增加了稅捐。大炮和軍艦次第地建造起来，就是战时征集規則也都規定好了。

在这以后，汉城的日本公使，就越来越加强了对朝鮮的內政的干涉。一八八四年十二月，过去一直秘密地受着日本援助的改革派，在汉城就杀掉了保守派的大臣并企圖佔領王宮。王隻身地逃到了日本公使館。公使認為这是千載难逢的机会，于是就抛棄了到这时为止还曾援助过的改革派，就率領軍队佔領了王宮。

鑒于这种情况，对朝鮮处于傳統的优越地位的中国兵和追求独立自由的朝鮮兵士，就攻击了王宮的日本軍队。結果，王又逃到中国軍队方面去。这样，日本公使就准备与軍队一起退出王宮，但在这当中却遭到了中国兵和朝鮮的兵士与人民的襲击。这就是本

文的“緊跟着鬧了十七年”的事件的內容。這一切問題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日本政府蓄謀已久的事情。

當第二次漢城事件之際，中日兩國代表在天津會見并簽訂了條約，規定：（一）中日兩國由朝鮮撤兵，（二）今後對於朝鮮的重大事件而出兵時彼此要通知（即天津條約）。大井憲太郎們想到朝鮮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的事情。

一八九四年，朝鮮又爆發了東學黨之亂。這問題又純粹是朝鮮的內政問題。朝鮮人民為了由李朝的壓迫下求得解放而進行鬥爭，而這一鬥爭又是採取了東學黨這一宗教運動的形式。東學是東洋之學的意思，是混合了儒教、佛教和道教教義的宗教，而其信仰者又是農民。在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期間，他們就掀起了一個大的起義。

朝鮮政府為鎮壓這一起義，因而要求了中國的援助。因此，中國就立即出兵，並將此意根據天津條約通知了日本。日本政府雖然毫未受到朝鮮方面的請求，但為了對抗中國，就以保護僑民為名而派出了大軍。同時，又反對中國的出兵通知書所寫的為了“援救屬邦”，而主張朝鮮是“自主之邦”。日本政府和軍部就是陰謀借這一機會將朝鮮完全地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的。駐漢城的日本公使為了拖長東學黨之亂，甚至還想給他們以援助的。而且，在東學黨之亂被鎮壓了以後，中日兩國也未撤兵，日本聲稱為使中國確認“朝鮮的獨立”，終於爆發了第一次中日戰爭。

這一點正如在下一節“產業的發達”中將要談到的，固然是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已經有了要確保朝鮮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的要求，但根本的問題則是想以戰爭將國內的不安轉向國外，想將日本所受到的歐美的壓迫，轉嫁到朝鮮。軍人也是經常地以封建武士的心情，傾向於對外國的侵略，這一些才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真正

的原因。也就是說，這是早在明治政府以來的征韓論以另外一種形式的實現。

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結果 本文對戰爭的原因沒有說明確，因而對於戰爭結果的說明也是不清楚的。它說，由於戰爭的結果，中國承認了朝鮮的獨立。然而，這是極其掩蓋了歷史的真實的。所謂承認了朝鮮的獨立，就是中國承認了日本恣意地侵略朝鮮。事實上，此後日本的駐漢城公使也露骨地干涉了朝鮮的內政。對於不聽從日本吩咐的王妃，甚至殘虐地被在日本公使指使下的警察和暴力團殺掉了。日本的資本家，在政府和軍部的幫助之下，在朝鮮也鋪設了鐵道。以宣稱是為了使其承認“朝鮮的獨立”而開始的戰爭，不僅取得了賠款，甚至还奪取了中國的領土。從這一點看來，也會明白這一戰爭的本質的。這時的賠款合三六、五二五萬日元，其中有二、〇〇〇萬日元成了天皇的財產，二、〇〇〇萬日元作為教育基金和災害預備費，其餘的三二、〇〇〇多萬日元，都用於償付中日戰費的公債和為準備下一次的戰爭的擴軍費用了。

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結果在國際方面的影響，本文並沒有寫，但這在歷史上却有着巨大的意義。也就是說，這一戰爭暴露了當時中國是想像不到的軟弱的。因此，英、沙俄、德、法等各國，都爭先恐後的開始從中國掠奪利權了。

第一步就是沙俄、德、法三國對日本的干涉。三國說日本由中國奪取了遼東半島一事是威脅中國的安全，而且也使朝鮮的獨立成為有名無實，因此就要求將它退還給中國。日本方面，由於遼東半島本來是陸軍非奪取不可才奪取的，可是將這裡作為殖民地來經營的信心還是沒有的，因此也只得忍氣地屈服了三國的干涉。但政府特別是軍部，都決心要雪此仇，并“臥薪嘗膽”以待時機，所以也就更大規模地奔命於準備戰爭。

干涉了日本的三国，又立即向中国要求作为争回了领土的酬报。也就是说，沙俄得到了中国东北的铁道和采矿权，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德国也租借了胶州湾并得到了山东省的铁道利权。继之，英国又租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法国租借了广州湾等等。这样，中国的领土就被资本主义列强一块块分割成各国的势力范围了。

另外，中国对日本，为了支付赔款又不得不借巨额的外债，为此作为抵押的铁道、采矿的利权、海关关税，国内关税以及其他的税都被债权国得去了。

随着外国势力这样的向中国的侵入，民众的生活也就越来越苦了。外国传教士钻进了中国的各个农村，他们很多是与封建地主和土豪相勾结的，而土豪为了压榨村人，一直就是利用外国传教士的治外法权。因此，民众对封建的剥削和清廷的压迫的怨恨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气氛也就因之而统一起来。一八九九年山东省出现了义和团这一民众团体，掀起了排斥外国人的运动。清政府内的保守反动分子，也想利用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来作为封建的排外主义。

一九〇〇年，因义和团杀掉了某传教士的问题，各国就佈下了将要占领北京的形势。这样，中国的民众和兵士就封闭了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各国也就立即共同地派出了大军，特别是日本还派了很多的陆军来镇压中国的民众。

另外，此时台湾总督鬼玉源太郎陆军大将，在与中央政府商谈后，为了趁各国注意力都集中于中国北部之际，就企图要派遣陆军将台湾对岸的福建也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由于中央政府受到英国领事的严重抗议，因而有所畏惧，陆军也只好无精打采地由厦门湾又撤回到台湾。

日英同盟 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将地球上

的全部，都各自分割成本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了。而且，在十九世纪的最后数年即第一次中日战争后，以此战争为开头，如上所述的各国对分割中国的剧烈的势力斗争就开始了。一九〇〇年前后，在各国中矛盾最尖锐的是英国和沙俄，而在沙俄后面，又有法国。美国不论在远东的贸易上或政治上，都还不是有力量的。

早在一八七〇年时，北京的英国公使就曾屡次劝告过日本说，为了对抗沙俄就应向朝鲜扩展。当第一次中日战争了解了中国已经不能够抵抗各国的侵略时，于是英国对于利用日本，使其对抗沙俄在远东的势力也就更加积极。（英国之所以先于各国，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前答应了与日本修订条约，也就是为了要将日本作为与沙俄对立的英国的警犬而加以扶植的。）

在日本的当政者们之间，伊藤博文们则企图一面与沙俄同盟来对抗英国，一面向朝鲜和中国东北扩展。而军部特别是陆军则是强烈要求与英国联合而与沙俄战争，借此来夺取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在日俄协商还是日英同盟的问题上，从一九〇〇年在政府和军部内部就涌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结果还是日英同盟说胜利了。一九〇二年就缔结了日英攻守同盟。也就是说，日本已向世界上表示了它已决心要与沙俄战争了。

日俄战争 本文也谈到在义和团战争后，由于沙俄不自中国东北撤兵，于是中俄就举行了谈判，但因为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与日本的关系，所以也就很难理解这问题的实质。同时，却又好像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日本是为了中国而与沙俄战争的。正如前项所说的，不论日本与沙俄妥协还是战争，总之，它是想要抢佔中国东北地盘的。这样，最后还是选择了战争的道路。

朴茨茅斯条约是日本和沙俄擅自规定了在中国领土东北的处理问题，但中国立即声明不承认日俄关于中国东北的决定，日本不答

应，相反却压迫中国，强调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另外，这时日本的劳动人民已经是在反对侵略战争，并冒着各种迫害，高倡了反战论，这一问题是必须要加以特写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发动了彻底的反战运动，就是基督教徒内村鑑三一直到开战为止，也不懈地主张了反战。而且，女诗人谢野晶子，也给在围攻旅顺军中的弟弟写诗，表达了为战争所苦的女性的真情，并且在全国普遍地传开了。

併吞朝鮮 本文在本項之末，將日本併吞朝鮮写成是“商談的結果”，这也是掩盖了帝国主义实质的说法。固然日本政府和李王也确是“商談”之后，才併吞了朝鮮的，但这一商談就如同拿着手槍的大汉，与手無寸铁的少女“商談”的結果“得到”了金錢是一样的。

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將朝鮮作为屬国，設統監，以監督朝鮮的外交。国王不堪日本的压迫，一九〇七年就遣密使赴在荷蘭召开的世界和平會議上控訴了日本的不法，于是，日本就迫使該王退位另立了新王。这样，朝鮮的一切內政也要受日本統監的指令。最后則以武力为背景而併吞了朝鮮。

朝鮮国民对于王未与国民作任何商量，就輕輕易易地屈膝于日本的压迫而出卖了国家，是激烈地反对的。其后，要求从日本独立的运动，就是一天也沒有停止过。反对日本統治的朝鮮民族的武装起义运动，在統監时代就已爆發。其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孙秉熙等宣言了一千六百万人民的独立，在全朝鮮掀起了大独立战争。这一运动固然为日本的警宪和军队的大規模的镇压所击溃，但激烈的斗争却仍繼續了大約一年以上。直接参加暴动的达二百万人以上，死者达七千九百零九人，負伤者达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被关进牢獄者达五万二千七百七十人。

另外一方面，反对併吞朝鮮，逃离祖国，在美国、上海和中国东

北的爱国者们，在上海設立临时政府，發行“独立新聞”并將其發送到朝鮮来。其后，过了二年左右，在临时政府中像李承晚那样的妥协的代表地主阶级的人，分裂了力量，临时政府就垮台了。但是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以后，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的。这一运动与朝鮮的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国外和国内，更蓄积了它的力量。

铁道国有和帝国主义 如同本文所提到的，日俄战争后所以要將铁道国有的原因：第一，是政府为了借此完全控制国内交通，便于無阻碍地运输軍事物資。第二，铁路工人，如下节所述，当日本工人运动發展之际首先創立了工会，政府为了以国家名义、强力地来压抑这一运动，进一步地完成第一个目的才实行铁道国有。另外，由于铁道国有又發行了巨額的铁道公債，使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財閥也大發其財。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紡織、繅絲業和輕工業確立了，而日俄战争后，在工業方面，造船業(以三菱为中心)、电气工業也得到了飞躍的發展，一般的机械工業及其他重工業也开始發达。从第一次中日战争到日俄战争，蒸气透平的馬力数量，虽然仅仅由三万三千馬力增至九万九千馬力，但日俄战争後的第四年就增至二十六万二千馬力，而在五年后的一九一四年又增至四十三万馬力。这样，这些大工業就都被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財閥所控制了。大資本家掌握了銀行及其他金融机关，通过它們就直接地壟斷了重要工業，这就叫帝国主义。日本資本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就完全地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軍閥、官僚和政党 議會開設后，也出現了一些繼承前自由党和改進黨的政党，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前，它們与藩閥政府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但是再生的自由党已經不是像以前的自由党那样的为爭取民主主义的革命的人民的政党了，只不过是成了牺牲自

耕农并有着很多土地和财产的、收取高额地租而且以此所赚的钱投资于缫丝公司和地方银行的寄生地主阶级的代表。而这一个政党在城市中也得到了三井系的大资本家的支持。改进党也一样，它是三菱的党，也是地主的党。

正因如此，所以尽管这些政党在议会上如何激烈地斗争，但这也只是这些政党的干部们为了争夺其在藩阀政府的地位，为了代表资本家和地主从政府多争取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而已。一说是只要有天皇的命令，就是庞大的军事预算也会在议会中立即通过的。

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急速地发达起来。这也就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因而强大，他们甚至都喊出了“政治是为金钱推动着的金权政治”的口号，大资本家在政治上的力量的增大也就加强了政党的力量。

一八九八年板垣的自由党与大隈的进步党合并创建了宪政党，打倒了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其后，大隈作了首相，除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以外，各个大臣都是由所有宪政党员中挑选的。尾崎行雄成了这一内阁的文相，在攻击财阀万能的演说中，曾谈到如果日本实行共和制时，则三井、三菱就会成为大总统的。于是，素来从内心中就憎恶政党的军阀和官僚巨头的山县有朋，借尾崎的演说就非难说他是主张共和制的，并布置了各种阴谋，终于使尾崎辞职了。此后，由于进步党系和自由党系争夺这一空位而使宪政党分裂了——这也是山县有朋的手腕，——这样，最初的“政党内阁”仅五个月就垮台了。

此后，就组成了以山县有朋为首相的军人和官僚内阁。这一内阁为了扩充军备就加重了地稅以及其他稅捐。为了这样，山县就大规模地收买了宪政党——进步党分出去以后的旧自由党系——

議員。

山县內閣为了使政党的力量不影响政府，就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加强了樞密院的权限，并限定陆海军大臣要由現役的大將或中將來充任。这样，如果軍部对其內閣不中意时，只須声言不派軍部大臣参加內閣，就能够將該內閣弄垮。軍部在此以前已使統帥权独立出来，而現在更由于軍部大臣規定要是現役武官制，这样，对国家政治就更能任意地干涉了。像这样的施展政治上的势力的軍部势力就是軍閥。

山县有朋之所以要这样来巩固軍部和官僚的势力，是为了要杜絕資產階級政党在政治上的增强。同时，这一內閣由于畏惧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在社会上逐漸地增强，——这一点在下一节中詳述——在一九〇〇年又制訂了治安警察法。根据該法，工人、农民及其他一般人民的政治上，社会上的集会和罢工等集体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也是被警察任意摆佈的。

如此，尽管內閣是常常更迭，但其政治却一直就繼續了在軍閥官僚的天皇名义下的專制政治。即使是官僚，但因为既然承認了議會，那末也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認議員的力量，因此伊藤博文于一九〇〇年八月就以宪政党为基础創立了“政友会”这一政党。創立这一政党的資金全是由三井和三井系資本家所出的。

这是官僚、地主和資產階級以权力和国庫的金錢为目标而勾結起来的。

政党是各个階級的利害关系在政治方面的代表。但由于在同样的有产階級当中，資本家和地主的利害关系也彼此有所不同，就是在資產階級内部各个資本家的利害关系，也多少是不同的。因此，有产階級的政党也就分成数个而且是相对立的。在英、美等資本主义發达的国家中，資產階級的利害关系漸漸地被簡化了，因而

其政党也就分成了两个或三个，它们是彼此交替地来执政权的，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看，这两大政党的对立，就被称为理想的政治形态。

在日本，由于有产阶级的政党分成了数个，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反复着离合集散，所以各政党的历史也很难简单地写出来。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政党并不是以主义、政策和纲领而团结的，而是在有权力、有钱的首领的周围聚集了追逐利权和地位的大小的野心家的党徒的缘故。成为政党后台的资本家（地主当然也是如此）也是在封建的天皇制权力的保护下被扶植起来的，更由于从一开始它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与其说它们与官僚军阀彻底对立，倒不如说它们企图与其密切勾结为恰当。也就是说，日本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像欧美资产阶级那样对封建势力完全独立的，因此，这就使它们的政党成为没有力量的，使政党的政策成为含混的，而它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组织了党徒。

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将在下节叙述。

三 产业的发达

资本和机械 日本的资本主义，如前所述，是以政府的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在民间首先兴起的是缫丝业，继之纺织业也发达了。

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前，棉纺织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末，出现了纺织联合会这一纺织资本家的团体。从这以后，就进一步飞跃地发展起来，早在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就爆发了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所不能避免的。由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而生产，一有利润就不愿一切地增加生产，而当认为生

产已达饱和的时候,那么这些貨物沒有了銷路而急速地变成严重的不景气,这就是危机。正因如此,紡織業者們在国内銷不出去,就打定主意即使亏本也要向朝鮮和上海去銷售。为什么日本資本主义从其幼年的时候就陷入了危机呢?这一点將在下边再談。

工人 日本工人的工資是特別低廉的,就是現在也仍是低微的。政府軍需工業的熟練工人,一八九〇年平均日工資也只是日金二角四分,繅絲女工是一角二分,有的地方仅仅九分。而这一年的—升大米却为六分。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一八九七年在大阪的紡織职工一万二千人当中,日工資得三角錢的仅有三百八十七人,而日工資在一角七分以下的則有一万人。可是这一年的大米—升却由一角一分漲到一角八分。

繅絲和紡織工人大部分为女工。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在整个工厂工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九为女工。而且,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又是繅絲女工,其余的大部分才是紡織女工。就是在这以后,日本的工人也仍有百分之六十是繅絲、紡紗和織布的女工。她們都是二十岁前后正当受教育的时候。在开始时,甚至不滿十四岁的少女也都佔百分之十左右。

劳动時間十五小时是不以为怪的,在小的織布工厂,劳动是从早晨四点到夜里十点,而飯食方面只供給銀馬的燕麦飯,这一情况也是不稀奇的。

繅絲和紡織女工都是被圈进宿舍中去,在宿舍的周圍,像牢獄一样砌起了高牆,門口經年不断地有門崗把守着。女工們是不能外出的,父母写来的信也要被資本家拆閱的。天棚也很低,在四疊*半的地方就挤了五个人。而且,由于被資本家反鎖在这一房間

* 一种日本蓆子,長約五市尺,寬約为二市尺余。——譯者。

里面，还发生过因为起火逃不出来致使很多女工被烧死的例子。

男工人也是这样，工资是极端低廉的，但劳动时间都是极长的。特别残酷的是以妇女从事煤矿的坑底作业和在一般的工厂中使用童工的问题。一九〇〇年时，在火柴工厂就使五、六岁的幼童从事排列火柴桿的劳动。

为什么日本工人是这样受着剥削呢？这是因为农民受着地主的残酷的剥削所致。如前所述，尽管由于地税改正，但农民的生活与江户时代几乎是同样的。因此，农民就不论工资多么低，也不得不忍痛地送女儿去劳动。纺织女工的歌子中就說“正是因为家里穷，在当年幼十二时，就被卖到公司里”，的确，她们也就是被卖身而来的。在农村的日子，住处是连蓆子都没有的，而到了宿舍总算是有了蓆子，看去倒好像是很好过似的，劝征女工的人就是这样巧妙地去劝诱的。这样，她们领到了低廉的工资并将其寄给了父母，而作父母的就以此去偿还地主的债，即使是残酷的佃租生活也得过下去。

另外，由于在农村中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这就使若干成年的劳动人民处于半失业状态，而不得不进入城市去当工人，去忍受低工资的生活。

因此，资本家对于有地主制度使农民永远赤贫下去一事是欢迎的。同时，地主对于资本家将工人工资毫不犹豫地降低一事也是欢迎的。因为，如工人的生活不好过，那末农民也就得在地主的那里忍耐地过下去的。

如果工人、农民有了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对资本家和地主有要求再度降低年贡，要求提高工资并为此而斗争的自由时，也就不会有这样残酷的事情了。但政府却一直是不承认这一点的，是经常地迫害工人和农民运动的。

在我国將父母为中心的家族制度一直說成是好事情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要以子女应孝亲的观念来使男女青年工人在不能独立生活的低廉的工資下劳动，并且將其所得寄回父母以偿还地主的借債和佃租的，如果青年和女性在經濟上独立了，这对資本家和地主是不利的。

这样，佔整个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者由于極端貧困是买不起东西的。因此，資本家也就不能將其制造品在国内銷售掉，所以当日本資本主义好不容易使用了机械，剛剛开展大量生产的时候，就陷入了危机。危机在这以后也是屡屡發生的。而且，日本資本主义为了將国内銷不出去的貨物塞到外国去，就想去佔領朝鮮、中国东北及其他中国大陆了。

資本家与地主的这一要求，与軍人和官吏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日本政府和資本家就越来越成为軍国主义，而这也正养肥了財閥。

本文提及“由于工業的發达……农業就逐漸的失去了像过去那样的有力的作用”，但地主不論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一直到今天也仍是有着絕大的力量的，而且地主与資本家的利害关系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在日本，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封建的农業仍旧是佔重要地位的。

工人运动 工人漸漸增多了，于是也就开始团結了。与过去的像农民那样的以自給自足分散生活的人以及在自己的作坊做工的手工工匠是不同的，工人却是遭遇相同的無产者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集中于一个工厂，在工作上彼此也是密切联系的。而且，住所一般地也必定都是在工人街的。因此，就結成了农民和手工工匠所不能做到的团結，組織了工会并有了自己的政党。

从明治初年就爆發了工人运动。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在

甲府的繅絲工厂，一百多女工就發动了反对延長劳动時間和降低工資的罢工，結果胜利了，这是我国最初的工人对資本家的近代的罢工。

从那时起，在印刷工人和机械工人之間也發生了創建工会的运动。

日本資本主义由于第一次中日战争而突飞猛进，大工厂的数目和工人的数目都迅速地增加，工人階級的强大，也使工人的团結迅速地發展起来了。

战争中和战后的好景气，早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就变成了危机，工人生活的不安已达到極点，大規模的罢工是此起彼伏的。

在这一年，片山潛們就創建了工会期成会，并在他們的努力下，以东京及其附近的鐵道、鉄工和机械工等工人的鉄工会为中心的工会就开始發展了。

片山潛生于岡山县山村的农民之家(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至东京作印刷工人，在業余就學習了英文等等。三年后，手無分文地到了美国，苦学于各个大学，在这里懂得了社会主义，后曾赴倫敦又學習了英国工人及其运动的实际情况。一八九六年回国，在神田开始教育工人，从翌年就开始創辦工会組織。

不久，工人运动就發展成政治运动，一八九九年片山潛和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与大井宪太郎那样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共同地創設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要求男子的普通选举。进一步在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五月，片山、幸德們就組織了社会民主党。該党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目标的政党，以为了世界和平而裁除軍备、消灭階級、土地和資本的国有等为根本綱領。在

行动綱領方面則提出实施比例代表制的徹底的普通选举,廢除治安警察法(这是治安維持法的前身,是以鎮压工人运动为目的,在这前一年制訂的),廢止貴族院和縮短劳动時間等等。該党与發表了其成立宣言和綱領的同时,就被禁止了結社,但片山們立即創設了社会主义协会为工人解放和民主主义的徹底化而奋斗了。

随着日俄战争的日益迫近,社会主义者們就激烈地主張了反战論。他們开始时是以“万朝报”为根据地的,但当該报轉向主战論后,幸德和堺利彦等就創辦了“平民新聞”,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个口号,勇敢地为和平与反軍国主义而战斗了。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平民新聞”刊载了“給俄国社会党書”,提議日俄工人共同地来反对战争,同年八月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工人大会上,片山潛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普列汉諾夫握手并作出了反对战争的決議。

禁止發行“平民新聞”以及其他的迫害,越来越殘酷了。当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紀念創刊一周年时,由于刊登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平民新聞”就被禁止發行,幸德和堺也被提起公訴,在第二年一月,“平民新聞”終于不得不停刊了。

幸德事件与友爱会 日俄战争后,不景气是更严重化了,一九〇七年就爆發了大的危机,这与世界危机相結合就更加深刻。当危机和不景气之时,最先被牺牲的一直就是工人。工資的降低和工人的解僱也是很严重的。这样,从一九〇六年在各工業部門都頻頻地掀起了罢工。一九〇七年足尾銅矿罢工形成了半暴动的形勢,結果出动了三个中队的軍队才勉强地鎮压下去。在別子銅矿也掀起了暴动。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漲,社会主义者們也增加了勇气,在一九〇六年二月就組成了日本社会党。在社会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提高东京市街電車費的大市民斗争一事是很有名的。

社会党不久就發行了机关报“日刊平民新聞”从事主义的宣傳和工人的組織工作。

这时,在农村,佃农的貧穷化也日趋深刻。各地都开始組織了佃耕会。虽然它沒有与在这以后的农会那样明确的与地主对立和斗争的目标,但即使如此,佃农团結起来向地主要求減低佃租的斗争也逐渐增多了。甚至由于应该將土地平分給劳动农民的思想的扩展,使地主和政府也为之手忙脚乱。

对于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漲,政府就施加了殘酷的鎮压,使“日刊平民新聞”处于不能發行的状态,很多的社会主义者接連地遭到了非法的逮捕,一九〇七年二月,日本社会党被迫解散,而“日刊平民新聞”也因之不得不停刊了。

社会主义者虽然还是分散地各自走其各自的道路,但在日本社会党解散前,幸德秋水們漸漸地就提出了直接行动主义的主張。随着鎮压的强化,一部分人的無政府主义傾向也加强了。他們失掉了坚苦地組織劳动羣众和推进階級斗争的耐心,信奉了个人的暗杀和以少数者的暴力就能够推翻統治階級的錯誤的幻想而离开了社会主义。

一九一〇年夏,一个無政府主义者想圖謀暗杀天皇的問題,被政府所發現。政府趁此为机会就非法地逮捕了与这一案件毫無关系的以幸德秋水为首的当时在日本从事牢獄外活动的所有主要的社会主义者,以完全黑暗的审判,就將二十四名宣判了死刑(实际上执行了死刑的只是幸德及其妻管野須賀子等十二人),这就是所謂的大逆事件。此后,在日本,社会主义当然是,就是一切的工农运动也都遭到徹底的鎮压,甚至連“社会”这个字样都不准使用。就是“昆虫社会”这一通俗的动物学的書也甚至說它因为有“社会”字样是不穩的,而被禁止銷售了。

但是工人階級正如不死之鳥。“死而重生，由死灰中重生的，我這不死之鳥，你殺吧，殺殺看，我是不死的”（羅曼羅蘭）。從幸德被處死刑這一年（一九一一年）年末到翌年一九一二年一月就爆發了東京市電車工人大罷工。這一罷工是由片山潛領導的，最後是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但片山却因此而被囚進牢獄，最終，也不得不由日本逃亡出外，此後，他再也沒有能夠回到祖國來。

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杜塞工人的自覺和團結了，這一問題已經是很清楚的。于是在大資本家澁澤榮一的支持與鈴木文治的領導下，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就組織了“友愛會”。這組織就是以反對工人与資本家鬥爭，主張勞資協調為目的的。但覺悟的工人還是大批的入會了。因為在當時要想作合法的活動，除此以外是別無其他組織的。不論是什麼工會，工人團結這一問題本身就有着很大的意義。友愛會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工人階級發展的同時，也暫時得到了順利的發展，到一九一七年為止，在日本全國所有主要的工業地區都有了支部。工人的全國性的組織，也開始在日本成長起來。

四 明治文化

教育和學術 于公佈憲法的第二年，就發佈了教育勅語。由于教育勅語，學問的根本上的批判精神就被扼殺了。它將日本這一國家和道德都說成是天皇的祖先的各神創造的，並將日本人作為臣民而竭盡忠誠使天皇得以永享榮華一事說成是最崇高的道德。在教育勅語中，甚至連“愛國”這一道德都是沒有的。這是由于國家是天皇的而不是國民的，因此“愛國”這一思想也無從產生，而只

是單單強調忠君的。

而且，也正如本文所說“懷念我國往昔事情的國粹主義”和過激國家主義是被獎勵的，而勞動人民的自由、和平和民主的思想則是受迫害的。

學問也為教育勅語所壓抑了。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的久米邦武教授，由於提出了“神道是祭天的古俗”這一學術論文，就被說成是違背國體由大學中被驅逐出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丘淺次郎在講授動物進化論時，宮內省就說，進化論就是講天皇的祖先不是神而是猿的，這是不可以的，於是一時就停止了他的講授。當時，丘淺教授就說，“人人說老老實實的不會惹是非，但並不是這樣，就是老老實實也要惹是非的。日本如果壓抑老老實實的科學的批判的話，那末現在就會招到是非的”。事實上，豈不正是由於這樣，在這次戰爭中惹到了大是非嗎？

帝國大學是培養官吏和官家的技術家的，就是現在也是如此。在帝國大學，歷史、社會和法律等關於社會方面的真正的學問是不發達的。固然以很多的金錢和設備在科學技術方面有了一些進步，但這與先進各國也仍是不足以相提並論的。批判的精神萎縮不振，也沒有學問是為了人民的幸福這一堅強的信念的，只是為了戰爭及統治人的學問也是不可能十分發達的。如本文所寫到的北里柴三郎就不是帝大而是民間慶應義塾出身的，是從德國的高霍研究過的人。日本人並不是沒有作學問的能力的。北里也好，野口英世*也好，當他們鑽進了自由的學問的氣氛當中，那麼他們就作出了驚人的事蹟。日本的官僚和軍閥的學校以及教育勅語是沒能夠使人

* 野口英世出身貧苦農家，著名細菌學者，隨北里柴三郎研究細菌。一八九八年發現鼠疫菌。一九二七年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感染，一九二八年歿。以研究狂犬病、小兒麻痺及痘瘡病原著稱於世。——譯者

們的能力得以充分發展的。我們到現在為止，以沒有大發現和大發明而愧對先進的國民，但如成了民主日本時，必然的會以優異的學問貢獻於人類的。

文學和美術 本文的這一項只是羅列了過多的人名。其中有落合直文等反動學者，也有像尾崎紅葉那樣的通俗作家。理應把這些刪去，提及以坪內逍遙是最先的在我國提倡了寫實主義的問題，二葉亭四迷又復將其付諸實施並為言文一致而努力的問題，介紹森鷗外的翻譯和創作等。再有，本文雖未提到但應該舉出在小說方面的夏目漱石的事蹟，敘述在詩和短歌方面的石川啄木的成就，也應該提及島崎藤村從明治到大正和昭和，不論在詩和小說方面都有了優越的貢獻等問題的。本文的任何地方都未提到大正和昭和的文藝，但如長塚節的“土”等就是反映了二十世紀一十年代的勞動人民生活的高度藝術的表現。在這以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像小林多喜二為工農勞動者寫出了很多而且是優秀的小說，甚至有的人受了他們的教育都拋棄了生命，這一點也應對兒童加以介紹的。

在美術方面，本文雖然談及菲諾羅莎發現了日本古美術的價值，但必須注意他是主張因為日本的美術是以封建的農業社會為基礎的，所以，為了保存和發展所謂舊日本美術，日本就不應成為工業國的這一點。自古以來的所謂日本美術既然是立足于封建農業社會，那麼，它就不能原樣地成為新的日本的美術，是有必要作某些改革的。在油畫和其他所謂西洋藝術，我們也不應永遠稱其為西洋美術，而應作為新的日本美術加以充分的發展，這些問題是有將其弄清楚的必要的。

這一問題，從音樂方面來看是更為清楚的。三位箏* 和琴的

* 一種日本弦樂器。——譯者

音乐，虽然是称之为“日本音乐”，但这只是古日本的音乐，而所谓西乐已经成了现代日本的音乐这一事实也是不容否认的。这一问题，只要考虑一下，能不能做到将三位线的小歌和端歌的靡靡之音教给儿童使它们去欣赏的问题，就会明白的，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做不到的。

第十二 从大正到昭和

一 欧洲大战和日本

本文以“欧洲大战和日本”这一节的题目开始，將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問題，都称之为“欧洲大战”。这当然不是正确的称法。仅仅从日本和中国参战、美国也参战了这一点上来看，也很明显的这并不是單純的欧洲大战而是世界大战。不仅如此，就是从这一战争的实質內容是帝国主义的世界爭霸战，它給予了全世界——也包括日本在內——以深刻的影响来看，給它冠上了儼然是另外一个名字的欧洲大战，也表明了这是十分欠缺历史观念的。

民众的力量 当日俄战争后的工人运动好似已被軍閥官僚政治所镇压下去的时候，民众的力量在政治方面就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以中产阶级的进步的知識分子为先鋒的，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要求的高漲。例如后来民本主义运动的鼓吹者吉野作造博士就強調說，他和其他的民本主义以及普通选举的运动，都是受了日俄战争前后的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影响的結果。

从一九一〇年前后，改变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解釋，主張主权在于国家，而天皇只不过是作为国家机关有着統治国家权限的“天皇机关說”就風行起来了。另外，由于对普通选举的要求的高漲，

而这一要求也推动了进步的議員。在第二十七次議会上，当整个統治階級虽一面將幸德秋水等判处了死刑，但还懼于民众的力量，的时候，議院也终于通过了男子普通选举法案。然而在貴族院則借口給予貧穷的平民以选举权，那無疑是等于对国家的叛逆，并且表示今后貴族院不再受理这样的法案而否决了这一法案。

当时的桂內閣，在这样的貴族院的支持下，恣意地推行了反动政治，但終因財政困窘遭到了資產階級的反對而辭職了。代替他的是比較自由主义的西園寺公望以政友会为基础而組成了內閣。

在这一內閣时期，陸軍強硬地要求增加兩個師團。但由于輿論方面是反對增課重稅來加強軍隊的，而內閣的文官們也沒有採納陸軍的要求。于是陸軍就撤去了陸相而使內閣垮台了（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為軍部的橫暴而憤慨的民眾，就掀起了維護憲政的一大運動。當時的報刊雜誌有的還揭露了陸海軍的干部與御用商人之間的不正當的勾當，同時，主張軍部大臣文官制的聲勢也頗佔了上風。

特別是在此以前的七月間的明治天皇之死這一件事，就給了山縣、井上馨和被稱作“元老”的軍閥和最高首腦部以很大的打擊。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明治天皇才是培養了他們的君主，當他們自己的勢力危殆時他們就立即利用了天皇的力量，但現在這一靠山却是沒有了。由於年輕的大正天皇的無能，元老和軍閥官僚固然也還是為所欲為，但他們的靠山也只有這一點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並沒放過一點，攻擊軍閥貴族的輿論就更加激烈了。

繼西園寺內閣，桂又再度作了首相，但由於他使大正天皇發佈詔書，任何事情都借口說是勅命而任其所為，於是全國新聞雜誌記者大會為首的所有民主主義勢力，對此就猛烈地加以反對。大正天皇召見了曾為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并面囑不准反對桂內閣。

天皇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人民的輿論比天皇是更強的，西園寺無法抑止也不得不任政友會去攻擊政府了。桂內閣僅僅兩個月就被人民打倒了。接着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組成了海軍軍閥首領山本權兵衛內閣。這時海軍首腦部的多數人，關於軍艦及其他武器的輸入和製造方面，接受了三井及外國軍需公司巨額的賄賂問題被揭發了（西門子事件）。輿論就抓住了這一點而攻擊軍閥政府。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二月在議會開會中，數萬民眾就要求議會對政府監察而舉行了大示威遊行。對此政府方面出動了數千的警察與軍隊，打傷了很多的人民，而且還將他們囚進牢獄而施加拷打，但是畢竟山本內閣也未能與輿論為敵，其後不久也辭職了。繼之又成立了與三菱有着深遠關係的伯爵大隈重信的內閣。這一內閣是以憲政黨的身後即桂所組織的“同志會”為基礎的。其外務大臣兼副首相的加藤高明就是三菱的女婿，其他與三菱有關係的人也都佔據了政府的要職。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會議 這時，在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也正是日本資本主義遭受第五次危機的年代。於是在遵守日英同盟的借口下為了第一，奪取德國在中國的利權，第二，進一步在中國擴大自己的利權，第三，將上述的國內民主主義運動轉向戰爭，就在英國並未要求日本參戰反倒是反對日本參戰的情況下，就對德國宣戰並佔領了德國租借地青島一帶，海軍也佔領了南洋群島的德國領地。對於日本未經英國要求就參戰一事，就是議會中也是有反對意見的，報紙也攻擊說這是以外戰來轉移民眾的反政府的熱潮的。

第一次大戰是英帝國主義和德帝國主義的世界爭奪戰。其結果是英國方面勝利了，但經過整整四年多的大戰，勝利了的英、法也都大大地削弱了。而美國從大戰末期卻逐漸在世界政治上掌握

了很大的勢力。日本也成了列強之一。

媾和會議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法國凡爾賽召開的。其結果是德國所有的海外殖民地都被奪去，還被課以龐大的賠款，禁止了一切的軍備。由於這一媾和和約，日本接管了膠州灣以及山東省內德國的權利，並實施了對舊德屬南洋群島的委任統治。在戰爭中從中國所獲得的利權幾乎也都被承認了。

這會議的主角就是美國大總統威爾遜。為戰爭所疲憊的全歐洲人民對他的期待就如同期待和平之神一樣。他所倡的“民族自決”原則，被為帝國主義所苦的弱小民族當作是希望之星了。但是這只是在口頭上，實際上凡爾賽和約並沒有承認弱小民族的獨立權，而不過是被帝國主義大國利用來重新分割勢力範圍。就是威爾遜本身在口頭上一面高倡着和平，另一面却仍積極地從事於干涉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爭。

由於威爾遜的提議，就創設了國際聯盟，世界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幾乎都參加了這一組織，但提議者的美利堅合眾國卻沒有參加。這就是威爾遜式的“和平”。

俄國革命 第一次大戰末期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的最大事件，這就是在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廣大地區的俄國，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即廢除了一切剝削制度的工農共和國。

在俄國，反對野蠻的封建的壓迫民眾的沙皇的人民解放鬥爭，從十九世紀初葉就發生了。不久，資本主義也在俄國得到了發展，並隨着無產階級的形成，科學的社會主義也作為俄國人民解放的原理，在進步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中間普及起來。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天才的革命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出現，關於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原動力、也是革命的唯一真正的領導力量，只有在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推翻了沙皇和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工

人、农民和市民才能够被拯救，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了完成革命必須組織無产阶级的先鋒队的 强固的革命政党，这个党又必須正确地根据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来領導等問題，从理論上和俄国社会現实的分析上以及革命實踐中就被明确起来了。

列宁組織了像他所說那样的革命党——开始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改名共产党——不断地批判了党内各种的錯誤理論和行动，正确地領導了党并成功地 把工人和农民羣众团結在党的周圍。

到第一次大战开始为止，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也是叫喊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实际上当战争起来后，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本国的帝国主义者站在一起而支持了战争。列宁和他的党布尔什維克則是坚决反对战争并且号召群众將帝国主义战争轉变成国内革命战争。俄国虽然随着英国方面参加了战争，但在战场上却是屡屡失敗，国内人民的生活也是一年比一年穷困。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的工人、农民和水兵厭惡战争，提出給全体人民以和平和面包、給农民以土地的要求而起来斗争，最后终于推翻了沙皇（三月革命）。但政权却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政府仍然繼續战争，对于給农民以土地，給工人以面包等問題并没有作任何保証。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無論如何是必要的了。

布尔什維克党，認為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在采取了比較民主的政策期間，革命有可能而且必須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于是就应努力于使临时政府的政权和平地轉移到当时在各地組織起来的工农兵會議即“苏維埃”去。可是到了七月，临时政府 就开始对这和平的革命运动加以猛烈地镇压。民主的言論和集会的自由也完全沒有了。很明显的，革命是必須要以人民的武装起义来进行的。

以首都彼得堡为首的全国的兵士、艦队水兵、工人和农民到处

都召开了大会，作出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決議，准备武装起义。一提到暴力革命有人就感到有陰謀的气味，但以鬼鬼祟祟的陰謀活动是不能掀起近代的革命的。这种革命，比起投票获得的多數來說，如果没有真正的多數，没有真正人民的絕對优势的多數的全心全意的支持，那么也是难望胜利的。也就是說，这一革命并不是以議會投票的多數通过的，而是以街头行动的多數所通过的。布尔什維克从一九一七年的八月到十一月，在全俄得到了絕對优势的多數人民的支持，十一月七日，彼得堡的兵士、水兵、工人终于掀起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冬宮，夺取了政权。

苏維埃政府立即施行了土地革命，保证了工人的自由，并向全世界呼吁，要所有的交战国都能立即停止战争。这样，一九一八年三月就与德国締結了和約。

俄国革命的影响，像闪电一般扩展到全世界。在德国罗莎·盧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都保衛着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工人和兵士的支持。这样，为俄国革命所鼓舞，一九一八年一月，为了要求和平，柏林的軍需工厂的五十万工人就掀起了罢工。前綫的兵士也迅速地丧失了战意。十月又爆發了水兵的大起义，革命势力儼然是要从根本上来摧毁德意志帝制，后来威廉第二就逃亡国外，共和国宣告成立，十一月德国终于向协約国投降。德国革命从此就日益發展了。决定第一次大战得以終結的力量，与其說是由于美国的参战，倒不如說是由于俄国的革命。

在德国的同盟国奥地利、匈牙利，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工人的政治性的同盟罢工和兵士的起义曾屡次發生。在意大利也是如此。这样，俄国革命就掀起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一直到一九二一年，这一形势是不稍衰的。下述日本的“米騒动”和朝鮮的万才独

立斗争以及中国的五四运动,也都是受了这一影响才發生的。

出兵西伯利亞 資本主义各国認為布尔什維克是不能够長期保持政权的,与他們的希望相反,革命政府却粉碎了地主、貴族、資本家,反动軍人等一切反革命勢力。为此而惊慌的各国,以十六国的多数的联合与俄国国内反革命軍相呼应,并派遣了大軍想把这剛剛出生的苏維埃国家击潰。

日本的出兵西伯利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日本的資本家和軍人比国联更先地,在俄国革命爆發后不久,就佔領了当时沙俄所經營的中东路(自滿洲里到哈爾濱的鐵路),作为自中国东北扫清俄国勢力,將日本政治軍事勢力向濱海省和庫頁島擴張的絕好机会,并援助了西伯利亞及中国东北的俄国人的反革命組織,窺視着出兵的良机。一九一八年春,当国联共同地决定对俄国武装干涉的方針时,国联虽然限定了日本出兵人数要在一万二千人以内,但日本毫不在意地,从一九一八年八月陸續向西伯利亞派出了大軍,最多时曾派遣了七万三千人。但这一国联的武装干涉,就立即被为保衛祖国和革命而站起来的苏維埃人民所击退。当各国到一九二〇年一月为止都各自撤了兵的时候,日本却不顧各国的反对,沒有任何名义和借口,实际上是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为止,都是执拗地企圖去占領西伯利亞,但結果是遭到了慘敗,在国际上也受到猛烈的非难。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初的重大的敗战。

俄国共产党和俄国民众,完全打退了所有的內外的反革命,克服了各种困难,終於建設了像今天所看到的强大的苏联,穩固地建立了沒有剝削、失業和危机的社会主义社会,联結了世界資本主义的环节是被大大地切断了。从此以后,这缺口就逐漸扩大,在第二次大战后的現在,由于中国和东欧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在地圖上也是一目了然的,歐亞大陆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屬於社会主义

陣營的，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都脫離了資本主義的統治。世界歷史的大的步伐——假如從短時期內，在狹小的地區來看，也許看不大出來，但從大的，從歷史的根本方向來看——顯示了社會主義已經是不可戰勝了。

對華二十一條 第一次大戰前，中國在孫文的領導下，革命力量強大了，一九一一年終於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中國各地仍被舊軍閥所割據。

中國成了共和國這件事情，使以君主制為最大靠山的日本軍閥和官僚的巨頭，使所謂元老的山縣有朋等非常擔心。他為了無論如何也要阻止住中國革命維持帝制，就一直在窺視着干涉革命的機會。但是日本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和資本家對中國的政治形態本身却並不是如此關心的。他們期望着腐化革命黨想借他們作為爪牙以便於向中國侵略，或是企圖與清朝勢力勾結起來等等，總之是沒有一定的明確方針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發展方向不能有明確的預見，而是企圖與當時的認為占優勢方面相勾結而已。不論如何，所有的日本統治階級只有在一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利用中國的混亂來更加鞏固地種下日本政治和經濟勢力。

恰在這時，就爆發了大戰。日本侵略主義者們認定了這是天假良機，就利用了歐美各國為了大戰而無暇顧及東方的時候，日本政府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就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要求，而正向青島德軍攻擊的日本陸軍也作了向中國內地進攻的準備來恫嚇中國政府。所謂二十一條共分成五項，第一項，山東省的前德國的一切利權由日本接收，第二項，將東北幾乎要全變成日本壟斷的殖民地的各種要求，第三項，漢冶萍的鐵、煤工業要由日本壟斷，第四項，中國沿海口岸不准割讓給外國，第五項共七條，即中國政府要聘請日本人的政治和軍事顧問；中國警察要聘用日本人或者是由

日华合組警察；要求中国軍的軍火供給要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此外，長江流域的鐵路利权，寺院，學校和医院在中国內地的土地所有權，傳教的自由（实际上是作間諜的自由）以及將福建省置于日本勢力之下的要求等等所構成的。一句話，这就是要想將全中国不論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完全地置于日本統治之下的，历史上最兇惡的帝国主义的猙獰面目。

中国人民对日本的無理要求是激烈反对的。当时中国的大总统是从清朝时代就是軍閥巨头的袁世凱，是后来受了日本的帮助而当了皇帝的卖国的野心家，他在日本的压迫下与其說是要抵抗到最后，倒不如說是在企圖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来維護其地位的。终于在五月就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只是在第五項的各种要求，由于中国民族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也畢竟沒有得逞。

“二十一条”是使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恨入骨髓的直接的动机。孙文等过去虽然也曾希望日本能站在亞洲各国民之前，来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势力，援助东亚各民族的独立，但自此以后，也痛感到日本比起欧美帝国主义來說，是更为兇惡的帝国主义了。

資本輸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資本家不仅向中国銷售棉紗、棉布等商品，而且还輸出資本，在上海、青島、天津等設立了紡織厂，以低得惊人的工資僱傭中国工人，获取了巨額利潤。另外，日本的銀行家們与政府和軍部緊密地勾結起来，与政府共同地或是單獨地給予中国政府和軍閥以龐大的借款。对这些借款，中国政府也不是用来振兴生产事業的，而是成了擴張其軍閥势力的政治和軍事的資金。日本政府和資本家就是这样地煽动了中国軍閥势力的斗争，利用日本的爪牙，企圖在中国扩大其政治和軍事势力的。

不論資本輸出是为了建設工業，还是以換取利权为代价的政

治借款，它都是帝国主义的經濟特征，而且，它也必然是伴随着为了保护其資本的政治和軍事上的活动的。正因如此，所以帝国主义就不断地在增大着战争的危險。

从接受資本輸出方面的民众來說，外国資本的輸入就意味着：第一，工人工資是極為低廉的，被剝削的情况也是殘酷的。这是由于外国資本能以比僱傭本国工人更为低廉的工資僱傭到輸出对象的工人，能够得到更大的利潤才輸出的，因此，它是完全沒有恢复与發展对方国的經濟，推进文明的非營利目的的。第二，外国資本直接的投入工業，或是成为政治借款，而特別是后者，輸入国的政治独立就受到了威胁，或者就被完全剝夺了。这与負債者对債主抬不起头来的理由是一样的。第三，吸收这种对人民不利的外国資本，却使一部分的当权者和資本家以及巧妙的与外国資本相勾結的人發了大財。日本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借款，就使接受这借款的段祺瑞等軍閥發了大財。因此，这些人們也就容易屈服于外国帝国主义，并成为他們的爪牙。所以，第四，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就必然与对国内的卖国叛徒的斗争相联系起来。

中国的革命民众，就是这样地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打倒軍閥和国内的革命的統一的斗争相結合，使一九一一年沒能成功的革命运动更加發展。在一九一九年凡尔賽媾和會議上，当知道中国政府要屈服于日本的要求时，北京的大学学生們，于五月四日举行了街头的示威遊行，高举“外爭国权、內懲国賊”、“廢除二十一条”、“誓死夺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号。这一运动立即波及到了上海，促成了上海全市的罢市，上海和南京的鐵路工人的罢工及其他的工人斗争。这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的开端，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直接起点。

米騒动 在第一次大战期內日本的各种工業得到了很大的發

展。机械、器具、造船等重工业和海运的发达尤其显著。电气和化学等工业，从这时也有了迅速的扩展。工人数目比起战前也激增了。仅以使用职工在五人以上工厂的工人来看，一九一三年为一百一十八万人，而到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一百八十二万人。城市的发展也是很突出的，一九一三年，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市、町、村的人口总数，占内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但一九一八年却增至百分之三十二。

大战中维持了景气情况，资本家轻易地就发了财，到处都出现了船财主，铁财主等暴发户。物价节节上昇。但工人工资却并未相应地提高。一九一七年大米、煤、衣料的价格比战前增高了百分之四十，但工资却只增了百分之十。到一九一八年，物价就愈益飞涨了。

特别是米价是年复一年地在上涨着。战前一升白米为日金一角二分到一角三分，但到一九一八年春却超过了二角，七月又涨到了五角。固然，地主囤积大米待涨和大米商人的投机也是使其异常暴涨的重要原因，但在日本的半封建的农业和寄生地主制之下，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和城市的迅速的发展，对大米的需要也增大了，但生产却不能迅速增加来适应由于景气而对农家的大米的消费的增加。第二，因为国家是以保护地主为第一要义的，因此，不管大米多么昂贵，仍然不想改变对外国大米征收输入关税和其他保护地主的法律和政策，这样就急速地促成了粮食危机。

由于政府和政党都是地主阶级的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一点也没采取为一般人民及一部分工业资本家所切望的有效的对策，诸如，废止外国大米输入关税；迅速地大量输入并以低价出售；对于地主的囤积以及对投机者采取严格的管制等，相反，倒混淆着舆论，任憑米价上涨。正因如此，所以一般物价也随之涨起来了。

当时工人工资,平均日工资男工是日金九角二分,女工则仅为四角八分上下。巡警和下级官吏、职员,月薪也只为十五日元到二十日元,他们一般的都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

富山县新川郡的沿海一带,不管哪一家都是男子到北海道捕鱼,女的留在家裡的,但因丈夫和兄弟們寄来的钱数目很少,所以她们们的生活也就日益穷困了。终于八月三日中新川郡西水桥町的渔夫的妻女们数百人举行了要求米舖落价的游行示威,进一步又列队走访街公所和街的资本家——渔夫的老板和大商人——之家,提出请愿,要求降低米价或者是撥發救济米。这个消息一經傳出,在东水桥、滑川、魚津以及其他富山县海岸一带的街上,要求降低米价的游行示威,或者是反对大米商人的囤积和运往县外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的一直繼續到八月。

这事件报纸作为“越中的妇女暴动”而傳播到全国去了。当此时,由于所有日本的城市也是弥漫着同样的空气,因此,在听到妇女暴动的消息之后,八月九日在名古屋、京都二大城市也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要求降低米价的市民大会。第二天,这和平市民的示威游行和集会,终于遇到了警察的镇压,从这开始就转变成了暴动。十一日民众运动在大阪、兵庫、和歌山、岡山、广島的各府县也都發起了,从这一天起到十四日,在仅仅四天之内,立即在日本全国所有的大大大小小的城市和若干的农村爆發了所謂米騷动的群众暴动。

群众以游行示威的威力施加于米舖,要求其廉售大米,或是襲击了大米的投机者以及平素对群众作威作福的富豪們,有时还将其住宅破坏和燒毀。有的則想襲击大米交易所,或逼迫县长和市长要求他們提出米价的对策。另外,被襲击的警察署、巡警的派出所和崗警也是極多的。

对此，政府仅以警察是镇压不了的，于是各处都动员了大批的军队。出动了军队的市和镇甚至达到了六十处。在吴市，海军工厂的工人与镇压他们的陆战队之间，爆发了几乎像巷战那样的冲突，死伤者竟达数十人。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军队对民众不一定是作了充分的镇压的，如在岡山市最初的一个中队，有的很明显地对民众是抱同情态度的。像警察队那样，在民众以毅然的态度出来并采取了果敢行动的地方，他们都是袖手旁观的。恐怕这是因为警察本身也以难以维持生活的低廉的月薪所苦，才失去了镇压的勇敢的缘故吧。

当米骚动时，很多的工厂和矿山特别是在山口县和北九州的煤矿，就举行了罢工，有的还转化成了暴动。另外，在农村在地主与佃农之间有纷争的地方，也变成了暴动，而且，在有农村工业的地方还有以当地的工人为中心与贫农一起掀起暴动的例子。这样，米骚动就以工人为主力，经过了一个月，从九州到北海道，扩展到几乎席卷了内地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与此相关连而被起诉的人竟达七千八百人。

米骚动是完全自发的群众暴动。而且，在这骚动的过程中，群众开始时仅仅是袭击米铺的，但也逐渐地将注意转向了警察、县长等国家权力方面。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就好像是在统一的指令下似的，在大阪、神户、名古屋、东京以及其他全国主要都市都一起暴动起来。在这里显示了日本社会的巨大进步。因为像这样同时的全国性的群众暴动，在封建社会及封建社会以前是绝对起不来的。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发达了，交通通信机关也高度发达起来，人的来往和思想、知识的交流也频繁了，（日本，通过报纸大体上在当天就能将世界中的问题传遍全国），城市工人既形成了群集，又是密集居住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达这一根本问题虽然将整

个国民置于少数大資本家的剝削之下，但在另外一面，全国人民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之間一致起来并加强了整个人民的联系等等，只有有了这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够在全国範圍內同时發生群众暴动。假如这时群众有着統一的领导部門时，恐怕米騷动就不單單是像旋風样的暴动而終，而是会成为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

米騷动，从世界史上来看它是俄国革命影响的一面。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他們几乎对这群众斗争未加組織和领导的。在大阪和东京的市民大会，虽然也曾有兩三个社会主义者，如在东京的山本悬藏等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还不能說是领导作用。俄国革命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每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作为一般的空气使俄国人民的偉大事業在不言之中鼓舞了工人和受压迫、受歧視的部落民以及其他所有無产、無权力的人民的。而最尖銳地反映了这一問題的，就是友爱会机关刊物“劳动和工業”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号上所登載的仙台的一个工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說，“俄国革命給了工人以生的希望”。此外，在該刊物上还載有“俄国革命的感想”的文章十余篇，而大部分都是讚頌革命的。像这样的讚頌，即使不呈現于表面也是会打动人們的心弦的。

米騷动一个月就終結了。群众像旋風一样地暴动起来，在数日內就将力量耗尽了。但它的影响却是極其深刻的。由于这一群众暴动，軍閥官僚的内閣就被击潰了。当时美国駐日大使館商务官拉比特就說“政治家們苦心地要經過几年才能做到的，群众一天就完成了”（“大米和社会政策”）。因此，在日本就最初地出現了政党内閣，即原敬的政友会内閣。一八九八年的大隈内閣，虽然也是政党内閣，但当时并不是因为大隈是政党首領才当上了首相，而是作

为元老之一才被任命的。现在的原敬不是华族——过去的惯例是首相必须要伯爵以上的华族——而只因为他是政友会的首领才当上了首相。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要统治像掀起米骚动那样的革命群众，就有必要做一些民主的和反官僚主义的伪装所致。可是，就是这政党内阁，也不是真正的政党内阁。因为军部大臣除了军部以外，任何部门都是不得提名的，而军部也是经常地会致内阁于死命的。另外，政党内阁也只是有了议会政治才能成立的，在日本由于是天皇政治，真正的政党内阁从原理上说也是不可能的。

米骚动又成了此后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发动力量。因此，它就成为了其后的民主运动的最有力的源泉。总之，米骚动是唤起了日本民众对自己的潜在力量的自信，成了日本此后一切革命的进步运动的基础。

工农运动的发展 米骚动的时候，米价一时是跌落了，但不久从年末起，涨的反比以前更高了。工人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大胆地起来斗争，罢工的風暴是一直连续下来了。一九一九年就爆发了东京炮兵工厂及其他兵工厂二万五千人为期二十天的总同盟罢工，爆发了神户川崎造船所的一万七千人的罢工以及釜石铁矿、足尾铜矿等大罢工，为了镇压釜石和足尾的罢工甚至还出动了军队。在这一年的三月一日爆发了如前所述的朝鲜大独立运动。八小时劳动制是由川崎造船所罢工才开始争取到的。第二年，即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也发生了八幡制铁所二万五千人以及其他各地的纺织女工的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又发生了从六月末起为期四十天的神户的三菱、川崎两造船所及其他有关工业三万人的大罢工，但还是遭到了军队的镇压。此外，也曾有了很多的大的罢工。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以横滨船塢公司和大阪造船公司以及机械工会共同斗争开始，造船、铁工、纺织等大工业的罢工

也頻頻地發生了。

反映了這樣的工人的成長，工會也發展了。友愛會在一九一八年就擁有了一百二十個支部及三萬個會員。在大阪和東京以金屬工業為中心也組織了一些工會，這些工會也逐漸的被友愛會所歸併，或是組織了統一戰綫，這樣，工會就擴大了，工人的覺悟也提高了，在這樣情況下，即使工會幹部如何的妥協，但工會的自主化運動仍然是會發生的。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在友愛會的大會上，就停止了鈴木的獨裁制，改稱“大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隨後在一九二一年連友愛會的字樣也被去掉，真正地為了工人與資本家鬥爭的特點也加強了，不僅如此，還提出了普通選舉和修正治安警察法等人民政治權利的要求。另外，在會內山本縣藏和渡邊政之輔及其他革命工人的勢力也加強了。在友愛會的大會上懸掛着太陽旗，唱着“君子代”^{*}歌的，但現在則掛上了紅旗，合唱了勞動歌。

一九二〇年，在日本初次舉行了一萬工人的五一遊行。

第一次大戰中，農村的景況比以前是好的。但這期間中小農民的貧窮化，也確實地在進行着。一町左右耕地的所有者每年要減少二至三萬戶，另一方面，土地卻向十町以上特別是五十町以上的大地主的手中集中。一九一〇年農家有百分之三十三點四是自耕的，可是到一九一九年卻減到百分之三十一點六了。在同一个大地主之下形成了多數的佃農一事，就促進了佃農的團結。另外，城市工人的鬥爭影響也波及到農村，佃耕糾紛在一九一八年為二五六件，到一九二〇年就增至四〇八件，在這第二年又復激增至一、六八〇件。這是因為農產物價格顯著地降低所引起的。與此同時，佃農會也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一九二二年又組成了“日本農民組合”。這個組織開始時是極為妥協的，但後來卻迅速的成

* “君子代”為日本國歌的歌名。——譯者

为战斗性的組織了。

普通选举法和無产政党 这一时期的主要政党是政友会和宪政会。政友会如前所述，是由伊藤博文組織起来的，是官僚、地主和三井財閥及其他大資產階級的党。宪政会是在前述的同志会的基础上，糾合反政友会的各派于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組成的，是以加藤高明为首領，以三菱財閥为背景与官僚 和一部分地主相勾結而組織起来的。

这些政党在一九一二年，如前所述在群众的压力下，提出了普选法案，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群众对政治 的关心 被剝夺了以后，議會也根本就再未提及普选問題。

然而由于工会的强大，为此所鼓舞的进步的知識分子也增加了勇气。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总同盟”的工人們在东京和大阪，又复煽起了普通选举的火焰。第二年，在东京五万人的工人和劳动市民的要求普选的示威遊行 就举行了三次。此后，在工会中就滲入了無政府主义的錯誤，出現了輕視普选的傾向。

在这年年底，山川均等就組織了社会主义同盟。这是个集合了無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組織，它虽然也不是能成为强固的政党的組織，但作为政党的萌芽也被进步的工人所接受了。

不久，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七月，日本工人階級終于組織了它的先鋒的党，日本共产党。渡边政之輔、德田球一和野坂參三就是它的創立人。这个党当然也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但却一直是以各种方式站在日本劳动人民的最前列的。

共产党一成立，也就給了总同盟以很深刻的影响，会長鈴木文治和松岡駒吉为这一形势所惊，就愈益加强了劳資协调主义。而且，在一九二三年就發生了最初的对日本共产党的檢举，总同盟于

部山本县藏等也被囚进监狱。于是铃木等就以此为大好机会，主张开除与共产党事件有关的人。对此，渡边政之辅等虽然力守统一战线，但终于从一九二五年起铃木等就掌握了工会的实权，并将渡边政之辅及其他革命工人开除了。渡边等以在其领导下的二十五个工会为中心，组织了日本工会评议会，反对劳资协调主义，坚定不移地站在工人的立场来推动工会运动。很快的，评议会的势力也就超过了总同盟。

工人、农民和劳动市民的政治自觉愈益提高，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二月就不断掀起了反对过激社会运动管制法案，为了扼杀工会的工会法案、佃耕纠纷调停法案（这在当时称作三大恶法案）的大游行示威，来阻止法案的成立。另一方面，以劳动人民群众对普选的要求为背景，当时的在野党的宪政会也抓住了这一问题，于一九二〇年第四十二次会议上提出了普选法案。原首相对此则借口这法案潜藏着摧毁现在的社会组织的因素而加以反对，并将议会解散了。此后，普选运动也越来越高涨，一九二五年普通选举法也终于制订了。此法将妇女和不满二十五岁的都由有权者当中剔了出去，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限制，特别是在小选区制来说，对于既成政党，尤其是政府党是绝对有利的，而与人民所希望的则是相距甚远。但即使如此，在选举上财产的限制是没有了，这对于劳动人民的政治活动也起了些作用。

政府和宪政、政友两党不得已而承认了普选法，但他们对此法不但如上所述地加以歪曲，而且为了使人民的政治势力不至于伸张，在普选实施之前还制订了治安维持法。此法案表面上的宗旨是为了处罚图谋变革私有财产制度和国体的。向国会提出此法案的若槻内相，就曾几次地声明说这一法案绝不是管制“工人和农民运动”，而只是处罚私通外国并企图以暴力来改变国体的人而已。

表面上似乎仅是禁止共产党的，而实际上則是镇压一切为工人而斗争的力量的法律。首先打击的是工人的先锋共产党，繼而再打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甚至稍具自由主义的人们都受了这一法律的迫害，这件事对国民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这一年合法的日本农民劳动党成立了，但在成立大会后就立即被禁止結社。

在这第二年，劳动农民党也成立了。該党开始仅是由于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組合組織的，是不吸收参加評議會 的工人和参加在前一年組成的無产青年同盟的工人的右翼的党，但不久該党内左翼的力量增强起来以后，总同盟就脱离了該党，又組織了最右翼的劳資协调主义的社会民众党。其余的人是主張門戶开放主义的，在合法的政党当中是最有战斗性的。此外，日本劳农党和日本农民党也都在这一年的年末(一九二六年即大正十五年)成立了。

在这期間的重大事件就是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震災。当时內务省、警視厅为了轉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就散布朝鮮人掀起了暴动的謠言，混淆人心，虐杀了数万的朝鮮人。此外，还虐杀了作为共产青年同盟的领导者，为进步的劳动青年和学生們所尊敬的河合义虎为首的九位革命家(龟戶事件)，宪兵甘粕大尉襲击了無政府主义者的大杉荣，不仅大杉荣甚至连偶然与其同行的幼子，連呼都沒呼一声地就被當場虐杀了。这些杀人犯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更昇官了。

华盛顿會議 大战后以俄国革命为先锋，民众追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也掀起了革命的風暴，但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不管在何处它都是在革命最高潮的瞬間，就背叛了民众，將民众出賣給統治階級这一根本的原因，也由于当时还没有像建立了俄国的布尔什維克那样的先锋的党和杰出的领导者，就都没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从一九二一年前后，革命势力就轉入了低潮。但資本主义各国的政府却也不能够再無視群众追求和平和自由的呼声了。一九二一年由于美国的提議，美、英、法、意及日本等就在华盛顿召开了五国海軍裁軍會議。日本方面是由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作为全权代表参加的。在这个會議上規定了主力艦的比率英美为十，日本为六，法、意为三点五，在某种程度上也緩和了一下造艦竞争。

华盛顿會議也討論了远东問題，除上述五国外，又加上了中国、比利时、荷蘭、葡萄牙等在远东有着利害关系的九国，在各国尊重中国領土和主权、中国对各国平等的門戶开放等問題方面达成了協議。而这实际上絕不是为中国的領土和主权的，而只是將大战中單独由日本以二十一条为首的对中国的壟断的活动，主要地被美国阻止住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退后了一步，只是扩大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門戶进一步想由各国来瓜分中国的。另外，日英同盟在九国公約締結后，在已經沒有必要了的借口下也被廢除了。日本作为大战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其經濟实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長，但現在却被美英帝国主义所牽制，在国际上也陷于孤立了。

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針 此后，日本外交暫時在表面上是打着与英美妥协的招牌，但在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圖却毫未放松。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在日本人的紡織工厂中劳动的中国人掀起了罢工，他們头一个要求就是“严禁毆打工人”。由此即可看出日本的資本家們对中国工人是进行了多么殘酷的剝削了。这一罢工，在三月曾一度解决了，可是到四月末又發生了。五月十五日，日本人職員对罢工工人开鎗杀死了一个人，伤十数人。抗議这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工人、学生以及其他市民的遊行示威就开始在上海各个街道行动起来。五月三十日在英国警察的命

令下，租界警察一齐对着在公共租界示威遊行的一队学生开鎗打死了十三名。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开端。中国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比五四运动更大規模地、进一步地發展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這次事件中仍是个禍首。

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越来越强。对此，日本的一部分資本家及外交当局企圖一面与英美各国妥協，一面徐徐地来蚕食中国。这就是所謂幣原(喜重郎)外交。但軍部和政友会等則主張采取强硬政策，主張鎮压中国民族的反帝斗争，应將中国置于日本勢力之下，以此与英美冲突也是在所不惜的。

二 侵占中国东北

金融危机 大战中由于突然的景气，畸型地脹大起来的各种工業，到了战后也就必然要被整理的。一九二〇年的危机，就进行了这种整理。但是大資本家們由于买通了政府和議會，在各式各样的名义下，由国家取得了补助金和貸款，得到了国家的訂單，而且还不断地掀起了通貨膨脹，人为地抬高了物价才渡过了这一关。此外，資本家們在一九二三年以后，借口“使工業合理化，以便增加生产，制造低廉的貨物”，就挤垮了中小企業，解僱了工人，延長了劳动時間，并迫使工人不得不更加緊張地去劳动了。

在这过程中，中小資本家被挤垮了，而大資本家却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工業。日本財富的大部分都集中到岩崎(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大倉、古河等數家族的大財閥及其一伙，集中到比上述任何一家族都無遜色的大財閥、大地主的皇室去了。失業者在一九二六年左右就显著地增加，最少也达到了五十万人。由于人民的

生活是这样地降低，因而大資本家对其制品的銷售也困难了，利潤率也下降了。在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上半年工業公司的利潤率是百分之十七，但下半年就降低到百分之十三点六，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为百分之十二点五，下半年又复降低到百分之十一点六。特别是繅絲和紡織公司的利潤率減低得更厉害。

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中国民族工業的發展。也就是說日本如上所述对中国是强行了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而这一点也就更加激起了中国的反日高潮。在中国，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組成統一戰綫，九月就攻下了武汉，年末时在長江沿岸的地盤已經穩固地建立起来了。翌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就佔領了南京、上海、杭州，將軍閥赶到华北的一隅，呈现出就是这里不久也要被占領的趋势。这样的中国統一的进展，同时也是反帝国主义的發展，这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也是不小的。

一九二七年初，兩三家地方銀行發生了挤兌風潮，并波及到东京相当有資力的銀行。不久，受到政府的特別監督和保护的台灣中央銀行，而且是日本向南洋活动的金融上的据点的台灣銀行，就瀕于破产的危机。这是因为該行对神戶的鈴木商店——以台灣为根据地而成長起来的財閥——沒有担保地放出了鉅額的貸款，而鈴木商店則是处于破产的邊緣無力償还所致。由于台灣銀行放棄了鈴木商店，該店在四月就終於破产。此后，第十五銀行及其他与鈴木商店及台灣銀行有关的銀行和公司、商店亦相繼倒閉。这期間，在中国，国民革命軍和日本陆战队的冲突和排斥日貨問題屢次發生。一部分資本家、官僚和軍部就非难当时的若槻宪政会內閣，說它对中国革命的方針是愚緩的。四月，內閣为了挽救台灣銀行向樞密院提出了緊急勅令案时，樞密院就提出对华外交的問題，否決了勅令案，拆垮了若槻內閣。

乘此危机，大資本更得到了飞躍的發展。例如在煤、鉄、鋼、銅、石油、电气、硫安、人造絲織品、制糖、紡織等基本工業，三井，三菱等系統的二至六個公司就占了各該部門整個生產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二二年原有一、七九九家銀行，到一九二八年就減到一、〇三一家了。整個銀行存款的百分之三十三點六，是被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五大銀行所控制的。在化學工業部門由於沒有大的資本無法開辦，因此，這幾乎也全是被三井和三菱所壟斷的。

田中內閣 若槻內閣之後，政友會總裁的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組閣了。他和他的一黨是以“強硬外交”而知名的，這一內閣的外務大臣由田中本人兼任。不久，吉田茂就当上了外務次官做着事實上是外務大臣的工作。

田中內閣對金融危机的對策與若槻內閣是沒有任何不同的。就是說，政府賠償了損失，為了挽救台灣銀行及其他金融資本就由日本銀行貸出了七億日元（實際上就如白給是一樣的）。在這一點上，田中內閣比前一內閣不同的，只是將更多的人民的捐稅贈給了大資本家而已。

但田中內閣出現的意義是在於其“強硬外交”的。他們是作為日本的資本家、地主和軍閥官僚的侵略中國的選手而替換了若槻內閣的。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的判決書中說，這一內閣的出現是“向外擴張論者所得到的最初的勝利”，實際上也正是如此。內閣在其成立的第二個月，在保護僑民的名義下，就向中國山東省派兵，來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特別是企圖與割據東北的張作霖軍之間取得聯繫來阻撓革命。

東方會議 六月間田中首相糾集了與中國有關係的軍人和官員召開了稱作“東方會議”的會議，決定了“對華綱領”。關於這一

綱領，仅就其公开发表的部分来看，第一，是强调日本对中国而特别是对东北有着“特殊权益”，为了保卫这“特殊权益”，就宣称要采取“坚决的自衛措施”和“不失良机的适当的措施”，第二，当时国民党撕毁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統一战綫，并开始镇压中国共产党，对此田中內閣就明确表示了要促进国共分裂，对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不逞分子”一有机会即将予以镇压的态度。对外国的政党甚至都叫做“不逞”分子的田中內閣的外务次官，而且是东方會議的主要的一員的吉田茂，后年称日本工运领导者为“不逞之徒”也是不足为怪的。总之，这就是即使以武裝来干涉中国革命，也要將中国永久地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的日本傳統政策的飞躍的进展。

“东方會議”所公开发表的内容就是如上所述。但据不确实的史料，在这會議上，三井的池田成彬和古河系財閥的久原房之助以及其他財閥巨头也都出席了。据说他們决定了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針，并將此作为“对华积极的根本方策”由田中上奏了天皇。在其所謂奏摺当中就说“欲征服中国則必先征服东北，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評述了从侵略东北的次序到征服中国的方法和順序，后来从一九三一年以来就將其付諸实行了。这一奏摺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中国杂志上发表出来，并为全世界所知晓。这究竟是否为真物虽然不太清楚，但田中內閣及奏摺率直地所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綱領，却也正是如此的。

炸死張作霖 翌年一九二八年五月，發生了日本軍在济南虐杀了很多中国人这一大事件。中国的排日运动如火如荼地起来了，而由于日本对中国輸出的激減，就是侵略主义者也都为之束手了。田中及陸軍的中央希望張作霖不要与国民政府永远地从事遙遙無期的战争，而是尽早地退回东北在这里在日本的“援助”（換言之即統治和监督）下，好好地来經營一番，并且还不断地在这一方

面施加了压力。但是关东軍的參謀們，是希望早日的將整个东北完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然而实际上很好地观察了張作霖以后，看出了他的确也沒有成为日本傀儡的可能，因此就得出了不如將其杀掉倒为好些的結論，一九二八年六月就炸毀了他所乘的列車，把他杀掉了。本来紧接着就會企圖立即占領东北的，但首腦部鑒于为时尚早，遂加以制止了。

田中为关东軍的过早的行动所激怒。但他甚至連处分这肇事的參謀們都作不到，而只是偷偷地將其一个直接的負責人免职而已。然而就是这个人，却也立即出任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的理事，事实上是比以前更高升了。

工农运动的高漲 自金融危机以来与大資本向壟断方面發展的另一面，失業者是更增大了，不景气的風暴窒息着中小資本家。

在农村，农产品价格自一九二七年以来是不断下降，可是农民所必要买的工業品的价格却并不是按此比例下降。相反，个別的商品却是上漲的。特别是捐稅是一味地增加而絕沒有降低的。大米每石由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的日金四十六元九角，到一九二七年(昭和三年)降到三十五元，一九二九年又降至二十九元余，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甚至又降至十六元。因此，佃农以及自耕农都为地主和肥料商人的借債所束縛住了。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是沒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問題的辦法的。但和平的、暫時搪塞办法却是有的，那不外就是增加工人的工資，縮短劳动時間，僱佣更多人，降低地主的法外的高額地租，或者直截了当地廢止寄生地主制度，將土地給予佃农，提高占整个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及購買力，締結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固然使資本家与地主剝削所得的份額减少了，但除此以外是沒有任何改善国民經濟的辦法的。可是，就是这样，日本的政府、政党、資

本家和地主也仍然没能作到。相反,对工人、农民为了生存組織工会,对政党、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斗争以及从事政治活动等問題却施加了殘酷的镇压。为了与其对抗,工人和农民的組織是越来越强大了,而且也越来越自主化和坚决化了。劳资糾紛在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为一、〇一二件,翌年件数虽然减少——在这一年政府發动了大的镇压(下詳)——但在性質上却是益加深刻,从翌年,一九二九年,劳资糾紛的件数和参加人数就大大地增多了。

年 度	件 数	参加人数	每一件平均参加人数
1929	1,420	172,144	120
1930	2,289	191,805	84
1931	2,456	154,528	63
1932	2,217	123,316	62

与此同时,工会数目也增加了。

年 度	工会会员数	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比率
1929	330,985	6.8%
1931	368,975	7.9%
1932	377,625	7.8%

农民与地主的糾紛,也同样地激增了。

佃耕糾紛件数表

年 度	件 数	参加的佃农人数
1928	1,866	75,136
1929	2,434	56,830
1930	2,478	39,799
1931	2,639	60,365

一九二八年二月开始实施了根据普选法的大选,最有战斗性的劳动农民党都得到了十九万票,加上其他無产階級政党合計共得到約四十五万票,有八名当选其中就有劳动农民党的山本宣治。

另外，覺悟的工人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動了對華不干涉運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並不斷地將戰爭的危險已迫近了的問題，向群眾發出了警告。為了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也是非常高漲的。

對於侵略主義者們來說，如果存有這樣的革命工人的話，那末是不能夠侵略中國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晨廣泛地在一道三府二十七縣展開了對共產黨員及其他支持者約一千多人的大檢舉，其中有四百八十四名被起訴了。同時，日本工會評議會、勞動農民黨、無產青年同盟都被禁止結社。繼而政府又修改了治安維持法，向議會提出了能夠對違犯此法者處以死刑的法案。但這一惡法由於全國的工人、農民，甚至稍具自由主義的學者和政治家皆群起反對，因此，在議會中也未能通過。可是政府卻以緊急勅令強制地將其修改了。舊憲法就是這樣事情也是能做到的。新憲法照理說是不能夠這樣做的，但實際上卻也是在這樣做着。另外，令人不寒而慄的特別高等警察，此時還大大地強化了。但日本民眾的解放運動並未為此所潰，被破壞了的各個組織又立即重建起來。在評議會之後，在地下又組織了日本工會全國協議會（全協）。

在這期間，議會中的無產政黨的議員，幾乎都不是真正反對政府干涉中國的政策，就是對治安維持法，也不是認真地去作鬥爭的。像社會民眾黨的西尾末廣之流，實際上是由土木建築資本家出選舉費來充當議員以便削弱無產階級鬥爭的，他自己在後年就曾自白過這一點。但其中的一人即山本宣治卻是徹底為勞動群眾、為和平及民主主義而奮鬥了的。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法西斯青年殘忍地將山本暗殺了。參加他的殯儀的工人們也都當場被警察逮捕。這是一個更大的鎮壓的前奏。四月十六日又發生了全國範圍的大迫害，被起訴的人竟達三百三十四人，在這以後也屢次對共

产党及其他民主势力繼續施加了殘酷的迫害。

政府就是这样的对人民的言論、集会和結社自由再三加以迫害，想从侵略中国来找寻摆脱一切困难的出路。

濱口內閣的成立 日本的露骨地强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当然会使中国的排日运动激烈起来的。例如，日本对中国输出的棉布，在發生济南事件的一九二八年五月約为十九万反*，而在杀害張作霖事件之后，八月就不及五月的百分之十即驟減至一万七千余反。相反英国对中国的輸出却增加了。因为这样，到了年末日本紡織業甚至都不得不为之減产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二八年一月到五月末对中国輸出总額为一亿六千九百万日元。一九二九年的同期則只为一亿四千一百万日元（日本輸出貿易总額在一九二九年还是增加的）。

面临这种情况，田中內閣也失去了訴諸全面战争的自信，而不得不多少講究一些穩和的手段，但为时也迟了。在国内不为三·一五，四·一六镇压所屈服的工农群众的斗争和为和平以及政治自由的斗争也高漲了，在野党的民政党为打倒田中反动內閣的强烈輿論所鼓动，以杀害張作霖事件——当时是以“滿洲某重大事件”来欺瞞国民的——为武器，攻击了政府。如此，一九二九年七月內閣总辞职，組成了民政党的濱口雄幸內閣。濱口內閣是以协调外交，紧縮政策和黄金解禁为其招牌的。

工業合理化和紧縮政策 紧縮是意味着尽可能地压缩国家預算，釘住公債的發行从而減輕資本家的稅額——但像酒稅那样的群众消費稅一下就提高了兩倍——解僱政府直轄企業的职工，降低工資并以此为缺口进而对整个民間工業展开解僱，降低工資和

* “反”为棉布数量單位，每反約合四十碼。——譯者

加强劳动，来确保资本家的利润。在打着紧缩招牌的内閣的组閣期間，公債券就漲了百分之三，銀行及其他持有公債的大資本家們就坐收了一亿五千万日元的利潤。

“紧縮”是与“工業合理化”并行的。“工業合理化”是在淘汰能率低的工業的美名下，实际上則是挤垮普通的中小企業，加强壟斷資本及其承包工業，然而，就是在这些承包工業中也是在“提高生产，降低生产費用”名义下来解僱工人、加强劳动和降低工資的。例如，在紡織工業，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廢止了深夜作業的同时，就推行了激烈的工業合理化。其結果是原来在每一万个錠子当中所需的女工数，在一九二九年为二百一十九人，到一九三〇年減至一八九人，一九三一年又复減至一六九人（每一个人所操作的錠子增加了，也就是劳动强度加强了）。另外，每一万錠子的男女工平均日工資，如果以合理化开始之前的一九二九年六月为一百，則同年十二月为八九，一九三〇年末又降至六四。就这样降低了成本和增高了資本家的利潤率。但工人工資却因而降低，劳动强度也加强了，而且工厂災害和职工的疾病的比率也增大了。同时还大规模地实行解僱。如此，在一九二九年以东洋毛紗公司的六千人的糾紛开始，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糾紛，一九三〇年四月在日本紡織業中最大的公司，鐘淵紡織公司各工厂三万五千名的工人掀起了反对降低工資的斗争，淀川、兵庫及其他工厂也举行了罢工，最后还發展成鐘淵紡織公司以外的紡紗織布工業工人的一大共同斗争。糾紛虽然經過了五十五天，但由于总同盟干部的背叛行为而終於失敗了。

黄金解禁 不論是工業合理化或是整理紧縮，它都是与日本資產階級的宿願的解除輸出黄金的禁令相联系的。黄金自一九一七年九月以来就是禁止輸出的。当时，由于日本有着利用世界的

不安定时期向东北、西伯利亞进行武力侵略的野心，而为了作此准备也因襲了大战中欧美各国所实行的禁止輸出黄金的办法，在日本也禁止輸出了。其后，从資本主义的常情来看，束縛国际通貨的黄金的流通是有很多不便的，因此，一部分大資本家——特别是軍事工業和重工業方面的大資本家——对于黄金解禁的要求也迫切了，但为了黄金解禁，就不得不緊縮国内的財政开支，推行通貨收縮政策，而这样做的結果必然要引起物价的跌落和銀根的吃紧。但这一点对于在大战中膨脹的通貨到战后本应加以收縮和整頓的也不整頓，利用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救济資金获利的資本家來說也是不利的。另外，日本統治階級的有力的一支力量的地主階級由于唯恐大米价格下跌，所以也一直强烈地反对通貨收縮政策，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黄金解禁也并未容易做到。

一九二七年的金融危机就暴露了粉飾太平的日本資本主义的深刻的危机。到了这个时候，就是逃避一时的政策也是無用了。壟斷資本这时就强行了“財界整理”，企圖在牺牲別人的条件下来加强自己。但田中內閣是以通貨膨脹政策暂时地度过难关，滿足了地主，并企圖从对中国的侵略来解脫国内困难的，然而这也失敗了。同时，就是为了向中国侵略，也是有必要重整国内資本主义的。这样，就企圖借一方面輸入低利息的外國資本，另一面又对一本万利的中国和南洋投資，来恢复如前所述的年年低落的利潤率。而不論是为了輸入外資或是輸出日本資本，通貨收縮政策和黄金解禁对于壟斷資本來說也就成为絕對必要的了。*这样，就在金融資本的欢呼声中民政党内閣替換了田中內閣。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政府就决定并公布自翌年一月廢除黄金輸出的禁令。

政府以整理財界，打开經濟难局，提高生产等各式各样的美名，一面宣傳說为了整个国民必須忍耐一时的牺牲，一面强行了上

述的各项政策，但这完全是为了加强垄断资本和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这一点并未能骗过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和学者。当时的合法的出版物中，野呂榮太郎的很多論文在“产业劳动调查时报”杂志上就曾对此加以分析和批判。

世界危机 正当这时，在一九二九年末，在美国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美国是曾吹嘘了它的异常的繁荣的。大总统胡佛就说美国是永久繁荣的。在这期间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就预言了当时看来是稳定的世界资本主义“当稳定的矛盾更加发展以后，则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走向更大的动摇，走向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激烈地尖锐化”果然，一年后，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就终结了。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的最激烈的时候，在美国与危机前的繁荣时期相比，煤的生产减退了百分之四十一·七，鉄百分之七十九·四，鋼百分之七十六·三，棉花消費額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德、英的工业生产也都各自地降低到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七年的水平。世界貿易从一九三〇年以来如同一个破气球一样，一九三二年仅及危机前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三三年则仅及危机前的三分之一。

而且，危机在农业部門的深刻的发展也不亚于工业部門，美国农产物的銷售額竟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在德国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巴西的农民將卖不掉的咖啡当作燃料的情况也出现了。

美国的失業者由一、五〇〇万人增至一、七〇〇万人，危机前的就業者有百分之三十八是失業者了。

世界中仅有一国即苏联非但没有危机，而且从一九二八年起，五年计划大踏步地发展并且由农业国轉变成巨大的工业国。即使根据德国的景气研究所的数字，苏联工业的飞躍的发展和资本主

义世界生产的停滯,就形成了如下表样的鮮明的对照。

工業生产發展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苏 联	79.4	100.0	129.7	161.9	184.7	201.6
資本主义世界	93.7	100.0	87.1	73.1	62.6	71.1

日本的危机和壟断的进行 不屬於社会主义的日本,立即遭到了这世界危机激浪的襲击。濱口內閣的一系列的政策,已經独自地將日本赶到危机的状态中去,再加上跨进了受到世界危机影响的一九三〇年后,就形成了空前深刻的大危机。物价的跌落是以前一年的二倍以上的速度在进行着。如依靠美国市場的生絲,一九二九年最高价由一細一、四〇〇日元(三月、四月的行情)降低到年末的一、一八〇日元,降低率达百分之十五强,一九三〇年尽管政府拚命地采取了防止价格跌落的对策,但仍然由年初的一、一〇〇日元跌到十月的五〇〇日元,即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其他如小麦、棉紗、砂糖、木材、銅、鋼鉄、紙張等国际商品价格也都同样地跌落了。农产物随着生絲的暴跌,茧也猛跌了,大米到夏季为止虽是上漲的,但从九月新米上市时开始也急跌下去,十月末由七月的最高价三十元零三角(一石)跌到了十四元的惊人的低价,自此以后,在一九三一年內大体上是停頓在十五、十六元左右,从秋季以后由于該年产米的歉收又复漲到二十元。但这只是市場行情,可以想像农民卖给大米商人的行情又将是多末低廉的。弱小的公司,接二连三地被挤垮了。資本金的減資解散是多于新設增資的。請注意下表的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的情况。

銀行公司資本增減(賬面資本,單位百万日元)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新設增資	1,448	1,305	1,288	1,151	731	796	540	1,327
減資解散	773	754	891	596	935	836	551	733

輸出貿易由危机前的最高額(一九二九年)到危机时最低額(一九三一年)就減低了百分之四十六点六,輸入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二。

工業生产在价格方面,就由一九二九年的七、四一九百万日元減少到一九三一年的四、九八一百万日元即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九。

通过这大危机,壟断資本对工業的控制力是愈益發展并出現了巨大的企業的联合(卡特尔)。一九二九年仅有一十二个卡特尔,可是到一九三〇年即增至三十一個,第二年又增設了二十三个卡特尔。鍊鋼、縲絲、啤酒、北洋漁業、汽車工業等部門,比卡特尔更进一步,还發展成強固的壟断組織的企業联合(托辣斯)。国家在一九三一年也制訂了“重要產業統制法”,以国家权力来促进了壟断的进行。根据这一法律,在八月設立了由官僚、貴众兩院議員和壟断資本家等構成的統制委員會,关于这机构連东京日日新聞都評論說“有吃小魚以圖自己生存的大魚”“將統制委員會說成是資本家(壟断金融資本家——井上)的御用机关,这一点是無可辯駁的”。

危机的加深 政府、資本家和地主是企圖將因危机所受的牺牲,尽可能地轉嫁到劳动大众和中小企業者身上去的。就是在平时,由于緊縮和“合理化”,工人、職員也都是被失業和低工資所困的,所以隨着世界危机的發展,他們的貧困也就更加深刻。根据

官方的，在城市中失業回到乡村仅能糊口的，撿破爛的半失業的都不包括在內的統計，一九三〇年六月在被調查人口七百万人当中，完全失業的就有三十九万五千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七百二十万人当中就有五十万五千人是失業者。据产业劳动調查所的科学的調查，失業与半失業者在一九三〇年估計就已超过了三百万人。

不管是报纸、杂志，或是議會都在热心地議論着“农村的穷困”。这样，在穩定繅絲，随之在防止茧价下跌的美名下，繅絲業者就由于絲价补偿法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各种为了“救济农村”的美名下，国庫也支出了費用，但这一切并未落在耕种农民手中，而是落在地主口袋中了。付不出佃租的农民，被迫卖掉了亲生女兒。甚至卖青苗的也出現了。在农村，飯食不够吃的兒童(沒有飯盒可帶到学校去的兒童)从北海道、东北地方开始，在全国都發生了。一九三二年七月据文部省的大为減少了的估計，人数也超过了二十万人。

农民飢荒在过去只是由于歉收的，但現在却出現了“丰收饑荒”。一九三〇年秋的产米是大丰收，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該年年末到一九三一年，“农村穷困”就更加严重。一九三一年产米由于歉收，使农民更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一九三二年秋的产米是空前的大丰收，共收获了七千万石。但在这年的秋冬吃不到大米的农民却也占了整个农民的百分之三十五。不管是麦飯也好，或是山芋也好，可是就連这样飯盒都沒有的飯食不够吃的兒童，为了飢餓都迫使他們偷盜了同学的飯盒。这时在东京朝日新聞社，召开了农林省官僚、大地主、資本家們对米价問題的座談会，其中的一个人就針对上述的深刻的人民的穷困說“給那种人三百万石或四百万石，也可以解决了大米的过剩問題”。对此貴族議員、农林省农事試驗場，东京大米批發公会总主事們就說“把大米倒在海

里就会吸引魚去吃,如果把这些魚捕上来作菜,就会多吃飯的。这样,大米也就会暢銷的”。接着产业公会中央金庫理事長伯爵有馬頼宁(后任农林大臣)就說“使沒有吃食的人吃上飯,作为施舍来說是可以的,但这样就会造成懶人的。將农民渴求的东西抛入海中一事,在思想上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肯定,但也許抛到海里去倒为好一些”(朝日新聞社發行“米的問題”一九三四年四月)。資本家、地主及其他政府当局,是不顧国民群众多么困苦,但为了保护他們的利潤,甚至都有了把大米与其給人吃倒不如作为魚餌反为好些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推行了降低工資和解僱。对此,罢工运动和佃耕糾紛也就不会不高漲的。如前所举的佃耕糾紛表,就說明了这一問題。社会主义思想逐漸地深入到工人、农民当中,而站在劳动者方面的进步的知識分子和学生也增多了。当时在日本發行的社会主义文献,除了苏联以外与德国相媲美,在世界上是最多的。从一九二九年,在全国的高等專門学校和大学,为了学生自治,为了研究社会科学的自由和反对軍訓,一次也沒有罢課或者未与学校当局对立的情形几乎是沒有的。一九三二年在新潟县,在军队中受尽了国家主义的压迫的兵士,复員后回到本村中很多是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列的,这一点也使政府和軍部大为惊慌失措了。

殖民地朝鮮在大危机前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在元山就爆發了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全朝鮮的工人的共同斗爭也一直繼續到翌年的四月。在危机时期,一九三〇年一月以朝鮮紡織公司釜山工厂的二千工人的罢工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在各地也都掀起了大規模的罢工。另外,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光州朝鮮人的中学生与日本人的中学生冲突起来,爆發了全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成了一九一八年的万才起义以来的大事件。

在台灣，從一九二七年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也激烈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就發生了台中州霧社的土著居民的起義，總督府還是以陸軍和航空隊來鎮壓他們的。甚至東京“朝日新聞”的社論也非難說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對台灣“沒給與自治權和參政權”，是“將蠻地稱作化外之地，不管是工業和教育全委於警察之手，也就是說正因將其置於警察專制之下，所以發生這一事件也是必然的”。

不管是國內或是殖民地，民眾的革命氣氛在各地都高漲起來。對此，濱口內閣以及其後的內閣，與田中內閣完全一樣一味地加以逮捕，下獄和拷打來鎮壓了。在國內，在違犯治安維持法的罪名下被檢舉的，一九二九年為四、九四二人，一九三〇年為六、一二四人，一九三一年為一〇、四二二人，一九三二年為一三、九三八人，一九三三年為一四、六二四人，是逐年增加的。由此可知民眾的鬥爭與政府的鎮壓是多麼激烈的了。

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是日本的危机最深刻的一年，世界危机从这一年开始也更加深刻。黄金解禁后，到一九三一年夏为止虽然输入了约七亿日元的外资，但到了现在它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毫未起缓和作用，甚至今后能吸收低利的外资的希望也消逝了。以三井财阀为首的一派垄断资本也就因而开始提出了再度禁止黄金输出的要求，要求转向通货膨胀政策的声音也高起来。地主也提出了以通货膨胀来提高农产物价格的要求。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所想到的唯一的逃避日益增加的，对民众统治的困难的希望，就是在于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和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但是侵略中国东北，对于他们說也是困难重重的。在一九二八年張作霖为日本軍炸死后，中国东北是由其子張學良支配的。他与他父亲一样，也是不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来反抗中华民国政府，而是誓忠于中华民国政府，在其政策之下，不屈服于日本政府和关东

軍的威胁,在中国东北鋪設了新的鐵路并計劃建設工業的。而这一点也就威胁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壟斷地位。政府和軍部就大規模地开始宣傳說張与中国政府創設了对滿鐵的包圍綫,威胁了日本的“特殊权益”,因此我們就必須坚决的来保衛“帝国生命綫”等等。

战争! 侵略东北! 这终于作为自一九二七年以来的,而且,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看来已是無可救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的出路,作为保衛“生命綫”的問題而提出来了。

侵略东北的准备 田中內閣时代的露骨的侵略中国的尝试,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的抵抗与日本人民的反对而碰了回去之后,接着在濱口內閣,果然的对中国也似乎是采取了“协调”的政策,派到山东去的军队也撤回来了。一九三〇年又参加了在倫敦召开的英、美、法、意、日五国海軍裁軍會議。这會議几乎与裁軍之名是完全不符的,不过是想减少些輔助艦艇的,尽管如此,濱口內閣还是不顧軍部的强硬的反对在协定上签了字。如此,濱口就以侵犯了軍的統帥权的独立的問題而遭到了軍部和过激国家主义者們的非难。該年十一月他为狂暴的青年所狙击,其后不久,就因之而死亡了。

但并不是說这一內閣坚决地采取了和平政策。新內閣在成立之初,就在京都、大阪、神戶地区举行了大規模的国家总动员演習,并实施了空襲下的軍需生产的維持、軍需品的調撥以及运输的訓練。而且,就是在濱口內閣时,在国家預算中的直接軍費的比率,也并無任何特別的减少。一九二九年度的預算,是前一內閣时就已編好而又被濱口內閣在中途以紧縮政策重新修改过的,根据这一預算总支出比前一年度只是减少了百分之六点八,而陆海軍省的支出也只是减少百分之四点三而已。一九三〇年度陆海軍省費

用絕對額是較前減少，但在總預算中所占的比率却為百分之二十八點五，即比前一年度還增加了。不但如此，在這期間與軍需有關的貨物的輸入在整個輸入貿易額中所占的比率，田中內閣時代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三十九，而濱口內閣時代的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都是占百分之四十一。

從這些事實來看就會明白，不管濱口內閣在表面上挂着什麼政策，但仍然是接連地在作着戰爭準備的。只是在備戰的方式上，由於內閣的不同，由於統治階級的那一層掌握政權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濱口內閣就是將重點放在以所謂緊縮整頓及其核心的“工業合理化”的政策上，來進一步加強壟斷資本，來整備軍需工業的。在餓虎捕食之前是必須要暫蹲一時的，濱口內閣所做的就是這個。實際的軍事工業也被高度地發展了，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侵略東北戰爭開始前，三菱飛機製造廠，第一次完成了日本生產的重型轟炸機，而坦克、裝甲車、高射炮等近代化的武器也逐漸能夠自造了。

侵略中國東北的開始 戰爭的準備是這樣的在進行着，但軍閥、地主、一部分資本家及瘋狂的軍國主義者，認為濱口及其後繼的若槻內閣對戰爭的態度是過於緩慢，而他們的態度卻是迫不及待的。一九三〇年九月橋本欣五郎中佐等陸軍將校的集團組織了“櫻會”，開始研究了“滿蒙問題的解決”以及為達此目的而改造國家即樹立軍部獨裁的方策。很早以來有名的軍國主義者大川周明從一九二九年在參謀本部的支持下，就進行了應在中國東北建設以“王道立國的新國家”並作為對蘇侵略的基地的宣傳。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是大川的熱烈的支持者。在他們完全統治中國東北的意圖中，從一開始就有了準備對蘇聯進攻的目的，而且這一侵略的目的又是採取日本應該防止中國東北的“赤化”和“共產主義”的形式的，這一問題是要加以十分注意的。

一九三一年初，大川和橋本等，就陰謀以政變來組織以陸相宇垣一成大將為首相的內閣，來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宇垣對此陰謀在暗中則是予以支持的。根據大川、橋本等的計劃，在二月使社會民眾黨，全國大眾黨，勞農黨三“無產”政黨召開打倒內閣演說會，製造空氣，而當提出工會法案時就動員由“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由公然的軍國主義者所率領的一萬工人對議會展開示威遊行，炸毀政友、民政兩黨本部及首相官邸，雖然再借口以軍隊保衛議會，占領議會來建立軍部內閣。

社會民眾黨的幹部龜井貫一郎，接受了欺騙工人並動員他們的任務。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平時的言論是冠冕堂皇的，但一當有重要的行動時，就成了法西斯的走狗，這一點是在德國，在意大利都已證明了的，日本的社会民主主義者也當然不能例外。並不僅是龜井一人，就是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是從早就有着可被大川利用的性質的。

暴動是預定在三月二十日，但在这以前宇垣得到了情報相信不用政變也可以推翻若槻內閣由自己來當首相，因而就背叛了這一陰謀，因此，這一陰謀就完全失敗了，這稱作三月事件。

這一大陰謀政府對國民是絕對保密的，不論哪一個陰謀家，就是一個也都毫未受到處罰。即使說政府對軍人是難以下手，但對大川、龜井和清水行之助等民間人，這一明顯的內亂罪和准內亂罪的犯人也是應該處罰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這就無疑地說明，政府是承認軍部、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永遠有實行武裝政變的自由。在這裡儘管若槻內閣及其外相幣原喜重郎口稱是“協調外交”，但其本質則是侵略主義的問題，就充分地暴露出來了。

三月事件時，消息靈通者們就已經知道了該年秋，在中國東北將有大事件發生。四月間又舉行了重轟炸機在三方原至大連間的

無着陸飛行演習，六月陸軍又制訂了軍制改革的方針。這一方針就是在朝鮮增加一個師團，將關東軍的編制和配備改成隨時可作戰的形勢，新設或增設了航空隊和坦克隊及其他的機械化兵團，總之也就是在作着具體的戰爭準備。

這樣，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略，甚至戰術的準備是節節進行了。假如這僅僅是軍部自己的行動，而內閣則加以反對的話，那麼內閣就應採取反對的對策，可是它非但不如此，而且還不將這一問題公開於國民之前，就是在政府內部，甚至對陸相的抗議也都是沒有的。恰恰相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軍國主義的共產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却被監禁，在報刊雜誌上也煽起了“東北問題”努力於製造了好戰的輿論。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開始了。成為這一導火綫的，有名的在沈陽郊外的南滿洲鐵道綫路的炸毀，是關東軍為了製造戰爭借口所作的活動，這一問題現在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已大白於日本人民，但政府和軍部當時却將其宣傳為中國方面製造的，並在“發動自衛權”的名義下，根據縝密的計劃立即向整個中國東北的要地進攻。九月二十一日朝鮮軍也越過國境向中國東北進攻。這就是所謂“朝鮮軍獨斷越境”。但是在第二天即二十二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上，若槻即幣原內閣全體通過，決定了朝鮮軍開拔的經費支出，並上奏於天皇，天皇也批准了。也就是說政府表面上高喊着不擴大方針，但在實際行動方面，却是為着擴大而給予了支援的。我們為了對政治判斷不犯錯誤，就應該不是看政治家的言談，而是要看其行動的。

十月事件和犬養內閣 在侵略中國東北之前，從八月左右，三月事件的大川、橋本及西田稅、北一輝、井上日召等民間法西斯分子以及海軍的藤井少佐、古賀中尉、三上中尉等又復計劃政變。在

战争开始后的十月，就曾企图以陆军步兵队及海军轰炸机等大兵力来颠覆政府，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政权。但是，这次也由于他们之间的分裂而失败了。这称作十月事件或锦旗革命党事件，这次大川周明虽然又被检举，但立即就被释放。政府和军部对他们是没有作任何管制的。

相反，充当管制主角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却与政友会的干事长森恪——他是三井财阀关系的政治家，是激烈的侵略主义者，是东方会议的发起人——勾结起来，与军部一起企图开始组织为了战争的举国一致的内阁。

另一方面，九月间英国禁止了黄金输出，这一点就加强了日本的再度禁止黄金输出论者的力量。为了战争，不是紧缩，而是不可避免的要通货膨胀，因之，要再度禁止黄金输出。看到了由于再度禁止黄金输出和通货膨胀将使日元贬值而禁止输出黄金的结果也将使对外贸易方面需要美元，于是三井、住友两财阀为首的金融资本就开始猛烈地收购美元。如此，日元的价值就迅速降低，越降低，则收购美元的人也就越发财。这一收购美元，破坏金本位制的首魁三井的池田成彬和住友的小仓正恒与政府和财界首脑组织了协议会，在十一月就声明要坚决地维持金本位，绝对不禁止黄金输出。在这一点，也鲜明地与要了解政治不是听其言而是观其行的原则是相吻合的。

若槻内阁就是这样的破坏了其重要政策，在内阁中也产生了分歧，结果，在十一月末就倒台了。其后，标榜“对华积极政策”和通货膨胀主义的，以犬养毅为首相，以十月事件的荒木贞夫为陆相的政友会内阁就成立了。

在这期间，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是继续扩大。十月八日，日本军航空队，对张学良政府所在的锦州实行滥炸，给世界各国以很大的

震动。到十一月中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北部，十一月末除锦州及其週圍外，完全地占领了整个东北。日本虽然与美国等各国约定不在锦州地区战争，但当犬养即荒木内阁成立后，日本军就准备了对锦州的攻占，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终于侵占了锦州。日本军在极为短促期间内就侵占了整个东北。

上海事变 占领了锦州之后，不久日本军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日本军侵略中国东北，在这期间又表示了向天津及其他华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之势，这样也就必然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特别是上海因为是以纺织资本为首的日本资本所集中的地方，为了保护其资本，海军舰队和陆战队一直就作着随时都可以战斗的准备。从中国方面来说，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最发展的地方，民族资本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是站在竞争的立场的，而工人也是燃烧着坚决地反帝国主义精神。另外，上海还有着几所大学，也都是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多的地方。在这样地方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来，若不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倒是奇怪的。包括了民族资本家的“抗日会”也组织起来了，各地方都召开了市民大会，排斥了日货，这使上海的日本人纺织资本家和商人们陷于苦境。日侨在大资本家和军部的操纵下召开了大会并要求派遣陆海军。日本海军制造了几个“事件”，造成了借口，一月二十九日薄明，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就展开了巷战，日本海军飞机也自天亮时就反复地对上海滥炸起来。

日本在二月初就出动了陆军一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三月又增派了一个师团。但上海却不像东北那样轻而易举的。中国的第十九路军装备也好，战志也很强，以工人为首的全上海市民的抗日决心则是更为坚强的。日本军在开始时，由于冷不防的进攻获得了胜利之后，为了整个战局的胜利势必要动员更大规模的陆海

空軍，就是軍國主義者也認為在東北和華中兩面進行大戰爭是不利的。中國方面，蔣介石是畏懼上海抗日戰爭會發展成強大的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買辦政策的力量。因此中日兩國政府就妥協了，自三月十日召開了停戰會議，五月五日達成協議，日本軍自共同租界方面撤退。“上海事變”是對中國全面侵略的試探性的戰爭。

“國史”的謬論 到“九一八事變”發生這一期間的問題，我沒有與其他問題相牽涉，只是單獨地加以評述。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必須對本文的惡意的謊言，加以充分的反駁。

根據“國史”的寫法，“軍部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跋扈，就連續地搞起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其結果就進一步引起了“九一八事變”，擾亂了亞洲的和平。這種寫法倒好像“九一八事變”是五·一五事件的繼續似的。這就是將所有的罪惡全部加在現在是斂跡了的軍部頭上，來隱藏壟斷資本家、地主、官僚及政黨的侵略主義的。其實，就是對軍部的所作所為也都是在為其掩蓋的。對於柳條溝事件也沒有說出滿鐵綫路是誰炸毀的，就說“突然的被爆炸了”，對於這個日本軍部的陰謀，甚至在現在還是企圖要欺騙人們的。

“滿洲國” 侵略中國東北戰爭的詳細經過，在這裡我想不寫也是可以的，因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全文已經公布，看看該文就可以了。

就是對於所謂“滿洲國”，本文也說軍部組織了“溥儀政府”，而這一政府又建立了“滿洲國”，其實這一切，從頭到尾都是日本政府 and 軍部干的，而溥儀只不過是無力量的傀儡。甚至在這“滿洲國皇帝”宮殿中還設立了日本天皇的祖先神的伊勢神宮的分社，而皇帝也還要去拜祭的。

“滿洲国”在法律的形式上是独立国。但是由于“日滿議定書”(一九三二年九月)，“滿洲国”的“安全保障”却規定要由日本軍来做。就憑这一点日本就足可以把“滿洲国”作为日本事实上的完全的殖民地，来殘酷地剝削和軍事基地化的。現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的法务總裁、国务大臣殖田俊吉就主張說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統治一点也不不是帝国主义，理由是軍部在中国东北建設了重工業，如果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話，那就不是建設重工業，而只是掠取农产物和資源的。这真是胡說八道。东北的重工業建設是誰做的呢？不是日本壟断資本家是誰呢？而且他們在那里还不是以刺刀逼着当地人，施以空前未有的剝削嗎？在形式上都剝夺了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而將其变成單純的原料供給地，这是十九世紀的殖民地政策，而“滿洲国”則是二十世紀的最新型的殖民地。使帝国主义国家来“保障安全”并給帝国主义国家提供軍事基地的“独立国”是不存在的。

战争和社会民主主义 九一八事变發生后，日本無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公然“轉向”了。在無产政党中最右翼的社会民众党的片山哲書記長在十月就說，东北的权益即使是資产階級的权益，也应以武力来保衛。在第二年一月的党大会上，一面高倡着反資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三反主义，一面作为新方針又強調了“国体的尊重”。这种既贊成保衛資产階級权益的战争，又反对資本主义的理論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一方針也不外乎是反对共产主义，贊成資本主义及其侵略战争与法西斯主义而已。左翼的全国劳农大众党在战争开始时固然也提出了反战声明，但不久有力的几个干部就公然支持了战争而退党，并組織了公开的法西斯政党——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党。跟着，在这以后的一九三二年五月，社会民众党与全国劳农大众党合併組成社会大众

党时,其运动的方針就是社会民众党所倡的三反主义。一九三四年陆军出版了数十万份的“国防眞义及其强化的提倡”小册子,宣傳战争,号召組織为战争的法西斯体制时,社会大众党的机关报就表示绝对支持,主張軍部是民主主义的,因此,無产階級应该与軍部联盟。不久,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当日本軍全面的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四个月以后,社会大众党就召开了大会,清楚而明确地号召整个国民来支持这一战争,标榜了党的政策是“广义国防”。所謂“广义国防”就是說为了战争要提供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精神生活的一切。工会方面,松岡駒吉和西尾末广們所领导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十月大会上也声明并实行了傾全力协助战争,“根絕类似罢工的事件”。

反战斗爭 但日俄战争以来的日本人民的光荣傳統的反战运动,并不是完全沒有的。共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全协)以及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識分子,就是在極端殘酷的鎮压下,也繼續了反战运动。九一八事件爆發前后,东京和橫濱的軍需工業地区及其他地区工人召开了反战會議并将反对战争的傳單遍撒于各地。从一九三二年“兵士之友”和以水兵为对象的“高桅杆”創刊了。在这一年的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时,各地都举行了遊行示威,以东京銀座为中心有六百名的警察还戒备着反战遊行队伍。一九三三年,反战斗爭就更加發展。七月一日大阪,在共产党大阪市委員会的领导下,在炮兵工厂前与举行反战示威遊行的同时,又散發了五千張的反战傳單。此外,在大軍需工場也散發了数千張的反战傳單。像这样的实例就是在农村中也可以举出很多。

对于鎮压領導革命的人民的反战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者們的殘虐性也增加了。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全国範圍內有一千四百多人一起被檢举了。当时党的領導者岩田义道和上田茂

树就被警察虐杀了。在翌年的三月二十日作为無产阶级的文学家，在国际上有名的小林多喜二在东京筑地警察署被中川警部們虐杀，同年十一月天才的革命理論家，而且，又是当时实践上的最高领导者的野呂榮太郎也被逮捕了。經過三个月的拷打之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这一人民天才者也被特高警察杀死了。

对唯一的有决定性的阻止战争的共产党和战斗的反战活动家的穷兇極惡的政府的镇压，在性質上更加狠毒，他們向党內派进了很多的間諜，搶掠了銀行，还宣傳說这是共产党为了获得資金而干的。这样全国性的組織到一九三七年时就被破坏了。但是在大阪以及各地以共产主义者为中心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們的集团被摧毀后又复建立起来了。

三 太平洋战争

血盟团和五·一五事件 随着在大陆上的战争的發展，在国内，軍部及过激国家主义者的势力也日益增强。他們指摘說政党与財閥彼此勾結追逐私利私慾，使国民困苦，忍受外国欺侮，危害国体，而加以猛烈的攻击。与十月事件有关的井上日召們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暗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接着，三井財閥的代表人物团琢磨也被刺了。在这事件当中，称为茨城县的农民敢死队也参加了，他們組織了“血盟团”，并拟訂了計劃要接連地刺杀財閥和政党的首領以及所謂元老重臣的官僚巨头。

血盟团員立即被逮捕。血盟团团員們与陆海軍將校之勾結以及与荒木陆相等的关系，早在十月事件时，就已知道了。可是政府非但不镇压他們，相反，却热中于对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檢举。在

这期間过激国家主义者們的陰謀，仍悠然地繼續着，五月十五日古賀、三上等海軍將校的一团就將犬养首相刺杀在其官邸中了。根据元老西园寺的秘書，原田熊男的日記，說犬养与張学良作过交易，并由張得到了鉅款，而这件事情特別激起了軍人的憤怒云。

皇道派和統制派 犬养死后，政党内閣后退，海軍出身的齋藤实为首相的官僚、軍部、政党的联合內閣成立，在举国一致的名义下，加强了战争体制。在陸軍內部，也分成了后来称作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兩派。皇道派是以荒木大將和真崎甚三郎大將为领导者，統制派則是由永田鉄山少將領導的。永田們为了推进战争，是以使軍事工業更加飞躍發展，建立强力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为其先决条件的。因此，他們也是与財界的首腦即壟断資本家相勾結的。皇道派的思想是最簡單的，認為只要軍部能够独裁則万事都可以解决的。他們还罵統制派是財閥的走狗。軍的内部虽然是这样的在爭吵着，但它却仍然在控制着政局和战局。

在此以前，中国对日本向东北侵略，就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控訴。国联断定了日本的行动是侵略行动，并要求日本撤銷对“滿洲国”的承認。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反对这一决定并退出了国联。自此，日本固然是处于單独的孤立的状态，但軍国主义者却認為如此就可以毫無忌憚地行动，于是就进一步向热河省，华北，推行了軍事的和政治的侵略。

对自由主义的压迫 在国内，齋藤內閣的文相（政友会巨头）鳩山一郎，在四月就借口說京都大学教授瀧川幸辰的自由主义的刑法学說是違背国体的，而將瀧川教授解聘了。根据过去的慣例，大学教授的任免是由教授会的決議，經大学校長向文部大臣陈述意見后由文相批准的。但齋藤內閣和鳩山文相不顧京大法學部教授会的激烈反对，而强制地將其解聘了。为此，以京大为首的东大

和全国的学生提出了反对解聘瀧川教授，要求学問自由和大学的自治与政府作了为时三个月的斗争。政府以数十名的警察镇压了学校内的学生大会，检举了多数的学生并施加了非刑拷问。在日本，学問自由在这里就是这一隐隐约约的火焰也被熄灭了。这时期，共产主义者們是屡次遭到了警察的虐杀，在前面已叙述过了。也就是說，不仅是軍部，就是官僚和政党首領等也是一样，也都在傾注全力企圖从日本徹底消灭殘余的自由和民主主义。

一九三五年春，天皇机关說的問題發起了。美濃部博士的宪法学說——一九五〇年这一說法就成了統治階級的解釋宪法的定論——被指責为違反国体的学說而遭到了迫害。

二·二六事件 战争和通貨膨脹，从一九三〇年左右开始就給壟断資本的軍需工業帶來了景气。国家与壟断資本相勾結的統制經濟也發展了。佔領了中国东北的軍部，固然也声明說这里絕不允許資本家插足，但为了將中国东北作为殖民地来进行剝削，結果还是不能不迎接壟断資本。一九三三年，“滿洲国”由三井和三菱借了二千万日元的借款。日本金融資本通过滿鉄的招收股金的形式，大量地进入了“滿洲国”。“王道乐土”在牺牲东北居民、日本兵士及日本人民的基础上，开始給財閥制造了龐大的利潤。但是农业恐慌不管在日本或是在“滿洲国”也仍未消除，如前所述，地主、資本家和官僚还在商量着要把大米抛到海里去。

随着战争的發展，軍內部的統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也激烈化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皇道派的一將校，將統制派的首領永田鉄山少將作为財閥的走狗，妨碍国内改革者而暗杀了。这是因为，他們还是使財閥进入了“滿洲国”，在日本內地也使財閥大發其財所致。然而，在实际上，皇道派与統制派一样，也是最忠实地来保护財閥的利益的。荒木和真崎与久原及鮎川財閥的关系是很深的。

皇道派的所謂“皇道”和“國體”，在現實上，也就不外是為了鎮壓人民反抗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所用的武器，不過皇道派比起統制派來說，地主的气味更為濃厚而已。由於壟斷資本的政策而沒落的中小地主和中產階級的气氛也反映在皇道派的有名的青年將校身上。他們與血盟團的農民敢死隊的勾結就是個典型。不管這些頭腦簡單的瘋狂的軍人們的反財閥氣氛高漲，不管他們如何認真地去漫罵財閥，但其行動則是煽動戰爭，發展軍事工業和統制經濟，結果仍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的。

總之，他們就是為了滿足他們對領土的慾望和對蘇聯攻擊的野獸般的慾望而焦躁地企圖在日本組織強固的軍部獨裁政府，來加強戰爭體制，來挽回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失敗的。而且，他們還將永田暗殺事件的公審利用為他們的宣傳煽動的舞台來刺戟輿論。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終於由一群青年將校率領着部下的一個中隊掀起了叛亂，襲擊了首相、藏相、教育總監、侍從武官長和元老西園寺等並暗殺了藏相和教育總監。叛亂僅三日就被平定，他們想在這次建立軍政府的企圖也失敗了。他們所渴望的真崎和荒木則與平日的大言相反，在最後一瞬間都吓得連援助他們的意思都沒有了。

這一叛亂者的理論上的指導者是北一輝，他與西田稅、龜川哲也們都由久原房之助和三井的總支配者池田成彬及其他壟斷資本家和政黨的首領領取了奢侈的生活費和運動費。

軍閥法西斯 叛亂將校和北、西田等是被判處了死刑，但在這事件後，日本的政治也就變成了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了。新的內閣由久任駐蘇大使的有名的國家主義者廣田弘毅作了首相。所有內閣大臣全是按照軍部的意見規定下來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就認為廣田內閣是直接參與準備太平洋戰爭的最初的內閣。“廣義

国防”成了这內閣的最重要的政策，为了战争它牺牲国民生活的一切，节节地作好了动員的准备。

自五·一五事件以来成了日本政治的原动力，而在二·二六以后，势力又得到飞躍發展的軍部势力，我想是可以称作軍閥法西斯的。軍閥在历史上是作为封建的国家权力的組織而成長的，他們之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以后得势，也是因为利用了統帥权的独立及軍部大臣武官制这一天皇制的特权所致。它不是像德国的納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那样的，由壟断資本自己創設的独裁权力机关。然而，这軍部权力是有着其自身的独立性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为金融壟断資本服务的暴力的独裁，这一問題，从前面叙述过的各种事实就可以明了的。法西斯固然是金融資本的直接露骨的暴力独裁，但軍部权力，却不是金融資本本身的直接的权力。而它在金融壟断資本主义阶段，它不但与金融壟断資本相勾結并为其服务，而且也必然要作他們的代理来独裁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因此，它就不單純是个封建势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將其称为軍閥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以后，广田、平沼騏一郎和近衛文麿等官僚虽然也曾几次当了首相，但根本上仍是軍閥法西斯統治的时代。

这样說法并不等于說广田、平沼与近衛們就对抗了軍閥。实际他們本身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內部的一員，是共謀其事的一員，这在远东国际軍事法庭的判決中已經是很清楚的了。近衛固然是喧揚說他是最努力于压抑軍部的，但在“改造”杂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月号登載的手記，“元老重臣和我”（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所写的）中就力說“如果提出少壯軍人們的个别的言論來說（傍圈为原文所有），虽然有很多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但这些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对于我們日本來說也是必然要走的

道路。”也就是說，儘管近衛們對軍部的做法方面，在戰術方面是反對的，但在根本上却是站在同樣的立場的。

第二次中日戰爭 “廣義國防”政策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是日益猖獗了，而與此成正比，中國民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也高漲了。當時國民黨政府並不抗日，卻拚命鎮壓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是合作的，為打倒軍閥統一中國而戰鬥着的，但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了叛變，對中國共產黨施加了激烈的鎮壓。中國共產黨雖然從長江下游撤出，但卻在華中，華東的農村建了解放區，建立了強而有力的紅軍。從一九三〇年末到一九三四年初，國民黨政府雖然發動了六次“圍剿”，但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與朱德的領導下，將所有的進攻都打退了。一九三四年紅軍的主力，打破了百萬敵軍的包圍，從華南經四川省，長征至中國的西北角的陝西和甘肅地方。延安也就成了這邊區的首府。中國共產黨在這裡一面受着國民黨的攻擊，一面在積蓄力量進行了組織抵抗日本侵略的廣大的民族統一戰綫。

中國共產黨的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逐漸地博得了中國愛國人民的廣泛而強大的支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當蔣介石為指揮“圍剿”中國共產黨到達西安之際，他就被“圍剿”軍的司令張學良監禁起來，張向蔣提出了停止內戰而與日本帝國主義戰鬥的要求，蔣也被迫接受了。經過這西安事變，到了一九三七年，中國的抗日戰綫就更加強了。日本的軍閥法西斯們是非常害怕中國的統一的，他們焦躁地企圖在中國一致抗日之前就先將華北置於自己勢力之下。

將中國東北作為殖民地來開發，作為日本軍閥和財閥的“王道樂土”，從一九三六年就開始感到困難了，工業建設並不是像想象

那样如意，对东北的输出也是极为不振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抗日势力，使日本的纺织工业也陷入困难。更由于政府所保护的重点是在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方面，因此，纺织业等轻工业资本家是更为窘迫了。他们利用了惊人的低工资和日元的贬值，向南洋方面倾销，但这就被指责成“劳动力的倾销”的社会性的倾销而遭到世界的非难。

自一九二九年大危机以来，各国都在本国力量的所及范围内提高了关税借此减少输入，增进输出。日本的输出贸易自一九三五年以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另外一方面，日本的输入，由于羊毛、石油、重油、铁等军事原材料输入的激增，就使对日元区以外的输出入贸易形成了巨额的入超。

日本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发展了，但它也只有扩大战争才能继续生产的，同时，其所需的原料和资源虽然是想由中国东北来取得，但这一点也不是像所想的那样容易。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解决这一切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于军部、政府和财阀所谓的确立“日满华区域经济”，亦即将全中国作为日本的壟断殖民地。同时，窥视中国市场的英、美，对日本向中国侵略活动的对抗与中国抗日民族战线的强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因此，趁此时期立即行动，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至上命令。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郊外的蘆溝桥，日本军突然地攻击了中国军。这样，所谓“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开始了。

“国史”在这里对战争的原因也是一字未提的，对七月七日的事件则写作是“在蘆溝桥，中日两军间的战斗，突然的就开始了”，将日本军发动了这一战争的事实也蒙混起来。在这里使用了“日支”等字样也是暴露了著者们的帝国主义的心理的。“国史”是日

本政府的官方書籍的一種。而在這樣的書中竟使用“日支”“支那”字樣，就不能簡單地解釋為粗心的。另外還說“軍部是節節推進了戰爭”，似乎只有軍部才是承擔戰爭責任者似的。當時的首相近衛不希望擴大戰爭這是事實。但正如前所引用的手記，他也是贊成軍部的方向的，他對他向日本國民及全世界聲明的“不擴大方針”全然沒有實行一事，是沒負任何責任的。戰火立即蔓延到了上海，八月海軍航空隊就對南京施加了大轟炸。

在九一八事變時，即使是表示了一些反對的言辭的“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如前所述，也公然表明了支持戰爭的態度。

第二次中日戰爭一開始，就是蔣介石也不得不聽從中國共產黨和整個民族的愛國者的要求，九月間與共產黨就正式地結成了抗日統一戰綫。而這一統一戰綫的偉大力量，終於將帝國主義侵略的野心徹底地打垮了。

防共協定和對蘇戰爭 本文所說的“我國與德國，在昭和十一年締結了同盟”，就是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防共協定”而言的。在這第二年，意大利也參加了。

當日本軍閥法西斯的勢力強固的時候，在德國希特勒的納粹黨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也正得勢，一九三三年終於掌握了政權。納粹黨是在德國軍部和壟斷資本家的援助下強大起來的。當納粹開始得勢時，德國共產黨就幾次地向社會民主黨提出組織反納粹的共同鬥爭，但社會民主黨卻沒有接受。原因是納粹在開始時，僅是攻擊共產黨的，因此，社會黨就認為與共產黨提携是不上算的。而這一點却也就使希特勒終於得到了勝利。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中就公然說德國必須占領蘇聯的領土烏克蘭。因此，納粹就作為反蘇反共戰爭的選手，大大的獲得了資本主義列強的支持。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蘇聯的野心，如前所述，是從一九一七年俄

国十月革命后，对西伯利亞出兵时开始的。“九一八事变”的一个
重要目的，就是借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这是大川和 阪垣所主
張的，也是关东軍參謀極力鼓吹“滿洲独立論”的石原莞尔大佐(后
为中將)所主張的。石原为了这个原因，甚至是反对在中国内地扩
大战爭，而主張經營东北，来傾全力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九三一年
日本駐苏大使广田弘毅就曾建議參謀本部作进攻苏联的准备。他
在当时就說，很清楚的作这种准备的目的与其說是为了防衛共产
主义，倒不如說是在于占領西伯利亞 倒为恰当些。日本对侵略苏
联的意圖是年比一年公然表現出来并进行着准备。詳情在远东国
际軍事法庭判决当中都有的。

这样，日德兩国的法西斯就在一九三六年締結了“防共协定”。
就其所公开发表的部分来看，它是以彼此交換关于 共产国际的活
动的情报，为了防衛共产主义作必要的协力为目的的，但在这后边
却附帶了秘密协定，那就是日德兩國对苏联的長期的，政治上和軍
事上同盟。

在这一协定締結后，一九三八年一月关东軍在东 条英机參謀
長的指揮下，具体地进行了大規模地进攻苏联的准备，从七月到八
月，在哈桑湖地区(張鼓峯)，日本軍就突然攻击了苏联，但以失敗
而終。接着在翌年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九月，日本軍又將更大規模
的侵略战爭在諾門汗地区，施 加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尽管坦
克、飞机等日本最精銳的部队都出动了，但也仍为外蒙古軍及苏联
各加盟共和国軍隊所击败。在任何敗仗时，都絕不承認是“失敗”
的軍部，在这一次却承認并宣傳說，軍隊的进一步的高度的机械化
是有必要的。

第二次大战和三国同盟 这期間在欧洲，德意兩國 已締結了
攻守同盟进行着对苏战爭的准备。一九三八年七月近衛內閣时，

駐德國的大島大使向德國提出了新的同盟的建議。此後，兩國就繼續了談判。一九三九年一月繼近衛內閣之後，平沼內閣成立時，日德同盟的談判仍然繼續着，德國是要求組織一強力的軍事同盟的。對於這一點，陸相和平沼首相是支持的，但有田外相和海軍認為這樣做法會使日本與英、美關係更加惡化，因此以時期尚早為理由而加以反對。在這期間，德國為日本的态度所煩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當日本軍正在諾門汗苦戰之際，就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平沼內閣說世界形勢是“千變萬化”，無法應付而辭職了。

德國，在此後不久，九月一日就突然侵入了波蘭。而與波蘭同盟的英、法於九月三日也對德宣戰，這樣就拉开了第二次大戰的序幕。可是英國却是努力促使希特勒將矛頭轉向蘇聯的。希特勒背叛了英國的期望，在占領了波蘭之後，就轉向并占領了挪威，一九四〇年五月又轉至西部戰綫，并立即占領了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六月，意大利也追隨德國向英法等国家宣戰了。法國政府雖然是向德國投降，但法國人民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地抵抗了德軍。

德軍的大勝利，也吸引了日本政府和海軍部。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近衛首相，松岡外相，東條陸相，吉田海相等，在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九月間三國同盟成立了。三國同盟在形式上是以美國為目標的，是以如美國參戰或是開始對日作戰時，則三國即彼此給予援助為宗旨的，并表明它不是以蘇聯為對象的。然而，在實際上這却是一個進攻性質的東西，是三國約定了共同地進行侵略戰爭的東西，在這裏面，在對蘇戰爭之際要彼此援助的問題也都取得了諒解。

南進 中國的抗日戰爭引起了英美與日本的激烈的磨擦。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近衛內閣聲明的“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就非常地

震惊了在南洋有着領土和利权的英、法、荷。日本是沒有能支持長期战争的石油的，而当时荷屬东印度的石油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物資。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軍占領了海南島，三月又宣告离海南島南方七百哩的海中的小島为日本的領土。在远东国际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說“太平洋战争的根本的原因是存在于征服中国的問題之中”，但实际上，与認為日本要侵占中国多少就能侵占多少，要停止战争就能停止战争的这一軍部与政府的估計相反，征服中国的战争却如同是陷进了無底的泥坑是一样的。因此，为了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侵占印度支那、緬甸、南洋群島，获得橡膠、錫、石油及其他極重要的战略物資，这样，也就面临了不但中国，而且面临了完全由世界中孤立起来的大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是为美国所敗，但对中国战争却是一直胜利的，现在的法務總裁殖田俊吉就是这样說的，此外，很多人也是有这样想法的，其实这完全是愚蠢的，錯誤的。假如他們对中国的战争是真正地胜利了，那么，太平洋战争也是不会爆發的。尽管战争初期，在个別的战斗上是胜利了，但在当时整个的战局，战争的主导权却是在于中国方面的。从战争中期开始，就是在个別战斗中，也都是吃了大敗仗。在太平洋战争中，与其說日本为美帝国主义所敗，倒不如說为中国民族斗争所敗更为重要些。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政府投降德国之后，日本就压迫法屬印度支那，停止它与中国的交通与貿易，九月日本軍就侵佔了北印度支那。由此以后，不久就締結了三国同盟，这种趋势震惊了美国 and 英国也是很自然的。英国由于对德战争，無暇顧及远东問題，但美国却連續地向日本提出了強硬的抗議。当日美通商航海条約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滿期后，美国就將其廢除了，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南进的意志。繼而从一九四一年二月到六月，美国又先后对日本禁

止輸出了銅、鋁、石油等战略物資。然而，到此时为止，美国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加以非难，但另一面，对日本也还是自由的輸出了战略物資，这一点，也許是会耐人寻味的。

日苏中立条約 日本为了南进，就有必要暂时地調和一下与苏联的关系。因此，在此以前尽管苏联几次地提出了簽訂日苏互不侵犯条約的建議，但都为日本所拒絕了，可是，这一次却与苏联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締結了日苏中立条約。

德国到一九四一年春为止，是侵佔了巴尔干半島，更进至北非洲，但这时食粮却感到非常不足，石油和煤也很缺乏。希特勒相信只要进攻了他早已垂涎三尺的苏联，就可以获得这一切物資，而且也能够与联合国取得妥协。六月二十一日，希特勒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龐大的空軍和机械化部队，突然进攻了苏联的領土。互不侵犯条約对于法西斯來說是一文不值的。突遭襲击的苏軍是連續地退却了。

日本政府有鑒于此，七月二日，在天皇之前召开了會議，作出了現在不立即参加德苏战争，但如战局的發展对日本有利时，在适当的时机即“以实力解决北方的問題”的决定。关东軍也作好了严密的名义上是“关东軍特別大演習”(关特演)的对苏作战計劃。日苏中立条約对于近衛和东条來說，只不过是对于日本有利时才得以存在的文章而已。松岡和东条是特別強調立即对苏战争的，但近衛則以軍备不足而加以反对。相应地，近衛为了使陸軍滿足，就提議佔領印度支那南部，而这一提議却被通过，也被实行了。

日本，在此后，实际上虽然沒有得到对苏战争的有利的机会，——因为德国为苏軍所阻止住，不久并遭到了反攻——但日本仍踐踏了日苏中立条約，不断地与德国通諜，將所得的有关苏联的情报送給他們，而且，也仍在中国东北窺視着进攻苏联的机会。根据

最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才了解的情况,关东军甚至对苏联都准备好了进行細菌战——造成鼠疫及其他猛烈的傳染病的。

太平洋战争 三国同盟时,本文說“我国在这时,提倡和平的人是失去了力量”。但这“失去”則是“受到了政府的迫害”所致。接着本文又說“政府为了战争,从巩固国内角度出发,企圖重整政治、經濟、文化、建立求謀举国一致的新体制”。这里所說的举国一致,实际上,就是政府剝夺提倡和平的人們的力量并加以迫害之意。关于这一点前面已談过了。另外,高倡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們也都成了軍国主义的問題,在前面也曾叙述过。

一九三七年近衛內閣与开始侵略华北的同时,又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制去拜祭神社,迫害了信仰自由。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又创办了“兴亞奉公日”。

这一年的五月,天皇向青少年学生發布了勅語,強調地命令要为战争去牺牲所有的一切。另外,在这一年从小学到高等学校,对整个学科都徹底地加以改变,使全体主义、过激国家主义和軍国主义得以广泛地滲透,在这二年后的一九四一年,仿納粹德国的做法,將小學校改成国民学校,对教学科目和整个教授法都想尽一切办法使其变成不科学的东西了。特别是国史,修身和地理的教科書,就是一点点的真理也都沒有了。

在东京帝国大学和其他各大学,在此以前就驅走了稍有自由主义及和平思想的教授,而任憑狂热的軍国主义分子横行。自然科学、工学几乎全集中于飞机、坦克、軍艦及其他軍事方面的研究。

在經濟方面,一九三八年制訂了国家总动员法及电力国家管理法,將整个經濟作了战争动员,并作好了随时在随随便便的条件下都可以征用国民的准备。为此,借口整理企業,挤垮了中小工商

業，而使財閥大資本家却像雪人一樣地養肥了。這時，就成長了幾個新的如鮎川又介和中島知久平及其他軍事工業的財閥。

一九四〇年，政友會、民社黨和社會大眾黨都自動地解散了。民主主義和政黨政治不論在名義方面或是內容方面都被否定，而由政府組織了大政翼贊會和產業報國會，為了戰爭驅使全體人民像囚犯一樣去勞動的情況就開始了。政府對於軍事資本家的保護是無微不至的，給他們資金，在訂貨尚未製造以前就先付錢使他們大發其財。

一九四一年又制訂了國防保安法，借口保守國家機密，縝密地統制了言論和出版，作好了隨時都能將反對政府派下獄的準備。

英國及美國對日本南進的抗議，自一九四〇年日美條約廢除以來，就日益激烈。政府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為了緩和美國的對反而開始了談判。可是同年一月三十日政府和大本營的聯絡會議，就決定將進攻新嘉坡的基地設於印度支那，近衛首相，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長將此決定報告於天皇並得到了批准。為了在馬來亞登陸，就拍攝了克達拍爾的航空照片，節節地進行着戰爭準備。日美談判也陷入了僵局——由於兩國都不讓步，在七月六日的御前會議上決定“為了南進應排除一切障礙”，也就是說日美開戰之不可避免是被決定了。在九月六日的御前會議上，天皇採納了“帝國國策施行要領”的決定，在這裏面規定“到十月上旬為止，如我要求仍不得以貫徹時，就決心立即與美、英、荷開戰”。

根據近衛的備忘錄，到了十月，陸相東條英機等就已決心要開戰了，在這一點上，近衛與東條等意見不合，十六日向天皇提出了請求內閣總辭職的辭呈。天皇批准了這一請求。免去了近衛，而任命東條為總理大臣。這與決定同美英開戰是一樣的，但天皇却仍懷有不安的。天皇曾召見了高松宮及軍令部長們，幾次地問訊

过到底有無战胜的自信,而当他們答复說“有相当的自信”时,天皇才安心了。十二月一日木戶内大臣的日記就写道,“下午兩点,召开了御前會議,終于,决定了对美开战”。这样,为被整个政府、軍部、財閥及議員等慎重准备的太平洋战争,就被天皇“决定”了。

“国史”在这里虽提到免职了近衛,而代之以“东条”,但在前面它对幕府的將軍要由天皇任命这一形式的問題都像煞有其事的描述了一番,可是在这里却一点也沒提到天皇的作用,这从學問上來說也是不对的。这样,就不能培养兒童对历史的正确看法和正确判断事件輕重的能力。另外,对宣战布告所用的主語是“我国”,而投降时却說是“天皇的旨意”,对这一点,也必須清楚地指出,这一宣战布告就是天皇决定的。因为,正是由于天皇想要开战,所以才作了这样决定,而投降則是基于国民的反战和厭战而不得不接受的。

波茨坦公告 战争开始时,由于日本軍突然的襲击,看去似乎是胜利了,但不久,日本在各地都被联合国軍击败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国、美、英的代表在埃及的开罗會談,决定了一直要战斗到日本無条件投降以及課予日本的条件并將这些条件公开发表,来劝告日本停止無味的战争。但天皇及其政府和軍部却如耳旁風,一味的还繼續着战争,而且使战争越来越接近了本土。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首腦,在苏联的克里米亞的雅尔塔會談,决定了对德国及日本的方針。此时,美、英特别是美国,認為,为使日本投降,苏联軍队扫清关东軍一事無論如何也是必需的,于是就强烈地要求了苏联对日参战。苏联,由于日本已經完全踐踏了日苏中立条約,因此,也就沒有了被日本抹杀的条約所束縛的义务,为了早日帶來和平,就接受了美、英的要求,同意在德国向联合国投降后三个月內即行参加对日作战。这一會議还决定了在战争終結

后，苏联領有庫頁島南部和千島，接收旅順、大連的日本的權利。接着，中国政府也同意了。

同年五月，德国向联合国投降了（意大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就已投降了）。結果，想繼續战争的就只剩下了日本自己。而且在六月时，冲繩島又被占領，日本的主要城市几乎都遭到了炸毀，有一千万人失掉了家园，国民为战争所疲憊是期望着早日和平的。美英兩國首腦七月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召开會議，在最后决定时又加上了中国，这样在二十六日三国共同的对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并向世界宣布了，这就是波茨坦公告。該公告劝告了日本投降，明确地提出了对日本的要求条件。这样，联合国作为“吾人的条件”課予日本的条件如下（数字为公告条文的次序）。

6、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劣兵黷武主義驅逐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

7、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等已毀灭，有确实可信之証据时，日本領土經盟国之指定，必須占領，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8、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將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島之內。

9、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后，將被允許其返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10、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視必須成立。

11、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貨物賠款之

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為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以別于統治原料，日本最后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12、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后，同盟國占領軍隊當即撤退。

聯合國宣稱，如日本不接受這一公告時，則日本只有完全而別無他路的毀滅。

政府由于沖繩已被占領，海軍也全被擊潰，因此，在這公告未提出之前就曾活動蘇聯請其斡旋媾和，但蘇聯認為該日本政府仍是原來的天皇及軍閥官僚的專制政府，並不是真正保衛和平的政府，它只是在闡述自己片面的希望，因此，就沒有應允。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后，政府和軍部以天皇為中心，雖然也連日的召開了會議，但他們并沒感到這一公告的重大意義。而且，鈴木首相還特意地在七月三十日的報紙上發表了政府對這公告“只有不加理睬，而向完遂戰爭邁進”的談話。蘇聯當然是不會與這樣政府斡旋媾和問題的。

在這期間，德國投降后三個月即蘇聯對日參戰的日期是日益迫近了。美國，在此之前是焦躁地極力想把日本的投降證明是由于美國的軍事力量。因此，他們將僅僅有兩顆而且是剛剛制造出來的原子彈的一顆，于八月六日就扔在廣島。從軍事上來說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軍部和政府對此却大為着慌。然而，僅僅炸彈還是不能夠決定戰局的。八日夜（九日晨）蘇聯軍隊根據約定參戰了。很快地關東軍和朝鮮軍就崩潰了。九日原子彈又扔到了長崎。關東軍的潰敗，就使軍部也都無望了，除了投降以外，是別無他路了。

在這種情況下天皇與政府才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日

当接受公告时还要求联合国要諒解“該公告不包含变更天皇統治大权的条款”。也就是說,当投降时,天皇向联合国軍的唯一的求就是保持自己的地位。联合国对此在十二日就答复說“从投降时起,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統治权須置于盟軍最高統帅的限制之下”,又說“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根据波茨坦公告,由日本人民的自由表示的意志来决定”。八月十四日天皇应允,十五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無条件投降了。

第十三 走向和平、独立和民主的日本

一 战争带来了什么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战争接着战争的历史。从成立了天皇制的一八六八年起，仅仅过了六年后的——一八七四年，天皇政府就嚐試着侵略台湾了。在这十年后的一八八四年，圍繞着对朝鲜的統治权的問題，中日两国军队就对峙起来形成弓弩齐張的緊張局面，但因清軍無战意，日本准备也不足而延期了。十年之后，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终于由日本方面的挑畔下爆發了。接着在这十年以后的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又發生了日俄战争，此后又过了十年在一九一四年，又强行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这个战争尚未完全終結的时候，从一九一八年夏到一九二二年秋止，整整四年多的時間还向西伯利亞派出了大軍干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又过了九年在一九三一年，又發动了所謂“滿洲事变”，即对中国东北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此后，战争是不断地扩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为止，十四年来一天也沒有停止过。

傾注了全国力量的大战争，到一九三一年为止，大体上是每隔十年一次，但在这其間如算上一些小的战争或海外出兵等，大体上每隔五年就有一次战争的。实际上說近代日本的历史是准备新战争、处理旧战争的善后的历史也不为过分的。不管是政治、經濟

或者文化，所有都是以处理战争的善后和准备新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和平”只不过是一次战争与其下一次更大的战争之间的极短的喘息时间而已。就是这一喘息时间也越来越短，在一九三一年以后，以全世界为对象的大战争，一直到它已註定的溃败为止，是不断地連續与扩大着的。

而且，一八七四年以来，这些战争没有一次是民族战争、正义的战争，也没有一次是防衛的战争，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也是极为悲惨的了。实际上，这些战争都是天皇及其军部、政府的战争，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战争。也是为了天皇制、大地主以及大资本家的利益并由他们所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就是当他们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日本国民群众也并没有从这些侵略战争中得到任何利益。正因如此，所以不管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不管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甚至就是在第一次大战当中，工人、农民及所有的劳动的国民，都掀起了反对政府、资本家和地主的巨大的斗争。当侵略战争及其胜利给天皇、官吏、军人、资本家和地主带来了巨额财富和闪亮的勋章的时候，也就是国民群众陷于饥饿和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只要把一九一八年的一面是空前绝后的好景气和另一面却是米骚动回想一下，任何人也都会明白的。

侵略战争即使是比较容易以胜利告终，但这对国民群众并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和幸福的。实际上，从事十四年的长期的战争，甚至扩展到以全世界为战争对象，而且註定要完全失败的自侵略中国东北以来的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给予对方各国人民的惨害和带给日本国民的痛苦是不知有多少的。

由于这种战争，日本国民自明治以来争取到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就是最后的一点点也被剥夺去了。开始时，迫害似乎仅是对共

产主义及其相近的人,就是說是对“紅色”的。但不久,多少有些自由主义或是民主主义傾向的象征者也都遭到了迫害。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完全被剝夺了。

当战争还没有扩展到整个中国时,由于军需景气,失业者是减少了,同时也呈现了景气即将好转的幻想。但战争经济就是要从国民群众身上榨取其最后的一文钱而将其转交给军需资本家及其同党的。所有的和平工业不管是资本还是资财都丧失了使用的余地,祖傳的生意也都关了門,并被强制转业到军事方面,劳动力也都为军事工厂所征用。所谓消除了失业者,实际上除强使八千万国民去服军事苦工营的苦役外是無他物的。大学生更不必說,就是十二岁的小学生也都被征去从事军事工业和军事食粮生产的奴隶劳动,年輕的姑娘也都为军事工业夺去了青春。至于工资等那就更是談不到了。

当进入太平洋战争时期,甚至连飯也都吃不飽了。在四面环海的日本,連魚也都吃不到了。一个小南瓜都不能不由好几戶的隣居共同的分着吃。

穿的衣服是只發給了衣料購買票,至于实物則几乎买不到的。一紮棉紗也都成了最高級的貴重品了。年輕的母亲为了給剛出生的嬰兒作尿布,都不能不到夢中去寻找。

就是以这样的方法从人民身上榨取来的錢,从一九三七年向中国全面侵略以来,仅仅临时軍費就高达至一千八百七十亿日元。而这些錢的百分之八十又都为三菱、三井、安田、住友等極少数的壟断资本家的金庫所吸收去了。他們接受了政府的訂貨后,当貨物还没有生产的时候,就由政府領到了貨款。而且軍人、官吏和大资本家們,就是在飢餓的人民为一棵葱而爭吵的时候,也仍使其厨师备各种酒菜、拥妓而耽于奢侈的生活。

不久，日本全國就曝于美軍殘酷到極點的濫炸之下。美國空軍不是將轟炸的主力放在破壞日本飛機場、軍港、兵營以及最重要的工廠和鐵路等戰爭能力方面，而主要是燒毀人民的住宅、學校和醫院，熱中于屠殺日本婦女和兒童。美軍對德國也是以同樣的辦法來轟炸的，在這後面卻隱藏着巨大的政治意圖。這就是，美國企圖儘可能地不損傷日本的軍事設施和軍事工業而加以占領，以便于利用這一切來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充當遠東的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對於沒有軍事意義的中小城市也橫加轟炸。被這種轟炸所燒毀或是由於疏減住宅而被破壞的房屋也達二百九十八萬戶，有九百萬人被奪去了家園，家財、器具等的損失按當時的公定價格計算，也高達至九十五億六千萬日元。

房屋和衣服被燒毀而僅逃出了生命的就算萬幸了。B二九型飛機在住宅區的四周投燃燒彈，使人連逃都逃不出去。就這樣僅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空襲東京時，就有十萬人以上被燒死。如整個算起來，至少有五十萬人以上的男女是死於空襲之下的。其中最淒慘的又要算是廣島和長崎了。廣島僅一顆原子彈就殺死了二十五萬人。原子彈受害者，就是在戰後八年的今天，也仍然斷斷續續地還有死亡的。在長崎也出現了二十萬人的死傷者。我們日本人對於這一淒慘的情況是永遠不能忘懷的。當然，並不單純是不忘懷這件事，就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戰術上來看毫無必要的，但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已如前述）也仍然加以殘酷轟炸的一事，也會使我們永久記着的。

在中國大陸上和南海的各島上，我們究竟有多少父親、丈夫或兄弟戰死或殺傷，其正確數字甚至在現在也都沒讓我們知道。被視為一家的希望和支柱而仰賴的年輕力壯的男子，一個個的都被征去當兵了。據政府說這些兵數在投降當時就已達到了七百二十

万人。平均起来，兩戶人家就有一个是当兵的。而据一九四六年末仅仅是确認的战死者就已超过了一百五十六万人。永远殘廢和下落不明的有三十一万人，其他“情况不明”的也有二十四万人。但是，实际的战死战伤者是远超过这个数字的。政府非但不究明战死、战伤者的数目及其死亡場所来撫恤遺族，相反却热中于造謠說西伯利亞扣留了三十几万人来煽动国民的反苏气氛。

如此所述，不仅仅是战争的直接的被害，就是間接的慘禍也是極其深重的，不是用数字和言語所能表达的。人們的精神被损伤了，特别是兒童和青年的肉体和精神的增长也遭到了阻碍，仅仅这一点就使我們民族蒙受了致命的伤害。在物質方面，由于战争而荒蕪的国土，一个接一个像連鎖反应一样的造成的損害，又有誰能够計算出来呢。

国民群众付出了这样極其悲慘的牺牲，然而他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占領和殖民地的附屬化！我們的民族独立被剝夺了，并且陷入了从我們祖先开始住在这个日本列島起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还没有过一次民族的屈辱和隶屬。这就是天皇制和帝国主义在八十年間，其中尤其是最近十四年間的战争的最后的結果。

二 虛伪的民主改革

我国統治者們的非正义的战争，給世界特别是亞洲的各民族及我国国民所帶來的痛苦和牺牲是莫大的。但尽管如此，如以此为轉折点，永远的除掉驅使国民从事非正义战争的專制統治者們，將产生法西斯和軍国主义的政治、經濟和社会等各种原因徹底根

除，树立日本国民的民主主义和持久和平的话，也还是能够补偿这一牺牲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与曾被我们所苦的亚洲和全世界的人们作朋友。

波茨坦公告是要求日本重生为这样民主的与和平的国家的。而且由于日本对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因此，也就负有严肃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的义务。

然而，占领日本的却不是集中表现了波茨坦公告的世界和平和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是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而且，其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曾因最残酷地镇压过菲律宾独立运动而出名的阿萨·麦克阿瑟将军之子，父子两代在美国将军中，都是以最反动、最是帝国主义式的将军而知名的。

形式上，日本是被盟军占领的，就是麦克阿瑟及其后继者也都是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出现的。但事实上却是美国的单独占领。从投降日起到该年年末，对日占领政策是名符其实地美国的独裁。此后，在华盛顿由参加对日作战的盟国代表设立了远东委员会，决定了对占领日本的根本政策，在东京又设立了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理事会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咨询机关。这一点固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帝国主义，但日本是置于美国占领体制及其独裁之下这一基本的事实是没有变动的。

成为日本的军事独裁者的美国的对日政策的根本目标，并不是在于像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那样，使日本民主化及和平化，而是在于使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变成美国征服世界政策的工具。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基本方针的声明”中，在开头作为“最终目的”就说：

“(甲)保证使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

(乙)建立尊重他国权利，支持表现了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的美国之目的、和平的、負責的政府。

只有成立这样的政府，才能与民主自治的原则相符合，在这一問題上美国也是寄与希望的。联合国的責任并不是在于强使日本成立不被自由表示的国民意志所支持的政体。”

从这文件当中，除了美国統治者的独特的美的辞藻外，剔出其实际中心来看，美国統治者就是要把日本第一，变成不能再度对抗美国，第二，不仅如此，进一步还要建立对美国順从的日本政府，这两点就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最終目的，对于將日本改造成“符合民主主义自治原则的政府”則是不負責任的。

那么，在这声明的最后一段又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从上述的基本政策的第二部分也可以看得出。在这一部分中說：“鑒于日本社会現况且为使美国以最少的兵力与資財来完成占领目的起見”，“盟軍”最高統帥可以“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及各种机关行使权力”，这就是說它虽然不是“支持”天皇制，但却是“想利用”天皇制的。“鑒于”“日本社会的現况”，即天皇制的、半封建的和壟断資本主义的性質，对于这些各种反动的軍国主义势力，美国是并不想將其剷除的，而是企圖利用这一切，来便利于他們統治日本的。果然，美国是說美国并没“支持”这些势力的，但为了“利用”他們，也就不能不加以扶植，也就是說，對他們也就不能不加以支持，而实际上也是支持了的。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構成部分的日本与联合国之間的战争的整个性質，第一，是民主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日本法西斯和軍国主义的战争。第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从日美战争这一局部来看，則是日美兩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爭夺势力的战争。美国并不是为了要將中国和南洋各民族

从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出来而战争的，而只是抱着將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从这些地区中赶走，由美国代替日本施以帝国主义的統治和剝削，使日本变成对苏战争和美国統治远东的基地等目的而战争的。

在事实上是单独占領和統治日本的，就是抱着这种目的的美帝国主义。而且，日本的反动势力也企圖对美帝国主义投降去取得生机。他們在苏联参战以后，就認為如果战争这样繼續下去，就会增大苏联的对日發言权，这样投降后真正的民主主义也就会在日本發展起来，这一点是他們害怕的。对于日本反动的統治体制中樞的天皇制，美、英似乎可以給保留下来，但苏联和中国則是反对的，因此，如战争長期繼續下去，則天皇制就要从根本上灭亡的，他們就是怕这一点才投降了的。

在这样帝国主义占領权力及其走卒的国内反动势力的統治下，日本民主化当然是不能够真正实行的。但战后，就是美国統治者也不得不作些对日本民主化的伪装。因为第一，对日德意法西斯三国，美英統治者也只是因为它提出了保衛民主主义的口号才得到了本国国民和世界民主势力的支持，才能够对日德意三国战争，因此，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战场上完全被击溃以后，無視更加高漲的国际民主势力——在对日問題上是集中表現在波茨坦公告上——就是美帝国主义也是做不到的。第二，以中国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大的牺牲者的亞洲的各民族的坚决不許日本法西斯和軍国主义再起的决心，也迫使了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如此。第三，日本国民对和平与民主革命的热望，在長期的战争中是遭受了百般的压抑，而投降后即爆發式的高漲起来，对此，就是美国占領者也就不得不做一定的讓步。第四，美国如前所述，为了將日本的統治体制改造成順从美帝国主义的奴僕，也就不能不給他們一定

的——但絕不是从根本上將他們打倒——打击，如此，在一定限度內利用日本的民主势力，就是对美国自己來說也是有利的。

这样，美国在占領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达到帝国主义的目的，于是就在某种程度上是采用了民主政策的形式。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和同月十日釋放政治犯到翌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的整肃过激国家主义者、軍国主义者的指令为止的为了保障国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和排除軍国主义领导者的各项指令，还有獎勵工会、土地改革和財閥解体等指令，看去似乎是聳人耳目的“民主化”的各项指令都被提出来了。

当时，这些指令却作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日本国民群众的民主革命的斗争的有利武器而加以利用了。同时，这一切固然是妨碍了清楚的去認識美国占領者的帝国主义的本質，但現在却已經是十分明白的了，这些指令都是以美丽的、民主的外衣所伪装起来的。但第一，它并没有明确表示做什么，怎样做的具体内容和实行的期限，它保留了怎样解釋都可以的余地，并給予了最大限度的拖延实行的可能性。例如土地改革的指令即其典型。在这里面說的是冠冕堂皇，它說“日本政府必須保証耕种土地的农民享有其劳动成果的平等的机会”。但到什么时候止，如何改革的具体内容却并没有說出来。而且，这一“改革”还是交給日本政府即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一直在压迫耕种农民由政府去做，对于耕种农民自己起来粉碎封建地主制的斗争何尝予以支持，不过是加以阻撓而已。

第二，所有的指令都是在迟于或过早于适当的民主革命的时期提出来的。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在月末时，美軍的先遣部队就已进入了东京。但是，政治犯如过去一样仍因在监牢中，治安維持法和治安警察法也都沒有廢除，直到投降后經過

了五十五天在十月四日才將其廢除。在這五十五天內，就給予日本反动勢力以時間，使他們在政治上由戰敗的打擊中得以復甦，來對付革命勢力。而且，在這期間特權官僚、高級軍人、壟斷資本家和大地主瓜分了軍和政府的蓄備物資，索取了尚未生產的軍需品的“價款”，並以各種名義的“補償費”的形式，向國庫大肆搜掠，掀起並造成了猛烈的通貨膨脹，以眼睛看不到的形式來剝削國民，將戰敗的犧牲完全轉嫁給國民群眾，而自己則利用戰敗來大發其財，至於天皇制法西斯的殘黨，也挾巨額的政治資金，悠然地隱蔽起來。就這樣使反动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從戰敗的一瞬間的打擊中復甦以後，才緩慢的做了一些釋放政治犯、民權自由等似乎促進了國民群眾的民主生活的假像。

或者是相反的，如一九四六年四月的戰後第一次大選，由於當時工人、農民、市民的同盟萌芽了，整個人民與反动勢力的鬥爭一天比一天的像暴風雨似的發展着，而且，也由於反动勢力騙過了很多的國民，於是美國占領軍就認為必須立即在民主勢力尚未進一步發展之前就實行大選，必須以“自由表示的國民意志”來加強反动統治。這樣，美國占領軍就踐踏了遠東委員會的要等到民主勢力更進一步地打擊反动勢力之後再行選舉的決定，就下了命令在四月舉行選舉。

所有的美國的民主化的指令，都是像這樣的在選擇了對反动活動最適合的時期而發布的。

第三，這些指令的運用，正如前所談及的是交託給天皇制官僚政府的，而指令本身也是抽象的，因此，反而使政府利用了“民主化”的指令，殘留並加強了反动勢力和迫害了民主主義。例如“公職整肅令”，從一開始就被用來加強反动官僚勢力的，其後，又變本加厲的整肅了眾議院副議長松本治一郎和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

一等，这就說明它更加成为露骨的法西斯政策的手段。还有，就是一九四五年末禁止修身、地理、历史的国定教科書使用一事，也在禁止軍国主义教育的名义下，被利用来剝夺日本国民对日本历史、地理的自觉，使教育殖民地化，然而，另外一方面，像“国史”这样的軍国主义历史教科書，却依然 强制灌輸給国民。其他如曖昧的土地改革的指令，也正如同是告訴地主叫他們现在就收回土地，現在就要考虑手段保留自己的势力来实行“改革”是一样的。

如上所述“民主化”的指令，尽管在表面上很像是革命的，但实际上它的結構不仅是使实質的力量不能發揮出来，而且也使美国占領軍直接的护衛了日本的反动势力。扶植天皇制这一根本的事实前已談过了。在軍隊方面，美国固然是解散了反美的旧軍隊，但对陆海軍高級參謀和將軍們却是加意保护的。他們現在都成了重新武裝日本的主要角色。就是特高警察，在表面上是廢除了，但仍以警备科等名义在組織上加以保留，而对于“优秀”的特高警官則將其有系統的吸收到美国間諜和秘密警察机构——CIC*当中去了。

在經濟方面，美国也并不是以土地改革来廢止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这一“改革”并未解放占日本国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山林原野，而且，地主的保有地恰如釘在农地上的楔子一样的被留下来，农道水利的統治权依然的留在地主手中，不仅如此，他們还加强了地主势力对村公所和农会的統治权，并且，通过征粮和征税也加强了地主与官僚的結合。

財閥解体完全是虛伪的。“盟总”的財閥解体科，甚至都有了“財閥保存科”的綽号。

上述的美国对日“民主化”政策的招牌及內容的矛盾，最大限

* CIC即 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 (反間諜机构)的縮写。——譯者

度地殘留日本所有反动势力，企圖將这些 利用来为美帝国主义对苏联、中国、朝鮮和越南的侵略，这种情况，在美国对西德的政策中也同样地表现了出來。从“德国民主民族战綫全国大会”編的“美国占領政策的实态”中的美国对德政策的情况，来究明对日政策的真像，是会有很大作用的。

三 走向殖民地化和法西斯化的道路

第一期 占領后的初期，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为止，專門渲染为民主的解放者的美国，三月間 就使日本政府在压抑通貨膨脹的借口下，强使国民所有錢款存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机关并加以冻结，来挽救大壟断資本，这一事情就开始暴露了 美国是日本壟断資本的朋友和日本人民的敌人。

对工会和农会活动的限制解除了，国民群众在共产党的猛烈的活动力的推动下，在各地都开始团結起来并参加了斗争。

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在 东京举行了打倒幣原內閣的工人、农民和市民的大遊行示威，但由于包括坦克在內的美軍部队的出动，队伍就被驅散了。日本警察向人民开枪一事，也是从这时开始的。麦克阿瑟是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保护者这一幻想也消逝了。

繼而在五月一日，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战争中很久就被禁止了的五一节也复活了，在东京有五十万人，在全国有二百万人都参加了这一国际無产阶级的团結的紀念日的斗争。

当时在全国，飢餓情况是很严重的。食粮問題的解决是迫在眉睫的問題。然而，这一問題已不能再指望保守反动政权来解决。在此以前，四月十日大选的結果，幣原內閣的当政党失败了。

幣原仰賴了“盟總”的援助，企圖仍據政府之位，但結果，由于以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为中心的在野党四党的倒閣共同委員會及議會外的群众的如同洶浪般高漲起来的反政府斗争而倒台了。其后，由于社会党背叛了共产党而与自由党妥协，就杜塞了以民主方式来締造次一屆政权的道路，結果是由自由党组閣了。中途，自由党总裁鳩山一郎却遭到了整肃处分，于是作为外务官僚头子的、过去就以亲美英、对中国和苏联有着貪婪的侵略主义的、作为財閥的最热心的拥护者而知名的吉田茂，很快的成了自由党总裁并筹組內閣了。

人民反对成立这一內閣并要求建立从根本上解决食粮問題的民主政府。五月十九日，在东京举行了三十万人的大遊行示威，包圍了首相官邸，迫使吉田打断其組閣的念头。吉田失去了自信而發生动摇，但在这时麦克阿瑟却向他伸出了挽救之手。四月二十日晨的报纸上，巨大标题刊载了麦克阿瑟的“警告多数暴民从事遊行示威及騷扰的声明”，在这里面表示了麦克阿瑟坚决鎮压日本国民群众的民主的成長的决心。在其庇助之下，第一次吉田內閣成立了。从战敗投降到这五月十九日的声明为止，我將其划分为战后第一期的前半期。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披上了进步的外衣的时期，在这期間，日本国民以工人为先鋒，急速地成長起来，表现了真正的民主主义，揭露了美国占領者的表面的民主主义，在这情况下，麦克阿瑟就暴露了他的真正的猙獰面目。

此后，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麦克阿瑟發出了禁止將在第二天即二月一日上午零时举行的国家机关职工与民間企業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为止，可以認為是战后第一期的后半期。这就是占領軍及其所支持的日本反动势力公然的以暴力来鎮压工人农民的斗争，而且是一面以狂暴的通貨膨脹加强对国民的掠夺，另一

方面又以制訂宪法为中心，来奠定重新整頓日本統治体制的基础的时期。新宪法本身，在外形上是相当民主的，但也只是对国际国内民主势力的虚伪的讓步，只是为了隱蔽占領权力及其走卒的反动独裁而采取的“民主主义”的假象。因此，就不能够說日本国民在当时和現在都最大限度的运用了新宪法（其所以能够运用，也是因为在这里面也反映了国际和国内的民主势力的力量），而忽略了美帝国主义急速地制訂了这一宪法的反动意义。

在这期間，从国民方面來說，也是紧接着前半期的民主化斗争的高漲的余波，工会、农会及各种市民組織都成立并發展了，以全国的組織及团結的力量，在农村則發展成反对征收土地，反对供出制*，在工厂則發展成反对解僱，要求提高工資等等的激烈的斗争，終于發展到二·一总罢工的高潮的时期。

从战后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末为止，从整个來說，可以認為是战后日本历史的第一期。而这也就是帝国主义一方面还多少地采取了一些民主的外形的时期，但另外一方面，面对着国民的民主的成長，就逐漸的暴露了其帝国主义的本質的时期。

第二期 禁止二·一罢工以后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大选的結果，在二月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成立为止，是战后的較大的第二期。这时期又以一九四八年七月公布的二〇一号政令，將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这时期，在政治上美国占領权力与日本反动势力擲民主的外形于不顧，从二〇一号政令禁止个别罢工起，进一步更穷兇極惡地剝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团結权，甚至对前半期的外形的“民主的改革”也都公然的开始倒行逆施的时期。武装警察队与美軍对罢工的流血的鎮压，也越来越頻繁和殘酷。工会与农会借口要排除共

* 供出制是日本政府向农民强制的收購公粮的一种制度。——譯者

产党对工会与农会的“独裁”，就依靠了“盟总”的劳动科的资金与指导，利用半封建的职级制度，积极的进行了分裂工作。

一面以这样的镇压与分裂工作来阴谋削弱国民的抵抗力，一面在这期间为了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又实行了经济恢复工作，使日本经济从属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使日本工业转变成美国的“远东军火工厂”而作着准备。

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的片山内阁，以社会党班底的“中庸内阁”为招牌，给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以幻想，它一面阻止了工人运动，强制国民“勒紧裤带”以“工资和物价新体制”“倾斜生产”来为上述的美国与日本垄断资本利益的“经济复兴”铺平道路。

这一内阁在一九四八年三月被工人运动打倒之后，接着就是以民主党（现在的改进党）的芦田均为班底的民、社联合的“中庸内阁”。七月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提出了二〇一号政令，以“外资导入”“振兴贸易”（使日本贸易完全从属于美国，并作为美国危机的充塞市场）等的招牌，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所希望的“远东的军火工厂”化的政策。因此，就是外国记者也都给这一内阁起了个“梆梆 * 内阁”的绰号。芦田内阁没能够隐瞒住其空前未有的接受贿赂的问题（昭和电工公司事件），以至于芦田首相、西尾副首相（社会党）和栗栖藏相们被提起了公诉，内阁因之崩溃。这就暴露了伴随殖民地政权的必然的政治腐败是如何的严重了。

芦田内阁崩溃后，民主自由党的第二次吉田内阁，在十月就成立了。吉田首相对外国记者就说“共产党诸君说日本已成了殖民地，但美国在过去不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吗？”（十月十日“日本时报”）。在这一年年底的十二月十七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发表

• “梆梆”是战后日本出现的为美军玩弄的一种青年妇女，如吉普女郎类。

——译者

了“日本經濟安定九原則”并將其不容分說地塞給了日本。对此，麦克阿瑟就曾說这是“要求日本人的生活，在各个方面比現在更大程度的节儉，要求暂时地放弃自由社会所帶來的特权和一部分自由”。

繼之，又制訂了外匯管理法及其他統治貿易匯兌的，在这一方面也从屬於美国的制度化的法律。像这样的殖民地化、法西斯化和極力压低国民生活的政策，必然是要引起国民群众的抵抗的。而共产党就是站在这种抵抗的最前綫。工会为民主化同盟等分裂主义者所破坏，一面受着“盟总”和警察的露骨的鎮压，一面則頻頻的掀起了罢工斗争。农民战线比前半期是处于低潮的，但在反对征粮和重稅的农民的斗争中，农民就抛弃了“中庸主义”和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干部的錯誤的信賴，而增高了对共产党的期望。市民們为了反对重稅，很多都是以民主商工会和納稅民主化同盟等的組織来斗争的。在这些組織当中，也有了共产党的积极的领导与援助。特别是随着日本殖民地化的日益露骨，国民的民族自觉也就被喚醒了。为了反对一九四八年七月提出来的二〇一号政令的北海道国营铁路工会旭川支部新得分会的青年工人，就組織了民族独立青年行动队，放弃了本位工作，在国营铁路的人們当中，在矿山，在工厂，在农村展开了訴說民族危机的一大宣傳活动。这一斗争，在殘酷的鎮压之下仍扩展到整个北海道，从八月下旬，行动队的青年們又到了本州。这一战术，尽管在放弃了本位工作这一点上，还有檢查的余地，但作为民族抵抗的群众的有組織的行动來說，則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在这样情况下，一九四九年一月就举行了大选。大选結果是“中庸內閣”的当政党的社会党和民主党垮台，反动的民主自由党則获得了絕大多数票，但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一举当选了三十五

名。这样，第三次吉田內閣就成立了。它憑借着占議會中的絕大多數，制訂了团体等規正令*及其他法西斯的法令，改組了特別审查局，使原来为調查过激国家主义的此局，作为对共产党、工会及其他民主团体、个人的特高警察式的調查与搜查的机关而扩大和加强了。

到此为止，对于战后日本历史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动向，我虽然还没有談到，但这些情况也必須在这里作一个交待。

四 战后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史的最基本的方向，一面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势力的飞躍的为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止的發展，另一面則是帝国主义的显著的削弱，是不可避免的沒落。

社会主义苏联是將第二次大战导至人民民主主义各国胜利的决定的力量，其結果，苏联在战后的世界政治上的發言权和威信，是飞躍地增高并加强了。而且，尽管苏联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战争災害，牺牲的軍人为七百万人，在德軍暂时侵占苏联的期間，被杀死者是更多的，物質的損害达四千八百五十亿美元。不拘是人或是物質方面，都超过了第一次大战整个交战国的災害的总合（可以此与上述的日本的損害作比較）。但由于不是为資本家的利潤生产，而是为了滿足人民的需求而生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偉大，到一

* “团体等規正令”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日本吉田政府由美国占領当局授权而制訂的一項法西斯法令。这个法令在表面上是禁止組成和領導与極端国家主义团体、暴力团体相同的反民主主义团体，实际上则是用来迫害日本共产党和 各民主团体的。

九四七年末，生产就已远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其后也不断地日益加速经济发展，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近来，就有了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的景象。

第二，东南欧各国民，被苏联红军由希特勒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团结了所有民主的爱国的势力，缔造了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度中彻底地实行了土地革命，国家没收了地主和法西斯的土地并无偿地分给了耕种农民。战时开始的可怕的通货膨胀，在一九四七年就完全停止，同时并实行了大工业、大森林和地下资源的国有，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结果，在一九四七年生产水平就已恢复并超过了战前，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些东南欧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各国，都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主义，发展了与苏联以及各该国彼此间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共同目的所结成的紧密的友好和互助关系。另外，在美、英、法占领的西德地区与苏联占领的东德地区，是走着不同的发展的道路，与西德在美国独裁之下变成帝国主义的基地的情况相反，东德在苏联的援助之下，则向人民民主主义方向发展。

这样，东南欧的大部分都截然的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而进入了和平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阵营。

第三，以中国为首的亚洲非洲的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民族，打破了长年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已经作为强大的一员加入了和平与人民民主阵营（中国、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的虽然还没有独立，但也使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更加困难了。真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后半期是殖民地解放的时代。而当没有了殖民地，那么帝国主义也就不能存在了。

特別对世界政治有着巨大的决定性意义的，是 有着六亿人口的广闊的中国，完全地粉碎了帝国主义体系，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独立，并飞躍地發展着政治、經濟、文化。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抗战期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統一战綫，固然算是保持下来了，但在一九四五年初，当中国的抗日胜利迫近的时候，美国就妄想独吞了这一胜利的果实，企圖代替日本来作中国的統治者，就援助并鼓动蔣介石进攻中国共产党，破坏了統一战綫。日本投降后，蔣介石一派对共产党及所有的民主爱国人士的进攻就更加猖獗了。

共产党和各爱国力量，为了建設民主的完全独立的統一的中国，也曾与国民党談判过，但一九四六年十月，蔣介石終于又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及其解放区的全面的內战。美国对蔣介石軍隊投下了从坦克和飞机直到其他近代化的兵器等二十亿美元的資本，但由于卖国反动的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敗以及兵士們憎恨蔣介石一派的压制和剝削，与其說是和解放軍作战，倒不如說是拿着武器，集体地向解放軍投誠了。人民在各地都支援解放軍，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一派。

結果到一九四八年秋，东北就完全解放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天津地区也归于解放軍之手。这样，解放軍和人民的胜利的进攻就从华北指向了华中，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了南京于是解放的矛头又轉向了华南。美国鑒于此种情况，也不得不承認蔣政权的維持是日益困难了，八月，就將一切責任归結于蔣介石政府的失敗，并声明今后要采取“封鎖中共”的政策。九月末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就仅剩下了四川、貴州、云南、广西五省和广东省的一部分。

十月一日胜利了的共产党和爱国民主势力，宣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同年末，中国本土除西藏外，全部解放，蒋介石一派就逃窜至台湾去了。继而，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人民解放军又解放了海南岛。这样在六亿人口的、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就永远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成为和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堡垒。一九五〇年一月与苏联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又是以“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为目的的。

中国隣邦的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垮台之后就要完全成为独立国，这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已有规定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不久，在全朝鲜到处都组织了朝鲜人民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开始来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势力。但后来由于美军进驻南朝鲜，人民委员会就都被解散了。曾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主及其他一切的反动分子，都作为美国的走狗而被扶植起来。这样，在南朝鲜就实行了、甚至美国的帝国主义式的新闻记者都不得不将其断定为“在压抑人类基本权利方面，这是个史无前例的野蛮的警察国家”（马克·盖思：“日本日记”）。

相反，在北纬三八度以北的朝鲜则被苏联红军解放了。苏联红军没有实行军政，对于朝鲜内政则是交予朝鲜人民自己来决定，并援助了人民委员会。作为该委员会的中央机关，一九四六年二月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任委员长，作为在劳动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人民的政权，开始了驱逐亲日分子、将土地分予劳动农民的土地革命、工业（原为日本人所有者）国有等人民民主主义的建设。

朝鲜尽管分成了南北并为美苏两国军队所占领，但朝鲜并不是战败国，因之，在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后，就应该迅速地统一南北朝鲜，建设民主的朝鲜国家。然而，在这里也与德国一样，美

国也是踐踏了国际协定，繼續地阻撓着朝鮮的独立和統一。一九四八年六月，就建立了以李承晚为大总統的所謂“大韓民国”的傀儡政权，而且与这一“政权”签订了“美韓协定”，露骨地显示了它想將朝鮮永久地作为美国的殖民地，作为向苏联和中国侵略的桥头堡的企圖。

这李承晚一派的卖国行为与美国的野心，不問南北，都遭到所有朝鮮人的反对。朝鮮人民在八月举行了南北联合的朝鮮人民會議的选举。在这一选举中，北部的人民当然是全部投票，就是南部的在美軍和李承晚的“史無前例的警察国家”的压制下的人民，也有百分之七十八，冒着各种迫害都投票了。根据从这里表明了南北兩地区的全人民的意志，在九月九日正式成立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当选为共和国的首相。

十月，苏联紅軍一兵未留的由朝鮮撤走。但美国却依然繼續的在占領着。这时，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与朝鮮相毗隣的东北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一步以破竹之势在繼續着胜利的进攻，这一情况与朝鮮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輔而行，就更使朝鮮的民族斗争飞躍的發展了。美国及李承晚政权，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就已逮捕了十五万四千名的爱国人士，并暴虐地惨杀了九万三千人。另外一方面，又大大地增强了警察和軍队，一九四九年三月又發布了征兵法。但軍队和警察的实际指揮权却規定由美国軍官来掌握。这样，当美国鎮压了为統一、独立和民主而战斗的朝鮮人民并进一步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建立了他們認為足能以武力推翻人民共和国的軍队和警察之后，一九四九年六月才由南朝鮮撤兵了。可是任何迫害也沒有能够阻止住朝鮮人民为統一与独立的斗争。与美軍撤退的同时，南北朝鮮的七十一个政党和团体就組成了“祖国統一民主战线”，在这一組織当中，甚至南朝鮮的右翼政党也都参加了。

李承晚政权与美国,为了逃避自己的灭亡,就开始作着推翻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准备。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南朝鲜军就进攻了北朝鲜,但在开城附近却被人民军打退了。这是在十一个月后的大战争的前奏。

在东南亚,在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越南民族也打断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抗战的“越南独立同盟”,在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在河内就宣言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派大军企图击溃人民共和国,但在胡志明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年复一年地成为强国并打败了法军。在一九四九年末,就解放了印度支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地区,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得到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

在马来亚、菲律宾以及在小亚细亚和北非等各殖民地、附属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主力的全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抵抗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迫害是年比一年地发展了。

如上所述,苏联的强大、东南欧人民民主主义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胜利、全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与附属国的民族斗争的发展,就说明在地球上是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确切地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而向人民民主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过渡。从另外一方面,这一问题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是越来越迅速地没落了。帝国主义不仅永远失去了更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区,就是在其控制下的殖民地、附属国,也遭到日益发展和强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打击,早晚也是不得不放弃的。不仅如此,就是在帝国主义本国内,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势力,也远比战前强大。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就更是如此。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国会中也经常是第一党或是第二

党的。

在战前的六大帝国主义中德、日、意三国，从帝国主义强国中跌落下去了。法国虽然仍是帝国主义的大国，但对美国的从属也日益加深，而为镇压越南独立运动这一无益的战争也使得财政破绽百出了。英国在战前一直就垄断着的中近东和东南亚所有的殖民地，也被战时中向此地区活动的美国夺去了相当程度的势力，就是英国本国，在金融上也要依存于美国了。

只有一个美国才脱群而出地成了巨大的帝国主义，但企图垄断日本和德国的帝国主义遗产的美国也遭到了挫败。东南欧和中国都完全地把自己由帝国主义当中解放出来。另外，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各国也都显著地削弱，比起战前作为市场的价值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全世界中的帝国主义的市場是大大地缩小了。

美国垄断资本还是企图维持与确保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和与战争中同样高额的利润。如此，它就不能而且也不想转向和平经济，相反却是希望尽办法来削弱社会主义力量，镇压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将全世界作为自己的利润的源泉来加以剥削与统治。一句话，就是希望掀起第三次大战来征服与统治世界的。

他们在战后当时还顾及到世界的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与苏联还多少作了些协调的姿态。但战后不及一年，东南欧各国明确地并决定性地脱离了帝国主义，在希腊也发生了革命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华北也赢得了坚固的势力，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也飞跃地发展着等等，为这些形势所吓慌的美英统治者，就展开了污蔑苏联为侵略者的大宣传，一面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事实上的封锁政策，这样做了以后却非难为“苏联的铁幕”。在日本，麦克阿瑟最初公然表示反共政策也就是

在这个时期。

但不管帝国主义怎样地策动与投机，社会主义力量是年比一年地强大。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美国杜鲁门总统就提出了所谓杜鲁门宣言的反苏反共的声明，它公然宣称要包围社会主义，保卫世界的反革命。所谓“冷战”就是这样的被美国发动起来了。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并扩张了包围并进攻苏联以及为了统治该国与该地方的军事基地。

日本因其原有发达的工业和众多的人口，就被当作了远东最重要的美军基地。杜鲁门宣言几乎与战后日本历史的第二期的开始相一致也绝非偶然的。至于第三期也是与美国的侵略世界政策的新的时期同时开始的。

美国为了使西欧资本主义从属于自己、并动员它参加反苏战争，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以“欧洲复兴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为名，向西欧各国贷款，代价则是在各该国内建立美国的军事基地并强使各国来扩充军备。对此，一九四七年九月苏联和东欧六个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组织了“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来增进各国兄弟党之间的联系、交换情报以及调整活动，以期巩固地团结起来发展为拥护和平与民族主权的斗争。在这期间，以中国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与东德的民主的发展为首，就不仅使帝国主义感到头痛的局势发展了，而且，也由于美英自己也发生了危机，这样，美英就越发加强了对苏战争的准备，企图由战争经济来逃脱经济的破绽。这样，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在美国的指挥之下，美国与西欧各国就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对抗苏联的军事同盟，企图以同盟军的力量来镇压各国的人民革命力量。

针对这种美国及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的战争政策与西欧各国的

对美国的从属，为了拥护和平和主权，各国人民就展开了强有力的斗争。军需生产的扩张也畢竟沒有成为解救经济危机的妙药。在一九五〇年初，美国又陷入了萧条状态中。而且，西欧各国的垄断资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表面化了。围绕着从整个来说是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彼此间的对抗也不可避免的是更发展了。美国的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非但未削弱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相反，由于世界市场二分为帝国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就使帝国主义国家更加困窘，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大胜利，就成了对帝国主义的新的、决定性的打击。

五 朝鲜战争和单独媾和

美帝国主义，作为挑起新战争的据点，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远东。日本的美军基地化，使日本工业从属于美国战争经济并使其军事化，对于美国统治者来说就成了紧急的课题。而这样的政策，与在西欧各国一样，就是在日本也要遭到人民的强烈的反击，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因此，一方面在猛烈地推行法西斯政策，另一方面又给予日本“独立”的名目，以“独立日本”的“自由意志”来协助美国的形式，来掩盖其殖民地统治的实质。这就是单独“媾和”的阴谋。从这里就开始了战后日本历史的第三期。

第三期 如前所述，是从第三次吉田内阁的成立（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的单独“媾和”条约的成立为止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又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分为前后两期。

为了反对吉田内阁的法西斯政策及公然的卖国政策，使日本

工業成为美国的承包工業与軍事化，反对为確保巨大壟斷資本的利潤而大量解僱、企業整理以及作为这一切的前奏的行政整理(解僱国营、公营企業的职工)等，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到夏天，就爆發了以国营鐵路工人为首的工人階級的强大的斗争。为了鎮压这一斗争，美国占領軍和吉田政府，就制造了一連串的莫須有的事件。

六月，首先国鉄总裁下山定就突然死亡了。当时，尽管还没有断定是自杀还是被杀，但政府、御用报刊和广播等，却大肆渲染將其說成是共产党员国鉄工会的積極分子的杀人行为，并借工会因此陷入混乱之际，就实行了国鉄的第一次的解僱。当然这件事与共产党和左翼工会是無任何关系的。下山是有着被美国或是日本統治者当局杀死的嫌疑。当工会为沒預料到的莫須有的事件而陷入混乱之后，立即起来准备作斗争的途中，七月十五日夜，从东京三鷹的国营電車車庫中，誰也沒有開車，而電車却猛冲出来，致使出現了十数人的死伤者。事件立即就被宣傳成共产党员的活动，以至于很多的党员和国鉄工会的積極分子都非法的被逮捕了。其后，判決的結果，就是审判長也不得不承認說，推事所主張的这是共产党的活动一事，只不过是“空中樓閣”而已。尽管如此，美日反动派仍借此事件实行了第二次的解僱。

但以国鉄工会、全国邮电工会、民間企業如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工会为首的大的工会都巩固地團結起来反攻了。对此，八月十七日夜，又制造了第三次的莫須有的事件。在东北本綫松川車站附近，不知被什么人把旅客列車顛复了。这也被指摘为共产党和工会的活动，并逮捕了国鉄工会和东芝松川工厂工会的積極的領導者与共产党员。后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在福島法院宣判被告全員皆有罪，并宣判五名为死刑，五名为無期徒刑，其他十名合計也被处了九十五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但是这事件完全是莫須有的，有無數的証据可証明被告全員是無罪的，是被美帝国主义和吉田政府的陰謀所誣害的。第一，沒有一个物証能証明被告是有罪，而唯一的証据只是由于警察和推事的拷問，按照他們既定的意圖被迫談出来的一部分被告的“坦白”，而这“坦白”不但是錯誤百出，而且还包括了彼此間的矛盾，这就証明了这一“坦白”只是被強制的架空的故事而已。例如，当夜由于陰雨是很黑暗的，但事件發生前后的时刻却变成了皎月当空的晴天。但是“坦白”的签字書上，却写的是暗黑之夜，这样問題是不可能記憶錯誤的。

第二，說顛复列車所用的鋼鉗，不論在工學上或是在實驗上都証明，以这样鋼鉗完全不可能顛复列車的。

第三，法院和推事是有意的隱藏了对被告有利的証据。例如被告之一由于有病，在醫學上已証明被告是不可能参加这一“犯罪行为”的，但审判長却有意的將診斷書隱藏起来。另外，推事也將物証的鋼軌接縫夾板隱藏起来了。

第四，被指摘为被告們的“共同謀議”的場所，是很多人一直在自由出入的、从屋外一見即知的工会事務所，这就証明，在这里發动这样大的事件的“共同謀議”是不可能的。

此外，被告是無辜的一事，就是最細小的地方也可以得到証明。就是从普通常識来考虑，由于下山事件和三鷹事件的誣賴使工会和共产党遭到打击的时候，有經驗、有思慮的工会和共产党的活动家們發动这一事件又有什么利益可期待呢？相反，由于將此事件被指摘为共产党和工会的活动，使美帝国主义和吉田反动政府以及大資本家，却得了莫大的利益。他們以下山、三鷹、松川三次莫須有的事件，就击败了相当强有力的工会的反解雇斗争，在工会中也加强了民主化同盟、再建同盟和刷新同盟等各色各样的分

裂主义者，削弱工会，强行解雇，为日本工业的军事化造成了基本的条件。

另外，在松川事件第一次审判时，美国占领军的 CIC 的军官竟与审判长并排的坐在一起来监视审判，从这一事实也就说明了这一审判的本质。

松川事件的半月后，借口说“朝鲜侨民联盟”违反了团体等规正令而被解散了。这时在朝鲜恰恰是美国统治者与李承晚一派在拟定进攻北部计划的时候。

与此前后，美国也公然开始了对日本单独“媾和”的活动。对日媾和，在一九四七年春，在联合国已经提出过了，但美国践踏了波茨坦公告的媾和条约草案要由美苏中英四个国家起草，并要由四国一致才能决定的规定，在美国从国家占多数的远东委员会上，主张以多数通过来起草，而与主张实行波茨坦公告的苏联相对立，这样，对日媾和问题就被搁浅了。这是由于美国企图在媾和后，仍驻军日本，继续其事实上的占领，因此，如果实行波茨坦公告时，则这一企图就会遭遇到困难。

其后，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又强烈地感到有“重新武装日本、利用日本的人的资源”的必要，因此就加强了它的使日本在外形成为“独立国”为上策的想法。特别是由于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的要求的高涨，也就不得不想些办法来欺骗他们。就是麦克阿瑟，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也说过，如军事占领连续五年以上，则在占领军与被占领国民间就会产生对立，而这一点则是不好的。美国将对日媾和问题，一直的首先是作为美国的远东战略问题，作为便于将日本的国土、财富与人力利用于美国的战争目的的问题而处理的，是完全没作为日本的独立和实行国际协定的问题而考虑的。而这一点也就最清楚的说明了这对日“媾和”的本质。

日本的备战财政，早在道奇所制訂的一九五〇年度預算草案中就表現出来了。在最重要的軍需品的石油关系的公司，都滲入了美国資本，从一九四九年秋，石油的輸入和貯藏就激增了。大的重工業和化学工業的企業，也被美軍指定为PD工厂*（生产美軍需品，接受美軍監督的工厂）。日本农業也加深了对美国的从屬。政府不謀求国内农業的增产和發展，却以高出国产大米的收購价格一倍以上的高价輸入美国傾銷来的粮食。实际上这并不是輸入粮食，而是輸入美国农業危机的。

工会、农会的分裂工作也逐漸的活躍了。为此，以拥有六百万工会會員的战斗力和夸耀的產業职工会會議，到一九五〇年初，就縮小到以前的十分之一。农民战綫在分裂中也削弱了。

然而，尽管受着工会干部的分裂主义、騎牆派和叛徒的困扰，但反对解雇工人农民、要求提高工資、反对苛稅等的斗争，却仍是非常活躍的。不仅如此，現在他們还将日常斗争与反对軍事基地、要求全面媾和相联結起来了。进步知識分子、学生、妇女团体，为了和平与独立，为了反对軍事基地，反对教育的殖民地化，为了全面媾和与拥护民族文化也开始組織了广泛的战綫。

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綫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就提倡了民主民族战綫。一九四九年九月，当任何人都沒有提出来的时候，就提出了反对单独媾和与軍事基地化，要求立即締結全面媾和，撤退所有占領軍的口号并为此而斗争了。但是，当时却并没有將美帝国主义及其占領軍的性格向国民明确的解釋清楚，而且，党最高級干部之一的野坂參三还提出在占領下也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張。这样下去，是不能够領導为和平与独立的国民斗争的。这时，一九五〇年一月“共产党与工人党

* PD工厂即 Procurement Demand Plants 的簡称。——譯者

情報局”就徹底批判了野坂“理論”，指出日本是在美帝國主義全面控制之下，日本正在為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國內反動派軍事基地化和殖民地化當中，因此，共產黨就應堅決的與他們作鬥爭。

日本共產黨積極的接受了這一批判，在新方針的指導下就充沛的活動開了。麥克阿瑟為此所嚇，五月三日就暗示要使日本共產黨非法化。繼而就鎮壓了五月三十日在東京召開的“為了全面媾和的人民總蹙起大會”和本來應在六月三日於全國範圍內要舉行的“突破工業危機國民大會”。緊接着在六月又突然的下令解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整肅全中央委員，翌日又整肅了十七名黨機關報“赤旗報”的幹部。

這一對共產黨的鎮壓，不外是為六月二十五日開始的朝鮮戰爭作準備的。

在朝鮮，五月間曾舉行了南朝鮮國會的大選。這次大選是在李承晚派猛烈的干涉下、在警察對有選舉權者加以暴行與威脅的情況下舉行的。儘管如此，但公然以李承晚的當政黨的名義出來競選的人卻仍然落選了。這次大選就進而鼓舞了對全朝鮮的和平的統一的希望。南北朝鮮的愛國者，頻頻的在三八綫附近集會，而全國的和平統一運動也迅速的發展了。

這一種形勢，就堅定了美國與李承晚派的軍事冒險的決心。美國聯合參謀本部主席和國防部長兼國務院顧問杜勒斯，六月十七日來到日本與麥克阿瑟作了些商議，後又飛至南朝鮮，十九日在政會上，就煽動說，如南朝鮮與共產黨軍隊作戰，則美國將給予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援助，而在第二天則又進一步慫恿了李承晚去發動戰爭。當時李承晚就對美國記者說“我們只要得到美國的許可，幾天之內就可攻下平壤給大家看”。同一時期在美國，就已經出現了一批預計到朝鮮戰爭，起而囤積大豆的大資本家。

六月二十四日深夜(二十五日晨)南朝鮮軍越过三八綫大举进攻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立即声明反击,并很快地將南朝鮮軍赶到三八綫以南。

美国杜魯門总统,二十六日就立即声明要援助南朝鮮,翌日又下令出动了美海、空軍,并以第七艦队封鎖了台灣海峽,企圖以实力来阻撓中国人民解放軍的解放台灣。这时,它虽然表示不派美国地面部队赴朝鮮,但事实上,美国陸軍已經是在朝鮮了。二十八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尽管苏联沒有参加,却仍篡夺了联合国的名义,断定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通过要以武力制裁的決議,从此,美軍也就冠上了“联合国軍”的名义。

但南朝鮮軍与美軍却被人民軍打得头破血流。六月二十八日,汉城很快的就归于人民軍的手中,八月中,就把美国和南朝鮮軍队赶到以釜山为中心的朝鮮东南端的一隅。只是因为人民軍沒有飞机,所以才在这里形成了膠着状态。这时美国的大軍却轉到背后由仁川登了陆。战局一变,美南朝鮮軍轉入攻势,再度的突破了三八綫,十一月初就攻近了朝鮮与中国东北的边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国”的口号下,就向朝鮮派出了志願軍。接着朝鮮人民軍与中国人民志願軍就轉入大举反攻,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就使美軍陷于潰灭的状态。一九五一年一月初,朝中人民軍队就打到了汉城以南的水原附近。

从一九五一年一月末,美軍又以新銳的龐大兵力反攻,到春天为止,好容易才到达了三八綫附近。其后,美軍虽然投入了远比太平洋战争所使用的更多的物資,以大的兵力几次的想轉入攻势,但每次都是付出了莫大的牺牲而被打退了。

日本,作为这一战争的基地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駐日美軍出动后,为了留守,为了鎮压为和平与独立的国民斗争,作为美国

的僱傭兵，作为重新武裝的第一阶段，七月八日麦克阿瑟就命令吉田首相建立七万五千人的国家警察預备队，并命令 將海上保安厅的規定人員由一万人增至一万八千人。这一命令由于一直就有着准备和計劃，所以就很快地实施了。八月二十三日有七千人的第一次預备队入伍者就穿上了美軍的軍服。到了年末，这支軍队就扩大到美式的四个步兵师团。預备队的武器是由美国“貸給”的，并且在教授这些武器的管理与使用方法 的口实下，在預备队中就配备了美国的軍官与軍士，由他們来从事 訓練与领导。海上保安队——小型海軍——的增强，也是以很快的速度进行了。

如此，日本的重新武裝，就大規模的 进行了。反动政治家、大資本家、大地主和旧軍閥对更公开的，更大規模的重新武裝的要求也更聳張起来。与此同时，警察和特审局(特高警察)和它們的中央机构也加强了。所有的反动势力都被动員起来。一九五〇年十月以前作为过激国家主义者、軍国主义者而被整肃者的当中，有一万人以上被解除了整肃。从这时到翌年八月为止，包括旧軍人在內的所有的反动势力的整肃都被解除了。右翼团体也公然的复活了。

日本巨大的壟断資本，接受了美軍的从事朝鮮战争的訂貨(特需)，而大發其財。工矿业生产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止，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特别是机械工业 生产竟超过了百分之二百，金屬工业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电力和煤气的生产，如以太平洋战争前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 平均为一百，則一九五〇年就达到了一百八十六，而一九五一年一月又增高到二百一十。然而，就是从这一九五一年起，人民的家庭与和平工业却为停电所苦了。这是因为电力被軍需工业和美軍所占用的緣故。我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清楚的暴露特需 景气的原形，說明了日本

工業的軍事的“復興”對誰有利，而又對誰是痛苦的。

由於特需景氣，大資本家的利潤比前一年增加了七倍到一百五十倍，但國民羣眾，却為物價的高漲和日益增加的重稅所苦。在戰爭開始後不久，與中國的貿易是全面的被禁止了，輸入品就必須付出高額的代價和運費從美國購買，而輸出除了向狹小的東南亞市場外則別無他路。這樣就更使中小工業與和平工業遭到了深重的打擊。

在农村則一味地推行着為加強地主制度的政策，农村經濟的破壞也加深了。而這一點也正被認為是為了重新武裝、製造出“人的資源”所必需的。

對共產黨和工會的迫害，也越來越兇惡。在政府機關和公私企業中都強行了“驅逐紅色分子”。為和平與民主堅決鬥爭的民主報刊，如改裝的赤旗報及類似的報紙都被蠻橫地禁止發行了。另外，歸併了“民主化同盟”的“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在“盟總”的援助下，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也正式成立了。一九五一年五一節時，人民廣場也被禁止使用了。

這樣，美國統治者與吉田政府一面進行着日本的軍事基地化、殖民地化、重新武裝及法西斯化，一面就在進行着單獨“媾和”。在這裡雖沒有足夠的篇幅來評述這一過程，但當一九五一年一月末，在杜勒斯來到日本與吉田首相會談時，就已經決定了後來在舊金山簽字的“媾和”條約的主要內容。當時，杜勒斯在日本報紙上就曾發表說，媾和後，佔領軍一旦撤走則日本就會發生“軍事的真空”，因之，也就會產生共產主義的直接或是間接侵略的危險，所以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如果日本希望的話”美國“就可以善意地考慮在日本國內或者是其周圍繼續駐紮美國軍隊”。

可是，同一個杜勒斯在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報告中，就說通過杜

勒斯与吉田的会谈,不仅“在媾和后,美国仍保有在日本本土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的权限一事取得了日本的同意”,而且杜勒斯对吉田“还强调了,在目前的时期内,美国对日本的政治独立和领土保全方面不负义务”。而这一件事也得到了吉田的同意。这一点后来就作为“日美安全条约”而具体化了的。美军不是为日本的独立与安全保障,只是为了在事实上继续占领,为了将日本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杜勒斯才说在“媾和”后,在日本全土设置陆海空军的。杜勒斯与此同时还会与麦克阿瑟商量过为使日本工业成为美国战争经济的承包业的措施,这一措施,在“日本经济协力”的名义下,也具体化起来。

吉田是博得了杜勒斯的欢心,但英国是不满于美国企图以它的媾和条约草案,将日本置于美国的壟断的统治之下的,菲律宾也因为日本对它的赔偿义务不明确一事也抱不满等等,这样就在他们之间也出现了部分的反对美国的草案之举,但杜勒斯却以威胁和利诱的办法强使他们通过了。但苏联却是坚决地反对美国草案的。反对的要点,主要是第一,它违反波茨坦公告,第二,美国草案并未规定日本的非军事化,第三,未明确表示占领军的撤退时间,也没有提出对重新武装日本的限制。但是,美国无视这一切,仍进行了“媾和”活动。

九月四日至八日在旧金山的“媾和”会议上,对日“媾和”条约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以外,在美英及其仆从国家等四十八国与日本之间签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被邀请的,台湾逃亡政权也没有被邀请。印度与缅甸,认定这不是真的媾和条约,因此,虽然接到了邀请,但却拒绝参加了。也就是说,对日媾和是在与日本战争最久的,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受到最大痛苦的东亚三大国以及对东亚有着深切关系的苏联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签订的。印

度的报纸也说这“完全是白人的条约”，就是马来亚英国方面的报纸也非难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受到损害的是亚洲人，但就是在完全不顾八亿五千万的亚洲人的心愿的情况下”签字的。

继之，在同一天吉田首相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当吉田与艾奇逊之间换文之际，吉田在文中就约定了与媾和条约生效的同时，日本“不拘在任何行动方面，都将给予联合国以各种援助”。

“和约”与“安全条约”，十月二十六日在国会中以多数通过并批准了。反对媾和条约的有社会党左派、劳农党议员和全部的共产党议员及其他四个议员，而对“安全条约”除了上述四党外，右派社会党也加以反对了。紧跟着将“安全条约”的实质的内容具体的加以规定的“日美行政协定”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也签字了。从此，第一，美国就永远的将日本全国作为它的陆海空军等基地；第二，铁路、电信及其他日本的整个公共设施，就被美军优先地利用了；第三，美军及其家属，不拘在基地内外，在日本国内都完全有治外法权；第四，他们有免缴关税以及其他的经济特权；第五，为了保护美军的利益，日本负有制订特别法律义务，根据这一点，就制订了“特别刑事法”，“特别民事法”及其他法律。而这也就等于保障美军拥有像过去日本军阀所持有的那样的特权地位。等于为美军提供了像过去那样的用来保护军阀独裁的防谍法等是一样的。

最后，不管是“日美行政协定”，还是“安全条约”，都没有明确美军出动时的条件和手续，这一点在实际上就使得美军能够在“为了远东和平”，“为了日本的安全”的借口下，为所欲为地发动战争，而且，还使日本对这样的战争负上了要予以协助的义务。

行政协定、安全条约和“媾和”条约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藉

此,在形式上日本是“独立”了,但实际上却被束縛在被凌辱的殖民地隶属状态。就是菲律宾对美国的从属也是没有这样深的。在菲律宾,美英基地的数量是被限制的,治外法权也只能适用于基地以内。日本的这种情况与以前的“满洲国”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日本的完全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情况是同样的。

这媾和条约、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了。吉田政府屈服于杜勒斯的威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反認台湾逃亡政权是中国政府并与之“媾和”。日本与台湾间的和约也是在这一天生效的。但爱国的人民却是将这一天作为最悲痛的国耻日的。

六 独立、和平、民主势力的发展

从“媾和”条约签字后到现在,是战后日本历史的第四期。“媾和”之后,重新武装日本,使日本军国主义化与法西斯化就日益公然并迅速地进行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军火的制造,由于得到了占领军的准许,也公然并大规模地进行了。而这一点,同时也就是意味着日本经济对美国从属的加深。大资本家们是企图破坏民族工业、以重新武装和美军特需来获取其最大限度利润的。国土的军事基地化,在“媾和”后,比公然的占领时代是更大规模地实施了。

美军基地现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在全国已超过了七百处,基地占用面积大体上相当于整个大阪府的面积,如果连同受基地直接影响的周围的地区加算在内,则几乎是等于四国整个地方的面积。美军横行于日本的山、海、平原和天空。在基地附近聚集了作为美军玩弄对象的娼妓,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失去了正常生活的道路,

而不得不去做些杂事来维持生活。如同狗的社会环境一样，教育是被破坏了。日本的姑娘也被美军所蹂躏了。

农民群众是竭力的为反对基地而斗争。但农村的统治者和地主们，则挑选了寄生于美军的生活道路，站在卖国的最前沿来驱使乡民。也就是说农村的封建制，在这时就成了占领制度的直接的支柱。地主作为农村的占领制度与反动势力的地盘被扶植起来，而为了制造出大资本家的廉价工资的源泉和重新武装的“人的资源”也就更加强了封建制。

重新武装在“自卫力渐增”的名义下，迅速地在进行着。警察预备队从一九五二年七月就改称为“保安队”并增至十一万人，拥有美国供给的坦克和大砲，比旧日本军多有数倍以上的火力。“海上警备队”也由海上保安厅中独立出来，并得到美国的驱逐舰和砲艦。在把保安队与警备队合并的基础上，又组织起了保安厅，进入一九五三年后，进一步还想建立起航空队。保安队的干部，大批的被派到美国的军官学校去留学。

国家预算中，仅仅称作“防卫分担金”的美国占领军——现已改为驻军——的费用、安全保障费和保安厅费等纯军事费，一九五二年度就占了支出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一，达一千八百二十亿日元。然而，预算中的军事费还不仅于此的。工业投资和公共事业费也都是为了军事工业和军用道路支出的。就是在气象观测方面，根据日美行政协定，首先又是为美军而服务的。因此，这一笔费用也就成了军费，从这样角度来看，今天，由于国家本身从属于美国并全面的为其军事目的而服务，因此，也就使整个预算带上了殖民地军事预算的性格。

为了强行这样的殖民地奴隶化政策，我国国民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就愈来愈被剥夺完了。破坏活动防止法便是这样的，即不顾

全国国民的反对而制订的。“住民登記法”也实施了。警察的中央集权化也在进行,劳动法規也改坏了,在“緊急調整”的名义下,罢工权也受到了重大的限制。(一九五二年六月至八月)。

同时,在社会、文化領域方面,冠以“开倒車”“复古論調”等*名銜的封建的、法西斯的、軍国主义的習慣,制度和傾向都公然被复活了。而这一問題的焦点,就是企圖以此为恢复天皇的神的权威所做的尝试。

麦克阿瑟曾揚言說,“天皇就是个优于二十个师团的战斗力”,为了重新武装和复活軍国主义,复活作为其精神的核心的天皇权威是必需的。天皇权威的复活,并不仅是复活裕仁天皇一人的权威,而且也是农村的地主、家庭的家長、工厂的职級制度以及其他各处的“天皇权威”的复活,是“天皇陛下的警察官”对人民專制的复活,是特权官僚專制的复活。而且,也正是由于天皇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僕从,因此,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統治和国内半封建性以及美国壟断資本的結合,也就很恰当的被襯托出来了。崇拜天皇就是国粹主义,而且,也正由于这样,所以它也就成了殖民地式的頹廢的別名即世界主义和卖国主义。

* * *

由此看来,似乎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把一切事情說得都是太平平的,但在事实上却是相反的。他們的法西斯統治,只不过是他們的垂死的掙扎而已。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都瀕于破綻,其經濟矛盾在日益加深,日本的反动派尚不及他們,是更加削弱和不穩定了。

在朝鮮战争中,美国在軍事、政治、道德各个方面都完全失敗

* 战后美日反动派为恢复軍国主义,在社会、文化方面又鼓吹恢复旧封建的一些習慣語如茶道、栽花等等。——譯者

了。从一九五一年四月起，战綫虽然是膠着在三八綫附近，但战斗并未减弱，相反却更加激烈，美軍的牺牲更是徒增不已。制空权过去是为美国壟断的，这是他們唯一的依靠，但从一九五一年起，朝中人民軍队方面也出現了米格式战斗机，而且把美机打得落花流水。另外，人民軍以裝有雷达的高射炮，也不断地打落了美国飞机。

在政治上，美国在联合国中也开始孤立了。亞非各国也是不贊成美国的战争政策的。英国和法国的政府也在国内群众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斗争力量的压力下，同时，也忍受不了美国强加在他們的身上的重新武装的负担，因之，对于追随美国扩大朝鮮战争一事，也就不得不陽奉陰違的来抗拒。

因此，杜魯門总統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也就不得不將为打开朝鮮战局而焦燥的、企圖立即掀起世界战争的麦克阿瑟免职。其后代表着世界人民的和平呼声，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駐联合国的苏联代表馬立克就提出朝鮮停战的建議。美帝国主义被迫接受了这一提議。这样，停战談判就开始了。对此，美国虽曾数次想加以破坏，甚至还强暴地轟炸了規定为中立区的談判的地点，但他們也終于未能破坏了停战。

在停战談判中，美軍还發动了細菌战，并对战俘施以非刑拷打，迫使他們表示不願回国，甚至將他們重新武装起来編入南朝鮮軍队。为了掩盖这一事实，美軍在停战談判会上对停战后的战俘交換問題，竟違背彼此交換全部战俘的国际法的規定，而主張所謂的“願意回去的才回去”的“自願遣返”。他們大事渲染說，强使不願回共产党方面的人回去是違背人道的，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不忍这样做的。然而發动細菌战、在战俘身上刺字并对朝鮮慘無人道的施以濫炸的美帝国主义的“人道”究竟是甚么，在一九五

二年五月七日，当巨济島战俘营的朝中人民軍隊被俘人員起来扣留了战俘营司令官之时，就清楚的暴露出来了。

战俘向战俘营司令官提出了(一)不准將战俘做原子武器和細菌武器的实验对象，立即停止暴行、虐待和集体屠杀，(二)立即停止实行非法而無理的“自願遣返”，(三)必須立即停止此等企圖重新武装战俘的强迫甄别的要求。为战俘所扣留的战俘营司令及其后任者也都接受了这一要求，明确地承認了过去在战俘营中是虐杀过大批的战俘，并对他們强迫施行甄审这一事实。所謂美国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的。

到了这时，就是英国的反动报纸也公开地开始非难美国說“联合国軍”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朝鲜战争的，是“沒有任何好結果”的。美国也曾努力企圖在战俘的“自願遣返”的名义下，强迫扣留与强迫重新武装来破坏停战，但一九五三年后，由于美軍士兵的士气日益低落，在中部战綫的重要高地又归于朝、中人民軍隊之手，而且，全世界对和平的要求也日益高漲，这样就更加深了美国政治的孤立，終于美国也不得不妥协，根据朝中方面的新提案，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兩軍代表在遣返战俘协定上签了字。

其后，李承晚在美軍的支持之下，先“釋放”了被俘的朝、中人民軍人員，使之变为一介市民而后即把他們編入南朝鮮軍，企圖以这种最后的掙扎来破坏停战。但这也只是对全世界暴露了破坏和平，希望战争的就是美国及李承晚，也暴露了他們是对任何协定都是背信棄义加以破坏的战争投机狂。七月二十七日朝鮮停战正式成立。和平力量得到了偉大的胜利。企圖破坏停战的李承晚和美帝国主义的冒险只是碰了一鼻子灰，而和平胜利却日益光輝。

在这胜利的背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經濟會議、亞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會議等拥护世界和平的运动，是年比一年的發展，

“以協商來解決問題”的呼聲，現在是遍及于全世界。

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在一九五一年和五二年是更加擴大、更加深入了。不僅在東南亞，就是在中東的伊朗，北非的埃及，在中非的我們認為文化是最低的地方，在各個殖民地附屬國，沒有一個地方民族獨立鬥爭不是發展的。

企圖封鎖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主義的美國的政策，相反却苦了他們自己。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擴大與深刻化，就使帝國主義市場是日益狹小與不穩定，而圍繞着這狹小不穩定的市場，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美英的對立。英法及其他西歐資本家正在由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中找尋出路，而這一點與美國的利益却是不一致的。美國與西歐資本主義的矛盾加深了，不管美國如何強迫，歐洲軍仍不能組成，不管是法國也好，意大利也好，向美國一邊倒的政權都是不能持久的。美國自己雖然將自己的經濟困難轉嫁到殖民地附屬國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並以戰爭經濟來緩和其困難，但自一九五一年秋，就是這樣，也仍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中。固然它也曾企圖以擴充軍備來打開這個局面，來繼續朝鮮戰爭，但現在就是擴充軍備也失掉了打開危機的效用。

在全世界，為推行破綻百出的帝國主義政策受美國任意擺弄的只是日本的吉田政權（及為其基礎的天皇制與天皇制官僚、半封建地主和買辦壟斷資本）。可是就在日本，從“媾和”後，以特需來掩蓋的經濟危機也掩蓋不住而表面化了。為了逃避這種危機，吉田政權及其一派就日益加深了對美國的依附，並企圖來接受其主子的“援助”。而體現這一點的就是前述的賣國、重新武裝的法西斯政策。

但國民對此的抵抗和為獨立與和平的鬥爭，却是以日本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在一天比一天的高漲着。

在旧金山和約簽訂之前，一九五一年八月，日本共产党在党内就提出了“当前的要求”，經全党討論后，在十月第五次全国協議会上，作为綱領正式地決定了。这一綱領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占領制度是如何的使日本国民痛苦，指出吉田政府就是这一占領制度的精神的政治的支柱，指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是必然的，而这一革命又只有在工人階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主力，建立除吉田政府及其一派的卖国势力以外的所有国民的統一战綫才能完成。此时，由于占領軍和吉田政府是要以暴力来維護它的地位的，所以“就必須作不懈的革命斗争，以和平的方法是不能够建成民族解放的民主政府的”。

共产党的新綱領是率直地代表了国民的要求。而这新綱領又是深入到工人、农民、市民和国民各个階層去了。即使不贊同共产党、在选举时投自由党票的人，他們的要求与行动也常常是与共产党的新綱領相吻合的。

最大工人組織的总評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当总評产生之际，是以“盟总”为接生婆的，而“盟总”也是以此而夸耀的，但到了这时，就是工会干部也不得不反映一些工人群众的要求了。因此，总評也逐漸地坚持了反对媾和“条約”和“日美安全条約”的斗争。进步的工人，在工厂中也开始建立了抵抗与自衛的組織。在农村，也同样的以貧农与山林工人为主力，發展成廢除封建地主制的嶄新的农民斗争，在这里也开始建立了自衛的組織。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苏联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应共同通訊社之請給予过日本国民新年賀电。在这里面反复的期望工人能从失業和低廉工資中解放出来，农民能获得土地并由重稅中解放出来，預祝整个日本国民和知識分子能为民主势力的完全胜利，为經濟生活的提高与民族文化、科学、艺术的繁荣而斗争，預祝日本国

民和各个阶層为保衛和平的斗争的成功和日本国民为祖国复兴与独立斗争的胜利。

斯大林的贺电,作为对日本国民为和平、独立、民主的斗争的国际和平、独立、民主的希望和鼓励而为国民接受下来了。

为和平、独立、民主的国民斗争日益高涨。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斗争,以总评为中心,工人和知识分子一齐起来了。总评发动了三次的全国性的罢工和抗议集会。在这斗争当中,煤矿工会的动摇分子被摺弃了,工人的团结和统一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场远比二·一罢工更为发展了的斗争。

另外,几乎全国的大学教授和学会,都为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而作了各式各样的斗争。这种情况与以前制订治安维持法时的情况是不可比拟的。但该法也终于在国会中通过了。然而,对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为了反对该法,拥护民主主义的、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数百万的工人、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统一斗争的发展。

这一斗争发展的结果,就成了“在人民广场召开和平、独立、统一的五一节”的要求。但政府是不拘如何也是不让使用人民广场的。五月一日,晴朗的五一节在青山开会了。四十万的工人、市民在这里集会,响亮地喊出了要求和平、独立、废除“媾和”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及打倒吉田政府的声音。在青山会场开会后,就开始了示威游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工人就向日比谷公园出发了。为响应大会决定的“继续为获得人民广场而斗争”的学生、自由工会和民主青年团等,又是走在中部和南部地区队伍的最前头,从日比谷公园走向了人民广场。

警察是蓄意的将工人尽量地让进四周是濠沟的广场,然后再企图加以包围与袭击的。不知此情的工人和学生的先头队伍,二

時半在二重橋就樹起了紅旗並唱起了國際歌。正當此際，當人民認為人民廣場已經奪回的時候，突然的，三個中隊全武裝的警察就襲擊了工人們。鮮血洒地，呻吟之聲瀰漫了廣場。突然遭到阻擊的遊行隊伍，一旦退却之後，就果敢的赤手空拳沖向了武裝警察隊。警察隊施放了毒瓦斯，亂開手槍來屠殺人民。在這期間，遊行隊伍的後續隊伍也來到了。警察隊也增強了，這樣，在三點鐘以後，數萬的工人、學生和市民與五千以上的拿着特殊手槍及催淚彈的警察隊就混戰起來。人民方面，已查明的死者有二人，估計姓名及屍體的下落為警察所隱藏起來了的死者數人，有一千餘人負傷。四時左右，遊行隊伍離開人民廣場，在廣場附近又與流動的警察軍展開了戰鬥。這時，在廣場周圍濠溝旁的美國占領軍高級官員的汽車和警視廳的汽車共十四台也都被燒毀了。

檢察局和警察，給這些遊行示威的參加者冠以“騷擾罪”的罪名，逮捕了一千人以上並把他們打進了牢獄。

東京的血的五一節，是日本國民在“媾和”條約生效後的第三天對“媾和”條約的答复，表示了日本國民對奴化民族、出賣民族、蓄謀戰爭、破壞民主主義者的堅決的鬥爭。這一鬥爭被非難成共產黨的暴力活動。但，假如這僅是共產黨所作的話，那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統治階級恐怕也不會害怕的。在這鬥爭中，共產黨員的確是站在這一鬥爭的最前面，但並不只是共產黨的鬥爭，而是黨員和數萬的群眾成為一體的國民群眾的鬥爭，也只有這件事，才使它成為歷史的事件。

此後，國民在為和平、獨立與民主的鬥爭中並未被當權者的暴力所吓倒，相反，祖國所受到的殖民地化的犧牲越深，而國民即使是最落后的階層也都愈益堅決的起來鬥爭了。

一九五二年末的煤礦工會和電氣產業工會，特別是煤礦工會

的長期罷工，甚至可以說是被礦工的妻子和女兒的活動所支持的。如反對征收土地充作軍事基地而起來的石川縣內灘村人們的鬥爭，就形成了該村和石川縣全日本的工人、農民和市民的鞏固的統一鬥爭，村民一直靜坐在美軍實彈演習的彈道之下，來反對對土地的征收，鐵路工人也拒絕運送美軍的炮彈和軍需品等，展開可歌可泣的鬥爭。就是在美軍刺刀監視之下勞動的軍事工廠，也頻頻掀起了敢死的罷工。

另外一方面，和平、獨立和民主戰綫也非常地擴展了。例如中國的日僑回國問題，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犧牲的、被日本強虜過來、被強迫勞動所殺的中國抗日烈士的遺骨的送回中國的問題，這一切問題都被打破了日本政府的阻撓，不管政黨、階級和思想信仰不同的日本國民各階層的代表之手所解決了（一九五三年四月至七月）。日本政府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的，但日本國民和中國則是發展了和平友好和人道的堅強的友誼，而這一國民的力量又大大地壓倒了反動政府。

原本，美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賣國勢力是有着權力和財力并壟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宣傳教育機關，又有着組織得良好的統治人民的機關和暴力。因此，要最後的打垮這些不是容易的。而且，和平、獨立、民主的國民鬥爭也仍然是未成熟的，也不免會有錯誤的。所以，國民也許還會常常受到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壓迫。然而，歷史的大的方向是已經定規了的。和平戰勝戰爭，獨立戰勝殖民地的壓迫，民主戰勝法西斯，我們是有這種戰勝的力量，而且，這一力量，在全世界、在日本也是日益在加強着。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正為自己的矛盾和削弱在苦悶着。日本國民獲得最後勝利的日子是不遠了。

回顧起來，我們日本人是有着光輝的、為和平、自由和民主而



不屈不撓的斗争历史的。在这世界文明圈外的小島上面，从我們的祖先居住时起，就与自然条件的不利而斗争，尽管有着远离文明世界这一历史条件的不利，但我們的祖先，仍一面虛心和苦心地学习了先进文明，脱去了原始的野蛮，奠定了日本人自己的文明，打破了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紀农奴制，当十九世紀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將亞洲各民族作为殖民地附屬国的时候，我們的父祖，就排除了这些压迫而独立了。

当时，只是由于国内的民主主义革命未能胜利，由于是在天皇制和半封建地主制的主导下而完成的独立，近代工業也是与半封建地主制相勾結而發达起来的。因此，与完成了独立的同时，天皇制也就成了对鄰国的侵略者，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的發展，就越来越变成了侵略的軍国主义，最后終于走上了侵略世界的道路，其結果却反而丧失了民族的主权，而形成了今天的慘狀。

然而，就在这期間，我們民族的最善良的人們，也从未停止过为和平与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我們繼承了这种悠久的强有力的傳統并使其發展，这样，就能爭取到独立，能够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的日本。

